

旅华岁月

—— 海伦·斯诺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DE38/27

旅 华 岁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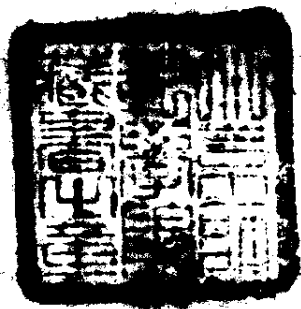
-海伦·斯诺回忆录

华 谊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5058



世界知识出版社

1085058

DE 38/27

出版说明

本书是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夫人海伦·斯诺的回忆录，记述作者1931年来华到1940年底离开亚洲期间的经历。作者来华后不久即与斯诺相识，后又相恋而结婚。夫妇二人作为外国驻华记者，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报道。他们与我国进步人士来往密切，同情并支持我国革命事业。1935年他们在北京经历了“一二·九”运动，后来又分别秘密访问延安，并都曾著书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事业。抗战爆发后，斯诺夫妇与路易·艾黎等人为在中国开展工业合作社活动而奔波忙碌，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作者在书中回忆了这段期间的所见所闻，回忆了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我国革命领袖以及进步人士的交往。留下了可供读者参考的众多史料，并且对许多人物和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书中涉及的历史事实很多，我们未能一一核对，只对明显有误之处由译者作了注解，或作了少量删节，其余一概保持原作的本来面貌。

本书中的星花注系原书的注释，注码注则系译者所加。

作者的语

与我关于中国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也用威妥玛—贾尔斯拼法拼写中国的词语和地名。从十九世纪起直到1979年，一般采用的都是威妥玛—贾尔斯拼法。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推广一种新的拉丁化拼法，称作拼音。现在外国正在逐步开始采用这种新的拼法。例如，我最喜欢的省份陕西省用威妥玛—贾尔斯法拼写时写作“Shensi”，而用拼音法则写作“Shanxi”；与陕西接壤的山西省用威妥玛—贾尔斯拼法拼写时写作“Shansi”，而用拼音法则写作“Shanxi”。本书的末尾附有一个拼音一览表。（中译本已删）

本书中的对话，都是根据记忆写成的。直到不久以前，我的记忆力一直都被认为是超群的。其中许多对话写成于多年以前。我还曾借助于我的六本笔记，这些笔记是在我把尼姆·韦尔斯（我的笔名）私人文献送交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前，从我三十年代的档案资料中选编出来的。后来的情况证明，我的这些文字记录是当时各个事件和局势的细节的独一无二的资料来源，甚至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仅仅这一点，也足以使我高兴地感到，我拖着那四十箱资料辗转半个世界并非徒劳无益之举。

鸣 谢

我谨向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致以谢忱。这个研究所保管了关于我在中国度过的那些岁月的档案资料。那些年月是那个伟大国家的历史中颇有争议的一段时光，而我的颇有历史价值的笔记则往往是仅有的在当时记下的文字材料。我也对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梅萨的G·L和谢里尔·福斯特·比肖夫表示感谢。他们两位负责整理我的文稿。

我特别感谢贝特西·博伊德·西内德拉。他承担了对《旅华岁月》的手稿进行编辑加工的艰巨任务，并以十分娴熟的技巧完成了这项工作。



本书作者。



埃德加·斯诺。

毛泽东、朱
德与史沫特莱在
延安。



作者与康克清
在延安合影



作者与朱德
将军在延安合影
(1937年)。



作者与朱
德在北京会
面(1972年)

目 录

第一部分 上 海

第 一 章	1931年抵达上海	(1)
第 二 章	蔻蔻店谈“命”	(7)
第 三 章	外国记者	(25)
第 四 章	首次目睹战争	(34)
第 五 章	世上独一无二	(42)
第 六 章	上海意识	(51)
第 七 章	我和斯诺先生结婚	(58)

第二部分 北 京

第 八 章	抵达北京，1933年	(71)
第 九 章	北京的院落	(75)
第 十 章	在北京的生活	(81)
第 十 一 章	泰亚尔·德夏尔丹	(87)
第 十 二 章	女唐吉诃德	(94)
第 十 三 章	艺术、文学和革命	(99)
第 十 四 章	年终	(109)
第 十 五 章	中国的乡村生活	(117)
第 十 六 章	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122)
第 十 七 章	北戴河：黄海边的传教士	(127)
第 十 八 章	狐塔旁的鬼宅	(134)
第 十 九 章	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141)
第 二 十 章	行动	(151)
第 二 十 一 章	詹姆斯·贝特兰：来自新西兰的 罗兹奖学金学者	(164)

第二十二章	埃德加·斯诺去看“照耀中国的红星”……	(168)
第二十三章	插曲……	(174)
第二十四章	1936年，首次西北之行……	(179)
第二十五章	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10月，斯诺 归来……	(189)
第二十六章	西安事变……	(197)
第二十七章	圣诞节，虎头蛇尾的结局……	(208)
第二十八章	创办《民主》杂志……	(212)

第三部分 延 安

第二十九章	在红色中国——我的延安之行，1937年……	(221)
第三十章	西安……	(224)
第三十一章	阴谋……	(231)
第三十二章	勉强逃脱……	(238)
第三十三章	抵达红军前线……	(247)
第三十四章	古城茅舍……	(250)
第三十五章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254)
第三十六章	在延安的四个月……	(263)
第三十七章	旅途十日……	(270)
第三十八章	重逢在西安……	(275)

第四部分 工业合作社

第三十九章	别了，北京……	(283)
第四十章	工合：我们创办工业合作社……	(285)
第四十一章	香港……	(295)
第四十二章	播种“芥菜籽”的时候……	(300)
第四十三章	别了，亚洲……	(311)
结束语	……	(319)

第一部分 上 海

第一章 1931年抵达上海

《林肯总统号》航行在混浊的黄浦江中，逆水而上。船基本上是空的，只有21个年轻的美国人在甲板上急切地凭栏眺望，恨不得立即看到他们还从未见过的上海外滩的楼群。小伙子们穿着浆洗得笔挺的白色热带服装。一位来自安纳波利斯的海军上尉帮我提着高尔夫背包，一位殷勤的弗吉尼亚人（很高傲）帮我拿着网球拍。

这是1931年8月。我告别家人已三个星期，来到这个离家乡5,065英里之遥的地方。我打算最多在这儿逗留一年。可是最后我却直到1940年12月才离开亚洲，庆幸自己在珍珠港事件以前一年得以离开。

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是游客。要去马尼拉的那12位都是陆军或海军人员，而且大都是夫妇同行。那六名“英美烟草公司的小伙子”与英美烟草公司签了合同，要途经上海去一个使他们感到毛骨悚然的地方，这个地方叫二十里铺^①。以上海为旅行终点的人中只有两名妇女，我是其中之一。帕特·墨菲和我打算在旅馆合住一套房间，因为她的丈夫是长江巡逻艇队一艘炮舰上的海军上尉，正在长江上游值勤。

^① 此处系音译。

所有的乘客都是初次到东方来。我是唯一的中国问题“专家”；我不是已经读过刚出版的赛珍珠写的《大地》吗？而且我还在研读E·T·威廉斯写的《中国：昨天和今天》。在国内的时候，我曾读过一位老资格的汉学家借给我的一份J·B·鲍威尔写的报告的打字稿。这份报告叙述了1923年鲍威尔和包括一些美国妇女在内的二十多人一起在蓝色快车上遭到土匪绑架的情况。我还带了一本E·卡恩写的很厚的专著《中国货币》，想读懂它，可是终于未读懂。除了在美国总领事馆当职员这个主要工作以外，我已在上海获得的工作之一是为白银代替黄金作为货币本位的好处写出报告，寄回被很不礼貌地称为白银院外活动集团的那个集团。

1929年，随着华尔街的崩溃，黄金兑换价的突然上升和白银的贬值，已使美国的白银开采业几乎陷于破产。在中国的外国侨民，则因兑换率对他们有利，仅用很少的钱就生活得象王室成员一样阔气。我在白银院外活动集团的中坚组织美国矿业联合会任书记的助手时，薪水相当高。为了能到国外去旅行和写作，我已把大部分薪水积攒起来。我还通过了外交人员考试，想在海外谋求一个外交职位，以用上我的西班牙文、法文或意大利文。能够打的只有白银这张牌，而现在在白银院外活动集团的里德·斯穆特参议员和我父亲的一些斯坦福大学老同学的大力帮助下，我终于踏上了白银的国土。我父亲的那些老同学，如当时的在任总统赫伯特·胡佛，或者自己就是老资格的汉学家，或者认识一些老资格的汉学家。

我已在上海得到的第三个工作，也与经济形势有着微妙的联系。在美国，大萧条正愈益严重，西雅图市外的美国邮船公司因旅客少而濒临破产。由于这种情况，以西雅图为基地的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报业集团给了我一个任务，不过限定我写的文章都必须到“光辉灿烂而富有魅力的东方”去旅行、为复兴旅游业服务的，当时这项业务已是死气沉沉了。

随着我们踏入这个世界上第五个最繁忙的港口，我们的生活水平骤然提高许多倍。由于一个美元值中国货币四至五元，当时，在上海的3,808个美国人以及在中国各地大约7,000美国人都生活得象王公贵族一样奢华，而世界其余地方都被“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受着折磨和煎熬”。我们也将加入这些美国人的行列。我很自信，也很愿意学习，可是最后我却不得不放弃为掌握复杂的货币问题所进行的努力（我始终不大同意那种认为大萧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金本位造成的观点）。

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华界以前的五个月是这个属于外国的上海外滩的全盛时期，它的繁荣达到了顶峰。此后外滩再也没有过那种辉煌。外滩最高的大楼刚由英籍阿拉伯人沙逊建成。沙逊正在把资金转移到上海。这座大楼就是华懋饭店。大洋行的腰缠万贯的大班们在这家旅馆里租下了套间，互相请客吃饭。这些房间正因为旅游业的萧条而租不出去。

那是黄浦港的全盛时期。在可怜巴巴、蝙蝠翅膀状的帆船和颠簸起伏的舢板中间，神气活现地锚泊着军舰和商船。到处都可以看到英国的米字旗高高飘扬，日本的太阳旗和美国的星条旗则知趣地在闷热寂静的空气中低垂着。当《林肯总统号》徐徐行进时，我们向每一艘驶过的船只挥手。甚至郁郁寡欢的、爱干净的日本人也向我们挥手还礼，尽管他们好象总是保留着另一只手在甲板上晾晒他们洗净的衣物。

在绵延几英里长的码头和货栈里，几乎所有的货物都是靠人力搬运的，而且所有的搬运工又都是中国人。黄浦江岸是受青红帮控制的。任何人都不敢怠慢他们，甚至连日本人也不敢小觑他们。

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人曾一度在东方控制了贸易。这种控制主要是通过1818年创办的康涅狄格州的拉塞尔公司实现的。在外滩许多仓库的一侧，拉塞尔公司的红砖货栈象城堡一样屹立着，占据了好几个街区。作为美国传统一部分的第一艘远航中国

的美国船是在1784年乔治·华盛顿生日那天出发的，这甚至比拉塞尔公司还要古老。

站在《林肯总统号》上，我们觉得我们也是这个古老传统的一部分。我站在船头上，象一只古老的快速帆船的船头雕饰一样，面对着未来，体魄健壮而又雄心勃勃。到中国来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大的大事，我要使它最充分地发挥效益，一分钟也不浪费。当船向码头靠近的时候，我把一只脚放在栏杆上，迫不及待地要尽快走下甲板，踏上中国的土地。

尽管我们都得到过忠告，说外国人在旅行时为了保全面子应乘头等舱，并且也都为头等船票付了500美元，但是，按照美国传统，却不应去住新建的华懋饭店，而应去古老的礼查饭店。礼查饭店是由一艘美国快帆船的船长和船上的木工建造起来的。它曾经是东方最好的旅馆。我说服了同来的人员，都去礼查饭店。

我是怎么会知道礼查饭店的呢？这是一个新闻界王朝的所在地。来自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密勒、鲍威尔和斯诺，接踵而来这儿组成了这个王朝。我带有我父亲的老同学为我写给在东方的报界老前辈托马斯·密勒和他的学生J·B·鲍威尔的介绍信。密勒为了给《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义和团运动的情况，于1900年到达上海以后就住在这里。1917年，密勒请J·B·鲍威尔来协助创办《密勒氏评论报》时，鲍威尔也住在这里。《密勒氏评论报》是美国在远东最有影响的出版物。（我立即被聘为该报的书评撰稿人——这是我的第四个工作，以后我又成了这家周报驻北京的记者。）

我并未带写给他们的学生埃德加·斯诺的介绍信。斯诺在1928年也来到了礼查饭店。当时他年仅22岁，却担任了助理编辑。但是我有一个贴有他的名签的夹子，里面装的全是他的文章，其中有些是我从《纽约先驱论坛报杂志》上剪下来的。我在美国矿业联合会工作时的一项职责就是从那份报纸上剪下有用的材料。当我拿着剪刀，坐在桌子边准备剪报时，我曾经想：为什

么我不能也到处采访，也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我甚至想过（我那种想法是多么错误！），与埃德加·斯诺的文章相比，这家报纸的女业主奥格登·里德夫人和女编辑威廉·布朗·梅洛尼也许更喜欢一个女性写的文章。

我们上岸的地点离礼查饭店很近，步行即可到达，但是，我们得到的忠告是，无论如何我们也得乘人力车。当时，我们还以为是一群歹徒向我们发动了袭击，后来才弄明白，原来他们是一拥而上抢生意的人力车夫。坐上人力车后，我们不得不在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而又程度不同地身患疾病的乞丐中间穿行。美国邮船公司来码头接我们的那个人站在他乘的人力车上，回头向我们招手。“现在在中国，谁都不敢动外国人一根毫毛”，他嚷嚷道。“只不过看起来有点危险而已。不用理睬他们。”

到了礼查饭店门前，我们乘坐的二十多辆人力车在狭窄的街道两旁停了下来。我们下了车，同所有初来乍到的人一样，向车夫付了多得跟赎身金一样的小帐，为总算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而松了一口气。我们的所在地是黄浦江的拐弯处。正好在礼查饭店对面的河堤上有一座庞大的城堡一样的旧建筑物，窗框的装饰富丽堂皇。车夫在这座建筑物笨重的大门边让我下车时，我看着这座无人居住的、空空荡荡的大楼，不禁有点不寒而栗。

“这个怪吓人的大楼是干什么的？”我问。

有人告诉我：“这儿原先是沙皇的领事馆。三年以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小小的枪战。”显然，苏联领事把他的职员都藏在大楼里面，有150名从前的哥萨克军官，穿着沙皇时代的军装来到这儿，企图占领这座大楼。他们想在上海建立逃亡者自己的流亡政府。警方没有介入，但是苏联人从大门内向外开了枪，哥萨克撤离了现场。这可能是俄国内战的最后一幕。1927年，属于国民党的中国人在广州杀害了一些苏联领事人员，外交关系当然也就破裂了。（1973年当我在离别了30多年之后重返上海时，我发现这两座美国建筑和苏联建筑显得更古老了，但却并不比三十多

年前更吸引人。那旅馆现在是给华侨住宿的。苏联领事馆则用木板围了起来。美国和苏联在上海都没有领事馆，而苏联人已在中国的北方边界上部署了100万虎视眈眈的大军。）

在礼查饭店的门厅里，没有让我们等着登记。我们每人都由一名身穿白上衣、低三下四、笑容可掬的茶房把我们领到各自的房间里。这些茶房就在房间外的走廊里侍候着，随时准备满足我们哪怕是最细小的愿望。

就是这样坐人力车从码头到旅馆走了短短的路程，使我们从普通人升入了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等级，使我们在这个廉价苦力的奇异国度里，成为在脑门上刻着美元印记的人上人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很快就捕捉到这个通商口岸的神秘气氛的时刻。我站在我的那间宽敞静穆的房间（加上膳食约两美元一天）的中央，闻着潮湿的空气。发霉的灰色蚊帐，罩住了巨大的有四根床柱的维多利亚式的卧榻。然后我用了很大力气才打开红木或柚木五屉柜的几个沉重的抽屉。抽屉上镶着樟木或檀香木，有的还镶有肉桂木。这些木头的香气与有霉味的空气混杂在一起。以后任何时候，每当我闻到这种气味，对东方的怀旧之情就油然而生。我的一些旧文件和手稿因为存放在樟木家具里，至今仍带着那种气味。

当我阅读《安娜与暹罗国王》一书时，我因为怀旧而流了泪，还点了几支檀木香。安娜·利奥诺温斯在我到东方前大约50年就来到东方工作，但是我遇到了与她同样的喜歌剧式的误会与矛盾以及文化上的震惊。当我燃着檀木香写下这几页文字的时候，我难以想象已经又过去了50年。

对于住在礼查饭店房间里的那位23岁的天真的美国姑娘似乎是极为重要的东西，似乎已经变成了一场音乐喜剧中的小小插曲。

第二章 蔻蔻店谈“命”

我们的心情过于激动，连行李都未打开，就急于去一睹市容。我按捺不住地要去美国总领事馆看看，因为那里已答应以高薪聘请我去工作，那将是我的主要工作。我知道我的其它计划都不可能挣钱。到上海来的九个人，包括墨菲海军上尉和他的妻子，陪同我坐人力车去登记。

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天气酷热，尽管当时热得令人难以忍受。饭店经理说过，气温会高达104华氏度，这并不是罕见的。我们也没有想到，从遥远的南方还会刮来强劲的台风，我们遇到的是一场暴风雨来临前的低气压。中国通在正午日当头时是不出门的，街上甚至看不见疯狗或普通英国人，午餐后，他们要睡一个很长的午觉。

我们伫立在公园桥上观看苏州河，此桥距离位于上海这个特别角落的礼查饭店仅有几步之遥，桥的另一端是英国总领事馆，俯瞰着外滩，英国国旗悬挂在大英帝国的旗杆上。当我们的人力车夫沿着外滩慢慢行走时，我朝港口外的远处望去，想到那些大班和实业界巨头们正坐在长凳上，翘首望着他们那扯着高帆的商船驶进港口。

当我知道坐落在古老、凌乱的红砖房里的美国总领事馆不在外滩，而外滩已被英国人所独占，我确实有点生气了，尽管美国总领事馆离开外滩不过一个街区。当我们在办护照的柜台前排队登记时，我注意到地板下陷，而且吱吱嘎嘎作响。

我向那位又瘦又高、态度友好的副领事打听埃德加·斯诺现在是否在上海，得知他刚从印度回来。“你想见他吗？”

“我倒是有这个想法，”我有点谨慎地回答。

“我替你打个电话给他。”

电话谈话丝毫不能保密，每个人对领事馆这边的高声对话都感到好笑，谈话大概是这样的：“是斯诺吗？这儿有位福斯特小姐想见见你，今天刚从西雅图来……胖吗？哦，是的，胖，50多岁了，但保养得很好……阔气吗？身上挂着许多钻石，她带着几个保镖……带枪了吗？带了，每个保镖有两支枪……斯诺，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担心。我会替你照顾她的……好吧，那么让我给你介绍一下……让我问一下。”

他把手蒙在送话器上，用象舞台上演员的那种能让观众听见的耳语说：“他请我们到蔻蔻店去喝茶——马上去，就在附近。”

“行”，我简直再也控制不住我第一天的激动心情。

整个小组兴致勃勃，一致表示愿意同我们一起去。“她不能没有保镖，因为她有那么多钻石，”英美烟草公司的小伙子说。

“这是一次采访——是谈公事，这是我为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所进行的第一次采访”，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们。

副领事解释说，蔻蔻店是上海唯一可以买到冰淇淋的地方。

“但是，福斯特小姐，你需要办的第一件事是，通过领事馆勤杂人员的领班作保，找一个包车夫，全天工作，一个月花你五美元，你要他，还是不要他？”

洋泾浜英语是当时整个中国沿海通行的混合语，新来的人都喜欢它。①

“要他吧，”我同意了。

一位头发灰白、气象尊严的领班来到，带来一个约40岁的黄

① 上一段的问句和下一段的答句用的都是当时中国沿海流行的混杂英语。

包车夫，他有一张诚实的、饱经风霜的脸，满脸微笑，有一辆崭新的乌黑发亮的黄包车，配有洁白耀眼的绣花垫子。

“美国小姐，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领班文雅地鞠躬问道。

“喜欢！”我爬进车里，这辆车我一直用到一年半后我离开上海为止。

在这座新的、现代化的美国式葱葱店里，我们和墨菲夫妇坐在一张小桌旁，极度湿热的空气使我们感到疲软无力。

“斯诺总是迟到，”副领事说，激起我脸上一阵红晕。他解释说，斯诺在去印度旅行时，在热带得了病，现在回上海来治疗和写书。他说，斯诺总是自行其是，不慌不忙。也就在那时，因为他写了一篇针砭“在上海的美国人”的文章，所以处境不妙。他思索了一下补充了一句：“他没有结婚……我也没有，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我没有理睬他的这一主动提示。

“他来了。”我的陪同站起身来准备握手。

我抬头看见一个瘦削但却体格健壮的人，穿一套白色西装。埃德加·斯诺因为面色苍白，脸上的雀斑十分明显。我希望他没有注意到我的失望，我曾经把他想象成一个勇敢、强壮、健康的环球旅行家。我不喜欢显露出病态的人，而喜欢运动员式的人，因为我自己也可以算作爱好体育锻炼的人，尽管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难道这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东方旅行家所要付出的代价吗？

尽管如此，我还是断定他是英俊而富有魅力的，我尽力克服最初对他产生的不良印象。他棕色的头发呈波浪形，而且很美。长长的眼睫毛，一双热情的棕色眼睛，在我们谈话中有时显得雾濛濛的。在后来的几年里，我认为他看上去象劳伦斯·奥立佛^①。我怎样才能使他脱下那套没样子的西服，穿上带垫肩的哈里斯花呢西服呢？我想着，不顾当时104度的酷热。我意识到斯诺的

^① 劳伦斯·奥立佛，英国著名电影演员及导演。

个性很强，他作为男性的自我意识也很突出，但这一切并非依靠服装的剪裁或给人留下最初的良好印象所造成的。我喜欢他这一点，并且发现，他远比我成熟，因为我自己总是希望给人一个好印象，能引人注目和讨人喜欢。

尽管如此，见他一看到我，就好象被迷住了，我也并不感到惋惜。他朝我走来的时候，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椅子腿绊了一下他的脚。

“你就是利文斯通博士^①吧！”他拖出一把椅子准备坐下，几乎没有理会别人的介绍，而是一直盯着我的眼睛，我咯咯地笑了。

“斯坦利^②小姐，我的意思是‘美国小姐’，自从1927年我离开堪萨斯城以来，我还没有见到过可以和你媲美的姑娘呢。”他那男性的嗓音十分悦耳，很有特色。“你使我想起隔壁的姑娘，我甚至已不理睬象你这样的姑娘长的是什么样了，我没有看见过任何钻石，也没有见到什么50岁的又阔气又胖的妇女。”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年轻人的规矩是老爱互相逗乐取笑，这是一种学究式的幽默，一种中国式的猜谜游戏。我们象中国人一样，从不把事情说破，而是看上去高深莫测。你什么话都可以说——只要你不把事情点破。这不是一个推理的结论，但它能表达一种含意——只是话语中却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埃德加和我总是在这种愉快的气氛中谈话，常开玩笑，象打乒乓球式的轻松对话，哪怕是在最沉闷的日子里也是如此。中国人喜欢这样，他们颇有涵养，善于委婉含蓄，妙语应对。（我敢说，这种交锋有一次在蔻蔻店里也进行过，我对侍者说：“给我一份

① 利文斯通（1813—1873），英国探险家、传教士。以去非洲探险而出名。

② 斯坦利（1841—1904），英国探险家（1862—1895年，属美国国籍）。1871年由《纽约论坛报》派往中非，因找到失去联系的利文斯通而出名。

不带杨梅的杨梅冰淇淋苏打。”

他点头承应，去同角落里的同事们商量了一下，然后带着一副平淡的、表情难以捉摸的面孔回来说：“小姐，杨梅没有了，您只能吃没有可可的。”）

美国人的方式是通过重复来表达幽默，这是一项新的发明，J·P·麦克沃伊和奥格登·纳什^①使之完美，但是我们的情形，还要追溯到马克·吐温，即通过尖锐的反驳来表达一种含意。

“我不喜欢钻石，”我伸出没有戴戒指的第四个手指，我告诉埃德加，我读完了他所发表的所有著述，请他接受我替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进行的第一次采访。“他们只采用‘令人眼花缭乱的、金光闪闪的东方’玩艺儿，以便振兴旅游业，——也就是理查德·哈利伯顿^②式的作法。你在泰姬陵游过泳吗？”

他说，我来晚了一点——他超越哈利伯顿式的活动阶段已经有一些时候了。他一到泰姬陵就得了痢疾，当他到瑞·光大金塔时，又患了严重的疟疾。

“这就是我的第一份新闻工作，”我叹息道。“你不能屈尊俯就，仅仅为了这次采访，再充当一回哈利伯顿吗？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被称为‘东方的呼唤’的东西。”

他说：“我来这里之前就已听说了，东方的呼唤就是呼唤‘仆人’，‘仆人，给我倒一盆洗澡水’，‘仆人，解开我的鞋带’，‘仆人，干这干那’，而大多数‘仆人’头发已经灰白。”

我坚持说，他总会发现一些奇妙的事物。

是的，他发现了：那是一个他称之为矮小的、穿着有匀称的菱形花纹的白色麻布衣衫、手摇纺车的人。他给我讲了甘地，讲了他的“最丑陋而又最机智的”门徒沙罗吉尼·奈都——印度的

① 麦克沃伊（1895—1958），纳什（1902—1971），均为美国作家。

② 哈利伯顿（1900—1939），美国探险家和作家。

第一号反对深闺制度的女权主义者。还有尼赫鲁。然后他说：“要在绅士的白色领带和带菱形花纹的白麻布衣衫之间作出选择，我喜欢甘地。”

埃德加态度自然，随便，容易相处，显得很有教养。他表现出一种特有的自信，不怕显示自己的个性，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喜欢这些。但是，哦，我确实希望他不要穿那套看上去象甘地的某个裁缝做的衣服。

我把冰淇淋苏打推到一旁，把我的公事皮包放在膝上，当其他人一份又一份地要冰淇淋苏打时，我们俩都忘记了苏打。

我把我的关于埃德加·斯诺的文件夹交给了他本人。我告诉他，我为美国矿业联合会所作的工作有一部分是剪有关中国和白银的文章，而我还主动剪了我所看到的他写的所有文章。

他很快地翻阅了一遍，然后抬起头仰望着，这时他那棕色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他的声音有点柔和了：“我如果有一张你正在做那些辛劳的剪贴工作的照片，我会写得更好些。我开始在忘却那些我应该为之写作的人们——所有那些象你一样的、极好的、在国内的美国人。噢，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小姐，你是要求对我进行采访的第一个人。”

我移坐到椅子边上，以我最老练的、主动的方式向前倾着身子，我已经用好话赢得了他的好感。“你知道不知道，除了赛珍珠以外，你现在是最著名的美国远东问题作家了。”《大地》一书已成为经典名著了。“它肯定打破了关于那令人眼花缭乱的、金光闪闪的东方的神话——如果这是个神话的话。我还不承认有这种神话呢。”

然后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坚决主张采用白银、而不是黄金的人。“我是白银院外活动集团的非官方的无任所特命全权大使——不，我有任所。我们喜欢中国人，因为他们有以银代金作为货币本位的良知，我们有很多剩余的白银要出售。”

埃德加总是敏捷地抓住一切机会来善意地取笑我或其他人。

“1931年的白银小姐，你不喜欢钻石，不喜欢黄金，现在你已经降低到我的货币标准了。这就是‘命’，地地道道的‘命’，纯银的‘命’，洁白而又纯粹。正象中国人所说的，人一辈子生活在天地之间，命中注定会有命好的时候。当我走到西藏自治区时，我受到灵感的启发，买了一枚银戒指，尽管我不知道哪个姑娘会喜欢它，甚至不知道我的姐妹米尔德里德会不会喜欢它。”

“究竟什么是‘命’？”我想知道。“我千里迢迢到中国来不是为了戴任何人的银戒指，我到这里来的原因跟你完全一样。我想当一名大作家，并且来旅行。我攒了好久的钱，一直在读所有有关的书。”

“哦，我明白了，基普林·洛厄尔—托马斯^①小姐，你一直在读《开伯尔山口那边》和《和劳伦斯同在阿拉伯》——就象我在堪萨斯城那样。好吧，大作家夫人，未来的大作家先生向你致敬，告诉你吧，汉语的‘命’字等于英语的fate或destiny（命运）。正是命把你带到了蔻蔻店。把命字和另外一个小小的字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重大的概念——革命，即英语的revolution，革命的意思是‘变革命运’。这正是在天地之间的蔻蔻店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你将戴那枚银戒指，我以前从未见过在小桌旁能决定这样的命中大事。”副领事假装妒忌地说。

我见到埃德加的时候，他正处在一生的十字路口。他说：“这是我迄今为止一生中的低潮之时。”长期以来，他一直受到云南——印度支那——缅甸——印度之行的影响，不仅因为身上染的疾病一再复发，而且也为到处见到的绝望、狂热和贫穷而感到沮丧。后来，他来到上海，遇到一伙坚决反对他的美国人，因为他曾在《美国信使报》上写文章讽刺他们，引起他们对他的仇恨——甚至密勒和鲍威尔也生气了。另外，英国警察收买了一个

^① 托马斯（1892— ），美国新闻评论家、著作家和演说家。

白俄告密者，指使他伪造一份材料，说斯诺是激进分子。1931年斯诺被列入了日本人的黑名单。二十年代的那个走好运的孩子——当时可以逍遥自在，不承担责任，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不怀虔诚的敬意——此时在他一生中第一次不得不面对成年人的问题——面对一个危险的世界，诸如发表几篇文章这样的小事也不再被看作是无害的。

在蔻蔻店首次见面时，埃德加拿起我剪的那篇关于“在上海的美国人”的文章，他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被人排斥。”他正在受排挤，甚至在书报上遭到攻击。他说他现在知道，J·B·鲍威尔因为支持国民党而在1927年美国商会选举中被击败时是何种感觉了。他说：“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回上海。”

“一定是为了银戒指。”副代理领事一直埋头吃着冰淇淋苏打，这时候抬头冒出了这么一句。

“你为什么回来？”我叮着问，一边按照职业习惯拿出铅笔和笔记本作好准备。

“在我环球旅行途中，到达印度时，突然得知我母亲已经去世，这件事使得我没有心思去旅行，只想回国，我决定朝回走，在上海写我的游记，现在这里物价多么便宜——因为有了白银院外集团小姐。我也需要加德纳博士。”（W·H·加德纳博士是美国在上海的一个有名人物，人人都非常喜欢他。）埃德加继续说：“我身上正发生着一些奇怪的事情，我并不是那种容易消沉的人。我好象不会写作，现在在我看来甚至纸是黑颜色的。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我却感到冷，或许是疟疾又犯了。”

我告诉他，听起来他象是一个肩头站着一只信天翁的中国通老海员。“只要想一想，你做了我想做的事——但没有哪个女性能象你那样周游列国。哦！我是多么喜欢旅行，但我可能连涓公河也永远见不到。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诉苦、抱怨。我会写一本畅销书。我喜欢书，信仰书。我不是想做一名驻外记者，

那只是为了开开心。”此时，我喜欢教训人的情绪油然而生。

“好吧！一贯乐天派小姐，你已经到达了远在南京路的蔻蔻店。”埃德加又活跃起来。“你还抱怨什么呢？至于写书，你必须在来中国的第一年就动手写，要不然你就会失去外来人的观察力。我累了，又有病，疲惫不堪，和我的读者失去了联系，谁 would 去读一本沉闷而难懂的书？这太消极了，太令人失望了。”

他说他也想家，他离家已经三年了。在大萧条之前繁荣达到了顶峰的1928年，他离开了美国。他的哥哥霍华德以及巴迪·罗杰斯在纽约和他同住一套公寓房间，在那里埃德加是斯科维尔广告公司的小伙计。（不久巴迪和玛丽·皮克福德结了婚。1941年当我看望他们时，她仍是那么美。霍华德当了全国制造商协会的新英格兰州的干事——此前一度曾是有名的“箭领”衬衣的模特儿。斯诺家的两个孩子对继承其父的印刷公司失去兴趣，这个公司曾出版《堪萨斯城星报》，斯诺最早就是在那里取得办报经验的，当时他还在密苏里大学学习。）埃德加说：“我原打算只花一年时间作一次环球旅行，现在我回到这沉闷的真空中，我在这里甚至不能写作。”

“不要放弃写你的游记，”我责备道。“我迫不及待地想读这本书。你难道不知道美国所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渴望旅行而又办不到吗？你是他们的代表。加入全国地理学会旅行团去旅行该有多么好啊！你想出一个好的书名了吗？”

“想好了，叫《云南》，但书一写完，我马上就坐火车经欧洲—西伯利亚等地回国。”

我说：“你简直想象不到我来上海是多么的艰难，除非允许我到美国总领事馆工作，否则就不会让我来。我不得不动员我父亲的斯坦福大学的校友，上自胡佛总统……有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共和党中居首位的大人物……美国矿业联合会的巨头们，等等。我放弃了美国矿业联合会的一份好工作——我的意思是，到领馆来充当位卑职微的秘书……”

埃德加这时放声大笑了，很明显，是我取代了他的回国之行，向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美国读者的新鲜看法。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闷闷不乐，尽管他坚持说1941年他离开中国时也体会到类似的心情。在那之前他从不烦恼，很少做他所不愿意做的事。他后来总结说：“要不是你，1932年我会离开中国的，你给了我在中国的一段富于希望的新生活——九年或更长的时间。”

“咱们到法国俱乐部去参加下午的舞会吧！”活跃的单身汉副领事提议说。他说，那里是真正的上海，哪个国籍的人都可以找到，是市区最受欢迎的地方。

法国式建筑的华丽宽敞的舞厅远非寂寥的所在，白俄乐队正在演奏一支名为《巴黎的四月》的曲子，但听起来更象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的阴沉曲调《莫斯科近郊的冬天》，描绘的是狼在雪地里追赶敞篷四轮马车。

通过观察，我断定埃德加不善于跳舞，而且认为自己不必擅长此道。他轻轻地一颠一跛地走过去请乐队演奏他最喜欢的慢三步舞曲，名叫《极好的一个》。

他解释说，他的膝盖被驮马踢伤过。“但那会好的。自从离开纽约以来，我很少跳舞。”大部分的夜晚他都是在J·B·鲍威尔的办公室里度过的，听鲍威尔谈论《芝加哥论坛报》的最新电讯。那是美国在远东的主要思想中心，记者们随时都到那里去聚会。“但是，因为那篇文章，密勒和鲍威尔现在都在生我的气。”

我们新来的人都用批判的眼光去观察在上海的2,554名法国人和9,603名英国人的这些代表人物，以及其它各种类型的人。天气热得可怕，我们跳了一会儿舞后，海军上尉的夫人帕特·墨菲认为这地方太沉闷。每个人看上去都脸色苍白，满面病容，她想到人们玩得开心的地方去。

副领事说：“从现在起的一年之内，你们都将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你们要付出的代价。”他说。他建议大家不妨到哥伦比亚城郊俱乐部去看看，如果不觉得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上那儿去有点儿太远的话。

“在中国和我所到过的东方的任何其它地方都没有令你开心的地方，”埃德加以最典型的老海员的口吻说。“白俄那儿有最好的食品，但要看你们是否忍受得了那些借伏特加酒消愁解闷的流亡分子的神态了。”

在俄国人的餐馆里，侍者和乐队穿的是带格子的缎子俄式短上衣和地道的哥萨克靴子，迈步时一起一伏，象骑兵一样。在维也纳的华尔兹舞曲之间，空中回荡着悲凉的巴拉莱卡琴声。（哦！我是多么爱跳维也纳的华尔兹舞！）

这是个避难所。当女士们和先生们呷着高脚杯里加了草莓酱的甜茶时，女士们的举止象公主，其中一些人自称过去确是公主，先生们象彼得大帝。副领事告诉我们，在整个中国有15万名白俄，大约4万军人是1927年来到这儿的。

“J·B·鲍威尔说，仅在满洲就有35万人，”埃德加插话说。“中国的统计数字毫无价值，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核对事实上。”

埃德加和我津津有味地吃着斯特洛加诺夫牛肉，而墨菲夫妇则讨厌基辅油炸子鸡。

“你使我想起我的母亲，”埃德加说。

“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位驻外记者，”我截住他的话头。“不要讲这样的话吧。我穿着雅典人的盔甲，已经下定决心，直到我旅行过一些地方，写好一本书，并且至少到25岁时才结婚。”

埃德加说：“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我正在写我的第一本书，不管怎样尽量去写。”

我说：“我随时可以动笔写我的第一本书。”

帕特·墨菲想结束晚上的活动。她说：“咱们回礼查饭店

吧，我想我已经得了疟疾，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这样疲乏过。”

此刻天气凉爽些了，街上更加拥挤，有有轨电车、出租汽车、人力车、自行车。许多人力车堵塞了十字路口，来自旁遮普的戴着大头巾的锡克族警察把带铁箍的警棍敲得噼啪噼啪地响，免得交通完全堵塞。

我的高跟鞋害苦了我，直到我在饭店的大房间里脱鞋时才注意到。我把每个书桌抽屉都打开，使檀香木、樟木和肉桂的香味散发出来。当我登上两级梯阶，爬到高高的老式床上，小心地放好发了霉的、防疟蚊的帐子，我差不多累得什么都不想了。

我躺在上海的蚊帐里，决定不在中国呆那么长时间，免得看上去脸色苍白，一副病容。我珍惜我的健康。体育锻炼是妇女解放的新内容，对美国人来说更是如此。二十年代的优等生们不顾背后的风言风语参加男女混合双打。我想起了我那个漂亮的、体格健壮的、西点军校的陆军飞行员拉塞尔·埃默里，他曾用美丽的美国玫瑰花点缀我的卧室，现在他正争取调到马尼拉或天津来工作。星期天我们常常骑马。他曾是一个足球明星，雷德·格兰奇的朋友，体育专栏作家，并且也想当一个大作家。

埃默里的关于向各方面最大限度发展的思想，除了对姑娘外，在当时是普遍的。其中想法之一是把婚姻的标准提高到一个新的尺度——一种重要的工作中的伙伴关系，而不是一种家庭的安排，好多属意于我的男青年都有这样的计划：不到25岁，外出留学以前，或者至少外出旅行以前，不结婚，未在“自己的工作”中作出一定成绩之前，不结婚。

即使在大萧条即将来临的不吉利时刻，美国青年仍在冲击禁区。我们都热爱生活，互相热爱，热爱人类的潜力。未来是我们的，不是英国人或日本人的。对埃德加·斯诺来说，1928年他来到上海，不言而喻，就是为了向在中国的英国人和日本人挑战。

在1931年，会见第一个驻外记者，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已经知道，埃德加·斯诺把心思都花在自己的工作上。他不注重体

育运动，常常取笑我，称我为“希腊女神”。他一点也不为自己着想。他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一个我简直难以猜测的世界。我怎么会知道他是正确的呢？我怎么会知道（而他是知道的）“这件事比我们更重要呢？”我们在第三点上相会，那一点刚好是掀动世界的杠杆的支点。我们和未来密切相关，对此我们两人都已清楚，是的，第一天就已清楚了。

透过离家5,000英里处的一顶陈旧的灰色蚊帐，我心目中的年轻、健壮、灵活的美国男女的形象开始消失。代之而出现的是现实的事物。

当我写到这里时，我又想起了1940年的12月，当《总统号》班轮开出黄浦江向檀香山和旧金山驶去时，有一个身材瘦削的、脸色苍白、病态恹恹的美国女子，体重大约100磅，穿一件旧皮外套，冻得蜷缩在栏杆上。潮水落了，向后退去。日本的军舰占领着港口，日本的飞机已经准备在第二年去袭击珍珠港。我们已经“失去了中国”。看来，我也已失去了近十年时间，因为我自己的工作一项也没有完成。的确，我看上去象一个落魄的传教士，为了更崇高的目的，放弃了物质的东西。在我那旧的蓝色浅皮箱里，还装着1931年我在美国放入的那些衣服。衣上的皱褶象征着我作为“希腊女神”的时代已经消逝。

在1940年冬天的寒风里，我回忆起埃德加·斯诺在蔻蔻店取笑的那个1931年的健康、自信、全美女童子军式的天真姑娘，她作任何工作都是那么努力，为了逗人喜爱，引人注目，不知花了多少精力，她是那么老练、精细、有创造性，她常常充当一个不计报酬的公民或一个社会福利工作者。

这个姑娘放弃了物质的享受，从不计较代价。作为报酬，她又得到了什么呢？1931年，我想在各方面实现自己最大限度的发展，但是历史的阵阵台风使我离开了自己的种种目标。为了公共利益牺牲了个人。我确实是这样的吗？我喜欢个人发展的原则，我没有失去自己的幽默感，尽管这种幽默感对那些生活在东方的

人来说，是少有的。想到本杰明·富兰克林^①的话时，我仍然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她久经沧桑，饱受磨难，但大多数苦难事情并不曾发生，其余则是别人所经受的。

^① 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者，科学家。

信件摘录

1931年8月31日

自别后这是我第一次可以说真正有五分钟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我在自己的住处，自豪地坐着，眺望着世界上这个最迷人的城市的屋顶。

公共租界的商业区都集中在外滩一带，例如，中国银行就在临江的马路对面。江就是黄埔江，河水又脏又黄，但我没有看到江面漂有尸体。自从汉口发生可怕的洪水以来，据说在离此不远的长江口此时很可能有这样的景象。每天有几百来自汉口的难民，被安置在帐篷里，受到照料。这些人曾不断受到霍乱的折磨。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很忧惧，准备马上去注射血清，以预防霍乱。

在中国总是有嘈杂声，到处都有，你分不清是举哀的悲音还是喜筵的欢声，或者是叫卖花生的喊声，听上去都差不多……

我一直和一位海军军官的夫人住在大厅的西端。我为膳宿支付210元（美国以外的外国货币——下同），这种货币在当地钱庄的汇价是4.52。以这种价钱，我一天四顿饭吃得相当满意。除了给“侍者”小费以外，没有其它开销。（除了小费，上海人的手沾不着现金的边，吃饭都是在“单据”上签字，没有人去看上面写的数字，更没有人拒绝付帐。规定是严格的，是从印度的真绅士那儿学来的，中国人称真绅士为“太太”或小姐。）

我下榻的地方是上海最好的建筑之一，名叫华联公寓，建成仅五年……这里公寓套房完全按照美国的方式来管理……

我的房间有一名男听差，昼夜24小时随叫随到，什么跑腿的事都干。还有一名“苦力”，负责收拾房间。

中国人讲究清洁整齐，一丝不苟。在礼查饭店时，我把许多

稀奇的手镯丢在镜台上去吃早饭，当我回来时，那个大老粗的“苦力”竟将那些手镯沿边架摆出一种图案，而其它一些东西也都象军人似的各就各位，整齐得叫人不敢轻易碰乱。

我每个月应该给听差5元，给苦力3元（当然是美国以外的外国货币）。我也有一个阿妈。阿妈就是贴身女仆。我的阿妈名叫阿妞（音译），她年轻、漂亮，已经结过婚，她十分腼腆，长得很甜。她每周来一次，干一整天活，挣1.40元。她负责料理我的全部服装，织补长统袜，洗刷一切哪怕看上去只有一点点不合格的东西，把要熨的东西熨好，为我收拾抽屉。我总是不熟悉她的整理办法，梳妆更衣时就感到有点麻烦——而我每天要更衣三、四次。

后来我又找了一个会按摩的阿妈，她会全身按摩，一个小时1.50元。我几乎每晚都让她来，因为我太累，神经太紧张，按摩对我好处很大。此人姓梅，是上海的名流，她60岁了，但看上去只有30岁。她有一双十分灵巧的手和一双小脚（曾经缠过）。梅告诉我，她经历过一段极为痛苦的生活。她母亲结婚才几个星期，就因为有一双大脚，被父亲撵到街上。如果一个妇女有麻子或者未裹脚，而订亲的时候又隐瞒了，未在婚约中提及的话，男人似乎就可以把她休掉（那是在过去的“好日子”里）。梅16岁结婚以前，他们家的生活一直很贫困。她的丈夫对她也不好，后来丢下她和一个女婴，弃家而去。她把女儿抚养大了。梅对男人和结婚十分厌恶，她让我正式发誓，决不当男人的牺牲品……

餐室里有一个侍者的领班，他有一、两个助手，每桌由两个人伺候。照料得非常有条理，殷勤得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你稍稍表示喜欢某样东西，他们从不会忘记。墨菲夫人和我特别喜欢软的烤面包片，切得很薄，结果，每餐都给我们端上许多软面包片。这里的首席厨师是瑞士人，甜食做得相当出色。

关于哪些东西该吃，哪些东西不该吃，我大概第一天就去问城里的医生了。他告诉我不必担心，一切煮熟后不久的食物都可

以吃，不要吃凉的。他补充说，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顺顺当地度过夏天。在夏天，这里的所有食品都是中国的，来自青岛和长江流域上游的农场，而冬天则有许多蔬菜是进口的。当地的顾问说，应该到城里任何一个好地方去开怀大嚼。然后又说，他们、他们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住了一个月左右的医院，刚刚出院，好象这件事与饮食毫无关系似的，又好象医院是一个避暑胜地。我喝各种热汤，不吃鱼，因为是河鱼。吃各种熟肉、炒菜，不吃冷肉或色拉。什么水果都不吃，除非煮过。吃香蕉（这里的香蕉小而绿）和很好的柚子。这里世界各地的菜肴都有。点菜时我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我学得很快，这是迄今我所掌握的各种外语的主要用途——辨认菜单。在这方面我只对冰淇淋和糕点不够谨慎。在这里我总是又饿又困，感觉很好，事实上我是长胖了，尽管我那么忙碌……

谈到我的职位（我一面在等候着去领事馆上班，一面在工业银行的一家公司里做事），可以说，这样的处境我从未经历过。我们每一分钟都在忙忙碌碌。我做的速记工作并不多，但要拆封和分发收到的所有邮件，或者做其它一些诸如总经理办公室要处理的事情。有一个名叫达·西尔瓦的葡萄牙人和我一起工作，我做的是一种私人秘书性的工作，主要是办理一些涉外的事。噢，我只是在最近一、两天才弄清楚这种工作是怎么回事。这个达·西尔瓦是一个天才，他常常一手拿着电话站在桌旁，交替地同打电话的对方和办公室里的某人谈话（偶然你也能这么做，因为每过一会儿，电话就会中断几分钟），同时他在一个信封上计算着什么，又用一个脚按电铃找听差，然后又跳起来，跑到别处干事。天那！在东方，就是这么从容自若！这是一家联合经营的美国公司，但只有三个美国人，我是其中之一……全体职员共有52或53人，大多数是欧洲人或葡萄牙人，有一些是法国人、俄国人和中国人。

总经理只有32岁，被认为是城里最精明的实业家……他不断

地给我增加任务，本周我正在为一些或多或少属于他个人的企业写广告副本，有几件事需要去做，需要稍加考虑作出安排。我发现在这里各方面都充满着机遇，但是正象一切值得花工夫的事情一样，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努力进行拼搏。

经理的办公室确实不错，但室内的陈设似有很大的改进余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竟象个家庭主妇似的手痒得不行，于是我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要求把一些香烟架和一座壁炉擦亮，因为这些陈设看上去似乎是金属的。我把中国听差的领班叫来，告诉他照此办理。可是这好象违反了整个传统习惯，自从明朝以来，这些东西从未被触动过，最后我不得不找来金属磨光器，教听差怎么去做。他们找到中国经理，对他说：“太难了，太难了，小姐要磨光蹭亮，但谁也不会做。”

可是，不管怎样，两、三天以后，这个办公室看来竟象是人们从未见过的最光亮的地方，中国人更加尊敬我了。我估计我是在他们面前保全了“面子”，而不是丢了脸。当他们从我办公桌旁走过时，他们会回头用一种不胜惊异的眼光注视我。我想，他们正在猜测整修翻新要进行到什么程度。

我无法不去插手卷宗的保管制度，现在我正在以最讲究外交的方式同人们磋商对此稍加改变，你想象不到，我已经变得多么擅长于外交辞令和活动了。你要知道，在中国，人们是不提出要求的，而必须讲究策略，只要一提起“变”字，任何人都会毛发倒竖……但这是有趣的，我正在慢慢地学会如何在这座城市里办理公务。

我必须告诉他们关于电话的情况，接通任何一个号码至少需要半个钟头（只有一个交换台），接通以后又总是面临着马上断线的危险，你听不到一点声音，总是占着线。每个打电话的人都在高声呼叫，愤怒地咒骂接线生。我想，我对在上海办事的最初印象是这里的人打电话或接电话的可怕方式——但我现在已很同情他们了……

第三章 外国记者

我的驻外记者生涯时间并不长，根据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集团的要求，我必须提供描写富有魅力的东方的特写。

我寄去的第一张震惊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集团的照片，拍的是多年罕见的一场恶性台风之后，洪水淹没车轮轴，楼房的一层虽有沙袋堵住门窗，但仍有被水淹的情形。香港记录这次台风的时速达136英里，8月10日一艘炮舰估计，风速达175英里。上海竟没有记载，因为台风是常见的事。过去关于恶性台风我所了解的最详细的情况，是约瑟夫·康拉德的书上提供的。下暴雨后的那天早晨，包车夫乐滋滋地拉着我走过大水淹没的街区，水几乎已漫到车座，他把我搞得全身都湿透了。当我们从其它人力车旁走过时，车夫们相视而笑，互相溅着泥水。外滩附近大多数建筑物的底层甚至一层都进了水，高大的建筑物仿佛在其支柱的支撑下在泥潭中摇晃，而中国人似乎觉得这种情景颇为有趣，外国人看上去都很担心，尤其是那些懂得一点建筑工程知识的人。

我的第二张毫无魅力的照片，照的是离上海不远、沿长江溯流而上900英里的地方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洪水后，大约有12万难民涌向上海的情形。这次洪水发生以后，三周之内有60多万人死亡，1,200万间房屋被毁。

9月，埃德加·斯诺乘坐新闻记者团包租的汽艇，沿长江溯流而上，前去察看洪水灾情，他让我看他为联合通讯社和《纽约太阳报》发的生动的电讯稿——其中描述了民船上高高堆起的死尸，以及成群结队的饥民向死尸行窃，向幸存者劫掠。

埃德^①基本上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曾目睹西北地区1929年的大饥荒，在那里，同类相食并不罕见，一些地方的店铺里还出售人肉，他还看到过印度以及他所到过的其它地方的悲惨境况，这一切使他感触极深。（他曾给我写信说，他一生中令他感到惊奇的事情之一是，1960年，他发现几亿中国人都有饭吃，没有人挨饿。）

那年9月，他告诉我，洪水、干旱和饥荒还不是最坏的事情，最糟糕的是三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无依无靠。中国近代已经爆发了14次大内战，埃德加说：“蒋介石只知道用内战来镇压红军，只知道增加农民的赋税，有些税提前70年就征收了。”

我说：“这些都不符合我作为一个极端乐观的人的心理，我可能会提前离开中国。”

9月19日，查尔斯·林白^②上校和夫人计划乘飞机到达，我们在上海等着他们的飞机降落，但他们未在上海降落，他们从空中拍摄了洪水的照片，飞机在中途——南京着陆，南京是当时蒋介石的首都。林白一直是鼓舞一大批天真烂漫的人出国的主要人物，1927年我们都曾支持过他。

我提醒埃德说：“我希望你注意林白是带着夫人的。”

在林白应抵达的那天，传来了震撼世界的消息，这消息至少是震动了被称作国联的那个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的国际组织。9月18日，日本人袭击了满洲，开始接管当地的3,000万中国人和朝鲜人，这是他们为占领大部分中国所迈出的第一步，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才被赶回去。

在中国和日本的外国记者获悉这条消息后，都很兴奋，记者们发现他们正处在自1919年以来唯一的真正战争的前线。他们非常激动，忙着计划前往满洲采访。

① 埃德是埃德加的昵称。

② 林白（1902— ），美国著名飞行员。

埃德准备到寒冷的东北去，并且开始购置御寒用的毛织品，但他还是在百忙中抽出了几分钟向我道别，他的头部以驾驶飞机的林白的神态向前微倾，由于有机会去了解一场真正的战争，他棕色的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芒。

他把他从纽约带来的几本关于广告的书给我留下了。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一直在为一些美国公司撰稿。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你能为我找到任何令人眼花缭乱的、金光闪闪的东西，我将不惜重金采用。”

我写了一封可怜的信给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信的内容如同我的其它信件一样，美国邮船公司旅游局以及白银院外集团都看到了。这封信可能会促使旅游局的大批人员辞职。我轻描淡写地提到了难民营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和其它疾病流行的危险情况。估计仅公共租界街头所见尸体的数字可能就远远超过1930年的2.8万人。

我说，除了我之外，目前在上海找不到第二个“旅行家”。一旦有可能，道路通行的话，我打算到离上海不远的杭州、苏州和无锡等几个城市去——寻找金光闪闪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东方。我告诉他们，在中国的外国人害怕旅行，因为到处面临着染上各种疾病的危险。旅行的唯一途径是乘火车，车上很拥挤，中国人随便吐痰，特别是那些结核病患者总在咳痰。我说，我愿意以我年轻的生命去为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冒险，但我不能单独外出，必须同一伙人一起去。

结伴旅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海是一个外国的通商口岸，到达上海外滩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还没有进入“真正的”中国。在上海的外国人几乎没有离开过城市，除了有时乘宽敞的游艇去玩或为了到长江三峡去旅行，有时候也乘汽船沿海岸到北京去。旅游设施还处在初级阶段，尽管中国旅行社在少数城市设有宾馆。外国旅行者不许到别处停留，警察要对他们的安全和行为得体负责。旅行社和我都未能为我要实现宏大的旅行计划而找到一

伙人，只找了几个新来的人，其中有花旗银行一个穿灯笼裤的青年，此人在整个旅途中从未笑过。

埃德刚从满洲回来，我就抓住他，要他加入我们的小组。一路所到之处，似乎都缺少不了埃德，一个唯一和我有共同思想的人。他写过第一份介绍中国全国铁路的旅行指南，但他对旧地重游没有特别的兴趣，尤其是在特大洪水过后疾病蔓延的时候。他在印度和缅甸生病生怕了。

有人警告我说，我种的预防天花的牛痘，对预防当时中国普遍流行的“黑天花”不起作用，所以在启程之前又用这种可怕的病毒对我进行了预防接种。我的反应相当严重，具有这种病的所有症状，在床上躺了大约十天光景。加德纳医生说，这有点象患了一场轻微的天花，而真正染上天花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则可能是致命的。

我安排到一户中国的大家庭去访问和拍照，并找了两个讲地方言的向导（中国人好象总是成对的来），即使只要乘一天火车旅行，也必须制定所有这些麻烦的计划。这一切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马可·波罗时代，他曾报道说，杭州和苏州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我从杭州开始，先游杭州的西湖，为了乘坐游艇，我们付的费用高于中国游客可能支付的费用20倍。

我发现，埃德不仅不愿意被别人拍照，而且通常拒绝给我拍任何照片。“为什么要浪费钱？”就是他的解释。我现在正从旧照相簿里寻找第一张我们在一起的合影——那是在弥勒佛像附近的一片高大竹林里。这张照片是花旗银行那位穿灯笼裤的青年抢拍的。我们俩看上去象吞吃了猫的金丝雀^①——我们在中国时取得了种种成绩后，互相常用这句话来表述。

在苏州，街上的小河发出浓烈的恶臭，使得我几乎不能集中精力观看这座城墙环绕的城市中的古老、别致的桥梁。苏州于公元^②484年由阖闾王所建，现在他的坟墓仍在那里，从未挖掘

过。这座城市拥有50万人口，拥挤不堪，肮脏污浊，我认为这里仍然处于乔叟^③的时代，看不出发展的迹象。

我们所到之处都被善意的人群包围着，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这些人多少都有些象逃难的难民，衣衫褴褛，患有疾病，有些躺在街道角落里，已经奄奄一息。两位中国向导兼翻译都厌恶自己的工作。这些在通商口岸的中国人比外国人更害怕拥挤的人群，他们尤其不愿意让外国人看到中国内地可怕的贫困景象，他们自己也是逃避内地的动乱和内战的难民，在外国租界的保护下，依靠榨取远方的饥饿的佃户所获得的金钱在这里苟延残喘。

在通商口岸的那些对外国列强奴颜婢膝的中国人，是想通过穿外国服装、讲流利的英语以及乞求外国援助来“拯救”中国。这种思想后来流行在台湾、汉城、西贡、金边、曼谷等地。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中世纪，但他们的手里却握着现代化的武器。他们愚弄美国人时显得足智多谋，极其聪明，仅仅通过宣布自己是反共的，他们就能从美国人那里获得几十亿美元。

出钱，出枪，解决就业问题都没有能改变这些傀儡的旧的思想方法。通常，革命只有在它能够成为参与变革生产方式的一支力量，在它涉及社会生产的新的关系时，才有可能爆发。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正确的。苏联（就象J·B·鲍威尔）总是愚蠢地认为蒋介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人则指出，蒋介石是封建买办。

中国之谜过去和现在都难以以任何语言加以解释，当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风行时，混乱才得以解决。在中国，一些术语的含意

① 英语成语：“看上去象吃了金丝雀的猫”（意即洋洋得意或踌躇满志），此处是反用，书中曾多处反用成语。

② 应为公元前。

③ 乔叟（约1340—1400），英国诗人。

可能正好同英语字义相反，这部分是语义学之争。蒋介石经常把中国共产党人称为反革命分子。

使我相当惊异的是，早在1931年我就认识到这类通商口岸式的中国人是多么空虚、低能和无知，简直不值得与之交谈。埃德一向心怀善意，宽容大度，他认为他们傻。他们没有国家，甚至没有自己的思想。

当我现在回顾过去时，我认识到上海只有一样令人眼花缭乱而又金光闪闪的事物是无与伦比的，那就是勇敢、美丽而孤独的宋庆龄，她是孙中山博士的遗孀，她在1982年逝世以前，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上海。1949年起她就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在我读了埃德所写关于她的文章以后，当我终于有可能通过埃德去会见她时，她拒绝了我的采访。（埃德很可能是她同意会见的、仅有的一位能采访她的生活的记者，就象他是毛泽东曾经对其讲述自己的生平并同意予以披露的唯一记者一样。）埃德已经受到孙夫人的影响，在我离开上海以前，我已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在中国有一件事真使我惊骇不已，那就是缠足。我在上海已曾见过，但真正使我震惊的是在那些古老的城市里，我发现农村的女难民，因为她们几乎无法行走，实际上正在慢慢死去。她们的脚象是断肢的，她们是跛子和肢体残缺的人。这种现象之可怕，不亚于这个世界的任何其它地方发生的类似景象。在1931年，大部分30岁以上的妇女已经裹了脚，因为这个习俗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才从法律上废除了。这种陋习已经成为衡量中国社会的病态的一种准绳，自从新孔子学说想出这个新观念以降低妇女的地位以来，这种陋习的存在已有千年之久了。

在苏州，有个濒临死亡的憔悴的妇女向我乞讨，她的脚几乎站不起来，脸上表情痛苦不堪，灰暗的眼窝深深凹陷，充满泪水，见此情景，我确实心都收缩起来了，汗毛直竖，恶心欲吐。

当我让向导给她一些钱时，她踉跄地向前走了几步，然后跌倒了。她指着尖脚解释她为什么不能恭敬地站起来。

我下决心研究一下妇女的整个处境，我在中国一直不忘收集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

尽管妇女处于这样明显的受压制的地位，但中国并不存在对男子气概的真正崇拜。中国男子在两性关系方面并不主动，关于西方妇女，多数中国人认为她们并不具有吸引力，甚至令人厌恶。因此在杭州发生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只有象斯诺这样的中国通，才能了解它的含意，这件事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25年后他在写回忆录时还写了这件事。

埃德告诉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定了你同中国人交往会取得巨大成功，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你，我想留下来看看会发生些什么事。”

与中国人建立的亲切关系那时对我来说似乎是重大的事件，而现在似乎更为重大了。我真正热爱这些人，并且想象这些人就是千百万中国老百姓——那时，平民被称为老百姓。当你感到你同亿万人民之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中美关系时，并且他们当中已经有一个人向你表明，他也抱有同感时，你便不难克服恶臭、贫困、疾病、危险和不舒适等等所带来的困难了。

• 见我写的《近代中国妇女》一书，1967年由海牙的莫顿公司出版。《传统中国妇女》，一份有争议的研究报告，尚待出版。

信件摘录

1931年10月18日

我刚从上海的华界游览归来，感到疲劳、头晕，象患了麻风病似的。你决不会相信，在如此狭小的地盘内能聚集那么多的人口。上海被分割为公共租界、华界和法租界。战前还有德租界，但他们失去了租借地。华界在“桥那边”，进入该界的外国人不多。我是同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一起去的，我们绕着狭窄的街道步行了几个小时，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停下来，都会有一群人围拢过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我的这位同伴能听懂不少中国话，跟他出去四处走走很有意思。他说，中国人说我“面如满月”，并对我的脚的大小作出种种评论……

在苏州玩得很痛快，城里有一座斜塔，它已有1,200年的历史，周围是大约30英尺高、五、六英尺宽的围墙……

西园很美，园内有一招牌，上写“See these fine fish in the pond on purpose to preserve the lives of fish of West Garden”（来看好鱼，养在西园放生池）。可笑的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竟然都对自己的英语感到很有把握，在上海的一家成衣铺里有一块有名的招牌，上写“Ladies have fits upstairs.”（女士要发脾气请上楼）^①。

我们观看了一座又一座庙宇，黄昏时走进一座古老的佛教寺院，里面有五百罗汉；殿堂内回廊曲折，香烟缭绕，令人有点毛骨悚然。我们外国人的鞋子发出不虔诚的响声，回荡在这阴暗、寂静的拱顶殿堂内，和尚们正在为一位要人的葬礼作准备，他们做了许多奇妙的纸模型：汽车、留声机、马匹以及全套的室内

^① 本意是想说，“女士订制服装，请上楼量尺寸”，由于英文不好，闹了笑话。

陈设，准备在葬礼时焚烧……

目前上海有许多关于日本入侵满洲的标语，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期，我们每天都有可能遇到严重的麻烦。日本人开设的商店遭到抵制都已关闭，他们的两船海军陆战队已经登陆。毫无疑问，你们在报纸上已经读到了这条消息……

我正在为几家公司做广告，有最大的夜总会，最大的保险公司，最大的汽车公司和我自己的公司。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我刚来时，我们的广告经理离开本市外出了一个月，有一次我曾经表示，我们的广告员办事不够迅速，所以经理表示，如果我有办法做得更好些，可以试一试。我试了一下，结果，除了我的其它职责外，我现在又是公司的广告部经理了，手下有一位广告主任负责分发材料……我每周给这里的四家报纸各写一篇新的广告，也为每期杂志写一篇广告。所以你会明白，晚上我并不是闲得无聊。

上海对一个有事业心的、有头脑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奇迹般的地方。尽管总的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有损失，但我发现这里机遇甚多，以致于难以下决心该干什么……

1931年11月

目前这里的商业发展异常迅速，以至房屋建筑跟不上需要了。一个月之内，两座八层高的旅馆开始营业。我已从原先住的那套公寓房间搬到了顶层，从这里可以俯瞰城市。房间布置得象一间工作室，配有从仓库里拿出来的精美的黑木相思树雕花家具，有书桌、书架、桌子等。我把我的浴室改成化妆室。我坐在我自己私人的1849年型的打字机旁，面前放着中华民国当时所出版的全部8本关于广告的书藉。

除了写广告外，我还为《密勒氏评论报》写书评，为当地办的消闲杂志《观众》编辑一个专栏，这两项工作都不赚钱，但都十分有趣……此外，我还上法语课，学中国官话……

第四章 首次目睹战争

1932年1月初，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区，人们已经可以感觉到即将同日本爆发战争，有谣言说将要撤退。我盼望已久的聘我去美国总领事馆工作的命令终于下来了。

上海的夜生活十分活跃，按照传统，社交的聚会通常在数月之前就订下日期。报上没有出现令人震惊的大新闻，可是我们觉察到正在发生一些事情。我们注意到销售日货的商店挂着“大甩卖”的招牌；我们买小树苗和鲜玫瑰花的那家“横滨苗圃”突然把招牌改成毫无特征的“花店”。一艘日本运兵船已经开进了我们宁静的港口。

1月19日和20日两天，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发生了冲突，停泊在港口的日本军舰立即进入戒备状态。日本总领事和上海市长吴铁城之间相互最后通牒，并在街上设置了路障。

至1月27日，上海上空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预料日本人随时可能发动进攻。不管什么时候，只要门呼地关上了或者人力车的轮胎炸了，我们都得从总领事馆的办公桌下被拖出来。

在家信中，我这样写道：

“你简直难以想象，现在生活在这里是多么悲惨和不可思议。我从未想过我会身陷战争之中，尤其是这样一场战争。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20世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简直软弱无力，百孔千疮。洪水泛滥、饥馑蔓延、疾病流行，赤色分子和土匪在内地割据，南京政府官员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简直不存在什么政府，即使有，也是腐败不堪的。他们大量发行公债，债

券泛滥成灾……。公立学校教师已经停发薪水达6个月之久了。最可悲的还得数军队。这是支什么样的军队啊！上个月在杭州我见到了一队孩子兵，最小的只有15岁，穿着球鞋，脸上露出天真无邪的神气。在队伍的末尾，我甚至看到一些孩子象中国的中学生在街上走路时那样手拉着手。在回来的火车上，有一群这样的士兵，一个人抱着另一个人的头在睡大觉。这支军队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没有弹药。

“现在，中国人在挖战壕、设置带有倒刺铁丝的路障。估计约有60,000士兵保卫城里的华界。这样的人保卫这座城市就象在美国由后备军官训练队用小得可怜的22响手枪对付机关枪一样……。

“如果中国的苦力和农民，为打仗而放下手中的人力车或工具仅仅一天，那么他们的家庭和他们自己就得挨饿，为生存而奋斗是如此吃力……。一个苦力要花10年才能凑足买一支枪的钱，而绝对买不起弹药。政府甚至也无力提供一发子弹。

“冯玉祥将军（顺便提一句，他是有名的“基督教将军”，一次，他用救火水龙头给一个团的官兵施洗礼，并给他们分发了《圣经》，规定他们必须阅读）最近在上海，他愤怒谴责了军阀和帝国主义分子20年来将中国作为他们争荣显威的场所，他力图唤起‘民众’，使他们觉悟起来，了解国家大事。这些民众根本不知天下事，他们目不识丁。交通工具、道路如此之差，有些相隔仅20英里左右的村庄，人们竟老死不相往来，他们几乎不知道邻近市镇的名称。在中国，一个士兵不过是一个为了糊口而当兵的穷孩子，他甚至不知道是在同谁打仗和为什么打仗。

“中国青年学生简直要发狂了，他们意识到国家已处在危急关头，前途令人绝望。举世闻名的中国学生运动，通过罢课斗争使民族主义精神传播海外，但它是我所知的最可悲可叹的事情之一。真是英勇壮烈。姑娘们十分纤弱，完全不习惯于户外活动，小伙子们身着丝绸长衫，脚穿软底鞋，看起来象姑娘似的，我

想，这就是为有四千年历史的养尊处优生活所付的代价吧。

“这里普遍的看法是，日本此举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作战地图上早已标明，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动。人们还推测，蒋介石本人对此十分清楚，他只存有一个愿望，即在日本人的控制——至少是经济上的——之下保留自己名义上的中国领袖地位。这个有着6,500万人口的‘日出之国’是多么奇妙的小国啊！它在嘲弄世界上所有的人，在外交上对国际联盟虚与委蛇、敷衍搪塞。这难道不是个发动袭击的千载难逢的时刻：俄国正埋头于五年计划，英国正竭力紧紧抓住印度，中国则百孔千疮、破败不堪。各国都纠缠于自己的严重问题而不得脱身——等到它们有暇顾及在东方发生的事件时，日本可能已稳坐于世界霸主的宝座上了。

“目前，日本正象对待附属国一样地对待中国……”

1932年1月28日，上海华界陷入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一方是日本侵略者，另一方是中国抗战部队十九路军。我和同住华联公寓的海军军官夫人等友人站在塔楼上瞭望着战事的发展。

在整整的34天里，我们不时听到子弹和迫击炮弹的呼啸声、双方之间的炮战和轰炸的隆隆声。晚间，炮火划破夜空，火势在不远的棚户区蔓延。“在上海面临危险”，这是我给国内报纸提供的照片的说明。

在我收藏的书信和往日的剪报里，我找到了一些当年发回国的电讯。

“日本飞机飞越上海上空，轰炸了主要的火车站。上海华界陷入一片火海之中，火势完全失去控制。日本海军陆战队已完全占据了闸北区。”

有一篇文章引用了我对一万人从闸北撤往公共租界这一情景的描述，“他们不时回头观望升腾至几百英尺高空的火焰。他们匆忙带走所能带的财物，逃入已经住着一百万人的租界区……，医院和避难所人满为患……。我们不知道这儿将发生什么事。第31

步兵团驻在这儿，17名士兵临时住在这座楼的第8层，所以我认为外国人是安全的。”

埃德加很是兴奋激动，匆匆跑往交火现场。1月28日第一个晚上，当埃德加来到塔楼顶上观看战场全景时，我们一群人已经在那儿看了好几个小时了。他满身尘土、精疲力竭，兴奋得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他那棕色的眼睛里却闪耀着愉快的光芒，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亲临战场。

“中国人在抵抗，”他怀着支持中国人的豪情宣布道。但是英国军官显然不相信他的话。埃德加告诉我们，他于11时35分抵达上海北站，并警告中国铁路工人说：日本人将在子夜时分发动攻击。随后，他由虹口折回时遇见一队队日本水兵排到马路两旁进行射击，于是他拐进一条小巷，避入租界。他从那儿的大门向外望去，看见日本人用机枪、装甲车和武装摩托开道占领了这一地区，“他们边走边屠杀，”他叙述道，“但这会儿，他们返回时都大批地受伤了。”

“这么说，你直接进入日本人推进的行列了，”我带着并非完全赞许的口吻问道。

“这可是空前绝后之举！”埃德加说，“就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我们竟可以离战场那么近，并且安全地观看战事的发展。”

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你有没有意识到，如果你为我搞到一张新闻记者证的话，我可能成为这个广袤世界上自1918年以来的第一位亲临前线的女战地记者——如果那时有过这样的女记者的话。”我说道。

“租界出入口有人把守，不允许妇女出入。”

“我可以看看嘛，”我申辩道，“只要有那么一张小纸片就行了。在我一生中再也不会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我的书比你的更需要翔实材料。我要的是凭证，我只求能够毫无愧色地宣布：有那么一天，我曾经是一位战地记者。我哪会遇到什么危险呢？”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埃德加犹豫不决地说，“但你

要是遇到什么麻烦，我可是无能为力了。”他允许我访问一下“红十字会机构，如难民和孩子之类。”

结果，他领我到租界警察局。一位英国警官简直被这一请求吓懵了。我们出来时得到了第206号记者证，上面贴有我的相片，为《纽约太阳报》采访的和“可在紧急情况下出入租界”的通行证。我还得到了第2663号宵禁通行证。这些是我的剪贴簿上仅有的足以证明我曾经是战地记者的证件，尽管我只当了一天。

下面两段摘自我的家信：

“昨天我到了战场——或者说到了战场附近。埃德加·斯诺带我到了上海北火车站。那里伤亡枕藉。我从观察哨所向外眺望。我前面的街上是中国军队的掩体。半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就有日本海军陆战队。他们的机枪火力网正朝向我。人行道上倒着一个盖着白布的死者——他是这场战争最初的伤亡者，一个中国军队的司号员。

“我们看见两个17岁左右的年轻中国士兵在掩体里正同一条长髯毛黑狗嬉戏，这条狗玩得很起劲。当他们注意到我们时正在哈哈大笑，并向我们致意。日本人可不是这样。我们又到另一个拐角去——那是一条划分由美国第31步兵团把守的公共租界和日本地盘之间的大街，我们走进街道约三步远，举目四望。两个日本人立即举起刺刀对着我们的前胸，和他们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们可不理会在战争时期微笑点头致意的那一套，他们就是在行使军人的职责。然而，这些中国人和日本人——中华帝国和日出之国的姻亲们看上去却很相象。中国哨兵没有多少掩护，懒洋洋地抽着烟，但日本兵却一直隐蔽得很好。……”

档案里可能还保存着有关我采访吴铁城市长以及访问霍乱、伤寒和痢疾肆虐的难民营的新闻短片。这是由埃德加的好友、头条新闻节目主持人、“新闻短片”制作者H·S·王拍摄的。

专门制作“新闻短片”的王为我安排了一次对中国统帅蔡廷锴将军的采访。他揣度着，没有什么能比这件事对提高中国人的士

气更为有利了，更不用说把一位美国姑娘放在这样的背景中还会获得新闻畅销图片的效果。我穿上猎装和靴子，带上外国记者专用的军用胶布雨衣。我们乘坐配有司机的新闻专车，通过租界警卫、绕到了中方前线的后方。这时几百码远处，一声爆炸划破天空。

“那就是蔡将军的总部，”新闻短片专家叫了起来，“我本来以为这儿是安全的，”他的司机没有得到允许就不顾满地弹坑把车开回去了。

这时我惊讶得忘记了害怕，再说，外国人也不能在中国人面前表现出惧怕。

“别跟埃德说这些，”我警告自己，“他会把我的记者证要走的。”

“但我以为你是他的正式助手，他需要一篇精采的报道。”

当埃德得知我的侥幸脱险时，他气坏了。从那以后，没有人还能再做什么来帮助我了，但中国人知道了这一事件，而这并无损美国的声誉。后来我拍的照片，主要是有关带刺铁丝网路障、沙袋及非军事行动的平民的事了。

可是战事一停，日本人刚刚撤走，一个年轻的美军情报中尉就带着我和其他一、两个人去日本人曾用海军炮火封锁的吴淞口炮台。我出示了记者证才得以进入。炮台仍在冒着烟，尸体仍在掩体里。在一个掩体里有两个年轻士兵是被震死的。

我们站在大炮旁照了像。这可是抢在埃德之前得到的新闻。他羡慕地端详着我的这些照片。在这次战争中，埃德加曾数次冒着轰炸的危险逼近火线，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能够在事件发生时身临其境。（后来，埃文斯·卡尔森于1937年和埃德加一道进入战场，他告诉我，埃德加是他在军人生涯中所认识的表现得最英勇的人物之一。）

在日本，总理大臣犬养因下令撤退而被暗杀。中国十九路军的伤亡约达14,000，平民伤亡人数为20,000。

这是中国士兵首次和一支现代军队对阵，他们这样做违反了主张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的意愿。从1927年起，蒋便陷入了困境，一方面是日本人在沿海地区进行威胁，另一方面内战在内地爆发。他倾向于打内战，对付他自己的国民；而日本人对他的地位的威胁似乎较小。但是中国学生主张对内革命，对外抵抗日本侵略。

信件摘录

1932年冬

我现在有个男朋友，我太喜欢他了。他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年仅27岁。我们二人都不大想放弃事业。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他是最喜欢的。他确实很有才能，富于探索精神。他曾独自一人驾驶着篷车穿过靠近西藏的、一个土匪出没的中国边远省份云南，进入印度支那，又进入印度内地。他是一个记者。但我出于某种原因，对可能陷入的任何感情纠葛非常谨慎。……

第五章 世上独一无二

人们都说上海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地方，特别对那儿为数不多的外国妇女来说更是如此。男女比例约为十比一，甚至极普通的女人也可能当上一天的皇后，几名美国妇女更被捧上了天。由此而来的男性的关注并不能令人沾沾自喜，尽管饶有趣味。而我有工作缠身，因此用上海标准来衡量，我几乎可以说是置身事外的。好几个有钱有势的年轻的大班正在寻找配偶，可我却不喜欢“上海意识”。

绝大多数美国人住在为数不多的有现代抽水马桶设备和西式饭菜的公寓式饭店里。我在华联公寓的小房间连房钱带饭费一个月只花不到50美元，另外还有一名男仆侍候我这个贵妇人；我每天花30美分的代价请一位女按摩师来为我按摩。还有一位半天工作的洗衣的阿妈（她把我打扮得花枝招展），但由于过分认真，她却把我的小白手套和绸鞋洗坏了。

每天早晨男仆送我乘电梯下楼。我花5美元雇佣的包车夫以照顾最惠国的那种姿态在等着我，他那种充满自豪感的笑脸使我整天心情舒畅，车垫保持得象我的洗衣女佣洗的衣服那么洁净。

正象我在家信中所写的，“有时我以为东方最大的诱人之处，就是一切东西的价格都极其低廉，几乎不用花什么钱就可以过上皇后般的生活。”

我住的饭店的街对面就是跑马厅，这是一处绿树成荫、供人们盛装骑马的地方，和伦敦的同类场地相比毫不逊色。主要是英国人在那儿打马球、赛马，这地方几乎被他们独占了。

我对于观赏挤得水泄不通的通衢大道——由静安寺路通往南

京路的街景兴致盎然。蔻蔻店就坐落在南京路上突出街心的地方，在凯利瓦尔士书店的对面。埃德和我曾在这儿多次对着冰淇淋、苏打举行隆重的仪式——这象征着优雅、洁净、富有生气的美国面对腐朽的旧世界。当英国人在外滩上海俱乐部里世界上开放时间最长的酒吧间里，呷着苏格兰威士忌，日本人在兵营里操练的时候，我们觉得未来是属于我们的。（1973年，我曾想去找那家蔻蔻店。1949年后，南京路拓宽了，这块美国文明的前哨阵地和许多美国文明事物——虽然不是全部，一起被人忘却了。）

宋庆龄女士也曾在这家蔻蔻店接待过几次客人，并且很喜欢这个地方。在全中国，这儿是最有美国风味的地方。一勺勺清静爽口的冰淇淋令人乡情倍增，这是一处崭新的、外国人唯一可以放心地喝牛奶的地方。

赫宁森奶场开办后，在中国出生的外国人的孩子可以保证得到卫生的牛奶供应。但仍然只有为数很少的外国家庭甘冒风险在中国生孩子。他们的佣人住在自己家里，这样很可能把各种慢性疾病带到雇主那儿。中国婴儿除吃母乳外不吃别的东西，这样他们的血液中就有足够的抗体抵御可能在几天内使一个外国婴儿致死的疾病。

外国妇女对在中国生活持有两种不同看法。条件优裕者象鲍威尔，从安全计，把夫人和孩子送回国内。但在华联公寓居住的海军军官夫人们却凑在一块儿聊天，似乎永远难忘在中国度过的那些日子。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象华莱士·沃菲尔德一样具有美国南部陶冶出的那种魅力，她们那时已经知道了沃菲尔德了。

我对我所做的一切都不分昼夜地埋头苦干，比其他姑娘们刻苦得多了——这是一种女童子军式的纯真。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重要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我不拘一格，广为选择，其中的一种做法就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姑娘，我要能够胜任不止一项高级而又困难的工作。

我热爱我的工作。起初，我只是总领事馆的办事员，我的同

行是四个比我年龄大、资历深的妇女。她们管着六、七个领事工作，根本不象是下属。不久，我当了总领事的私人秘书兼社交秘书。由一位年纪较大的办事员负责记录口授的内容。我估计，这在东方可能是一个秘书所能找到的最美的差事了。如果你以当地的购买力来计算，我们的薪金简直可以达到天文数字。象在美国时一样，我拼命积蓄，为旅游和写书作准备。

我有我自己的颇为象样的办公室，甚至有一名给我放复写纸的办公室侍役。在我任职期间，“上海的沙皇”埃德文·坎宁安作为中日协定联合委员会主席正是飞黄腾达之时。在上海，他名列各国领事之首，世界上没有其他领事官员拥有象他那样的实权。我正处在一种权力的转换时刻，即英国人正在放弃、美国人正取而代之的交接点。当英国或日本的官员来访时，我为美国的“面子”考虑，故意让他们适当地等候一段时间。让舰队司令和陆军将军们明白，文官享有优先权。

我坐在放着梔子花或晚香玉的办公桌后，傲气凌人地处理一桩桩外事活动，俨然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日本人和中国人总是生怕有什么失礼之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对妇女总是彬彬有礼，殷勤相待。我所接待的第一位法西斯党徒是娶了墨索里尼女儿爱达的那位齐亚诺伯爵。他是意大利的驻华公使，我曾在社交场合用我初学的意大利语同他应酬。

在中国，几乎没有年轻的未婚的外国女子。单身汉们常常早早来到，约定恰恰在午饭前会见总领事，以便邀我外出。可是我忙于正常的礼宾活动，很少接受这类邀请。后来也总是在向社交方面的良师益友讨教后才接受邀请。

这种克尽职守的精神得到了慷慨的回报，我成了美国人所称的幸运儿。由于坎宁安先生的夫人罗达有病，不能处理社交事务，我被授权负责——并有全权处理——美国总领事馆和整个美国社团以及领事界的娱乐和社交活动。对外国人来说，上海的战争不过意味着重视礼仪、加强同本国人之间的联系，但除了备茶

舞会和宴请以外别无其它活动，在这种场合，大家都身着流光溢彩的盛装，精诚团结的精神令人振奋。那时的华莱士·沃菲尔德一家从未如此欢乐过。我们派人请来了在马尼拉的陆军军官夫人，我带着栀子花到船上去迎接她们，她们了解我的全部活动，说是陆军从来没有被政府的外交机构如此优渥地接待过。

当第15步兵团从菲律宾来到的时候，我万分自豪地见到罗伦萨·加塞上校和L·T·格罗少校——这是我在东方所见到的最英俊的两位军官。在一般的社交活动中，海军总是比较受欢迎，而陆军可就不一样了——除非他们持有西点军校的文凭——我这次可是改变了做法。加塞上校和格罗少校为感谢我而在法国俱乐部举行了正式晚宴。

海军也不甘落后。由舰队司令出面在旗舰上特地为我举办备茶舞会。这些军人着装整齐，但除了我以总领馆名义安排的一些活动外，别无它处可去。上司们吩咐他们的副官随时听我发话。

通常在上海的美国部队只有理查德·霍克上校统辖下的第4海军陆战队，它处于动员状态，保卫着公共租界的安全。在中国，可能是一个美国军人保护着两个美国公民吧。

除了执行正常的任务，我安排了一些招待会、晚宴，甚至桥牌聚会，好让在上海的美国人的生活过得更具特色，我还亲自过问邀请当地的新闻摄影记者也来参加，因为我希望能压压英国人和日本人的威风。

那时，有关“美军慰问协会”的想法还未听说过，也无先例可循，因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真正的战争”。那儿的每个人都急于亲临前线，因为除了少数上层人物之外，他们都是第一次遇到战事。我心里有两个想法：一、这些人愿为我们冒生命危险；二、没有这些外国军队驻扎在此，日本人恐怕不会撤出；然后还有三，他们身着军装，不是人人都十分引人注目吗？

我在大型招待会上注意介绍不同国籍的人士相互结识，并邀

请军官们参与他们本来不应参与的文官的外交事务——当然是在得到我的良师益友们赞许后才这么做的。

我作为女主人的生涯随着我当上“庆祝1932年7月4日美国人委员会秘书”——我就是这样在信件上署名的——而登峰造极。我应在跑马厅的草坪上安排这次庆祝活动，届时应有军乐队奏乐，军人穿礼服出席升旗仪式，并举行盛大招待会。和英国国王诞辰游园会相比，我们的招待会将毫无逊色。而在英王诞辰的游园会上，女宾们头戴很大的帽子、身穿拖至草地的长礼服，和进白金汉宫所着服饰毫无区别。我已为我自己赴正式游园会设计好了服装——佩有黑丝绒腰带的浅蓝挑花刺绣礼服——唉，可就是没有拖到草地上。于是我向那位来自弗吉尼亚的、象华莱士·沃菲尔德那样拘泥于礼节的海军军官夫人，买下了她的礼服——衣服很长，饰以粉红色的拖地花边、并缀有宽圆花边领和黑丝绒腰带，加上系有黑丝绒饰带的宽边意大利草帽。以后好多年，在这种场合我都穿这套服装，就象她在我以前曾如此穿着一样。

我在酷暑中一手提着长裙子执行着公务，瞥见埃德加在场子边上向我投来迷恋的目光。我矜持地向他挥挥手，他则以甜美的一笑作答。

除威尔士亲王的朋友沙逊一家之外，在上海还没有国际上层社会的代表。他们在自己的华懋饭店款待威里·范得比尔特时，我应邀作为他的伴侣出席宴会和舞会。

夏天到来之前，国联的李顿调查团在前往“满洲国”了解日本占领情况的途中抵达上海，我得为他们安排会晤。他们要我参加调查团，特别是麦科伊将军的助手威廉·比德尔。他们不仅要我参加在中国的活动，而且还要前往日内瓦。如果在几个月以前，我可能会因为有这样的美差而欣喜若狂，可现在我的羽翼未丰，不愿再浪费时间，为他人做嫁衣裳了，现在是我完成自己的伟业之时。我正在为一本我后来一直未动笔的书收集材料——边干边学。埃德加·斯诺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的手稿源源发

出，丝毫未因外界活动而分心。我喜欢他这种工作作风。

当我向老资格的领事官员保尔·豪斯顿披露我到东方来的目的是要写书时，他答应予以帮助。他患有肾病（数月之后便去世了），但把我当作他所积累的在中国的工作经验的继承人，并从他那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借书给我读。他还非常秘密地交给我一份他所撰写的有关1927年广州公社的很长的领事报告，当时，他在国民党进行大屠杀时营救了几个苏联领事人员。他是我所见到过的第一位直接了解中国共产党人活动情况的人。毫无疑问，这是就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向国务院反映的第一份真实、客观的报告——后来导致一些中国通被援华院外活动集团的麦卡锡分子排挤出国务院的就是这种类型的报告。豪斯顿对这份报告非常自豪，甚至有点心情激动。这份报告为凯洛格—约翰逊这类不干涉主义者提供了弹药。他对充满上海意识的坎宁安持有戒心，并告诉我，不要在坎宁安面前提起他。

“没有什么你不能做的，你确实非同一般，”豪斯顿以留遗言的口吻对我说。他觉得我的问题提得好，我富有创造性，能象领袖人物那样思考问题，“执着地追求需要做的事——而不去责备别人。”

“我只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只不过特征更明显罢了，”我解释道，“为什么不去做所谓不能做的事呢？”

“也许是这样，”他说，“但是典型的美国人从不到中国来。”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有关中国的著述都谬误百出的根源所在。“到我们这儿来的仅是个性奇特的人——或者他们本来是不肯到这儿来的。”对他来说，汉学家简直就是陈腐思想的同义词，他告诫我不要学汉语。“它会伤害你的脑细胞。”他说道。

从一位名叫维克多·弗莱勒的阿尔萨斯—德国—法国人那里，我也得到了一些有关中国的经验。他是我能够找到的唯一的
中国问题学者。他作为汉学家为了解所谓“真正的”中国，在中国的

陕西无声无息地埋头苦干了25年。但他的结论却非常消极：除非把中国的孩子——断奶就送到完全西式的住宿学校，与中国的影响彻底隔绝，否则中国的现代化就毫无办法。这种方法的正确性可以从著名的宋氏姐妹的例子中得到证明。她们的父母逼着她们在幼年时就住在上海的马克蒂耶女子学校，比其他中国孩子接受西方教育早许多年。随后，又被送到美国大学深造。结果，其中两姐妹成了中国的第一夫人，庆龄嫁给了孙中山，美龄嫁给了蒋介石。另一个姐姐鸾龄做了中国行政院长孔祥熙博士的夫人，他是“宋氏王朝”的至亲，1927年后是美国对华援助的联系人。

“但是你把主要之点遗漏了，”我对弗莱勒博士说，假如这几位姐妹是在法国或德国接受教育，那就什么也不会发生。她们接受了极严格的清教徒式的训练——这是美国文明的基石，也是大英帝国赖以发展的基础。“就象蒸汽机原理一样——压力产生能量”，我说，“你应该读读爱默生^①的作品，而不是康德或弗洛伊德的作品。”

弗莱勒博士万分惊讶，他三次几乎把头磕向地面，“你是老师，我是谦卑的学生。”他觉得我有一种他称之为“鉴别力”的秘诀。他认为中国人不乏智力，但缺少“鉴别力”——他们的神经系统不够健全，已经衰退，因而毫无希望。“你具有中国人缺少的那种素质”，他说，“你应该当我的学校的学监。”

“这完全靠自制力，”我解释说，“可这并不意味着态度消极。首先必须产生动力。给空水壶加盖无济于事。必须先产生蒸汽。必须生机勃勃，富有创造性，充满激情。”

^① 爱默生（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诗人、先验主义作家的代表。

信件摘录

1932年春

大多数外国人抱怨上海是由一群建筑物封闭起来的都市，根本无法外出度周末。但我对这种说法很不理解，远近到处都可以走动，走内河、运河，或走铁路，但缺少公路……。

我组织了去无锡的一次远足，从上海到无锡乘火车一般只需大约五小时，眼下由于局势混乱则需八小时左右。

由于无锡有纺织工厂，它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虽然我听说无锡很脏，根本不值一游，但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更有甚者，据说那儿土匪猖獗，湖盗（在太湖）横行，兵痞肆虐，危险极大等等，不一而足。我在中国不怕任何中国人。只要你以礼相待，他们就不会故意伤害旅游者，当然，绑架除外。

我们由沪宁线出发……火车定于下午3时左右出发……我们于2时30分到车站。一等车厢挤满了人，进去都很困难，更不用说找个位置坐了。推推搡搡约摸五分钟，我扔下了手提箱，一屁股坐在上面。中国人对白人妇女一概不予注意，不管她们是否提着东西。当然不提东西会显得更有身份，不失尊严，但于解决行李问题却毫无帮助。

靠窗口的座位大多被那些到内地去执行公务的军官们占了。他们全都身穿深蓝色棉军服，腿上打着绑腿，多数脚上穿球鞋，头戴象法国人戴的那种帽子。军服呈蓝中带绿的颜色，由于日晒雨淋、多次洗涤而色泽黯淡。他们袖子上戴着作为标志的袖箍，上面写着中文字。军衔则为肩章，常用别针——大号别针——别在肩头——似乎这些是美好的军事装饰品一样。看上去他们并不象整装待发的威武军人，而是秉性温良，亲切友好，我很喜欢他

们……

我们到了无锡。我的一位朋友和办纱厂的荣先生有一面之交，我们便拿着名片找到了申新三厂，这座工厂看上去就象坐落在运河边上的一座夏宫。白色的厂房，大烟囱上盘绕着常春藤，房前有一座绿树成荫、设置了长凳的公园。

我们先见到了荣先生的秘书和该厂的助理……最后，荣先生亲自出面，我们互相介绍、鞠躬致意，就象在职业拳击场上一样，紧紧握手。这位荣先生颇富魅力。他不说英语……我们坐在一张发亮的中式桌子两边海阔天空地聊了一会儿。

我过去从未听说过可以象这样进行三边式的交谈。我们提问，秘书随时译成中文，然后荣先生回答……

荣先生的普通话讲得很好，语调抑扬顿挫，具有一种很难解释、但听来十分悦耳的韵律。据说中国话说好了是世界上最好听的语言。这就是诗歌在中国如此繁荣的原因……

随后，我们参观了一座纱厂和一座纺织厂。他们使用的是马萨诸塞州制造的完全现代化的机器，但却有数百名男女童工在厂里做工，这一点可太令人沮丧了……

无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因为城市的发展与外国人无关。无锡完全是中国人的社会。毫无疑问，中国仅需要一点资本就能和其它国家并驾齐驱。无锡就是证明。

第六章 上海意识

“你可千万不要同斯诺或鲍威尔这样的人来往，他们都是亲华分子。”说这话的人是在为我的社交活动出主意，他语气冰冷地提醒我，就象是从北冰洋地区来的一股强大的寒流，使我无法理解。接着他又说：“不过，鲍威尔家的姑娘倒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她们是所有来过上海的姑娘中最可爱的一对。鲍威尔夫人颇有见地，把孩子带回了美国。”

我虽然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所谓的“上海意识”，但这还是第一次对此有所领略。我只好跟上这种思想。我虽然很自信，但毕竟是初来，所以也很谨慎。我不愿意让人说成是个亲华分子，不希望让这类不堪入耳的流言飞语损害自己的形象。另外，我也不想和当地的权势集团发生冲突，他们对我非常友好，也有很大帮助。我父母在国内是社会贤达。我也是属于那种人缘很好、循规蹈矩、爱听好话的人。在学校期间，我每年都当选担任一些职务。但尽管如此，我却一向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点书生气，有我自己的思想。以前，我还从未接触过任何危险的思想。

埃德刚到上海时，鲍威尔一家对他亲切热情，犹如一家。1931年时，鲍威尔大约40岁，他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活象一只猫头鹰。他每天工作到很晚，要等到给他的报社——《芝加哥论坛报》发完电稿后才睡下。他患有肝炎，除了喝茶外不喝其它饮料。他酷爱在美国的妻子和孩子，节衣缩食攒钱寄给他们。

在上海的外国人视鲍威尔和斯诺为亲华分子而加以排斥，1931年日本人开列外国记者的黑名单，也把他们两人列于前茅，他们的行动受到监视，我们从来弄不清日本人胆敢采取什么贸然

行动。鲍威尔经常说：“我宁愿和中国土匪相处，也不和任何日本人来往。”

我给埃德打电话告诉他，我在蔻蔻店等他，打算和他谈谈有关斯诺和鲍威尔的问题。我们见面后，我告诉他，我们面临着“一场灾难的威胁。我们崇高爱情的萌芽可能会被扼杀。”

“噢，我还可以继续和你交往，不过，只有在阴天才行，”埃德一边吃着冰淇淋苏打，一边笑着逗趣。他解释说，亲华就意味着你支持中国的独立，反对外国干涉。这还意味着你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放弃根据条约规定开放的通商口岸。

“你的意思不是说要结束治外法权吧？”我惊奇地问。“没有治外法权，外国人就无法在此地居住。”有了治外法权，侨居国外的人就享有不受居留国家管辖的自由，而只对本国的法律和法庭负责。正是由于治外法权和“炮舰外交”，外国人在中国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外国妇女更是受到严格保护。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敢碰一碰外国女人，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提醒埃德，慈禧太后下令将所有的外国人和基督教徒处死一事才刚刚过去31年。我还说：在1927年，“蒋介石仅仅因为姑娘们留短发而下令砍掉她们的脑袋。他认为仅仅短发一项就足以证明她们是共产党。这些都是哈利特·埃贝德告诉我的。”（哈利特·埃贝德是我爸爸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友，他来华时恰好遇到1926—1927年的革命。他那本在1930年出版的《苦难深重的中国》影响了我的看法。）

“噢，你又没有梳短发，”他总是对事情满不在乎。随后他用比较严肃的口吻对我说，德国人、俄国人和奥地利人都不享有治外法权，只有12个国家享有这种权利。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类的东西，肯定意味着结束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但密勒和鲍威尔认为，美国人能和中国人建立友谊。他们坚信蒋介石之类的中国人能够领会西方化的思想。

埃德解释道，帝国主义是分阶段地发展形成的。为了帮助我

理解这些，他推荐我去读些列宁的书籍，他在印度时就读过列宁的书。密勒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和辛亥革命，鲍威尔支持1925—1927年期间的国民党革命，他为此在上海受到排斥。但孙中山夫人现在却认为蒋介石是反革命，至于埃德，他同意孙夫人的看法，认为中国需要进行更彻底的革命，还需要多次进行革命。

我订了一份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并为它撰写书评。我为鲍威尔写的第一篇是论“上海意识”（他说这篇文章很精采！），我阅读了密勒的所有单调乏味的书。当我们在一起喝茶时，我听埃德朗读他的著述，然后，我从“本国角度”发表评论和看法。我看不出他们的观点有什么不对；只是埃德反对帝国主义的调子比老一辈人更加前进了一步。

我们做的事也只有美国人才会去做，别人谁也不处于能够进行这类活动的地位。我仍然强烈地感觉到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存在着自然形成的源远流长的友谊。我们双方都能自我克制，不需要互相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至于政治事务，那就象季节一样不断地发生变化。

在上海期间，我有时的确感到孤单——如同一颗小小的麦粒夹在两个大磨盘中间一样。但我从未感觉到会被压碎，尽管这种可能性时时存在。两个大磨盘的下面一个是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上面一个则是由具有“上海意识”的帝国主义死硬分子组成的，为首的人物是我的顶头上司，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埃德温·坎宁安。他1914年来中国，从1919年起就成了“上海的大亨”。他维持着大企业大班们在通商口岸的利益。

到1927年，在中国的外国人已源源不断地从内地涌进通商口岸的城市，其中有很多到其他国家去了，以后也没有再来中国。国民党的国民军从广州出发不到六个月就打到了长江沿岸的汉口和南京。此时在汉口，孙中山夫人所参加的左翼政府正和英国政府就英国交回租界进行谈判，但在左翼政府同蒋介石右翼分子决裂后便垮台了。

在南京传说有几个（可能是六个）外国人被国民军杀害了，为此，“赤色分子”受到了指责。（我至今无法找到任何证据和道理，说的赤色分子会如此愚蠢，不过，鲍威尔却信以为真。）不久，蒋介石和上海的那些惊慌失措的外国利益集团作成了交易，在南京成立了他的政府。

上海工会占领华界时，鲍威尔正在上海。上海华界当时是东亚工业最集中的地区。工会组织是由周恩来领导的。暴徒在火车站附近杀害了大约5,000工人，为蒋介石和他的军队接管提供了口实。

与此同时，40,000外国军队开进来准备保护上海和大约75,000名外国人。（美国军队是由教友会的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指挥的，他曾受命不得向中国军队开火，后来他曾报告说，他的军队驻扎在中国时，不曾怀着敌意放过一枪。）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独树一帜地反对武装干涉，这在华盛顿得到美国总统柯立芝和国务卿凯洛格的政策的支持。美国商会通过决议，要求列强进行武装干涉，并且对鲍威尔进行攻击。

鲍威尔和密勒都从来不曾点出蒋介石的名字，而他们也未受1927年事件影响而冲动行事。尽管鲍威尔绝不会使用诸如“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这样的词，但他确实相信这正是蒋介石所代表的、或者是蒋介石在友好的美国人精心扶植和控制下所可能代表的。

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真正认识蒋到底代表谁。他当时实际上是代表“买办”阶级的利益，这也就是中国人现在对资本主义的称谓，当时它构成了“帝国主义”的另一面。很幸运，我没有坠入这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用语之争的迷雾中去。我既已身历其境，就必须自己去了解事实，而不是从想象中的概念出发，因为这些概念本身是充满矛盾的。当中国人使用“封建主义”这个词时，他们实际上指的是古老的封建制以前的父系部落氏族公社这种孔夫子制度。现在中国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封建买办，这也正是我在1935—1937年期间的认识，这种看法在当时并不流行；苏联人和鲍威尔都还在极力想把他美化为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1932年，我忙得无暇就这些问题进行全面思考，但我也并未任岁月蹉跎。在上海，几乎只有埃德加·斯诺一人愿意和我谈谈中国人和他们的问题。

反对帝国主义行径的一派在中国可能只有为数不多的代表人物，但在国内他们却得到报界和舆论界有力的支持，不仅有密勒—鲍威尔—斯诺的报刊，还有一些在中国努力实现“中国化”的重要传教士们。这些反对外国干涉的卫士们背后有白宫和国务院为他们撑腰——有教友会的胡佛和1928年签署和平条约的凯洛格。他们的使者是教友会教长纳尔逊·图斯勒·约翰逊。他竭力反对干涉主义，急于避免以任何形式卷入，以至鲍威尔都把他出使的经费说成是“白白浪费”。

我很自然地站到了这一边，我是斯坦福—胡佛孤立主义者的门徒。但两种截然相反的势力每天都向我施加压力，我必须自己判断采纳哪一派的观点。我到上海时随身带着介绍信。但这些不是社交性的证明信件，而是要求研究中国问题的老前辈对在帝国前沿哨所进行考察的年轻的美国人的关照。无论是坎宁安还是他的对手密勒和鲍威尔都是这样看待我这些信件的。我知道，我还用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方式代表着美国青年。我一到中国就投身于青年事业——即致力于创建一个崭新的世界的事业。

我不是什么专家，但对任何事情都还略知一二。凡事我都并不精通，而总是一个二流角色。但通过这一次对多方面的事务所进行的广泛而全面的研究，我培养了冷静地从整体观察事物的能力。我敬佩埃德，他遭到排斥，处境孤立，却毫不在意。至于我自己，我既无名气，又不够坚强，才智和办法、资金也都有限，不可能单独完成后来我在中国所做的事，要不是借助于我的丈夫，与他同心协力，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些事情的。

只有身处矛盾的焦点，个人才有可能在历史上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就好比一个渺小的人物，尽管势单力薄，但仍能竭力去偷盗那照亮未来的普罗米修斯火种。

信件摘录

1932年夏

关于政局：蒋介石照常还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华北的军阀仍照常混战。广州来的左翼（汪精卫和他的追随者）除了偶尔发表些讲话外就无所事事了。汪总是摇摆不定，以致整个国家都已对他完全失去了信心。除蒋介石凭借飞机和大炮外，没有任何人在这个国家享有威望。这里每个人都预期南京政府随时会垮台，但它却反而日趋巩固。蒋介石把他所有的军队用来对付内地的共产党。

我认为，在江西以及附近地区，大约有7,000万人在共产党政权统治下。他们称之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了自己的纸币，邮票等，并显然还有一整套组织完善的政府机构。他们采用了俄国苏维埃制度，把田地退还给了农民。农民坚定地支持他们。军阀手下的士兵正在变成赤色分子。

据说在长江流域地区有一半农民是红军密探，由于这个原因，南京政府的军队行动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据说，现在农民所遭受的压迫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深重，他们身受这样的压迫，日益感到不满。在四川，农民已被迫交纳70年以后的捐税。各地军阀在混战中抢占了大批村庄。南京政府根本未执行国民党的重建计划。他们所做的只是替自己的军队购买枪支弹药，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至于什么修建道路和兴办工业统统都被置于脑后。每一个省份都被一个军阀牢牢地盘踞着，怕邻近的军阀从他辖区捞取油水，所以不顾农民死活拚命榨取。

有一次，我和约瑟夫·洛克博士一块儿吃饭（他是《全国地理》杂志的颇有名望的探险家），他刚从云南回来，他说，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强迫农民种植鸦片而不让他们种果腹用的粮食。

他还说，当地政府将一切有嫌疑的人或者那些行为稍有不轨的人统统砍头问斩，通过这样简单的方法，他们把赤色分子杀绝了。

反共浪潮已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每天都可以从报纸上读到几十名学生由于口袋里或者书桌上放着卡尔·马克思的书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监禁，从此以后，就杳无音信了。这种情况在上海尤为突出，据说，“成吨”的宣传品不断地被租界当局和中国警察发现，不幸的物主们被立即就地处决。上海工厂的工人学会了进行有把握的罢工，如果哪一月里没有一家公用事业，如公共汽车公司、电话公司或工厂等等，组织罢工，那就算是个糟糕的月份了。打仗以来，工资减少了而物价不断上涨。但在租界内还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骚乱——由于当局小心对付，任何骚乱还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了。

据说中国共产主义分子主要在学生阶层，这些人认为除了用武力推翻各地军阀之外没有其它出路，已经没有任何人还对他们的善意寄予一丝希望了。自从年迈、贤明的孙博士在为人道主义事业操劳中以身殉职后，国民党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受到各方面的指责，中国已经根本没有领导了。

据说，瑟顿将军又到中国来了，考虑建立一种法西斯制度，再加上外来干涉的威胁和日本人的恫吓，这里生活极不安定，但也饶有兴味。……

第七章 我和斯诺先生结婚

在我25周岁生日那天，埃德拿着一束梔子花早早就来了——只有这一次他没有迟到。为了纪念我们第一次相见，庆祝活动包括去蔻蔻店喝茶和在晚餐时吃斯特洛加诺夫牛排。

埃德表示，我已满25周岁，越过了一个里程碑，说时，他低着头，有些腼腆地吃着美国冰淇淋苏打。他满怀希望地对我说，我可以在北京更好地写书，因为那儿生活费用低，而且环境也很安静。但如果我真的想去旅行，我到底打算到哪里去呢？

“婆罗洲，”我马上答道。“那是除了奥沙·约翰逊以外还没有其他人去考察过的地方。还有福摩萨、西里伯斯、爪哇、巴厘、新加坡和所有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城市。”

“也许我们可以作个安排，”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请试试这个。松紧可以调整。你戴上这个就算去了西藏了。”

我收下了那个西藏的马鞍形银戒指并带错了手指。我避开他的话题说：“我先把它收藏在钱包里。先得出书。你赶紧把书写出来，我也抓紧忙我的书。”

“用一种新的说法，这东西比我们俩人都更为强大。”埃德有点发窘地说。“一年之前，当我们第一次坐在这张桌子旁时，我就知道了。这不仅是真正的阴阳结合，而且是八卦算定的。难道你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的婚姻是天作之合，是神助天定的，是最

• 阴阳在中国指女性与男性，是宇宙万物的基本。其标志是由一条表示运动的曲线分割的两个对等半圆组成的一个圆。八卦是算命的八个要素或图表。

好的吗？在一起，任何事情都可能做到，你看，我们是多好的一对！”

“阴阳的事可以先放一放，”我和往常一样，必须控制住局面。“至于八卦算命嘛，走！让我们去算算命，然后再到杰斯菲尔德公园散散步，我要在那儿度过我在中国的第二个生日。”

我们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到静安寺，那儿有个寺庙，里面有一位年迈的和尚，他满脸皱纹，还有一颗长着长毛的痣。他手拿着一个装有八卦签的罐子，来回不停地摇着。我们的司机用洋泾浜英语翻译道，“你们俩同命相连，顶好！你们运气很好，应该马上结婚。”

去杰斯菲尔德公园的路上，埃德笑着对我说：“现在你还反对吗？”一路上，他高兴得不停地哼着歌曲，我也随他一起唱着。

汽车司机不时回过头来高高兴兴地咧着嘴朝我们笑。他可能知道我们俩的名字和经历。（在上海，外国人不多，中国仆人什么都知道：什么事正在发生，或什么事没有发生。）

我们在大公园的玉兰花树下漫步，这是除了外滩的小小花园和跑马厅外，唯一可供外国人散步的地方。那一天，风和日丽，中国人一家大小穿着绫罗绸缎，所有的外国人也都穿得漂漂亮亮地在外边散步。我打量着那些英俊的英国人，他们穿着能和萨菲尔街媲美的格雷裁缝店做的服装。

“我的问题是，或者说曾经是，我不愿意受到约束。”埃德一直想把谈话引到他的话题上，而我则想避开。“直到遇到你之前，我总是把妻子看成是累赘，而不认为是伴侣、益友。俗话说，孤身独行的人是走得最快的人。现在，我整天想的就是，在别人把我同你拆散以前和你结婚。除非你和我在一起，否则我就会茫然失措、无所适从。在我今后的一生中，只要能使你满意，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我甚至心甘情愿地做你的奴仆，这是真的，我是真心实意的，我现在只关心一件事，就是你同意和我结婚。”

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我已经被你迷住了。真可怕，以前我从未这样着迷过。”

（在此之前，他在给我的照片上就已签上了“你的奴仆”，此后他一直这样称呼自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自由了以后，才不再这样称呼自己。）

我承认，“你是我所碰到的唯一和我志同道合、情趣相投的人。”但我又告诉他，我不打算把我的婚姻生活搞得一团糟。它必须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婚姻。为什么不呢？为什么要限制它？我赞成结婚，同时也赞成离婚，我还赞成选择和不受约束。为了美满的婚姻，我愿意付出代价。我不想让受挫的作家的心情，来损害美满的婚姻。我首先要写一本书，即使这本书永远也不会出版。

我认识到埃德有一种罕见的特点，这对我至关重要。一开始，他就对我抱有信心，相信我有才华、有前途。对我做的任何事情他都感到自豪。那一天日落时分，我们在杰斯菲尔德公园互相祝愿对方成为伟大的作家。直到最后，他对我未能功成名就、富可连城、成为一个伟大作家仍然感到困惑不解。

12月1日，我接到埃德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我刚把书稿寄走，我们俩到外滩散散步好吗？我在华懋饭店等你。”

虽然，我的书进展不很顺利，但我却学到了很多東西。

我穿了双轻便鞋，为了抵挡江上吹来的寒风，我还穿了一件带大翻领的外套。江风迫使我们倒行，埃德加竖起了大衣领子，压低了帽檐。在江边海关码头，一帮外国水手兴高采烈地跳上黄包车，他们歪戴着帽子，一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气派。我们了解他们的心情就如同首次发现新大陆一样激动。

在江心，许多可怜的小舢板和帆船随波逐浪，而江中停泊的外国旗舰则巍然不动，船上的信号旗在寒风中飘扬。

埃德抓住我的胳膊，使我面向着他，抓得我双脚离开了地

面。他说，“让我们永远离开这污浊、肮脏的地方，我们结婚吧，然后坐日本轮船到南洋去旅行。我制订了旅行路线，到每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而且这些地方连奥沙·约翰逊都没有去过（日本人是这样说的）。旅行回来后，我们将住在北京，在那里，你继续写你的书，我也要写本游记，写完后我们坐火车穿过西伯利亚到欧洲去旅行。”

“那我怎么去泰姬陵？”我提出了异议。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将为你建造一座。让我们去俄国看看未来究竟如何。我一直想在达尔马提亚海岸住上一些日子。那不是阿克塞尔·芒恩在《圣·米歇尔的故事》一书里曾描述过的地方吗？”

当我脱下一只白羊皮手套，伸手从提包里把那枚西藏戒指取出来递给他时，这一次是我眼里充满了泪水。我说，“现在你可以给我戴上了。”

我们按西藏人的做法相互碰了碰鼻子。许多中国工人围着我们看，他们感到很有趣。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外国人公开表露感情，总有许多中国人围观。在公共场所接吻，在中国是禁忌的。

我说，“我不想在象上海这样污浊、肮脏的地方结婚。东京不错，很干净。我要栀子花和一件日本结婚的和服。我们还要周游日本，然后在长崎上船。”

“我给日本使馆的约翰·艾利森发个电报，”埃德说。“我们曾在一个屋里住过。”

我们手拉着手开始朝电报局跑去，纯粹是为了好玩。

然后，我停下来对他说，“还有一件事，这次一路上我们要经过十几个领事馆。你也要给你纽约的出版商留下个良好的印象。我不愿和一个身穿着印度贱民衣服的人一起旅行。我们正好顺道去格雷服装店。你做套哈里斯花呢服装够你穿10年的。”我仍然没有只顾现实而忘了仪表。为什么不可以两者兼顾呢？为什么要加以限制呢？穿着入时也很有趣。

埃德根本不喜欢这种想法。从这家东方最好的伦敦成衣铺里，我挑选了最好的衣料，给他做了一套深色西服，一套黄褐色哈里斯花呢西服，还做了一件赴宴穿的常礼服和一条马裤。花钱最多的还是一件棕红色驼毛大衣和一顶新帽子。埃德在一旁一直沉默不语以示反对。

一下子做这么多衣服可能有点傻，但这可是一笔不错的投资，因为这些服装他穿了十几年。他非常喜欢穿花呢西服，在那期间，我简直没有办法叫他换穿其它衣服。（我得说明一下，这套服装包括两条裤子、一件上衣。）

我非常清楚，如果花很多钱给埃德做衣服，那这笔钱必须从我本人作为他妻子的制装费中拨出。虽然我无需添置新衣服，但还是难于作出决断。下决心今后不再花钱为自己添置衣物，就好象宣布自己暂时已经不年轻和不再吸引人一样。作为新娘，我的确也买了一顶巴黎帽子，做了一套任何场合都能穿的制服，还有一件旧的日本结婚的和服。除此以外，从1932年到1939年期间，除了生活必需品外，我几乎没有为自己买过任何东西，这是需要毅力的。

我坚持婚礼要在圣诞节正午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举行，由未来的大使约翰·艾利森和他的未婚妻珍妮特作证婚人，结果引起了一些麻烦。仪式结束之后，我们穿着日本结婚的和服，来到了帝国饭店。

我的那件结婚和服是用黑色绉绸做的。上面的图案是手绘的，颜色也是手工染的。和服的下摆和袖子都长可及地。上身用大红绸子作衬里（在中国和日本，新娘必须穿红），中间系一条织有金色浮花的大红锦缎腰带。和服的下摆是海潮图，一只只白色的海鸥飞翔在蓝色的大海和一层层雪白的浪花之上，我感到自己仿佛就象阿芙罗狄蒂女神从大海中升起，不过身上穿的却是足以抵挡严冬的寒衣。

我们的蜜月从周游日本开始。在旅馆里，我们坐在草垫上吃

火锅。在热海海滨旅馆，我们发现，这里是好莱坞摄影棚能够为蜜月布置的最佳布景：镶着纸窗的屋子，一边是一小片竹林，另一边，旅馆一直延伸到海面之上，北斋^①笔下的海浪扑打着海岸。

在冬至前后海上风平浪静的日子，我们上了船，开始了愉快的蜜月的海上生活。“此时是一切新的开始的最佳时辰。”我告诉埃德。我买了一些用蓝绿色翠鸟羽毛做的十分别致的耳环。我还讲给他听一个中国通船长向我叙说的一个引人入胜的神话故事。冬至前后14天左右的时间里，海面会异常地平静，这样翠鸟——或者叫鱼狗就能在海上漂浮的巢里孵卵。在翠鸟繁殖的季节，整个宇宙——太阳和大海——都得听命于它们。

在翠鸟孵化期间，世界停止了运动。这是耶稣诞生、约书亚自称驾驭了太阳、卡奴特王指挥海潮的时候，是传说向大海发布旨意、创造新世界的时刻，水手们在此时会抛弃他们的渎神的咒骂，海上的旅程此时经过千辛万苦的颠簸后终于在南十字星座下面沿着麦哲伦航线前进。尽管我从未这样安排，但它将永远是我一生中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刻。我不喜欢沉睡中的死寂黑暗，在这冬至时刻，我要为光明而奋斗。

在愉快的冬至蜜月里，这一对年青伴侣是无所畏惧的，因为他们自认为，已把自己和南北半球的整个大自然、以及各国人民、和所有书本上反映的思想，全都融为一体了。

我们带了一些书到船上阅读，其中有萧伯纳的《专供知识妇女阅读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指南》，H·G·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和他于1932年出版的著作《人类的工作、财富与幸福》。美国人至今还没有开始思考，但我们还是带了一本乔治·多尔西^②的《为什么我们举止行为要象人类》，我将这本书向居住在婆罗洲的地道的英国绅士介绍时插进了一句话：“为什

① 北斋（1760—1849），日本著名艺术家。

② 乔治·多尔西（1868—1931），美国人类学家。

么我们不……”

我们俩都读过斯彭格勒^①的《西方的衰落》，我是在美国读的。我们还粗略地研究了“帝国时代”（日本在台湾，英国在婆罗洲、香港和中国的通商口岸城市，荷兰在西里伯斯、爪哇和巴厘；以及葡萄牙在澳门）。

现在我们就周游所有这些地方了。那时，我们美国人还没有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损坏自己的良好形象和毒化自己的心灵，对我们来说正是游历的大好时光。

在“卡娜达·玛鲁”号的海图室里，我仔细地看了航海图，这里是一个英属斯皮特岛（我母亲可能喜欢它），那儿是一个朋朋岛（很可能是海岸流浪者的岛）。我们已过了苏禄海。日本船长让我掌舵，驾驶着“卡娜达·玛鲁”号在西里伯斯海区航行。他说当我们越过赤道线时，他还要让我掌舵。他喜欢我们，因为我们乘坐他的船而不去乘别的船，也正是他的船才驶往那些很少有人去的地方。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舱室和私人洗澡间让给我和我的丈夫，并把他的舱面也让给我们了。作为交换，他向我们借了些诗集。他对待我们仿佛我是太阳女神，身旁则是阿波罗神。船上乘客除了我们外，还有两、三个日本商人。温暖的、蔚蓝色的南洋清澈、透明、平静，宛如熔化的玻璃一般。挂着彩条风帆的船，看起来纹丝不动，就象画面上的假船。

当船靠近婆罗洲时，我登上了甲板，我穿着英国裁缝做的白色马裤，头上戴着白色软木遮阳帽，一条和美国国旗颜色相同的红白蓝三色围巾在夕阳下飘动。白色珊瑚礁的岸上，显出耀眼的红色屋顶。岛上的红树和棕榈树随风摆动，点头示意欢迎我们的到来。啊！这就是婆罗洲——还不仅是婆罗洲，还有塔瓦岛，远离家乡10,000英里之遥！

我丈夫对我这身打扮很不以为然。我带了一只大黑箱子，里

^① 斯彭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著作家。

面装满适合各种场合穿的衣服，从在甲板上穿的短裤到长长的夜礼服和金色的拖鞋，对此他永远不会原谅我。

他打量着我，用行家里手的口气讽刺说：“你可以想象自己天生就是个探险家，但你还算不上是个旅行家。”

此时，一个说话带有英国人口音的经营硬木的商人告诉我，除了马丁·约翰逊夫人外，我是来塔瓦岛的唯一白人妇女。他希望我们没有任何在这里拍摄电影的计划，否则“我们只好安排一头‘野’水牛在橡胶林中追逐她的场面了……，当然，这里所有的水牛都是性情温顺的。”听到这番话，埃德才老实了。

我带着开拓者的沾沾自喜的语调说，“你听见没有？仅次于奥萨·约翰逊。”但我又说，那儿一定会有很多男性白人吧。

那个商人说，“不对，我们只有两个人，英国驻岛上的官员和我。不过，我们相互不说话已有好几年了。这非常象萨默塞特·毛姆^①笔下的描绘。他认为我是在放弃白人的职责，因为我为了赚钱和当地人一起划着独木舟四处寻找珍贵的硬木。”

婆罗洲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里程碑（它确实是一个航海标志）。婆罗洲几乎是大英帝国最后放弃的海外据点。

踏上香港码头，我感觉我又回到了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重新经历了1887年的维多利亚女王庆典。1933年，那些坚固的中产阶级的建筑物看来竟和帝国一样能够持久，尽管我在港口读到了萧伯纳那些与基普林^②不同的观点（但他们两人对“衰退”的打击看法一致）。汇丰银行的经理头戴礼帽、手拿洋伞的走路的派头，就好象地球陆地的四分之一、人类的四分之一是属于他的一样。

① 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

② 基普林（1865—1936），英国作家，作品多描写英国殖民地的风光与殖民者的生活。

我们穿越乡村到达远离广州四十英里的香山县，瞻仰了孙中山博士的出生地。当我走访这个平静的村庄时，我对过去那段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尽管这儿已不再是革命的中心了。此时革命的中心早已移到了遥远的、交通不便的内地，在那儿，农民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神秘的红军与蒋介石和当地的地主进行斗争。

在广东，我们走访了中山模范区区长。他戴一顶黑缎子瓜皮帽，还戴了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举止庄重，很有气派。此人就是年事已高的唐绍仪。他曾任袁世凯的秘书，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他生于1860年。1873年他是满清政府第一批派往美国求学的学生之一。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读书。他和他年轻的夫人在离澳门不远的乡间住宅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他的住宅外表朴素无华，但里面用具都很现代化，只是具有中国风格。唐乐意和记者交谈。他对中国的前途颇不乐观，并对现政府持批评态度。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对任何事情他都可以任意评论。

当我们启程前往澳门时，看见许多小船载着禁运品停泊在离唐家不远的码头旁，我的丈夫告诉我，唐无疑在从事走私活动。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埃德在中国的时间较长，有理由怀疑政府官员从事任何的欺诈活动。

澳门是葡萄牙殖民地，位于沿海，离香港35英里，是东方有名的罪恶渊藪、赌博中心，主要的活动是鸦片走私。这两种行业被这个城市所垄断，其内幕不为外人所知。澳门是个丑恶、令人意志消沉的地方，这里没有欢乐、没有吸引人之处。但当我们沿着总督府脚下古老的旧房址行走时，身处欧洲对华贸易的第一个海外基地（这是1557年建立的），触发了我少有的思古之幽情。葡萄牙人是欧洲帝国最早的探险者和最晚放弃其事业者。（在我写作本书时，中国还没有收回澳门，香港的未来地位也尚未确定。）

澳门的房屋建在濒临美丽海湾的小山上，景色如画，建筑风

格多样。此地1,800艘小船大部分从事捕鱼，当我瞭望这个繁忙的港口时，渔船正川流不息地进出港口。

我一直期望到广州去看看。这是一座从小快艇时期就为美国人所知的城市，也是仅有的一座我们以它的名称来为许多美国城市命名的中国城市。它是中国南方的战略中心。从香港的九龙，我们乘汽船从宽阔的河口溯流而上行程75英里抵达广州港。河道里挤满了小舢板、小帆船和汽轮，除了外国轮船上使用蒸汽机以外，其情景和1784年第一艘美国商船到达时没有多大区别。从那时起，美国开始和中国进行茶叶、丝绸和棉花的贸易。

1933年，从广州到上海或汉口还没有铁路，我们只好坐火车返回九龙，然后从那里乘坐太古轮船公司的船到上海。我们在上海短暂停留后就前往我们的目的地——北京。

首先我们坐船穿过旧时的海盗巢穴——浅水湾，并在汕头停靠。汕头的挑花、花边和刺绣享有盛名，这里生产这类产品的血汗工厂也很有名，厂里都是女工。另外，汕头盛产橘子并以常刮台风出名。因为它和常遭强大暴风袭击的台湾相距不远。离海岸不远处有两个小岛——马祖和金门。^①在1949年蒋介石逃到台湾后，这两个小岛成了磨擦的根源。

在最早的通商口岸厦门，我们到鼓浪屿参观了岛上的公共租界，拜访了美国领事。厦门以前主要以帆船经营与爪哇和台湾海峡间的贸易。有很多人从这里移居海外。在菲律宾和台湾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来自厦门附近。

福州也是最早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出口竹笋、漆器和有名的福建茶叶，这是最好的茶叶。

尽管有大批中国人为逃避本国人的压迫而涌进这些通商口岸城市，想得到外国人的保护，但中国人对通商口岸制度是反感的。他们要求外国人放弃这些城市，废除治外法权。“不平等条

^① 这两个岛不在汕头附近，作者搞错了。

约”规定，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基督教徒都享有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这样，这些社团实际上就享有了主权内的主权了。

这些旧时的通商口岸城市对在租界里、院墙内的外国人来说，是使人感到沉闷闭塞的地方。那里的气氛始终是紧张和不稳定的，活象一座人间地狱。外国人聚居的地方就是流放地，里面没有生机，没有活力。他们象身患癌症的病人，快活地拒不承认自己有病一样，在等待着末日的到来。在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革命高潮兴起之前帝国主义势力就已在中國日渐衰退了。

1933年，一些外国列强的炮舰和军舰在中国沿海巡弋。外国炮舰经常出入青岛港，一靠码头，水兵们就立即到吉米店吃冰淇淋苏打，我们也是如此，一到青岛马上去光顾这家店铺。在威海卫，我们看见部分英国军舰隐蔽在刘公岛背后戒备森严的港口里——外国人在建立通商口岸城市时，总是选择一些岛屿和沙洲。刘公岛于1898年被英国租用为海军和供煤码头。它和青岛一样，还是一个避暑胜地。

根据1858年的天津条约，烟台成了一个通商口岸。同时成为通商口岸的还有长江沿岸的另外四座城市。外国炮舰可以进入这些地方驻防。烟台位于渤海湾山东半岛的石岸上，也是山东柞蚕生丝的集散地。

在我们的船继续溯流而上抵达天津之前，我们在寒风凛冽的大沽港沙滩上搁浅了几天。从我奢侈的美国人的生活标准来看，船上几乎就没有暖气，但英国人似乎喜欢换换新鲜空气，在每条船上和每列火车上都经常听到英国人议论和抱怨太闷热了、没有足够的新鲜空气。这与他们一贯勇于面对危险和艰苦的英雄气概截然不同了。后来我推测，他们谈论这个话题可能也是为了避免和他人谈及个人情况。为此，英国人所采用的其它办法是颇为明智地对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这两位小公主在口头上表示崇敬和对威尔士亲王爱德华毫无保留地进行颂扬。而美国人则主要是用厌恶的口吻谈论刚刚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就职的总统富兰克

林·罗斯福。

大家都对“诚实的中国老商人”和“忠实的老仆人”感到怀念，由于民族主义精神在中国正日渐高昂，再也见不到这种人了，商人和仆人都变得既讨厌又危险了。人人嘴边都挂着的一句话是：“你当时就该了解中国了。”

最后，我们终于看见了天津的外国租界（美国在这里没有租界），这儿也是活动繁忙的贸易中心。1860年英国人和法国人占领了天津，这里就成了通商口岸。1874年至1894年是天津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它由直隶总督李鸿章管辖。外国人至今仍怀念他，认为他代表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如同在香港一般，牢固的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建筑代表着逝去的荣光。号称“江滩老夫人”的汇丰银行大楼看起来很牢固，但却毫无生气。

这里的空气令人感到窒息，好象在等待什么肯定要发生的事情似的。日本在1931年占领了满洲（东北），至今还不到两年，谁知道他们下一步又要干什么呢？总的来说，英国的旅客同情并理解日本人的野心，而我们美国人却持相反的看法。

回顾我们的旅行，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即白人时代在东方到处都正在逝去，尽管这一点还远非共同的认识，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行径的非共产主义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新兴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现在正在兴起的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反帝国主义，而不是从前的“民族主义”的排外主义。当地的“民族主义者”在心理上是排外的，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恰恰相反，正如中国学生生动地描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一部分，是帮凶。他们比帝国主义还坏，他们具有倒退的伦理道德观念，沾染了西方所有的恶习，而对其长处却丝毫没有吸收。

在中国的典型例子是蒋介石，一个不可救药的卖国贼，在朝鲜和印度支那还有类似的人。他们是被雇佣的，是乞丐，是美国

纳税人的美元填不满的无底洞，美国所得到的报偿只是仇恨和不满。

在我研究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之前，对这一切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但当我离开广州和香港时，我已得出了这些结论，尽管并不清楚蒋介石之流究竟代表什么。这只是出自内心的和直接的感觉。

1925到1927年期间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民族主义”革命的高潮，此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右翼转向了反革命，并和左翼分裂。此后直到1949年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前，除了从1937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这段短暂的时间以外，这一分裂导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陷入了长期瘫痪状态。蒋介石从来没有制订关于未来的计划，他也没有前途。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在南朝鲜、印度支那和其它地方的同伴也都没有前途，即便是得到美国的援助也罢。他地位虚弱，在人民中没有基础。人民和青年人都反对他，他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这样的国家里，除了实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没有其它的出路。因为实行资本主义已经为时太晚，再说，也不具备产生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

第二部分 北 京

第八章 抵达北京，1933年

从天津到北京，乘火车行程约90英里。我们穿过一片肥沃的冲积平原，到处是富饶的农庄。村子里房屋鳞次栉比，以土坯或砖垒墙，以瓦盖顶，每一所院子都有用土夯实的围墙。火车进站时，高大古老的城墙迎面耸立。这种鞑靼人的城墙是用石条砌成的，里边用土填实，30英尺高，13英里长，宽度可以并排行驶两辆战车。

从一开始，我们就感受到了北京高度浪漫和富有戏剧性的历史气氛。我们坐上人力车，穿过未铺路面、遍地尘土的狭窄的胡同，又经过两侧种有槐树的宽阔大道。在狭窄的街道上，自行车和手推车中间走着驮煤的骆驼以及骡车和驴车，把我们挤得东倒西歪。我们只是偶尔才看见一辆坐着外国人的出租汽车。街道上飞扬着从遥远的沙漠吹来的黄土。天气寒冷刺骨，冷得我们几乎无法呼吸了。

我们投宿在法国人开的十九世纪式样的北京饭店，饭店给我们开了一套富丽堂皇的新婚套间。因为没有游客，周围的房间都是空空的，我们的房间很大，热气都升到高高的天花板顶上去了。（1972年我和饭店大餐厅的领班交谈回忆往事，他自三十年代起就在那儿工作。这家饭店没有多大变化。）巨大神奇的紫禁城就坐落在同一条宽阔的大街上，离饭店不远。饭店是外国人的社交中心，他们在仿凡尔赛宫的镜厅建造的舞厅里举行舞会。

饭店楼下就是有名的北京书店，书店的老板亨利·韦什^①搞发行和收集善本书，同时还收购和出售当地居民的藏书。在那里，你可以遇到每一个真正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在交谈中消磨整个下午。

面对大门的楼梯的最上一层是驼铃商店，店主是海伦·伯顿小姐。她不是来自南达科他州就是来自北达科他州。在这里能以低廉的价格买到各式各样的东方工艺美术品，从珠宝手饰到皮毛大衣，应有尽有。我自己还有大约500美元，可是我已下定决心为共同的利益作出牺牲，不在任何个人物品上花钱。（当时在北京，500美元是一个人两年的生活费用。）我有患殉难者的变态心理症的危险，幸亏海伦使我成了北京唯一的时装模特儿，这才挽救了我。每当城里有旅游团体到达的时候，她就让我穿上她用皇家特制的丝绸缝制的歌剧斗篷和舞会礼服，有的甚至还带有拖裙。我就穿着这些服装跳维也纳华尔兹舞——乐队总是在我出场时奏华尔兹舞曲。第二天一早，旅游者就会上驼铃商店订购类似的衣服。我还帮助海伦设计珠宝首饰，并按成本价格给我自己买了几件。

自1933年至1937年日军占领以前，我们住在北京。这是北京作为外国人乐园的最后时期。北京有一点象古罗马，同样是被孀居的好客的女主人和知识贵族阶层统治着。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这座帝王之城变成了学生和学者之城。自辛亥年义和团要杀死在中国的全部外国人以后，使馆区成了壁垒森严的飞地，但仍有一些外国人以微不足道的金额租用其他地方的满族大宅院，象皇亲国戚般地生活。

海伦·伯顿是北京显赫的女主人之一。名流一到北京饭店，就受到她的款待。海伦在西山租了一座庙宇作为度周末的场所，届时还带上一班佣人以供差遣。这种旅游有助于使北京的生活充实有趣。就在过这种周末的时候，我们和埃文斯·卡尔森夫妇交

^① 法国人，中文名叫魏智。1920年夹华，曾在北京饭店内开设法文图书馆，解放后他搜集我国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提供给美国间谍。1951年，北京市军管会将其逮捕判处10年徒刑。1954年被提前释放，驱逐出境。

上了朋友。卡尔森的妻子埃特尔是海伦的至交。后来埃文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工合发起人——并把这个词引进英文。但在北京，我们和埃文斯观点相同之处不多，他是使馆卫队的副官。但我们喜欢在使馆游泳池游泳，有时还在那里过夜。

每当7月4日在使馆区举行阅兵时，埃文斯是人们见过的最英俊的军官之一。他有和他人一见如故这种不寻常的天赋，甚至后来（在1937—1938年）遇到中国共产党人时也是如此，这是最严格的考验。他刚强简朴，淡泊无为，而且拘谨得象清教徒，但仍然具有美国人的善良和迷人的魅力，更不用说品德优良了。他的父亲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公理会牧师，埃文斯相信所有的教义。但他渴望获得更多的知识，他是一个如饥似渴地寻求真理的朝圣者，但直到他临终之时，也未真正找到真理。他崇敬埃德，特别崇敬他作为一个作家所取得的成就。1937年阅读《西行漫记》，成为他一生中的转折点。

埃文斯是斯诺的婚姻这个地雷（或精神地雷）区的第一个牺牲者。他因为我们之间迅速地交流思想和进行辩论而神魂颠倒，并被这种心电感应吸引住了。他是一位实行家，不需要以任何形式给他输入外来动力——但在智力活动上，他渴望获得新的观念来帮助他应付当时世界上的混乱状态。

“我始终需要的是埃德那样的婚姻”，若干年后，他说。他感到一生中浪费了许多岁月，因为他缺少一个人督促他思考和学习，激励他前进。“千万不要停止批评埃德和督促他前进。”他告诉我，“这是他成功的原因。”

埃文斯的问题是，他的妻子完美无瑕。埃特尔漂亮、迷人，一心一意地委身于他，甚至在他死后也矢志不移。她曾经是一位女童子军组织者，而且才堪胜任。她是军官妻子的典范。她为人宽宏大量，乐于允许埃文斯实施他自己的想法，并对他的所有成就都非常自豪。但是他说，她不与他就某些观点进行辩论，也不主动提出任何新思想。她的爱忠贞真挚，但这不是埃文斯所需要的，

他是这样想的。他需要一部活百科全书来弥补他缺乏正规教育的不足，他需要对刚刚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新观念进行讨论。

他天生就是发号施令的人。甚至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拒绝服从他亲生母亲的命令。埃特尔有几分怕埃文斯，并极其尊敬他。他不喜欢任何形式的软弱，所以她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必须是个“好样的”。她甚至在长途爬山旅行时也要跟上他那两条美国佬式的长腿。我和她一起在西山的时候，她尽管怀有身孕，在一次徒步旅行中却还忍受着疼痛，坚持要表现得象个勇士，对埃文斯连说都不敢说。结果她流产了。

一天在西山，埃文斯和我一起，在柏树和银杏树林里散步。埃德与我都喜欢埃文斯与埃特尔。但整个周末都听着反对罗斯福和新政的谈论，就使我郁闷得透不过气来。埃文斯义正辞严地攻击工会，他宣称说：“如果一个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为什么他不滚到别处去，而制造这些麻烦呢。他应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汉。”

我很少发脾气，但这次我抓住他不放：“别以为你能象你以前开枪打死尼加拉瓜人那样打死美国人。任何不愿意参加工会或罢工的工人就象一个中国苦力。这是美国的最大长处——劳动人民拒绝被当做苦力对待，并要求享受他们应得的权利。恰恰由于人们诚实正直，努力工作，并要求文明的工作条件，你就不肯公平地对待他们，我看不出在这种时候你怎么能成为一个好汉。为什么不公平地对待他们？有这样可怕的观点，再也不要自称是一个基督徒了。”

几年以后埃文斯告诉我，在这以前从来没有人那样和他谈过话。“你第一次真正把我唤醒了。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设想一下，在那张娃娃脸的背后竟有这么多的思想！我决定我最好回国看看，象你这样刚从家出来的年轻姑娘在发表这样的宏论时，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几个月后，埃文斯回到了美国去指挥罗斯福的警卫队，并成为总统的真心实意的崇拜者。

第九章 北京的院落

北京为我们在三十年代所经历的、象京戏似的戏剧性事件提供了适宜的背景。这座城市始建于公元前十二世纪的周朝，当时它是燕国的都城。城市毁于秦始皇之手^①，他就是公元前 221 年左右在中国修建长城的皇帝。到了汉朝灭亡以后，这座城市又被鞑靼人统治了两个世纪。其后归唐朝所有，继唐之后，契丹人攻占了该城，并于公元 986 年重建了高 30 英尺、长 13 英里的城墙，并重新命名为燕京。

1122 年，来自满洲的金朝游牧鞑靼人夺占了该城并进行扩建。其后是忽必烈汗率领蒙古人入主北京，忽必烈汗将北京命名为“汗八里”。^②目前的建筑格局主要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忽必烈汗于 1267 年定都北京——马可波罗在他的书中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

1368 年朱元璋起兵反抗蒙古人，并建立了汉人的明朝，这是 450 年来第一个汉人建立的王朝。朱元璋定都南京，而“北平”只不过是“北方的大都市”。1421 年，明朝永乐皇帝把宫廷迁到北京（“北方的京城”），自此以后北京一直是首都，其中只有 1928—1949 年间，该城又被称为北平，而首都在南京。到了 1949 年，共产党人恢复了北京的名字，并再次把它定为国家的首都。

北京离长城仅有 35 英里，始终是中华帝国的前哨阵地。在正北方向有通往满洲平原的大门山海关，西北方向的南口是一个通向山区的要隘。北京城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北端，平原延伸 90 英里，

① 原文如此。

② 满语，意为君主之城。

直抵北直隶湾。长城沿着山脊，蜿蜒起伏在海拔4,000英尺的崇山峻岭中。云霞缭绕的西山耸立在北京身后。

1933年的北京，一圈城墙套着一圈城墙。街道是狭窄的胡同或小巷，尘土飞扬。胡同两侧是用砖墙或土墙围成的院落，墙上没有窗户。紧锁的大门是院落的唯一进出口。围墙可以防噪音、尘土和盗贼，还可以为院子和沿墙四面的平房提供一个清静不受干扰的环境。尽管如此，仍然有几条大街的路面宽阔，商店林立，交通方便。这样的街道有莫里森大街（以第一个传教士的名字命名）和哈德门大街。这些大街两侧槐树繁茂。因为缺乏木材，房屋一般都是用泥巴或砖筑成的。

不久，我们就到城墙上面去散步。在建有城垛的城门口，我们常和宋哲元将军的士兵互致问候，他们用大刀和步枪守卫着这座城市。在午夜以前实施宵禁，这些城门就关闭了。

北京以东方治安最好的城市而闻名。交通警察都是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面色红润的山东大汉，他们带着一副无忧无虑、友善和好的神气——至少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外国人是这样。我很少看到那种在上海司空见惯的残酷行为，——那里的锡克人不断在大街上用警棍猛敲人力车夫和苦力的头部。北京城里有上下水道、电灯和有轨电车，主要街道上都铺了碎石路面。

我们在煤渣胡同21号租了一所房子，这里从来没有住过外国人。我们有现代化的水电设备，但没有电话。1933年8月10日，我写信给埃德的姐姐：

“……3月份我们到北京时，努力想找一所家具齐全的房子，但我们找不到，所以租下了这一所，一切家具都要自己配。……我很快就发现，北京到处是古玩珍品，但就是没有合用的日用器具……”

“我们佣人的住处有三个房间和洗澡间。我们自己住了带洗澡间和厨房的五个房间。这所房子的布局是一个封闭的院落，就象西班牙的别墅，四周都是高墙，两边砖铺地之间有一个小花

园……埃德占了房屋的一翼做“图书馆”，里面布置得有点爪哇风味，点缀了一些蜡染法印染的花布。

“由于3月以来天气好极了，我们在这里过得非常愉快，我们的小花园里花树繁茂，美不胜收……有桔树、柠檬树、石榴树、紫藤、丁香树、棕榈树、松树、玫瑰花等等。一个花工每周来一次，带来长成了的幼苗，他以最令人咋舌称奇的价格出售这些幼苗，有时候100株卖1元（25分美元金币）。如果我们感情冲动起来，我们就拔掉老干残株，换种上新花幼树。

“上个月是我们的‘宴会’月，到了月底，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厨师和佣人）都普遍地感到‘厌烦’了。这里有些人设宴请二、三十人。但尽管有这些令人厌烦的事，这里还是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人，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玩得很开心（在我们自己的宴会上除外）。北京是保持稍有借口就请客的这一古老的好传统的最后大本营。

“下周末，我们要去西山远游，在那里我们要骑小毛驴，一路上我们要在几所有名的古寺里住宿（这是中国的旅馆系统）。

“我们每天都上一次中文课，现在我已学会大约200个中国字了。学中文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困难，表意文字很有意思。举例来说，房顶下面有一口猪，意思就是‘家’，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儿子，意思是‘好’，太阳和月亮在一起，意思是‘明亮’（还有聪明）或‘明’——如明朝。一个人立在一个单词边上，意为诚实或可靠（信）。许多张嘴，意为‘讲别人闲话’（叽）。我字上面加一只羔羊，意为正义（义）。一个门加上一个耳朵，意思是听（闻）等等。我们的老师是一位人们想象中最谦恭、温和的小人物，他外穿灰色长袍，内衬一件一尘不染的白袍。他教我们两个人，每月收学费20块银元（大约合5美元金币）。他每天都来授课（雨天除外；下雨时他无法外出，因为街道泥泞难行）……

“不久前的一天——28日，是埃德生日……他非常渴望回

家，至少作一次短期旅行，去看望家人，他正认真地考虑在今年秋天回去。如果他写的书畅销，也许能在纽约建立一些能够赚钱的联系。或者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中国人和日本人非常反对这本书，他们也许会赶他回去……

“我们俩都非常好（经过了六个月仍然是好朋友），同时又是一个很和睦的小家庭。”

我仍然记得我们举行的第一次鸡尾酒会。北京接待宾客的女主人有一个严格规定，决不把不相投的人混杂在一起。但我想一举还清我们在社交中欠下的债务。在稳重而讲究外交的北京，在此之前从未聚集过这么庞杂的人。我不仅请了日本人，甚至还请了一些中国人，以往很少有人这样做。当然，由于缺少女宾，来的大多数是男人。

穿过月亮门进来，空气里就充满了花香，这里有茉莉花，盛开的晚香玉，夹竹桃，和所有我能租到或买到的香气扑鼻的花木。小院里挤满了人，然后是起居室、餐厅、埃德的书房，也宾客满堂。他们坐在椅子上愉快地交谈。我不理解为什么无人退席——也不理解为什么我不得不为已在北京住了10年甚至20年的老住户作介绍。当最后两位流连忘返的客人仰望充满传奇色彩的北京星空时，鸡尾酒和吐司早已一干二净了，所以我请他们留下吃晚饭。他们是卡尔·沃尔特·杨^①和他的妻子格拉迪斯。他写了几本有关满洲和国际法的书。

“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过的最好的聚会。”卡尔·沃尔特声称，“我在这里见到了我很早就想认识的人，而且我们还严肃地进行了交谈。”

格拉迪斯·杨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我的家，她要求我给北京妇女俱乐部上一堂室内装饰课——我明智地拒绝进行这次尝试。她喜欢的是我的明亮、暖色调的起居室，这个房间更象一间温室。甚

^① 美国人，中文名字杨沃德。1932年李顿调查团来华，他被聘为专门委员。

至在冬天我也保持室内满是花木：山茶花，梔子花（我最喜爱的花），以及盛开的桔子和柠檬树等等。我把花木放在靠近窗户的地方，这样太阳光就可以穿过它们而照亮整个屋子。

使起居室不但与众不同、而且富有舞台色彩的，就是我所设计的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小型花园。沿墙挂着一面长长的镜子，镜子下面有火山岩堆成的山，一条小河绕山流过；小河有一个放水的软木塞，这样金鱼和小甲鱼就能换一换环境。岩石上长着小树。到了秋天，枫树甚至还改变颜色。

窗帘和椅罩的颜色是相配的：淡黄色的手工编织的粗布料。我在这些窗帘和椅罩的四角镶上现代派风格的多种颜色大同心圆，窗帘用的是重彩。

我设计了一套与通常沉闷的古代维多利亚式的北京风格大不相同的家具，由一个一句英文也不会讲的木匠做成。这是一套最时髦的柳木家具，漆成玉色或黄色。我那张半月形的书桌带一个围绕桌子的书柜。桌面是玻璃的，压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格兰特·伍德和托马斯·顿的画。这张桌子吓坏了那位中央王国的木匠，但它只花费了15块银元。我还让他做了几把带坐垫的精致椅子，每把只花了5块银元，折合大约1块美金。

在北京，你能够定做你想要的、自己设计的任何东西，而价钱同商店买来的一样。我过得真适意，我甚至为自己设计了银器，上边带有枝叶摇曳的竹子。我喜欢中国工艺品的风格。

我最心爱的珍品是量着房间大小定制的美丽的、金灿灿的草席，铺在冰凉的水泥或石头地面上。到了夏天，每家都搭起一个相同的草“篷”（天篷），用来遮盖住部分院落。

至于其它房间，埃德也曾插手布置的事。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天气寒冷、大风呼啸的日子，当时我正患咽炎，病倒在冰冷、空空如也的房间里。苦力们开始进来了，先拿进一个女式马鞍，接着是给我买的瑞士的白皮滑冰鞋。巨大的餐具柜和箱子也出现了，黑漆包铜，这是中西合璧的产品。我想也许是发烧影响了我

的视力，尤其是正当一把最难看的垫得厚厚的椅子搬进来时，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了。最后进来的是埃德，他得意洋洋。

“我在一次拍卖中几乎没花什么钱就把这一切都买下来了。”他说，当他坐在那把摇摇晃晃的旧椅子上时，高兴得喘不过气来了。“法国使馆的一个人要走了。”

幸运的是我嗓子疼得连话也说不出。我写了几个字：“把那些黑物件放在餐厅里。”他高兴地监督着把那些东西放好。

我们的法国使馆式的餐厅很呆板，挤满了这些笨重的家具。在这里面我唯一能看得过去的是一张窄而长的餐桌，这是我买到的旧货。我给这张桌子买了一块手工编织的花边台布，价格大约10美元。（后来我在纽约看到类似的台布，标价650美元。）我买了白底蓝花柳树图案的盘子，并配上了我自己设计的柳树图案的烛台。

布置整个住宅的费用大约100美元，或者折合大约400到500银元。我们住在北京时期，日常生活费大约是每月50美元——我们过的是王侯般的生活。每月买食品需80块银元，折合20美元，这还包括正式宴请在内。当汇率变化时，我们的花销更少了。房租是15美元，两个佣人每月8美元，中文教师5美元。

第十章 在北京的生活

老中国通的诀窍基本上是英国式的。你必须养狗、养马、按英国方式喝茶（决不要中国式的），你还必须总是衣着得体（决不可赶时髦），即使是在家里。你必须时刻注意保持“面子”，甚至对佣人也需如此。

一个月花200美元，你就能生活得非常阔绰。“地道的北京方式”意味着租一所满族人的宅邸，里面陈设着古董，训练一大批佣人，并招待来访的社会名流。你还要去西山租一所庙宇度周末，在跑马场养一厩马匹，用来打马球、骑乘或赛马。你在北京俱乐部打网球和在“狗展”上展出你的狗。

我喜欢英国的礼节和服装的剪裁，但不赞成英国帝国主义。为什么美国人要屈居第二，而不是名列首位？我是三十年代的美籍青年，仍然要为1776年的革命而战。

在北京，你能见到从世界各地前来游览的旅游者。在其他地方举行的招待会上见到这些人是赏心乐事，但当他们带着介绍信找上门时，这就意味着你得陪同他们去参观游览，这就成了一件令人心烦的事了。

人们遵循外交礼仪。英国人衣冠楚楚地准时赴宴，但象埃德这样的美国男子，在可能的情况下就要尽力摆脱束缚了。妇女们外出赴宴时总是穿长礼服，星期日除外，甚至在家时一部分时间也穿着长衣。你穿着长衣服参加鸡尾酒会和使团下午的正式茶点招待会。甚至在茶会上，女主人们也总是穿着女主人礼服。

长衣服有实际效用。尽管身体上部是裸露的，但它能保持你的腿部温暖。北京是有暖气设备的，但英国人非常反对使用。房

子一般用煤炉或壁炉取暖。

至于便服，妇女们有时穿短裤，但决不穿便装长裤。我有一套裤腿很长的海滨浴场睡衣——在北京，这是唯一的式样如此稀奇古怪的服装。

请客、赴宴、应酬接连不断，但除了游客外，你所见到的总是那么几个人。每天下午，我们喝茶时吃烤饼、蛋糕、家常小甜饼，或者夹肉面包。这是可能有人来串门的时候。我想成为北京的雷卡米埃夫人^①而搞起的沙龙，更象一个艾丽丝梦游仙境式的茶会，到会的中国人说着程度不同的蹩脚英文，而敢于一试其中文的外国人则寥寥无几。从来没有在8点半以前开过晚饭。

在北京大约住着700个美国人；他们中有教师、传教士、医生、护士、汉学家、商人、艺术家和喜爱接待宾客的女主人，还有使馆人员和海军陆战队（唯一存在的美国骑兵海军陆战队）。尽管如此，在这些美国人当中属于北京“社交界”的不过50人上下，其核心是使馆和几个女主人，主要是卡尔霍恩·“露西”大婶^②，前驻华公使的遗孀和《诗歌》杂志创办人哈里特·门罗的姐姐。

然而，只要你住在北京，你就算“加入了俱乐部”，因为首先你必须有一定的身份。在北京，你挣不到数目值得一提的钱——你必须靠个人收入生活，除极少数人外，但他们的薪金很微薄。那些“懂行”的人宁可住在北京，而不愿到其它地方去挣大钱。实际上由于物价低廉，他们过着高水平的生活。外交使团是派往南京政府的；他们还是依旧继续驻节北京，北京是个迷人的地方，而首都南京则令人难以忍受。

^① 雷卡米埃夫人(1777--1849)，她的沙龙吸引了19世纪初在巴黎的大多数政界与艺术界名人，这些人中有反拿破仑政府分子。1805年，拿破仑将她放逐出巴黎。1815年拿破仑滑铁卢大败后，她又重返巴黎。

^② 其夫曾在1910—1913年任美国驻华公使，中文名字为嘉乐恒。

外国人通常吃西餐。厨师们都是在其他厨师那里当徒弟学来的手艺，所以无论你到哪儿去，食谱都是陈陈相因——法国和英国烹调的混合物。水煮开后装在瓶子里再放进冰箱。冰是污秽的，是从污水池塘和河里取来的；在上面放放黄油都是危险的。

我们吃着各式各样的蔬菜和肉，但不吃生拌色拉——免得闹痢疾。有些外国人用高锰酸钾把生菜洗过之后就吃，但我认为这办法不保险。我让厨师用它来洗水果，但我们只吃能削皮的水果，或者吃煮熟的水果，甚至削皮时刀子也能把细菌带到果肉上。中国人以人粪当肥料，这就使疾病流传。埃德在上海闹过痢疾，但他和我在北京几年都没有患这种病。（一直到1937年我去延安时才染上此症。）在中国出生和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人对痢疾和其它疾病产生了一定的免疫力，但你不能依靠这个。住在亚洲的外国人几乎不断地受到痢疾的痛苦折磨，经常的结局是做一次割去大部分肠子的手术。

由于缺乏维生素，我的健康逐渐恶化，我不象我丈夫那样，吃许多鸡蛋或喝罐装牛奶。直到1938年，我才听说有装在胶囊里的维生素。

任何外国货都是奢侈品。吸一个月的美国香烟要花20到25块银元——而我们的房租只要50到60块银元。所以，我们享受的外国东西只是那些我丈夫坚决要求的：骆驼牌香烟、马克斯威尔豪斯牌咖啡和蓝吉力牌刮脸刀片。

我不吸烟，不喝咖啡或烈性酒，只有极少数的几次例外，也不为我自己买任何进口货。我从不敢碰一支骆驼牌香烟（我在1935年开始抽香烟，但只吸哈德门牌，这是人力车夫吸的，每包价格是一角银元）。我丈夫不许我动用崭新的蓝吉力牌刮脸刀片——他说，如果我要用刀片割他的喉咙或我的静脉时，我只能用旧的钝刀片。他用日本人发明的办法把刀片磨快，然后还能用相当一段时间。

至于咖啡，我发现厨师反复用同一个马克斯威尔豪斯牌的罐

子，里边装的是商店磨制的一种便宜货。这种咖啡更好，味道新鲜，而且我丈夫从来不知道其中的差别，但我让店主把价格降到它实际所值的水平。在任何地方办任何事，“拿回扣”已成惯例。你必须出这个价钱，而且还得高高兴兴地出。

埃德主要喝白干，一种很有劲的中国酒——我们还用它在壁炉里引火。伏特加既便宜又有用，和柚子汁掺在一起可当混合甜饮料。我们认识的人大多数只喝威士忌加苏打水。我们请客时我丈夫买了一些这种饮料，几瓶的钱就和房租一样多。

在北京设宴饕客至少要上两种葡萄酒，索泰尔纳酒和红葡萄酒。我们不得不遵守这个习惯。尽管如此，一个朋友为我设法买来一些城外的法国修道院酿造的酒。珍妮特·休厄尔和我常常坐着人力车去，归来时满载够喝好长时间的酒——有沙布利酒、红葡萄酒、索泰尔纳酒、波尔多红酒、佐餐酒、黑莓酒、古安特奥酒、薄荷酒等。到家后，我把这些酒转灌进昂贵的进口酒的瓶子里，就象我的厨师利用马克斯韦尔豪斯的咖啡罐一样。其中有些酒是陈年佳酿，而所有的酒都是行家酿制的。传教士们一直喝葡萄酒；这是他们自己的库存，他们也供给中国的其它修道院。价格折合成美元大约是15分一瓶；甚至香槟酒的价钱也不过是大约两倍之数。按这个价格，这些酒的味道对我来说就更好了。在我讲出酒的来源以前，来访的美国客人认为我们的酒窖如同寓言中所说的那样神奇。

我所极为赞的一个英国习惯是爱狗与爱马。我们的狗雪白漂亮，它的名字戈壁来源于它祖先的沙漠。他原是内蒙古的一条小狗，被瑞典探险家斯文·黑丁带到北京。有人告诉我们，灵提是原始狗，在中亚进化来的。这么说，戈壁是最古老的品种了。

戈壁来我家的第一天就接管了整个家院。在夜里它占据了埃德从法国使馆买来的令人生厌的厚椅垫子，但到了白天，它坚持要睡在我们的双人床上，床上有真丝绸面的鸭绒被，我们用两套

高尔夫球棒和两只网球拍把被子高高撑起来，想不让他去睡，但它象猫一样把这些东西都扒到一边去了。我让人给它缝制了一件棕色驼毛大衣，到了冬天，它神气活现地穿着这件大衣走来走去，活象一匹在“马展”中获得优胜的马。

我们住在北京的时候，劳伦斯·索尔兹伯里和埃德蒙·克拉布在北京任职。我的挚友罗伯特·沃德是驻天津的领事，他间或来看望我们。他感到我们夫妇关系很和美，对他有吸引力，他还渴望与人谈论世界上发生的什么事。

当时还在“语言学校”学习的一些初出茅庐的新手，大约10年以后，引起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案件，因为他们上报华盛顿的是事实，而不是通常的昏睡病式的新闻公报。约翰·斯图尔特·塞维斯^①自1935至1938年在美国使馆任译员。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里的约瑟夫·史迪威自1935年至1939年任武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史迪威奉派为蒋介石主持军事事务，而蒋却打算在战争中袖手旁观，“坐山观虎斗”。蒋介石要求撤换这位有经验的老中国通，华盛顿满足了他的要求，召回了史迪威。这个时刻标志着“美国世纪”已胎死腹中。这证明美国人永远操纵不了他们从汉城到西贡的傀儡，但这并未防止在毫无用处的贿赂之中浪费掉数十亿美元，也没有防止那些大规模的破坏，这在全世界造成了对美国人的仇恨与蔑视。

1945年以后，院外援华集团麦卡锡的调查员们把几乎全部老中国通都打了下去。此后，美国在亚洲的政策转向了一条徒劳无功、愚蠢无能、自取灭亡的道路。

对于一批人员不断变动的学者和学生来说，北京是个理想的地方。在他们中间，约翰·金·费尔班克^②不仅以中国研究之“王”闻名，而且还被认为是研究美中关系方面的头号学者。他

① 汉名谢伟思。

② 汉名费正清。

写的一本名著就题为《美国与中国》。• 约翰非常诚实正真，能够正确评价来自各方面的事实——所以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在1933年，就象我们一样他和威尔玛是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妇。

赫勒·克里尔^①正为撰写他的佳作《中国的诞生》一书研究甲骨文。但由于他从未研究过人类学，所以他并不理解他的发现。他对古代和孔子思想十分崇拜。我记得有一天，我请他和顾颉刚一块吃午饭，因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顾对研究古代的学术工作毫无敬意。顾颉刚这个批判性的学者是我们在中国结交的最有吸引力的朋友之一，他的思想诚实正直进步——这在中国尤其罕见。

德国前青年领袖卡尔·维特福格尔^②和他的妻子奥尔加·兰是从希特勒德国逃出来的难民，他受过欧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教育。他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即使他学过人类学的话，他也并不理解这门学科。奥尔加为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家庭与社会》一书做了开创性的工作。维特福格尔在纳粹手中遭受的迫害破坏了他的思想和客观性。纳粹分子强迫他脱掉鞋，光着脚去清扫厕所，以此来羞辱他并摧残他的人格。

这些学者们都各执一说，我和他们之中的每个人也都观点相左。尽管他们积累的资料是重要的，但是我认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掌握了理解中国社会——无论古今——的钥匙。

•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年出版，1972年修订版。

① 汉名为顾立雅。

② 汉名魏特夫（魏复光）。

第十一章 泰亚尔·德夏尔丹^①

1933年初的一天，我脚穿皮靴，到郊外去进行了一场名义上的打猎，归来时发现，我丈夫请了两位陌生人来喝茶。一位是美国考古学家艾达·特里特，她住在法国，她的丈夫瓦扬·古久里是当时法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另外一位是他们的密友，法国耶稣会神甫泰亚尔·德夏尔丹，他由于持离经叛道的观点而被放逐到中国，而且只允许他以考古学家的身分发表他的著作。（1928年12月，他和几位中国人在离北京30英里的周口店洞穴里发现了中国猿人、北京人——他告诉我说，那是一个女人。）我和他们两人立刻就很谈得来，他们两人留下来吃了晚饭——一直到深夜，泰亚尔无法出城回修道院。

泰亚尔是我曾见过的男子汉中最令人动心的人物之一，他身材修长，体魄健壮，思想敏捷，神采奕奕——对于自己给别人造成的这一印象他也并非毫无感觉。坐牛车、骑骡子和步行进行的古生物野外考察旅行，在他英俊的、贵族式的脸庞上留下了风吹日晒的痕迹。他的眼角上已经出现了纤细的皱纹，然而蓝灰色的眼睛仍闪烁着幽默与机警的光芒。他有一个习惯，常常笔直地坐在椅子边上，扬起脸，眯着眼睛，以期待的目光全神贯注地看着说话人。

后来我发现，泰亚尔从最初相识就在每个他最喜欢的人周围都划了一道具有魅力的圈子。从第一次见面的那个下午开始，埃德和我都认为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影响是双重的。两个圆圈旋

^① 汉名德日进。

转着向同一中心相互靠拢，但又达不到共同的中心。泰亚尔的影响来自这样一个人，他通过苦心的自我修养，达到很高的造诣，对他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另外一种“阴阳圈”，我认为它的吸引力出自于“婚姻的力量”。

1933年，群星汇聚在我们在中国的小小的院子里，这件事不仅出于我的想象，艾达·特里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文艺评论家刘易斯·甘尼特为艾达和巴黎的珍妮特·弗兰纳举行的宴会上，我们才再次见到艾达。在战争期间，艾达被困在法国布列塔尼，多年的折磨和幻想破灭的不幸，都以丑陋的笔调蚀刻在她的脸上；她看上去意气消沉，茫然若失。除了一些对于往事的回忆外，她仇恨苏联和其它一切事物。

她说：“在北京的那天下午，是我一生中所度过的少有的最愉快的时光，真令人兴奋。那一天我们都那么年轻，那么兴高采烈——我们认为世界就属于我们四个人，好象我们无所不知又无所不晓。从此以后一连数月，只要我一回忆起这件事就感到充满活力。当时我们大家多么热爱泰亚尔呀！”

现在她感到只剩下孑然一身——一切都荡然无存了。当年我们聚首时，希特勒刚在德国上台，罗斯福在美国刚入主白宫。泰亚尔为他的朋友们在西班牙使天主教不再成为国教而激动，当时他认为这表明教会最终要站在正义的一方。“当时，世界就象复活节早晨的初升太阳。”艾达说，“不仅泰亚尔这样看，我们都这样看，是不是？我们认为希特勒不过是一个骗子。”

“我们都要求更多一些。”刘易斯说，“但我们要的是什么呢？”他指出，艾达和珍妮特在法国已处于她们所在行业的顶峰，在全欧洲也居于知识界的领先地位。现在她们成了终日宣讲末日即将来临的人。他认为中国一定有不寻常之处，才造就了我这个遇事过分乐观、以主观善良的意愿看待事物的波利安娜式的人^①——看起来你仍一切顺利，但中国正在遭受蹂躏、劫掠。你

^① 美国作家E·波特所著小说的女主人公。

似乎仍旧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我告诉他，这并不是中国造成的。我是在1931年从美国把波利安娜主义带来中国的。我这种乐观主义根子很深。但是在有了中国的经历以后，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事情可以比现在糟得多。我从来不是一个怨天尤人的人。但是每当我想怨天尤人时，我就想起了我在延安见到的一个朝鲜人，没有人有过象他那样九死一生的经历——然而尽管他已经奄奄一息，他却仍然充满了摆脱了幻想的人类精神。泰亚尔所孜孜追求的正是这种精神，我说：“这是战胜其它一切的纯洁无瑕的精神。”

（刘易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为我那本描写这位朝鲜人的书《阿里郎之歌》*写了书评。他不相信这件事——他认为这是小说里虚构的。艾达也不会相信。但泰亚尔将会认为，这本书印证了他的理论。这个朝鲜人失去了一切，但是他得到了自己的“灵魂”——尽管他不使用这个词。他认为他是“上帝”，因为他能控制自己，这是克服人类本性的局限的一个胜利。）

泰亚尔受巴黎的亨利·伯格森的影响，特别是伯格森的《精神的力量》（1919年）和《创造进化论》（1907年），对泰亚尔的影响尤深。但他决心在“创造进化论”的顶峰，而不是在它的外边为基督教找到一席之地。

基于维多利亚式的乐观主义，泰亚尔相信男人可以无限地臻于至善至美的境界，女人更是如此——他经常说，女人是比男人更高的进化类型。耶稣是由人类之子变为上帝之子的榜样，泰亚尔在自己的生活中要努力再现此事。他致力于人类最伟大的挑战

* 《阿里郎之歌》，纽约约翰·戴公司1941年首次出版。珀尔巴克（即赛珍珠。——译者）称之为“一部巨著”。加利福尼亚州帕落阿尔托兰帕茨出版社和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于1973年再版。在日本，这是一本畅销书，特别受到600,000旅日朝侨的欢迎，第二版重印了九次。1982年在日本作为《世界名著》丛书的一辑重印。

与冒险尝试；通过利用头脑，利用“思考的力量”来进化成上帝，从而来号令天地万物。对他来说，变成上帝是人类的本性，是人的特殊现象，是自然达尔文进化论的一部分。

就象使徒们的神权递嬗，泰亚尔感动了我，而这只是因为我是当日能感动他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埃德和我经常与泰亚尔一道在北京的城墙上散步。带着我们的狗戈壁。我们爬上前门城楼，走到狐塔，再上观象台，我们不时从城垛后放眼远望，俯瞰城市一派灰色的瓦顶。当我们漫步前行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感到非常孤独而相互之间非常亲密。

城墙上杳无人迹，一片寂静，只有城楼里偶尔飞出几只燕子和蝙蝠，以及我们的狗不时高兴地追逐想象中的狐仙。泰亚尔为我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保存至今，在照片里，我站在观象仪后面严肃地向外眺望着下边鳞次栉比的屋顶。为什么泰亚尔把我们带到这城墙上和三个世纪以前由他的耶稣会修建的古老的观象台来呢？为什么他要带这两个美国人，而不是两个年轻的法国人或英国人——或中国人来呢？他不是凭希望与意志而是凭着预感，把法国力量的守护神象征性地交给了在东方的年轻的美国。

我们常常站在那里，双肘支在观象台的女儿墙上，久久地沉思。泰亚尔跻身于如下的一些首先打开东方大门的耶稣会士行列——圣弗朗西斯·泽维尔，他是一个当代使徒，于1552年死于东方；还有马泰奥·里奇^①，十七世纪他在中国宫廷里教授天文学和科学，就象泰亚尔在二十世纪进行古生物学和史前考古学研究一样。

泰亚尔还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会士，他严格按照耶稣会的会规生活；他要求有自我思考的权利，但不要求享有表达或发表的权利。我以前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退出耶稣会，但现在我认识到这是他的影响的根源。他想从内部接管，而不是做一个持异议的反

^① 汉名利玛窦。

对者，这种持异议的反对者为数甚多——但象他这样的只有他一个。

他充分理解撞击震动产生力量的原理——这是各派教士的过剩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古老来源。他比较喜欢接近妇女，而她们中间有很多人对他非常崇拜，但他不是破坏贞洁誓约的那种人，这约束了这种力量而使它得以用于其它目的。他对妇女的态度是非常法国式的，非常有魅力，是有意培育出来的魅力。他告诉我，他和他的姐妹们关系密切，并且在美国妇女和欧洲妇女之间偏爱美国妇女，因为她们思想解放，更令人感兴趣，更有知识，更接近他的水平。

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法国人，特别是在外表和风度上。他热爱法国，总是觉得他是被从巴黎放逐出来的。他尤其喜欢美酒佳肴，风雅的交谈，迷人（不是漂亮）的妇女，和高级社会的一切赏心乐事。他不是一个圣贤、隐士、苦行者，而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耶稣会士，他相信人类还是唯一的一种有精神的动物。

泰亚尔于1881年5月1日出生于奥弗涅，我和他首次见面时，他52岁，正值鼎盛之时。他是伏尔泰和帕斯卡的后代，他决心要发现天地万物的逻辑，却还要保留天主教的神秘性。泰亚尔告诉我，他并不是自己选择当神甫的，而是他的家族指定的。

自从他1923年到爱弥尔·里桑神父的研究中心以后，他在中国和东方度过了25年。从那时起直到他死，他不但被禁止发表除了科学报告以外的一切东西，而且还被禁止从事教学。

泰亚尔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发展精神力量。在这个世界上他孤身一人，但他不仅相信上帝和耶稣在用双手引导他，而且还相信他自己是耶稣进而也是上帝的另一个化身。

泰亚尔拒绝接受德国人奥斯瓦德·斯彭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的理论，我们对这个理论的三个方面都进行了研

究（我在美国读过此书，并决定到东方看一看，是否东方有我们在西方所缺少的东西）。他绝对相信西方文明，认为其生命力在于基督教而不是科学。他彻底否定全部的东方哲学与宗教，并劝告我不要浪费时间去研究它们——这使我认为他头脑狭隘偏执，目光短浅，所以我没有接受他的劝告。

一直到1945年投了原子弹，我才认识到泰亚尔用意的重要性，其用意是使天主教徒的头脑向科学开放，又向科学传输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与此同时将人类的进化推向更高的水平。

埃德加与我是美国民主的典型产物，我们喜欢它。不管犯了多少错误，我们都不能承认有任何人没有自治的能力。

在1936年以前，除了少数中国人以外，泰亚尔是唯一我们能与之就那些正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聚集力量的有争议的重大问题进行交谈的人——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那些在当时我们还没有共同语言的东西。在外交界，习惯上忌讳进行争论——而在北京也没有人对这些新的未知的问题提得出什么有价值的见解。谈话就象涮碗水一样乏味。

在北京的宴会上，我们找不到人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起，这场大战在六年以后突然爆发了。但这些复杂的概念是我们同泰亚尔的日常话题。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期间，他不在北京，当时埃德和我开始卷入学生运动。泰亚尔在法国逗留了三个月，随后去了印度和爪哇，直到1936年的2月或3月才返回北京，当时他来我们家吃过午饭。尽管法国人办的大学里学生参加运动的寥寥无几，这次学生运动还是使他既惊讶又高兴。

我把我在爪哇找到的一个小小的黑木雕像给了他——一个带尾巴的猿人。他说他喜欢这个东西，而且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这样一个猿人雕像，一个“爪哇人”。饭后，我们又去城墙上散步，城墙离我们邻近狐塔的家只有几步之遥。在1936年，我们有很多事要谈论。1935年希特勒下令征兵，意大利在10月开始占领埃塞俄比亚。1936年3月，希特勒占领了莱茵兰。

在这个黑暗的时期，对泰亚尔来说，地平线上最光明的地点是西班牙的共和政府，西班牙自1492年以来一直是古老宗教法庭的大本营，也是哥伦布航海的根据地。泰亚尔坚持说：“时间一到，你就会发现，天主教会将站在正义的一方。”他的意思是站在社会主义一方，而不是法西斯主义一边。后来，在1936年7月17日，佛朗哥发动叛乱，开始反对西班牙的民主政府，并在意大利和德国的支持下于1939年初取胜，而与此同时，“民主国家”则袖手旁观。

1940年6月，被占领的法国与德国签订了维希停战协定。法国的灵魂从未从这个深深的创伤中得到恢复。然而就是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为泰亚尔主义和一种新的心灵开辟了道路，就象白桦树在森林大火的灰烬中生枝抽芽一样。

第十二章 女唐吉诃德

我对中国人称作封建主义的事物反抗了一年，但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是我所干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也是我同真正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头一次冲突。

1933年我们抵达北京后第一次走出北京饭店时，从等待顾客的一排人力车那里走过来两个人力车夫。我断定，根据穷人发迹的美国传统提高他们的生活地位，将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所以，我雇了王作我的私人人力车夫，每月工资五美元不到。我还努力把沈义沛训练成管家。我通过一个朋友的管家雇了一位厨师，开头他表现挺好，直到他挣到足够的钱要撑“面子”时为止。因为我一个苦力也没有雇，所以我额外付给每个人报酬。

有些北京通一直警告我：你不能那么做。你不能触动这个制度。这是一种等级制度，从一号、二号，一直往下排。除非某人从别人的管家那里得到担保，否则，你就不能雇用他。中国人宁可挨饿，也不愿丢脸在一个当过人力车夫的人手下干活。外国人的佣人都属于一个组织系统，除了这个系统里的人，任何新人都打不进来。在这个系统里，到处都要进行贿赂。上上下下都需要担保人。

北京的佣人制度被一些周游过列国的贵妇人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每家应该有一个管家，一个由他作保人的厨师，这个厨师带一个徒弟，不拿工钱，做厨房里所有的杂活；还有一个由管家作保人的苦力，他干所有的体力活，如擦拭家具、打扫房间之类；还有一个阿妈负责洗洗涮涮，她至少干半天。这是最低限度的，“露西大婶”卡尔霍恩有一大批佣人。

沈义沛会说一点英语，他当过排字工人，后来失业了。他身体相当瘦弱，我觉得，他得做室内工作才能活下去。

王对送信递条（当时我们没有电话）的工作很满意，每次出去办事都带上我们的狗。他强壮，懒惰，却又可爱，喝白干喝得脸上红扑扑的。后来发现，他不仅拥有一块田地和四辆人力车出租给了别人，而且娶了两、三个妻子。他竭力避免从沈那里接受命令。厨师也是如此。

厨师偷偷摸摸地“揩油”，这是可以想见的，但超过某种限度就被认为是出格了。“太太”要允许他这样做，就会丢脸，管家也一样。

我意识到存在一种消极的抵抗，要让我最后感到受不了，把沈辞掉，我命令沈辞去厨师，找一个自己人，但是这并不解决问题。

“我没脸见人了”，沈解释说，“为了挽回我的面子，我必须有一个苦力。管家不能干体力活。他必须指使苦力去干。最好把我的工资减一些，雇一个苦力。我自己当然并不想要苦力，但没有法子呀！”

“有志气，就有法子”，我固执地说。

其实我们小家庭的活儿有一个佣人干就足够了，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这些家务活我自己每天用两个小时就可以干完。佣人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同来访的朋友聊天。珍妮特·菲奇·休厄尔只有一个管家和一个厨师，这种情况在上海很普通，但是，并没有我打算做的这种安排。不按照保荐制度的办法，你要提升什么人是不办不到的。

有人告诉我，给你的管家找一名苦力是徒劳的，因为这将是一个从事家务的苦力，他也会拒绝接受一个当过人力车夫的人的命令。多给钱他们也不承情。他们认为你是一个傻瓜。你只付给他们标准工资就行了，不用多，也不能少。你所需要做的是辞掉沈义沛，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一切都会顺顺当当的。在一个当

过人力车夫的人手下工作，你的佣人在全城人面前都丢脸。

在整个中国，外国人都爱自己的佣人，家庭生活都很幸福，但也许除我以外无人不严格遵守这个“制度”，即一个建立在轻视体力劳动基础上的等级制度——但这一制度同印度的贱民制度还不完全一样。自从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在中国几乎没有外国人被杀害，但是当他们在被杀时，通常的原因是，厨师丢了脸，他用切菜刀结果了信任他的雇主。

我的这段愚蠢的唐吉珂德式的与假想敌的战斗，险些毁掉我在北京的整个有趣的经历。我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辞掉沈。妥善的办法是请“露西大婶”的管家或美国公使馆的管家给我家的佣人班子做保人。我可以只用两个佣人，并使全家上上下下都很和美。当然，我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可是我奋斗了一年。我原想把沈训练成别人的管家，而不是自己留用他。

最糟糕的是，我这时也急于把沈辞掉——只是从原则上讲我不能这么干。训练他干活已使我精疲力竭。每当客人来的时候，沈总是想出一些特别的做事方式，使我们大家都为难。他总是使人提心吊胆的。埃德对我的固执的试验一点也不同情。

我为沈感到非常难过，但我既不喜欢也不讨厌他这个人。他有妻子和一个多病的孩子，欠了很多债。凭着在“富有的外国人”那里担任高贵的新职，他不断借新债还旧债。他也不时地向我借少量的钱以应“急”。

终于有一天沈说他添了一个儿子，要用整整一个月的工资来办酒席，以庆祝孩子的出生。他只好预支这笔钱。

“太太，我并不想这样做。”沈解释说，眼泪滚下面颊。

“我妻子家里坚决要求办酒席，如果连一次酒席都不办，那我就没脸见他们。只要我有一个好差事，我就得花这笔钱。”

“要是你这份好差事丢了，那你怎么办？”我提出质问，感到我对沈的前途的关心到此为止了。

沈吃惊地说：“当然，我就断了收入，也没有面子了。”

“好吧，那就告诉你太太家里，就因为你一面欠债，一面还要这么愚蠢地铺张浪费，因此，你已失去了你的好工作。要想改变中国5,000年的传统习惯，我真没有这个气力了。你今天就去另谋新职吧。”

我留用沈一直到我们搬家迁往一个小村子时为止。当然，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无法为他找到一份工作。1934年3月26日，我收到他的来信，信中写道：“您的宽容和仁慈给我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使我常常记起您那高贵的容颜。根据现在的情况，我想不知是否有可能再雇我到您们那里工作……”

沈坐人力车（不是拉车）走了五英里来看我，恳求雇用他。但这时我在各方面对中国人已有足够的了解，使我能以毫无表情的面孔回答他说：“没有法子。”我已经有了一班新的服务人员，是由燕京大学兰·塞勒教授的管家作保的。我再也不去同这个佣人制度纠缠了。我绝不再低估中国劳工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力量了。我尽量不同人力车夫打交道，我们买了两辆日本自行车。

全中国都存在同样严密的“担保”系统，不仅通过亲属关系和宗族体系的方式存在，而且在大城市还通过流氓帮会的形式存在，它们控制着圈外人的工作机会，到处都得行贿。正是这种关系网维持了2,000多年的中国文明。实际上，单一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他只是整个链条中的一环，离开链条或与它发生冲突，都不能生存下去。即使是乞丐和强盗也得把他们所得的钱财送回家里，海外华侨也一样。妇女和儿童实际上处于家庭奴隶的地位，儿子被当作老年的保险。子女孝敬父母是严格的儒家规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它后来变成了政治上的虔诚。

在旧的制度下，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适当的地位和身份，对他人可以提出相应的要求。作为保证系统的一分子，贫困和财富都要从上到下分享。一个富有的叔叔就要资助自己的儿子和侄

子，但他们将来要报答他，给他养老，并负责他家庭的福利。

对我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不易明白的，因为我没有学过人类学——这门课至少在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应该是必修课。我不得不通过艰苦的努力自己摸索，自己解决难题。我得益最大的是鲁迅的著作。他虽然不是一位共产党员，但在中国，他现在仍比任何文学家都更受尊重。他写的《阿Q正传》揭露了旧的面子观念，他的所有著作都讽刺儒家之道。

这种呆板落后的制度充满迷信和残酷。只有对这一制度有所体验的人才会理解中国共产党正在致力于从基层改变中国的这一事业的惊人的进步性。人们只能根据中国自己的过去对她作出判断，而不能根据其它任何标准。“为人民服务”这一朴素的童子军式的口号，从实践上粉碎了整个儒家传统的族阀制度，这种制度要求任何需要帮助的人，特别是陌生人，必须有人“作保”。

我对中国缺乏任何种类的基本自由感到非常令人气闷，但是中国人却喜欢这种状况，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从生到死都保险了，起码对家庭和家族经济情况好的人是这样。

我在沈身上进行的固执的试验，出于我对中国情况的无知。描写中国的英文书籍没有多大用处——我和埃德对这类书多数都看不上。我们觉得，对中国真正的问题如此缺乏了解就离开她是令人羞愧的。这就是我们俩人冒着生命危险于1936和1937年采访共产党人的一个原因。我们认识到，这一经历不仅对我们，而且对西方，以至对全世界，都是重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了解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第十三章 艺术、文学和革命

在我们抵达北京后不久，三位由鲁迅介绍来的艺术家开始定期来访。鲁迅是当时中国艺术界的巨人，在各个方面提倡西化。这三位艺术家总是穿黑哔叽西服，扎黑色蝴蝶领结，看上去显得文弱而敏感。他们能阅读英文，但从未尝试过用英语交谈。我们立即谈得很投机，但是埃德几乎无法容忍语言上的障碍。他常常在他们来后几分钟就避开，事后要我告诉他谈了些什么。

他们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的工作和生命象共产党员一样处境危险。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纯粹是艺术家的人对国家可能构成危险。他们个子小小的，怕我们的大狼狗，但他们在寻求真理方面却是无畏的。他们从未看见过一幅原版的西洋画，只看见过照片，但他们的赞扬是无限的。

1925年冬，他们同另外一位名叫商的朋友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名叫Daubers的艺术协会。到1933年，该协会已有11名成员，并且出版了北京唯一的艺术刊物。1925年，王纯珠、梁义珠已经21岁，商和苏豁才19岁。1929年，他们把40幅油画带到东京参加写真艺术学会组织的展览。这次旅行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们倾向他们称之为“无产阶级的艺术”，尽管他们没有一个人属于工人阶级。Daubers与德国表现主义的“狂飙”运动有联系，与坎金斯基^①和俄国人有联系。他们也喜欢毕加索、马蒂斯和塞尚，而王则热爱米勒，被誉为中国的米勒。

^① 坎金斯基·瓦西里（1866—1944），俄国风景画家，抽象派艺术的奠基人。

他们告诉我，全中国大约有50名左翼艺术家，绝大部分在上海，少数在杭州美术专科学校，广州几乎没有，因为那里压迫很厉害。

他们来访时总是单独来去，以避免警察。他们的一个同事正在躲避追捕。另外一个最近在山东被处决，他是去那里教书的。商因为在泥地上画了国民党的党旗，而被判处十年徒刑；他于1932年同8个教师和12个学生一起在山东被捕。只有梁结了婚。

这些左翼艺术家告诉我，他们的目的是要表现人民的生活。他们称自己为表现主义者，或自然主义的学生，这在中国是新鲜的，革命的。在中国，除了很受限制的水墨画和水彩画之外，所有西方的技巧和材料都是新鲜的。

1929年，梁出版了一本“现代”写生画，是不顺应自然、形象失真的。这被认为是危险的激进。虽然你几乎分不清“哪个是裸女，哪个是楼梯”，但人们认为画裸体女人这件事就证明画家是共产党员。

围着一盘饼干和一壶中国茶，还有我们那不放心的狼狗也从不缺席，我们谈论青年、艺术和革命。这个团体的目的是借鉴西方的艺术——油画颜料、画布、木刻、铅笔、炭笔，最主要的是明暗对比和立体透视。中国画只限于纸、丝绸和毛笔。除了俯视的景象外，没有透视画法。中国画是平的，平到使一些评论家认为中国人的眼睛看不到立体。中国画是对现实的逃避，是一种逃避哲学，它不用表现法，而是用写意法。

这些艺术家告诉我，继续模仿业已存在1,000多年的中国艺术是无用的，因为它已经达到了尽头。当我批评他们模仿西方时，他们很生气地说：“这是一种进步。为什么要使我们同这绝妙的艺术隔绝呢？”他们为从事这种艺术甘冒生命的危险。

我们没有钱，但是我们还是收集了至少50幅有价值的木刻画，送到纽约的《今日中国》杂志去展览。我们要求展后退还，但有人把它们扣下了，我们以后没有听到任何有关的消息。（从

此我再也没有向该杂志寄送任何东西。)

在泰亚尔·德夏尔丹的帮助下，我把左翼艺术家的作品送往欧洲首次展出。这次展览也许是“现代”画展的第一次，首次展出在世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包括传统的国画。这次展览于1934年3月14—19日在巴黎的比利埃画廊举行，尔后在欧洲作巡回展出。这些画在那里丢失了——14幅油画，19幅素描，51幅木刻，所有作者用的都是笔名。

在纽约，赛珍珠和她的出版商理查德·沃尔什发表了我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不但介绍了中国的新艺术，而且也介绍了中国的新文学。我和王送给她一轴大画卷，这是王画的一个身穿红袍的僧人正在敲门，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这部小说已由赛珍珠翻译成英文。

一天，赛珍珠和理查德·沃尔什到我家呆了一整天。我们大家很快就成了朋友。43岁的赛珍珠正处于生活和职业的最佳时期——她在恋爱了。1935年6月，他们两人结了婚，这是天作之合。从她向打字员交出第一篇手写稿那一刻起，迪克就照管她的事务。1938年，她获得诺贝尔奖金，部分是奖励她为传教士父母亲写的传记（确实是两部第一流的传记）。一些年来，她的书给她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收入，她几乎每天都写作，直到1973年80岁时与世长辞为止。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正是通过这位小说家的头脑才对中国有所了解。

赛珍珠仪表庄重而妩媚，有一副甜美的嗓音和一双碧蓝泛绿的水灵灵的眼睛。她身材高大，端庄安详，样子是一个典型的具有18世纪德国移民文化特征的宾夕法尼亚家庭主妇。理解她一生的关键是了解她做母亲时受到的挫折。她曾告诉我，在她生了一个智力发育不健全的孩子之后，她再也不敢怀二胎了。她憎恨已离婚的丈夫巴克，因为婚前他没有告诉她，他的家族有这种遗传病。由于孤独的压抑，她转而从事写作。她非常关心妇女们的问题，她们则通过大量买她的书来报答她。

沃尔什于1933年成为《亚细亚》杂志的编辑，他和赛珍珠拥有这家杂志和《约翰·戴出版公司》。开始时，他们俩都赞助过我。我们向他们两位谈及为了解中国人的真正的社会学而翻译中国著作的想法。他们都同意，沃尔什出版了这方面的大部分著作。在向西方介绍亚洲作家这件事上，他比其他任何人的贡献都大，因为他一直是这样做的。

1935年12月，我和写意画家王纯珠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新艺术》的文章。关于写意画，艺术界几年后才谈到，我和王一起学习过写意画，尽管我自己未能掌握它。这是中国人的一项重大成就，任何西方人都无法模仿，它是一种有韵律的笔法，是中国独有的。一笔画下去，墨从边上渗出，形成一幅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有机画面，而不来回涂抹以加重浓度。精通这种画法的人，如同书法家一样，是稀少的。这一画法只限于线条——实际上是轮廓。立体造型是不可能的，也是与本意相违背的。要画一片叶子，只要在笔的一边多蘸上些墨就行了，必须一笔下去一次画成——对我来说，这不过是进行了一次笨拙浅薄的艺术尝试而已。日本人从未掌握这种画法，他们画任何东西总是勾画黑边，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日本”的特色。

王是这个小组的领导人，也是对我们的讨论最感兴趣的人。他创作的中国画要比西洋画好些。当时虽然只有中国画能够出售，但这些艺术家牺牲一切而学习西方技巧。

到1935年初，这一小组的其他人已经失踪了，王也必须逃离北京。他告诉我们，他手头上没钱，又无人资助，共产党的各种地下组织和外围组织都遭到了破坏。他们中有些人挨饿，其他一些人死于疾病，而政府的主要武器是：被捕的人如果不供出几个“共产党人”的名字，他就不可能获释；通常他还得参加新的法西斯组织，这一组织主要是从出卖他人、甚至出卖无辜者的共产党的叛徒招收人员。这是我全部经历中所遇到的最丑恶的事情。这是法西斯分子在全中国采用的手法。结果，任何被释放的人都会

被怀疑为了出狱而出卖了他人。这样的人被认为是危险的，因为他或她在获释后还可能被迫充当警方的告密分子。这是最悲惨的情况。一个人为了自己的信念可能已牺牲了一切，在遭受拷打和仅免于被处决——这是对任何共产党组织的任何成员的合法惩罚——而得以出狱后，却发现朋友们都不敢接近自己。有些人早已同家庭脱离了关系，出狱后面临死于饥饿的危险，因为没有人“作保”，所以找不到任何工作。

在北京，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执行这个计划，他曾在宪兵第三团总部拷打和处决过许多年轻人，也曾把重要人物送到南京去受刑。（1973年，我到了南京雨花台刑场，在那里，人们告诉我，从1927年到1949年，蒋介石政府在不名的坟坑里埋葬了10万青年人。这些人都是中国的精华。我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我曾经认识，或曾见过一、二次面。）

我对中国的最初兴趣是美学，而不是政治。我惊奇地发现，左翼艺术家、作家和学生是知识分子领袖，从个人来讲，他们比其他人有吸引力，即使在肉体上也常常如此。蒋介石正在镇压和屠杀中国的优秀分子——他们是最先进的青年，他们正在发扬人类的精神。

我们帮助王逃到上海，又搭船去了法国。不久，收到他从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在那里很快活。我在1939年第二次收到他寄自延安的信，当时他送我一张照片和一些水墨画，用的笔名是胡蛮（祐曼）。1972年我访问北京时，有人告诉我：他还活着，但由于病得太厉害而不能来看我。

在中国，画妇女身体的画一直是被禁止的，除非画中的女像穿着遮盖严密的服装，但即使如此，除了观音菩萨和道家的仙女的画像外，别的也少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2年。裸体画仍被禁止，可以画赤背露体的劳动者，用以显示他们的肌肉。但是，这时第一次把穿着各种衣服、裹得严严的妇女作为艺术的一个题材。）

中国传统艺术的突出特点是：艺术是反对妇女的。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艺术家对女性人体不感兴趣，妇女裹着小脚，青年艺术家和作家，仅由于他们的思想而被处死，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想到了我所认识的美国艺术家，他们身体健壮，充满活力，热爱生活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对年老的中国人来说，只有静物才能引起画家的兴趣，任何活的东西他们都不感兴趣。一个人只有到死后，才能给他画肖像。在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造成这条可怕的鸿沟的是些什么东西？原因在什么地方？

“你们已经掌握了一部分真理，”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中国艺术家。我告诉他们，西方是在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庭教堂屋顶画和达·芬奇的“蒙娜丽沙”出现之后获得解放的，它标志着人类再次象当年希腊人那样崇拜人的肉体 and 头脑。

但是，这些艺术家心中所想的是别的东西，西方艺术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棱镜向他们渗透过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革命是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产生的，甚至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这我可以理解。然而，为什么中国要整个跳过长达数百年的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这个辉煌的时代呢？这是出自自愿的选择还是客观的需要？

在我着手研究中国的美学问题之前，我已经断定：中国的农民和劳动人民要比病态的颓废的上层阶级更有吸引力，不仅在体格上是如此，而且心理上也是如此。大多数外国人都强烈地感到这一点。上层阶级不仅轻视体力劳动，而且连走路都懒得移动双脚，更少参加体育活动和室外锻炼。这些文弱多病的青年艺术家从来不到农场锻炼自己的筋骨，培养自己缺乏的“感官能力”。到六十年代，毛泽东命令所有学生至少参加两年至三年的体力劳动。但在三十年代，左翼艺术家是在逾越把中国知识阶层和劳动阶层分隔开的鸿沟——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如果说不是在行动上，歌颂劳动，这不仅因为劳动是生产性的，而且也因为劳动从美学上看也是美好的，十七世纪的清教教义也有同样的观念。

当我1937年到达延安的时候，我很难理解为什么那里的每个人都显得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吸引人，而当时我所遇到的别的中国人却充满了卑鄙、残酷等各种令人厌恶的特性。当时我还不懂得Charisma（超凡魅力）这个词，但这正是每个领导人都具有的——没有它，他就不可能生存，就不可能在成千上万心怀敬佩的追随者中确立领导地位。

当我力图解决有关美学原则的问题时，这个同整个中国文化有联系的棘手问题把我难住了。即使在今天，许多博物馆的馆长和东方艺术专家对这一点仍然不理解；他们对造成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因不了解，因为他们未曾学过人类学，其丑恶的特征也令人讨厌。他们鄙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没有认识到它要比马克思主义时期以前的照抄照搬先进十万八千里。我热爱1972年的中国的艺术，因为我记得所有以前那些可怕的问题。当任何西方人因为自己的艺术而面临被处决的威胁时，他才有资格批评中国当前的艺术作品。当然，中国的现代艺术仍然有一段漫长的征途要走。

又过了一、两年，我们决定把现代中国的著作介绍给西方，我们雇佣了几名翻译，翻译了几篇短篇小说。埃德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同一位译员合作翻译鲁迅的小说。我们决定着手编译一册内容广泛的短篇小说集，主要选取那些能表现真正的中国社会的作品。我们还认定，了解中国的办法是阅读中国人写给中国人看的作品。

我们想培养萧乾和杨滨，尽管这两位作家是不知名的。我坚持和他们一起对他们写的两个短篇小说作了文字上的订正，并编入了《活的中国》一书中。萧乾写的那一篇小说是最受读者喜爱的，广播电台还加以改编在电台上朗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在英国和美国为他树立了名声。杨滨写的那一篇（她使用的笔名是佚

• 埃德加·斯诺编，《活的中国》（纽约，约翰·藏出版公司，1936年）。

名和杨刚)，于1973年在她的一个集子里重新发表。•她未能活着看到这本书的出版，因为她大约在1949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后自杀了。

萧乾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友好，可爱，漂亮，有才华。但是他胆小，这也不奇怪。1925年他13岁时因被怀疑信仰“社会主义”而被捕，未经审讯就被投入监狱。同时被捕和被处决的有几千人，当局曾宣布，那些有一本圣经的人就是冯玉祥的追随者，也就是布尔什维克。他告诉我，在同一条炕上的17人中，有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学生。萧于1911年出生在北京一个贫穷的蒙古族基督教家庭，后来变成了孤儿，所以他到一家基督教徒经营的地毯厂当了三年学徒。在他13岁时读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以前，他一直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萧相信神鬼和各种迷信，但在外表上他显得是个很新式的人物。从燕京大学毕业后，他找到了工作，在天津《大公报》当文学编辑。不久，他的朋友杨滨由他“作保”也在该报工作。后来，他在伦敦和美国分别度过了一段时间，于1949年回到北京。（他大约在1979年来康涅狄格州拜访过我，并写了一些有关我的文章在中国发表。）

杨滨比起萧乾来显得刚强，有男子气概，萧很欣赏她这一点。她是我所认识的少数既非天生可爱、又不人为地力图显得可爱的中国人之一。她还不是在态度和个性上使人不快的人，但也相去不远。然而，她健康的脸盘是漂亮的，周围披散着未加美化的剪得短短的头发。她穿着西式的白色上衣和黑色的短裙。她住在燕京大学校园里，虽然她并未被录取入学。她曾有过性命之虞，她的老师待她很好，其中之一就是有名望的顾颉刚。大约在1930年或1931年，她是燕京大学学生组织的副主席。当时，她因领导

• 纳奥米·卡茨和南希·米尔顿编：《一部遗失了的日记片断》（纽约：兰道姆书屋，1973年），内容为有关亚非拉妇女的短篇小说。

一次要求释放政治犯的示威游行而被捕入狱。

杨滨意志坚强，头脑清晰而客观，她曾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当她还是一个学生干部的时候，正是马克思主义引导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萧乾带她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她显得相当拘谨和愤世嫉俗。人家告诉我，她被怀疑是托洛茨基分子，让我不要接近她，因为她不值得信任。我不相信这一点，而且无论如何她正是我要找的人。她出生于湖北一个高级官员的家庭，是家中18个孩子之一。她的一个兄弟是一位重要的左翼人物。我想，她的家庭有足够的钱财和影响把她保释出狱，在那些日子里，除了用背叛他人的办法出狱之外，保释是唯一的办法。杨滨声称她没有叛变，我宁愿相信她。

杨滨成了中国最著名的女记者，四十年代她来美国时，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女记者。当时她还就读于拉德克利夫学院。当她在一个月末前来访问我的时候，她的脸简直就象人死后塑制的脸型。1973年我获悉她以自杀结束自己的一生时，我并不感到惊讶。

我也编辑萧红的作品。数年后，她死于贫困和营养不良。她的丈夫是田军，他的《八月的乡村》由罗伯特·沃德翻译，由“每月一书社”出版。我也编辑过其它小说和诗歌，主要发表在《亚细亚》杂志上。

对我来说，撰写那篇收在《活的中国》一书中题为《现代中国的文学运动》的开拓性文章比什么都困难，尽管杨滨帮我进行研究。根本找不到有关的中文文章，英文的更不用说了。我的文章于1936年发表在伦敦的《今日生活与写作》上。1938年发表在伦敦的《新创作》上，由约翰·莱曼编辑，采用了我编辑的两个短篇小说。

埃德和我把林语堂介绍给我的朋友卡罗尔·麦科马斯，他把林的手稿送给赛珍珠。理查德·沃尔什一手负责对林的书加以剪裁编辑，然后出版，使他挣了很多钱，尽管林对此并不领情。林语堂转向右派，最终支持了蒋介石。如果他1933年不站在左翼方

面，因而我们也不尽力促进他的事业，那他很可能永远不会在西方出名。

我吃惊地发现，左翼作家在中国的文学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就象在艺术领域一样，尽管它主要是仿效俄国。托尔斯泰是一位在中国、朝鲜以及其它亚洲国家最有影响的作家。中国唯一有独创性的创作冲动来源于左翼运动。（即使在学术上也是如此，只有自然科学在很小的程度上除外。）我看到了它的重大意义。由于许多原因，中国没有其它道路可走——唯一的道路是走向某种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接管政权以后，西方大喊大叫创造性的天才受到了压制。情况并非如此——不幸的是，基本上不存在可以压制的东西：必须先培养出天才，艺术家和作家开始从政府得到生活津贴。艺术仍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但这个概念承认存在辩证的冲突，这是艺术的根源。同时，追求的目标是扎在土壤里的根，而不是缺乏独创性的模仿。今日中国的艺术是说教的，功利的，是新的改革运动的一部分，但它是民主的，是一个群众性的发展。艺术也受到尊重。象从前一样，文字和绘画在中国都具有魔力。中国仍然处在说教性的寓言的时代，但只要扎根于健康、肥沃的土地，它将来可能出现“百花齐放”的时期而震惊世界。中国仍在为2,000多年的封建停滞和对各种创造力的全面压制付出代价。然而中国解放30年来已经发展的艺术和文学，要比美国头150年幼年时期的尝试规模大得多。

第十四章 年 终

头一年往往是最困难的一年。埃德早先深深地热恋上美国驻上海总领馆的美女，这是大大违背他的意愿的。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临着要放弃他珍贵的自由这一难题。然而，如果不是出于自愿选择，那末除了在奴隶的昏沉的迷梦中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作自由呢？实际上，埃德加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自由。新的选择自由展现在他的面前。他只需要管他自己的工作，其它的一切他身后有一个人负起了全部责任，我坚持，无论付出何种代价，其它一切事情都应服从于他的工作。我们的分工是：他挣钱（虽然我们俩都同意在这方面花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我负责其它一切事情，包括鼓励他去旅行或工作。

在我们蜜月旅行之后，我们很需要有一笔收入。埃德写了一篇又长又散的文章，总的谈了谈我们旅途中所看到的欧洲殖民主义在东方各地的表现。他的题目是：《西方威望的下降》。这是一篇反对帝国主义的文章，指出西方应该在日本以战争来夺取殖民地之前，放弃自己的殖民地。他不喜欢这篇文章——他已经习惯于新闻报刊的简短文章了。但他对将7,000字的长文改成2,500字的短文投寄《先驱论坛报》而感到发怵，该报肯定会采用，并会立即付给150美元的稿费——当时，我们非常需要钱。

“我喜欢它”，我说，象有些时候那样感到自己绝对正确。“它是《星期六晚邮报》经常刊登的那类东西，这家杂志也是孤立派，它同《先驱论坛报》是一样的货色，所不同的是《邮报》需要有描述背景的长文章，让普通美国人能读得懂。”

埃德自从1928年以来，几乎没有看到过一份《邮报》，但他

对我的判断有点迷信，他把我看作是给他带来好运气的吉祥的人，而且比较来说，我刚从国内出来。然而，他已经树立了特殊的成功心理：绝不冒失败的危险。对他的一切文章，他都耐心地改了一遍又一遍，把文章删短，校订，以保证稿子不会被退回来，同时，发表后也不致使读者感到厌烦。

他认为，打入《邮报》是不可能的。他给编辑的附信写得很长，以防“肯定”遭到拒绝时，可以保护自己的自尊心。我怕埃德改变主意，因此立即坐着王的人力车，把文章送到邮局，从海运寄走，还保了险。

一周周地过去了。一天，《邮报》寄来一个小小的开了透明纸窗的信封。埃德以为是一份广告，差一点把它扔进废纸篓。但是是一张用新型打字机打的支票。当我们研究这支票时，埃德办公室里的焦急气氛越来越强烈了。支票上写的是7.5美元，还是75.00美元，或是别的什么？决不可能是750.00美元——这很可能是打字打错了。

拿着这张小纸条，就象捧着圣杯一样，我们爬上了人力车，径直去银行，小心地呈上，似乎我们拿的是被盗的货物，或者这是一张假支票。出纳员怀着敬意看了支票，告诉我们很有利的汇率，然后把这笔钱存入我们的帐户。750美元可兑换中国钱4,000元。我们可以靠这笔收入生活一年多——而且可以过得非常富足。

埃德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激动的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即使在我们分乘两辆人力车并排经过长安街时，他也不肯松开我的手。两个人力车夫乐得回头直看，竭力防止两辆车轮子碰到一块儿。

我们感到象奴隶刚刚赎买到自由一样地心情欢畅，我们把这笔钱储存了起来。这是免于恐惧和担忧的自由，是保证我们可以写书的自由。这也是使埃德不再担心稿子被拒绝采用的自由。从此以后，他与《星期六晚邮报》建立了经常关系，该报是全世界付稿酬最高的杂志。这样一来，《邮报》在某种程度上资助了我

们在中国的活动，埃德成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桥梁。除了在《读者文摘》上转载外，他至少已获得了任何杂志所拥有的最广泛的读者。《邮报》采用他的稿件，使埃德有信心继续对太平洋地区进行观察。

然而，他小心谨慎，防止损害他在《邮报》所受到的欢迎，只向该报投寄他有把握被接受的、精心剪裁的稿件。如果他敢于冒被退稿的危险，稿件可能被接受的多得多。就我记忆所及，《邮报》除了有时加上自己的标题之外，从来没有退过埃德所寄的文章，也未曾作过改动、修订和查禁任何东西。

寄来支票以后，下一班邮船带来了《邮报》主编乔治·爱德华·洛里默的一封信，请埃德以后还给他写文章。埃德继续给他们写文章，直到1950年麦卡锡时代。当时他辞去了副编辑的职务，以抗议他们对中国及东方的新态度。虽然如此，本·希布斯仍坚持说，只要他作主编，埃德就可以给《邮报》写东西。（希布斯告诉我，无论何时，只要埃德的名字在封面上出现，该杂志的销售额就立即上升。）埃德给《邮报》写了15年多的文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这家杂志的战地记者，被允许去他愿意去的世界各个角落。在那期间，据他统计，《邮报》付给他大约25万美元。

埃德加·斯诺生活中令人惊异的事是，至少直到1949年，不管有钱还是没有钱，他可能没有做过任何他不愿意做的事。他享有真正的自由，包括不为自己对妻子和家庭的责任担忧，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会照管家庭的——我也的确把它当作自己工作的一部分。

在麦卡锡时代之前，除了1931—32年在上海的那几个月，他受到一些人（他对他们的看法毫不重视）的排挤之外，埃德在个人生活中或在工作中，从来不知道受排挤的滋味。他是那样习惯于我行我素，他甚至毫未觉察到这一点。这就是他获得成功的条件，我认识到这一点——至少是在我试了一年，想让他采用别的

作法而未能成功之后。埃德从未遇到过真正的问题，但到1949年，他却遭到了具有持久影响的一连串打击——离婚，永远被苏联拒之门外，与《邮报》断绝了关系，院外援华集团和麦卡锡的攻击，以及遭到出版界的排斥（尽管兰道姆书屋继续出版他的著作，直到最后。）。

埃德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只挣了几百美元，但他仍未放弃《云海南方》一书的写作工作。当我们在北京安置下来以后，埃德在统一通讯社的工作由于预算问题被解除。美联社的吉姆·米尔斯提出，只要埃德能坚持工作两年，就给他一个工作，但埃德不愿意被“拴住”。由于同样的原因，他拒绝了东方的一份最好的工作，即从上海为《先驱论坛报》写报道。他想按照自己的爱好搞写作和旅行，从来不想按照一个时间表去办事。我的想法也一样——牺牲一切来写我们的书。我们认识到，从事报纸工作没有什么前途。

我正在收集材料写书，但一个很大的打击却从天而降。我获悉，另外一个美国妇女也有同样的想法。一部中国历史“史剧”即将出版，这是关于这一主题的通俗介绍。

很难相信还有其他人像我一样笨。15年来，我还没有掌握写作的真正诀窍——或者说，做其它任何创造性工作的诀窍。埃德每天都在做，但我仍然不得要领。事情很简单：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去写作，然后你再干别的。你必须从梦中醒来就直接投入写作，不要让任何别的事情使你从这一直接、狭窄的思路分心，甚至不要让早饭、报纸或电话来干扰。这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学问题——不是一个缺乏时间的问题。很少有妇女掌握这一诀窍——它同我们的自然倾向是背道而驰的。

在我们婚姻生活的所有日子里，我保护埃德，完全不让他从写作上分心或受干扰，直到午饭时间。他充分利用了上午的时间，证明我这样做是正确的。至于我自己，我常常在一早就作好

准备，等待随之而来的空余时间，但总是等不来。这是我自己的缺点。我有佣人，可以在上午做我自己的事，象埃德一样。可是相反，我总是做那些“紧急”的事，而往往是为别人做的。我全部的最佳创造力，即上午的精力，都花费在为别人做好事上了。我不害怕浪费自己的精力，我以为未来会在那里等待着我。但是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未来永远没有来到，要是它真的来到了，即使你的心境已发生了变化，所以你不再能象你以前那样做自己的事了。1949年以前，我在别的事情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然后麦卡锡时代来到了，又碰上了离婚，致使我的工作到现在也仍然没有完成。

这不是埃德的过错。他讨厌我牺牲自己的写作而在其它事情上耗费时间，因为他知道，我必须成名，获得社会认可，然后才能出版我写的书。埃德对我有充分的信心，而首先是对我的文字才能充满信心。他实际上认为我是一位文学天才——当然我也是这样认为，尽管没有把这一信念付诸试验。这是我们的婚姻所赖以存在的支柱。我感到丈夫对自己的钦佩和热爱对我是极大的支持。

在我们婚后的头一年，我强迫埃德的衣着居于北京最考究的人士的前列，强迫他去骑马，去增强体质（他曾经是一个获得21个记功章的男童子军，但在东方几乎丧失了健康），去跳舞（尽管他断然拒绝去练习），去参加各种团体的周末山区徒步旅行，去参加其它各种各样的活动。他生性不大主动，需要连拉带推或猛拽，这就弄得我精疲力竭，但我仍竭尽全力，想方设法扩大他的名声。

在第一年年终，我发现埃德不会有什么变化。

“我想要得到的就是你的赞许”，埃德说。“这是我所寻求的。你为什么批评我？”他以小孩般的莫名其妙的神情发问。

“我从来不批评你。”

我愣住了，这是真的。

幸运的是，我有足够的理解力决定作出战略退却，从我的最高方案退到最低方案。我决定让埃德保持他的本色。他天性讨人喜欢，容易相处，只要他不必去做那些他不想做的事。他性格倔强，就象一头密苏里州的骡子。他不懒惰。他热爱自己的工作，那就是写作、新闻工作和旅行。他不乱花钱，除了买美国香烟、咖啡和刮胡子刀片外——他在这些方面不肯降低西方的标准。他有良好的教养，也很文明。他憎恶宣传。他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部分就是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即使在他的作品中也没有这种表现，尽管我们之间天天辩论。

我决定，对以下几点我要坚持到底：一，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埃德的健康和工作；二，除了买生活必需品之外，我要更加小心，不为自己花钱；三，我下定决心不嘀咕，不埋怨或感到生活清苦，而要满足于已有的东西——如果我得不到自己所喜欢的东西，那末我就喜欢我已有的东西。可是，我不是殉道者，我不是天生就节俭的，尽管埃德是这样。我是以自觉的行动，为了大事而放弃小事。

啊！我多么喜欢设计东西并让人把它们做出来——而且几乎不花钱。在三十年代的北京，中国珍品是何等便宜。幸亏我出身于清教徒世家，才使我能鼓起必要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的勇气。而且幸亏在北京，不打扮才最时髦。我从美国带来许多适合在各种场合穿的漂亮衣服。然而对一个20多岁的姑娘来说，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宣布暂停购买新衣服或其他东西，时间显得太长了。

大约在1936年的某个下午，我骑自行车去设在北京饭店的韦什书店。当我看见一位穿戴最时髦的年青女旅游者时，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她走起路来摇曳生姿，就象这样一个有魅力的人所应有的姿态，戴着黑色高顶帽子的脑袋时而往上一仰。我一只脚踏在自行车的脚蹬上，仔细地观察她。我穿着一件用埃德在印度做的俗不可耐的衣服改成的灰色苏格兰呢外套，在北京寒冷而尘土

飞扬的街道上在做些什么呢？我不想成为一个衣着粗俗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传教士式的毫无幽默感的社会改良家，陷入中国学生和传教士绝望的深渊。

埃德和我受着不止一种冲击——这就是力量的奥秘。孤单地处在异国的无情的土地上，我们在一个小小的真空中相依为命，我们感受到贫困的压力并与世隔绝。埃德是一个快活的人，并不感到缺少什么。但我深切意识到自己为着这种独特的生存而放弃了些什么。然而，享受的奥妙正在于丧失。我能够从简单的东西中得到享受，正因为我丧失其它一些东西。

精神力量不止一种，大概还因性别而异。泰亚尔的观点是，一个人必须单独发展其体质、头脑和精神力量，不受异性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受社会影响。他本人就是他的观点的完美的典范。这同所有独身主义的、禁欲主义者的神父和神秘主义者的旧概念没有多大差别，不管他是印度教的坐钉床的苦行僧，或是在欧洲修道院穿粗布衣衫的教士，他们企求通过祷告或沉思获得上帝的垂爱。所有伟大的精神领袖都是摆脱女人的，反之亦然。

我的观点是：人类分成男女两性，这是在进化和突变方面向前迈的一大步；愈加分化，变化就越大，品种就越多，刺激也就越大。寻求配偶是自然选择的方法之一，它用了多少世纪才进化到现代的核心婚姻关系，也就是由一男一女组成的单位，就象其它细胞和核子一样，具有同样的电磁引力。这种“阴阳”原子（我不是从中国得到这个概念，但我喜欢这个词），能够产生供外界使用的能和力。但如果不是科学巧妙地加以处理，以增强在冲击下产生的力量，并使动力在消耗后获得再生，它也可能成为剩余能量的毁灭者。大自然提供了男女之间的惊人的吸引力，人类能够在婚姻生活的锅炉里捕捉住这种吸引力来成倍地增强他们的各种力量。婚姻生活需要相互忠诚和专一，特别对妻子来说更应如此，以免折断把夫妻两人紧密连结在一起的高压线。在这样的一

种婚姻生活中，埃德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伴侣，因为他致力于成功，他的男性的自尊是健全的。他虽然不懂这种理论，但他享受了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成功。

谚语说：“在每一个伟大的男人后面，总有一个不出名的未被颂扬的伟大的女人。”我的“婚姻力量”的理论不是全新的。如果有关某些伟大的男人的力量源泉的真情能够为人所知，那末，我的理论就可能有许多实例。妻子是产生和再产生肉体和精神力量的源泉，这种力量不仅支撑着丈夫，而且他所取得的一切更高的成就都是由于这种力量才能取得的。这样的一位妻子，往往本能地执行着一个女人自己的密谋，其中一部分，就是把她自己的才能作为一种自然形式的巫术秘而不宣，去增强男性的自尊心。

象泰亚尔一样，男人单独地去攀登最高顶峰，比起任何女人来，是比较容易的。泰亚尔不重视天主教的女圣徒，因为她们缺乏为实现这种攀登所需要的全面的发展；她们在虔诚的宗教活动中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主要从事一些医治病人等次要的事情。从来未曾有过一名妇女是耶稣会会士。但泰亚尔却相信，女人比男人进化程度更高，并且有更大的潜力。他不反对别人结婚，只反对象他自己一样的神甫结婚。他虽然不同意我的“婚姻力量”的理论，但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个有助于提供鼓舞和新活力的女信徒，虽然由于政治原因，他无疑信守自己保持贞洁的誓言。

斯诺夫妇的婚姻在未破裂前，是一段协作成功的姻缘，它向不少人们和历史事件提供了动力。

第十五章 中国的乡村生活

虽然埃德和我表面上过得很愉快，但是我们两人都有着很坚固的保护层，使我们免于在北京的安逸生活中象人们所说的那样被“同化”。可是，要摆脱繁忙的社交活动，要节省钱，要写书，那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因为我们在北京受到大家喜爱，要这样做就更困难了。我们决定搬到燕京大学附近的村子里去住，埃德在燕京新闻系任课。

从1934年3月到1935年秋天，是上帝或命运使我们得到理想的住地——海淀。这里是道地的乡村。我们住在一所小房子里，它象一颗宝石镶嵌在一座小山上，从那里几乎可以俯瞰颐和园。在种着芦笋和草莓的园子里，有一座高高的熔岩石假山，在上面可以隔墙远眺，还有二、三英亩草地供我们的爱狗戈壁在上面奔驰。我们一直渴望能自由呼吸。这里有新鲜的空气，还有我们自己种的蔬菜。

每月的房租不足10美元，所以这样低，是因为房东吉米·权希望租给外国人住。他是与日本人作交易的金城银行的行长。他建这所房子是为退休作准备，也是他的幸福家庭的避暑别墅。可是盗贼曾闯入过，他害怕他的孩子——如果不是怕他本人——遭到绑架。

守夜人又是花工，他的全家住在院门口的小屋子里，他为此担惊受怕。这所位于军机处^①的院子的一边是一个没有人家的斜坡，院墙不够高，小偷蹬着梯子就可以进来。我们住在那里的时

^① 此处系音译，疑误。

候，有一次小偷果真打破门房的一扇窗户，恐吓守门人。守门人因为喜欢有戈壁作保护，所以对它很好。在房子附近有一片古老的墓地，吉米指望它能阻挡盗贼，因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害怕在黄昏后经过墓地，连那一些被认为已经欧化了的学生和教师也是如此。但是，满人和蒙古人对此却不在乎。这里埋着的一定是他们祖先的鬼魂，因为海淀是旗人的飞地，居住着1911年被推翻的清王朝战败的家臣和侍从。那里的人们仍然能讲一口最好的宫廷官话。

我们在3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搬了家，那天还刮着风。我们所有的家俱都是由高大健壮的河北苦力用杠子从北京城抬去的，他们在长达五、六英里的路途中边走边唱。如不这样，就要用双轮马来运，可是颠簸在高低不平的石头路面上，会把一切东西都碰碎的。搬家的结果，连放在绿玉色柳木桌子和我的月亮形书桌上的薄玻璃板都毫无损坏。

啊！处理掉了埃德在拍卖行买的那些笨重粗大的法国公使馆的破烂货和破旧的小地毯，以及女用马鞍，我是多么高兴啊！我留下了白色的冰鞋，以便在燕京美丽的湖上溜冰。

埃德和我以及我们的朋友姚莘农，带着戈壁一起乘坐燕京的大轿车先到，当我们等苦力的时候，我们查看了我们的游泳池，粘土地的网球场和现代化的自来水设备。在西式的壁炉里用煤球生起了旺旺的火，苦力们一到，立即把我们的煤球炉拿了出来。当餐桌和盘碟一运到，一顿丰盛的欢迎宴席也很快准备好了——什么东西都没有打碎，甚至埃德的一瓶高粱酒也完好无损，埃德和姚用这瓶酒来庆贺乔迁之喜，也用来保持炉火旺盛，他们从远处往炉子里喷酒取乐。

姚是中国主要的文学杂志《天下》的编辑；他的英语讲得很地道，人也很漂亮，是一个十分世故的上海滩的花花公子。他总是穿一套浅灰色的西装，里边穿一件淡紫色的背心，脚上穿一双戴有鞋罩的漆皮鞋。他和埃德一起翻译鲁迅的著作时一直住在我们家。

第一个晚上，我们关掉电灯，点上蜡烛围火而坐，听姚讲鬼的故事，他保证每个故事都是真的。他完全相信这些故事，并已从我们的新佣人那里听到了有关墓地和当地的种种传说。（我们的管家和厨师已由附近的燕京大学正式作保，每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徒弟帮着做各种事情，只有在主人用电铃招呼时他们才亲自出面。）姚对我们说，他不认识不信鬼的中国人。信鬼是崇拜祖先的基础，今天可能仍然存在这种迷信。但是姚也很佩服鲁迅，而鲁迅却抨击所有这些迷信。

吉米·权的漂亮的房子是我在华北见到的唯一一所没有院墙的房子，虽然在远处有外围墙。在敞开的半方形的院子里，房子上有很多向阳的窗子，两边的厢房之间是铺了地面的院子。

一边的厢房是埃德神圣不可侵犯的办公室，都用爪哇蜡染来装饰，这是一间舒适安静的书斋，他很喜欢。另一边厢房是我的书房，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有一间工作室——以前我只能在卧室里工作。戈壁在帕那萨斯山和舰队街之间来回跑^①，虽然它的大部分时间是呆在花园里，希望能看到什么让它高兴的事。我们第一次有了电话——装在靠近厨房和佣人房间的墙上。

啊！我多么喜欢黄色和阳光啊！每间屋的地板上都铺着发亮的金黄色草席，是按着屋子的大小编的，正合适。墙壁粉刷成黄色，衬托着绿玉色的柳木和竹器家具，非常适合做我们的乡间休养所。我用配有蜀葵花边的金黄色朝鲜布做窗帘，阳光透过窗帘照到金黄色的草席地面上，反射出极其柔和的色调。我的室内大盆景两侧长着桔子树和柠檬树。我在中国的所有住处都象温室一样，长满植物，摆满花卉，坐满谈天说地的客人。

我设计了一些在我们桌上用的黄色或桔黄色的荷花形亚麻补花盘碟垫布。我今天仍然后悔当时我没有坚持买下那些我所见过

^① 帕那萨斯山在希腊南部，据希腊神话，为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的圣地。此处比喻作者从事文艺创作的书房。舰队街为英国伦敦的一条街，报社较集中。此处比喻主要从事新闻工作的斯诺的办公室。

的最美丽的垫布：燕京的一位教师设计的垫布，上面用上“万”种颜色绣着一所英国花园。现在看来价格是太便宜了，但当时来看，是太奢侈了，想都不敢想。每当需要花钱的时候，我就惊恐万状——就象埃德在要他作为模范美国丈夫的样板时感到惊恐万状一样。也许是由于女性的爱好受到剥夺，使我这样喜爱手工艺品。如果当时我有钱花，后来大概不会产生那种念头，即组织中国工业合作社以挽救中国妇女的手艺。

我特别喜欢花园，不管是大花园还是小花园。不论搬到那里，我总要造一个花园，现在依然如此。我设计了自己的苔藓花园，用树根做桩子，用空心石头做岩洞，小小的铁线蕨实际上是银杏树的亲戚。银杏树是现在生存的最古老的树之一，在中国寺庙里被认为是神圣的树。

我和埃德的整个婚姻生活中，每天下午都在一起喝茶，吃蛋白杏仁饼干。这个时间我们往往“在家”接待客人，虽然我也常常在星期三举行我的雷卡米埃夫人式的聚会。埃德把他写的一切都大声念给我听，我们无休止地进行讨论。戈壁一会儿卧在我的膝上，一会儿又卧在他的膝上，以表示它的客观性。

戈壁也使我们在村子里受到欢迎，因为满族人和蒙古族人都喜欢这种狗，这是来自和他们同一大草原的土生土长的狗。人人都向我们微笑，同我们打招呼。我们的佣人喜欢戈壁，当我们照料另一只属于住在蒙古的拉森兄弟的俄国狼狗时，他们很高兴。这只狗名叫伍尔夫森，当时处于病后的恢复期，精神很紧张，心脏不好，我第一次碰它的时候，它咬了我的手。过了一些时候，戈壁驯服了它，但我不让它出院子，因为它心脏有病。

守门人和所有的邻居不愿我严格的命令，拿这两条狗打赌，让它们出去赛跑。它们朝着北京城的方向跑去，丢失了。经过寻找，这两条狗在整个乡间都出名了，沿途的人我们都问遍了。

我们的语言老师姓黄，是个瘦高个儿，面色憔悴，就象那两条灵狼狗似的。他爱狗——他也是蒙古人——在他上课的时候，

这两条狗蹲在他两旁。我们也喜欢黄老师，他是一个开朗、友好的人。他在这个地区的农民中很有威信，但我们猜不出他是属于什么秘密公社的。他会射箭，我们猜想他是义和团的一个成员，义和团在1900年试图杀死所有的外国人，当时他的家人负责指挥附近圆明园的卫队。圆明园被欧洲军队破坏了。燕京大学校园就是这座宫殿原址的一部分，包括校内美丽的湖泊，戈壁常在那儿游泳，使学生们惊骇，因为他们从前很少见过灵猴狗。

我们把戈壁用长皮带拴在自行车把手上，让它在车前直线向前跑，拖着骑车人快速向前行。当地人把这说成是象在手推车上装上风帆的发明。

戈壁得了热病，差点儿死去，全村人都很关切。但戈壁的情况是个例外。在1972年以前，每当我想到中国时，眼前总会出现一连串虐待动物的镜头。中国人有一种古老的图腾式的禁忌，反对把狗作为爱物——虽然不反对把狗作为食物。

我们常常沿着田野的小路骑车或散步，与农民交谈。或者骑车去圆明园遗址和颐和园。

黄老师的中文课很有趣。我们一起讨论农村的各种问题。他认为，农民们不会抵抗日本人；相反，他们正迁往满洲，在日本人统治下做事。农民和学生互不信任，彼此瞧不起，非河北省的学生被认为是外人，就象我们俩一样。

埃德学习写中国字，但我拒绝这样做。我对古代的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虽然感兴趣，但我反对旧字体的那套原则，我认为中文教学应当书写拉丁字——虽然西伯利亚的苏联人已开始实行拉丁化，但这还是刚刚听说的新概念。学习象形字就如同用图画教学一样：永远摆脱不了原有的含义。

除了我所需要的日常用语之外，我决定不再学习别的中文。我们可以每月用十来块美元或更少的钱雇到一个很好的全天工作的翻译，包括打字和做秘书的工作。我认为，如果我花时间学习中文，那我将永远不会了解中国。

第十六章 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我们搬到了海淀，正好赶上我注册参加燕京大学1934—1935年学年的学习。我选修了大部分用英语教学的课，外加一门用英语讲的课——这门课讲的是“黑格尔逻辑学”，由张东荪主讲，他是中国最有名的黑格尔派哲学家。他成了我们的朋友，后来支持我们的各种计划。

燕京还有五名外国学生。一名是德尔·博德，后来他成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汉学权威。另一位是密执安州的格丽特·布赖恩特，正在读研究中国问题的学位课程。在哈里·普赖斯指导下，我们就靠仅有的几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来学习，包括很少一点关于合作社的材料。R·H·托尼著的唯一的一本经典著作《中国的土地和劳工》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还学习了他写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我对托尼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为我了解西方文明打开了眼界。我还参加了卢修斯·皮特用英语教授的西方哲学简史，这是很受欢迎的课程。还有一门是由P·C·许教授的课程，主要是关于儒家学说和家族制度（许是一个基督教徒，他几乎与我和玛格丽特一样憎恨儒家学说）。

我自己还单独学了一门特别课程，是由美术系主任L·T·黄主讲的中国美学，主要讲解中国艺术的深奥哲理。

我们还骑车到附近的清华大学去听冯友兰讲授的《中国哲学史》，后来，博德翻译了他写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本书。即使在寒风呼啸的日子里，风雪与黄沙使我们睁不开眼，但我们还是骑五英里路的自行车，到北京城里去听苏体山讲授的佛教与道教的专题课，他是这类学科的最中国的学者。

这一年大量的研究和 Learning 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头脑，我知道自己在中国大地上的位置。埃德加·斯诺在晚年时说，他有“几分费边社员”的样子。我们阅读左翼书籍俱乐部出版的约翰·斯特雷奇和G·D·H·科尔的著作。我们利用燕京大学的图书馆。我们没有钱买书和杂志，只订了英国工党的伦敦《每日先驱报》，在1932—1941年期间，埃德是该报驻远东的记者。我们向海伦·伯顿借阅《星期六文学评论》和《纽约人》杂志。我们觉得与世隔绝，只是模糊地觉得正在出现一种向左摆的倾向，摆向马克思主义一边。我们的思想在我们头脑中自行发展，以基层群众的需要而不是以理论为基础。

有一天，我们在燕京听到一次情绪激昂的演讲，是一位刚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回来的教友会女信徒给一个关心时局的学生团体作的报告。在那样一个不大整洁的地方，不仅火车正点运行，而且青年运动十分鼓舞人心和美好。我和埃德深受震动。致使我们去图书馆借了两本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新书，这是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写的。这两本书实在使我们厌恶。我们对书中的一切都不喜欢，特别是毫无逻辑，违背理性——更不用说对左派分子处以酷刑的主张了。

我的经济学老师哈里·普赖斯根据他在耶鲁大学所进行的研究，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非理性对人类的思维有很大的影响。当我和埃德与哈里和他的夫人贝蒂在校园或附近的田野一起散步时，我常常同哈里辩论。我认为，人们可以用揭示因果、用推理和科学研究解释一切事物。我感到我和埃德都和历史站在一边，这就是说，我们与现实保持接触，而未受表象的欺骗。我们感到自己绝对正确，并始终坚持直到最后——这种信念在我的脚下是如此坚定，以致我现在仍然有这样的感觉，虽然我一生中已有多次地震动了脚下的大地。

在我们旅华岁月中，另外唯一的一个讲英语的而又始终正确的人是孙中山夫人。我们三人都是从经验中而不是从理论中学习

的。我们的思想就是每天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同时，我们还有广阔视野。我们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我和埃德思想开放，能够暂缓下结论，直到最后再做抉择。我们可以自由地思考问题；而别人却要迎合雇主才能维持生计。

孙夫人是积极反对蒋介石反革命行为的代表。我在上海与她交谈过，我们离开上海去东京结婚时，她曾设宴欢送我们。宴会上我们遇到了杨铨（即杨杏佛），他不是共产党人，是我遇到的中国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他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非常西方化，他是孙夫人于1932年成立的“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之一，该“同盟”努力为孙夫人所说的中国的“50,000名政治犯”争取公正的审判。为了恐吓“同盟”——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法西斯蓝衣社分子在研究院台阶上刺杀了杨先生。刺杀发生在1933年初，大约在我们见过他三个月之后。“同盟”的另一个成员林语堂已受到威胁，随后，“同盟”解散了。

这是对中国知识界上层人士的一个打击，研究院的学者们再也无人敢站出来争取即使是最初步的西方式的权利。胡适博士曾是该同盟的成员，他害怕得很厉害，以致后来在1935年拒绝支持北京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他在一次教职工会议上说，“‘一二·九’运动是由埃德加·斯诺夫人发动的，经费不是来自莫斯科，就是来自罗斯福总统。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支持一种外来的思想”。在有关西方培养的中国人的历史上，这次事件可能是最低点——胡适博士甚至攻击政治上支持他的人——燕京大学的西方化了的学生。

当这些美式的学者拒绝支持“一二·九”运动，以及在此之前，基督教徒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全国一致地表明立场，反对新的法西斯主义自从1932年以来一直对西方化的民主知识分子的杀害和镇压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中国”。同年，六位青年作家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活埋，就埋在他们自己被迫挖的坟坑内。最使我吃惊的是，被蒋介石法西斯政权逮捕和杀害的都是知识分子中的优

秀人物。在被称之为“白色恐怖”下面受害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共产党人。

要想发现任何关于中国的“地下”或法西斯组织的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认为它是一种秘密会社。1937年我在延安时，刘鼎给我讲了一点历史。他说，法西斯运动始于1932年，是上海战争的结果，当时，蒋介石无路可走。这一运动由国民党黄埔军校的一些士官生发起，他们曾在莫斯科学习过。他们被国民党派到俄国去，但右翼不信任他们，所以他们在1929年左右逃到日本去了。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后，这些军校的士官生给蒋介石本人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结为他的势力。他们被请到南京。其中有一些人曾在莫斯科以间谍罪名被捕，指控他们与托洛茨基有牵连，他们把苏联称作“红色帝国主义”。这些人组成了复兴社。

刘说，第二个由原莫斯科留学生组成的法西斯组织“都是前共产党员”，他们是1930年前后回国的，“翻译了很多法西斯主义书籍——还有关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书”。他们使用了法西斯主义者这个词。他们说希特勒是英雄，他复兴了德国，蒋介石可以成为中国的希特勒。

第三个法西斯组织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CC派，这是一支秘密政治警察，不仅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

1932年初，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一所政治训练学校。校内有上千名学生，所有的教师都是法西斯分子。蒋还在1932年建立了一个法西斯主义的调查局，由戴笠负责，他是蒋介石的亲信，他的名字在中国是最令人畏惧的（他一直与美国人合作，直到1949年不得不逃走^①）。蒋介石还从德国请人来帮助他从事政治训练工作。

刘鼎解释说，“第二个和第一个组织叫蓝衣社，第三个叫做

^① 原文如此。

CC。”他继续说：“从主观上讲，法西斯想把所有的外国势力——全部帝国主义——以及苏联的红色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他们用的口号是，为了“国家社会主义”，但是，他说，他们“不反对资本主义”。“法西斯不反对封建主义”；他们却欢迎来源于旧中国封建哲学的新生活运动的口号。

当然，在1934和1935年，对于这一切我们都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中国人试图建立一种不合逻辑的组织，我把它叫做次法西斯主义。我现在认为，法西斯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违背逻辑，说谎话，自相矛盾。

1934和1935年，蒋介石政府模仿墨索里尼的新生活运动，开始复活儒家学说，提出了它的新生活运动的四项原则。对此，我感到很震惊，因此起而采取行动。这种新生运动是很难理解的，但我后来提出了一个概念，把这叫做“次法西斯主义”，后来在欧洲称为卖国主义。蒋最终并不是一个卖国主义者，虽然他拒绝抵抗日本，苟安于内地以保存他的财力和物力。但从“帝国主义”和多国公司的角度看，所有这些傀儡都是卖国主义分子。他们是国际外国资本的仆人，被利用来破坏他们本国人民迫切需要进行的革命。

第十七章 北戴河：黄海边的传教士^①

到1935年底，我们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即中国的与世界的最复杂问题交织在一起，一切都动荡不安。35,000万中国人民孤立无援，而蒋介石却讨好法西斯，只想挽救自己那小小的政权。西方的大多数人还在沉睡，而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日本人却力图改变现状。“国联”已名存实亡。我和埃德不希望美国介入亚洲或干涉中国，而这也仍然是国务院的政策。然而，只有美国人可以采取行动——别人都被帝国或其它问题牵制住了。

我和埃德对谁都没有信心，在理论和行动上也没有指南。相反，我们感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定将出现，至少在亚洲将是这样。

在燕京大学一切如常，大家都相信中国将在几百年之后把日本人同化掉，因此，何必操心呢？外国教师实际上期待他们将能留下来在日本人统治下做事，学生们也是这样。前共产党员作家杨滨告诉我，燕京在各方面都没有希望，“基督教徒”控制了学生组织，她不喜欢基督教徒，认为他们都是反动的。那一年，埃德任教的新闻系学生们除了谋生之外，别的什么也不想。

哈里和贝蒂·普赖斯邀我去北戴河避暑，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他们在北戴河租了一栋很大的农舍（1936年我也和他们一起住在那儿），大约有一年时间，我一直生活在遍布中国的最成功的基督教传教士和信徒当中。但中国缺少蓬勃的生机。整个进展看来是人为的，都在上层。在北戴河度过了两个酷暑，我接触到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基督教传教士”。（南方的不包括在内，他

^① 原文如此。

们在长江附近的牯岭避暑。)这种集会就象野营布道会，使下半年的生活令人尚可忍受。

湖北省发生了一起可怕的谋杀事件，一对姓斯塔姆的年轻美国传教士夫妇被中国人砍了头。“共产党人”(具体说是朱德领导的军队)被谴责为谋杀者，特别是国民党人这样指责，他们看到了这一事件对右派具有宣传价值。这件事使传教士结成了一个“恐共”的整体。即使共产党人根本没有牵连进去，传教士们也急于相信是他们干的。

1935年，北戴河流传着一本名叫《赤祸》的小册子，这是一个传教士写的。我认为它只是一篇狂热情绪的文章。我还认为，对传教士来说，采取这种强烈的反共立场是危险的。甚至一些右翼中国人都不喜欢这种态度；他们称之为帝国主义，就象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

关于斯塔姆被杀事件的喧闹，被利用来为中国的教会团体、也为蒋介石政权筹集资金。谋杀事件竟有如此大的影响，以致人们可能认为，国民党出钱让人进行了这次谋杀，以便动员外国舆论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

在1935—1936年期间，我简直不能理解传教士们为什么要利用这一孤立事件来大作文章，虽然这件事令人悲痛，但他们这样做会危及他们在中国的前途。他们当然比我更了解中国农村：这是惊天动地的事件；他们意识到他们在中国的基础是多么不牢固。如果斯塔姆是被农村老百姓自发地杀害的，这个事件就更显得意味深长——传教士们极度恐慌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希望把它归咎于共产党。

人们应当记得，近在1900年，慈禧太后曾下令杀死所有在华的外国人和基督教徒，有数百人因此丧命。参与这次屠杀的大多数人在1935年仍然在世。大约有2,000名中国基督教徒和30,000名中国天主教徒、221名西方基督教徒一起被杀。我遇到的不少传教士，在义和团时期曾在中国，他们之中有些人是在中国出生

的。

我决心设法弄清斯塔姆被杀的真象。两年以后在延安，那里几乎无人听说过此事，他们对我说，朱德的部队从未到过那个地区。他离那里还有几百英里，人们却把罪责强加于他。他们坚信这种事不是共产党干的；对他们来说，这种作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他们一般来说也不许砍头，当然更不许砍外国人的头。后来我在马尼拉遇见了中国的领事杨广森，他曾去湖北调查斯塔姆事件，但对谁是肇事者，他也找不到一点证据。

在三十年代，我对谎言有着清教徒式的厌恶。我过分天真，认识不到大谎言、小谎言和影射都是战争武库中的标准武器，特别是在内战中，其中大部分被天真轻信的人重复传播。我还认为真理总是站在正确的一边，这也是最好的政策。否则，信赖就受到破坏，而与此同时，政治和个人的士气都遭到破坏。

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是1807年到中国的，名叫罗伯特·莫里森，最后一位，塔里撒·格洛克小姐，现在仍在上海，从技术上讲她的身分不是传教士，而是原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1935年，中国有107个耶稣教派的5,875个传教士和512,873个接受圣餐的信徒。其中37%是单身妇女——妇女解放是耶稣教教会传教工作的一部分。1936年，天主教声称拥有2,934,175名信徒和12,499名修女、神甫、教师和非神职工作人员。

我清楚地认识到，与亚洲所有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是一个革命的进步的宗教——这是泰亚尔的坚定观点。我从来也没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我在燕京学习了一年，才找到证实这一点的材料。人人都清楚，中国存在着真空，天主教和耶稣教都有可以填补这个真空的原料；可是他们都没有起到这个作用，为什么呢？为什么中国人好象对基督教道德观怀有敌意，甚至在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时还如此呢？

我从未对宗教进行过多少研究，但我对所有的学科都没有偏见。虽然我对宗教改革、清教徒和克伦威尔等等有所知晓，但我只

是模糊地知道宗教作为变革动力的历史。在中国这些可怕的岁月里，我必须认真研究我自己的西方文明——研究它不仅对我自己，而且对中国有什么价值。我始终赞成西方文明，但我知道它还谈不上已经深入到“竹幕”后面去，至少就好的意义来说还没有。

很显然，中国在一个世纪来所需要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传教士。在中国，真正的本国基督教本来势必要比当今已发展了的清教徒的社会主义激进得多。在中国和其它类似的国家，人口过多使基督教本身固有的个人主义成为不可能；西方那种个人的非凡的发展是一种奢侈，中国是无力培养的。群居社会在中国容易被接受。个人主义在那里从来不存在；按照遵循祖先的规矩，保持严格亲属结构的儒家原则，个人主义是被禁止的。

我们所认识的中国人中，最具有个人主义思想的是休伯特·S·梁，^①是基督教青年会教育的产物。但是在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同时，他也认识到，中国需要的是一种与社会主义有关的全新的思想。

换言之，传教士并没有把最高类型的宗教或西方文明带到中国，其原因在于他们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了解基督教的革命性含义。到1911年时，他们已与中国社会古老的祸害和弊病妥协，并适应了这一切，而不象十九世纪的传教士那样，面对实际存在的危险而奋力与之斗争。大约1911年以前，基督教实际上一直在吸收中国的穷人和劳动人民做信徒，并与上层阶级作斗争。

至于天主教，初期的信徒时代的基督教是反对旧的部落和氏族社会的狂热革命者，它年复一年地开化欧洲的野蛮部族，带来了新型的一夫一妻家庭和新的反部族的反对复仇的道德规范。罗马天主教的教义是封建主义思想，毁灭先前的部落氏族体制、各种对祖先的崇拜、图腾制度等等——包括作为生产方式的奴隶制——并用农奴代替了奴隶。

^① 休伯特·S·梁：梁士纯，现为南京大学教授。

当然，这正是中国从秦始皇以来所一直需要的，在他当政时期，正是耶稣基督在中东传教的时期。当天主教在反对旧的封建主义的崇拜祖先和氏族部落制方面如此有效的时候，为什么它的传教士却失败了呢？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与上述封建主义的一套妥协了，另一方面也因为处在典型的福音时期的纯粹的天主教从未传入中国。到中国来的是以耶稣会会士和其它教团组成的反宗教改革派，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要摧毁新教徒所进行的“革命”，而不是在亚洲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基督教的博爱和同情在中国作为个人的品德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但它们不符合历史的需要。

我必须认真思考什么是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实质。人们吃惊地发现，传教士们不再反对儒家的学说，也不鼓励抵抗信奉异教的日本人。他们甚至把蒋介石说成是一个基督徒，这种看法必定会破坏他们在年轻的中国人中尚存的威望。

我不想成为一个基督教的或其它的殉道者，但是我感到不满的是，所谓的基督教徒没有在中国树立起应该树立的榜样，在需要它的时候，它不但没有起到任何领导作用，而且从历史意义来说，它实际上变成了非基督教徒。必须有人采取行动。

我是历史的牺牲品。我的牺牲是历史向我榨取的，就象从新鲜葡萄制出酒来一样。历史所榨取的是我由于天性和后天发展而产生的剩余精神力量。这种葡萄酒被发给中国人，去陶醉他们，使他们有意志和决心去采取行动。我的智力仍在发展，但历史把我的研究引向狭窄的道路，与我的本性完全相反。企图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的我，正被降低为一个葡萄园的工人——一个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探索者。

在北京，我开始模糊地认识到，除了孙中山夫人和泰亚尔·德夏尔丹外，“精神上的”卓越几乎同所有的“基督教徒”无缘，这个领域正在被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或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接管。传教士所经历的精神成长过程，在我看来是一种轻松的过

程，它不需要什么勇气，因为他们坚信上帝在照管他们，他们只要按上帝的意旨去做就够了。即使泰亚尔也相信这一点。但是，真正的勇气是一种自觉的意志，没有“上帝”在保护某人的想法。

所有宗教的实质在于愿意为信仰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是求生存。这就意味着为他人、为社会、为将来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是对“精神”素质的检验。中国的共产党人必须高度具备这种素质，今天，他们正在进行教育，努力在群众中推广。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教导，认为不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就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82年，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原则，引用了毛泽东那段话。

单纯个人的精神发展是不够的。它必须是生产性的，是符合历史的要求的，它不能与未来相对立。在所有的人当中，我是头号的个人主义者，相信最大限度的个人发展，特别是妇女的发展，她们往往还没有表现出这种能力。而到1935年底，与我的愿望相反，我却社会化了。我的个人主义被打破，为中国的广大民众而做出牺牲。实际上我失去了自我保存的意识。

从我抵达中国的第一分钟起，我一直是忙忙碌碌的。我全部关于流芳百世和取得成就的观念都集中在决心写出一本有价值的书上，可是我在中国卷进太深了，以致无法搞创作。

这是女性特有的难题，所以我们在各个领域中所创作出的杰出作品极少。在整个过程中，别人的急需使得我们的精力非常分散。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由于历史的偶然性，要不是我，我着手干的事就没有一件是可以干成功的——因为我是当时当地唯一在场的人。因此，历史的使命要大于我个人的愿望、我自己的自尊和我自己的幸福。我变成了一个非自愿的在中国的“基督教徒”，因为没有别人承担牺牲的角色。

而在此刻，我仍然相信艺术本身是不朽的。我相信纪念碑，它们是重大成就的遗产；我相信人类的冒险、探索和修建各种巴

台农神庙^①的活动。我最相信和最喜爱的是美国的试验——美国人。我一直是这样。在创造神灵方面，我们并不出色。但是自1607年以来，我们培育了成千上万的个人，他们为前所未有的最高的生活水平而辛勤工作。与此同时，我们还培育了高度的精神价值，这是从最大限度的慷慨、仁慈、友谊、心境愉快和以事实为依据判断事物的真正民主的天性等意义上说的。我绝不会为了所有的巴台农神庙，所有的贝多芬交响曲，所有的英国文学，所有的法国佳肴，所有的印度泰姬陵，所有的俄国和中国革命，而抛弃真正的美国人民，哪怕把这些统统加在一起，我也不会这样做。

这种新型的美国人，为人类的奋斗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在革命中由它的参加者写成的宪法和人权法案。我们的祖先为确立美国的试验和原则至少进行了三次英勇卓绝的战争。这些战争是：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之间的内战，这次战争推翻了“封建主义”；1776年的革命；以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南北战争。中国必须同时进行这三次战争，还得与现代帝国主义作战。他们没有祖传的民主变革和民主权利的武器可供使用。只有战争可以大大加速变革。

^① 希腊女神雅典娜的神殿，约建成于公元前438年。神殿建筑风格典雅，被视为人类建筑史上最高成就之一。

第十八章 狐塔旁的鬼宅

1935年，当我在海滨消夏时，埃德到满洲去采访，报道日本征服者的所作所为。他写的《远东战线》一书对他们多所抨击，我们还未达到神经紧张的程度，但我们确实知道，日本正弯弓待发，准备随时占领华北。只有一件事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日本人不想惊动孤立主义者的美国人，他们打算通过中国的傀儡进行统治。

在日本的黑名单上名列首位的，就是J·B·鲍威尔和埃德加·斯诺。搬进北京城里去住，看起来是个好主意，特别是由于埃德已对悠闲自得的乡村生活感到厌烦，迫不及待地要重操新闻旧业。

1935年秋天，我们找到了另外一处理想的住所——一所成群的狐仙与迷途绝望的学生和满洲难民出没的宅院。由于盔甲厂13号闹鬼，半边住宅的月租不过十美元。我们和先住进去的房客埃利克·特·尼斯特龙^①博士合用一班佣人。尼斯特龙博士拥护君主制，是一位瑞典的地质学家。他每晚都去北京俱乐部消磨时间。他漂亮的妻子拒绝来华。他一年中有半年去瑞典与妻子住在一起。他在山西太原府建立了自己的“新常富科学研究院”。在欧洲，他与《哥德年鉴》的编者往来，这些人亲笔签名的像片挂满了起居室的四壁。

在这种吉卜林式的环境中，我们度过了西方使馆留驻北京的最后一段岁月。这所半西式的房子尽管只有一层，原来却是打算作为一座豪华的英国式住宅的。房子两厢的前边，有一个长方形

^① 瑞典人，汉名新常富。

的玻璃暖房，里边满是花草。我们单独的洗澡间富丽堂皇，装有大理石的设备和现代化的上下水管道。宽敞的房间里有壁炉和暖气。高墙围起的院落有一英亩大小，一端有马厩，还有一个网球场和一个镶有玻璃的廊子，廊子是用来举行那种头戴意大利来亨草帽、身着黑天鹅绒披肩的正式花园招待会的。靠近门房是盆花栽培室；我把它布置成埃德的工作室，他常常一个人在那里高兴地大呼大叫。

星期六晚上，尼斯特龙总要带上一个或另一个使团里的一批人去北京饭店出席晚会。他会恳求我：“穿你那件带长拖裙的苹果绿礼服。”当我身披长长的红天鹅绒歌剧斗篷进入饭店时，他就会要求乐队演奏维也纳华尔兹舞曲。这斗篷是海伦·伯顿送给我这个当地时装模特儿的礼物之一。

盔甲厂13号位于古城的拐角，那里矗立着狐塔。这地方杳无人迹，冷落、寂静，只有蝙蝠、燕子和狐仙出没。再往远处就是耶稣会的观象台，我们与泰亚尔一块儿在那儿散步。尼斯特龙在那里有一个私人的5洞高尔夫球场，场上有短距离的洞穴交叉。在高大院墙的一边是义和团墓地，里边埋葬着庚子年的外国死难者。中国人相信，每一座坟里的鬼魂都仍在那里出没。

离哈德门大街约有一英里远的城墙根下，是一片缓缓倾斜的空地，林木扶疏，适于散步，那里所有的院子都是封死的——没有一家的大门开向林荫路这面——高墙顶端栽满了尖尖的玻璃片。这个地方鬼气森森，凶险逼人，中国人不愿意到那里去。但我们用长皮带牵着戈壁在那儿骑自行车。那里虽然满地灰土，但清爽幽静。

我到底见过13号住宅作祟的狐仙没有呢？没错，见过。当埃德与尼斯特龙都不在家的時候，我见过一次。狐仙与狼仙类似，只是在中国的这类传说中，狐仙经常是生前受虐待的妇女，死后出来报仇。看见她就得死。当夜幕降临后，狐塔里狐仙成群。塔下的土地浸透了罪犯与无辜者的鲜血。此地曾是刑场，成吉思汗

的城墙依然箭痕累累。

狐仙只光顾二层以上的房子，这是中国人不愿住两层楼房的一个原因。我们的一层平房的瓦顶几乎是平的，瓦顶与天花板之间不过一英尺上下的空间，周围用水泥小心地封严实了，所以外边的动物无法进去。

一天傍晚，我独自一人在我们宽敞的起居室里看一本借来的《星期六文学评论》。忽然，我清楚地听到天花板上传来象是缓慢的、有节奏的脚步声，声音来自上边，但不是在瓦顶上。戈壁颈毛直竖，发出惊恐的低吠声。我几乎惊呆到无法去按电铃叫我的管家。

“有东西在头顶上的天花板里走动。”我低声说，手指着上边。

“是狐仙，”韩说。“以前就听到过。”

韩与当苦力的陈都带着他们的大刀和草垫子，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过夜。临睡前，他们在院子里巡视一番，并让其它几个男人带着大刀站岗。我走回卧室，竭力想入睡。

过了不一会儿，两个佣人都听到了相同的响声。我们开会商议。我要找一个梯子，从大厅里通电线的小活动天窗往里看看。但他们拒绝去看，也不让我也去看。

他们解释说：“不，太太——看了就会死；不看就不会死。”

等到早晨，我坚持找了梯子和手电筒，从活动天窗探进头去调查一番。此时街坊四邻都知道了狐仙的事情。不到十分钟，就在房间里聚集了大约20个人，男人们都带着大刀。

椽子上盖满了厚厚的一层黄色尘土，看不出有扰动的明显痕迹。我开始往下爬，我的观众们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

且慢！那块宽木板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横跨在几根椽子上的那一块。我又重新爬了上去，再次研究地形，下边又恢复了鸦雀无声的局面。

木板弯翘了，一边向上翘起，这样变圆了的底部就能象摇篮那样晃动。对，只要老鼠沿着合适的角度在翘起的一边跑过，使木板晃动，一头撞击木椽，就会发出脚步似的清晰空洞的声音。我用不着成为阿基米德，就能理解老鼠在杠杆支点起作用的原理。你可以用这个办法移动地球。

我把活动天窗又关上，看着下边提心吊胆的观众。我不想破坏一个优美的传说，或使租金增加，或鼓励怕狐仙的强盗。（我甚至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埃德，我知道他不会对此守口如瓶的。）

“没有狐仙，”我告诉他们，“这是闹狐仙的天气吗？”

“是的，”人们告诉我“刚下完大雨，这一阵儿又热又干，这正是听见狐仙的时候。”

北京的温度和湿度变化很大。地板缝缩了达一英寸之多。松软的木板在变干和开裂时，能卷翘起来并吱吱嘎嘎地作响。钉子能发出令人心烦的吱吱声并从翘曲的木板上拱出来。当木板在炎热中干缩时，门能自己打开。

在这样一个由潮湿变干燥的夜晚，由于木板收缩，整个狐塔都会吱吱嘎嘎作响。

那么是谁把那块宽木板安放得恰到好处，来制造狐仙的脚步声呢？这一定是想保持房租低廉或使强盗认为这所房子闹鬼的人。

1972年，我再次在13号院子附近的狭窄、尘土遍地的胡同里漫步，在朦胧的暮色中拍摄狐塔和观象台的照片。狐塔附近的城墙正在被拆掉，但至今仍无人敢面对面地对付狐仙。

这所宅院是一座封建君主主义者的城堡，是清王朝的遗物，这个王朝在辛亥革命期间被轰出了紫禁城^①。管家老韩与皇族有亲缘关系，他的模样和举止宛若一个国王。厨师和他的徒弟也同属皇族。苦力老秦是一个瘦高个儿的蒙古人。我们对他爱若家人，他

^① 此处有误。清廷迁出故宫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

也非常喜欢戈壁。至迟在24年前，他还可能是八旗勇士。当他身佩大刀在宽敞的大院巡逻时，看上去就是那种角色。看门人小关是唯一的年轻佣人，他和家人一起住在门房里。共有十五个人住在佣人房里。

考虑到我们在北京的全部越轨行为，我们有上面所谈到的佣人是非常幸运的。满人和蒙古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原因都非常谨慎。他们对北京警方或法西斯分子并无效忠的义务。日本人在争取他们，并在满洲再一次把溥仪扶上皇帝的宝座。但外国人的佣人们充分懂得他们不能去管他人的闲事，否则就要丢掉差事。我们的佣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把我们朋友中的一些革命学生交给警方，就能捞到一大笔钱。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干过。

另外一个安全因素是，尼斯特龙的政见可能比匈奴王阿提拉^①还要右，但我们从来不谈论这样的事情。他是斯文·黑丁的朋友。斯文·黑丁是欧洲有名的亲法西斯分子之一，我们同他也有一面之缘。

13号院里的礼仪实际上是满清皇族的那一套。当尼斯特龙博士在夜间11点或其它任何时候归来时，佣人必须在大门两边列队恭候他的圣驾，头碰地行磕头礼——只有管家例外，他只鞠躬。在干涉北京的佣人制度方面，我有过教训，但我还是忍受不了这个。当看门人和他的妻子在门口给我磕头时，我用中文命令他们不许再这样做。“不是美国规矩，”我郑重地说。“这不是美国的习惯。”（他们一点英文也不懂。）

尽管我已尽我所能，但每当我们穿上礼服去参加社交活动和归来时，大多数佣人还是列队迎送我们，一个个满脸堆笑。他们多么希望我的形象——举止如同一位女王啊——他们把我们当自己人了。在大厨房里——大得可以用来准备外交使团式的宴会，厨师

● 阿提拉（406—453），曾率兵占领拜占庭和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远至法国和意大利，被称为“上帝的祸害”。

和他的伙计经常不断地招待他们的朋友。他们经常议论的话题之一是，他们的“太太”是不是舞会上最漂亮的美人。在这种舞会上，我实际上经常是最漂亮的美人，与尼斯特龙博士等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跳维也纳华尔兹舞；非法西斯分子从来不善于跳舞。

让我放弃在北京饭店跳维也纳华尔兹舞的机会可着实不易。那里舞跳得最好的两个人也是北京最吸引人的男子：一个是头号意大利法西斯分子，齐亚诺伯爵的一个朋友，另外一个是新近从德国来到北京的年轻的纳粹贵族。当维也纳华尔兹舞曲一奏响，一座不问政治的桥梁便架起来了，我们保持沉默休战，直至乐曲停止。他们两人都竭力想在各方面成为尼采式的超人。但他们对埃德和我的尊敬超过了他们对在北京的任何其他人。同时，他们俩还非常亲英和亲美。这一点正如齐亚诺本人（这使他的结局很悲惨：为此，他最终被法西斯分子处决了）。在我与这两个年轻的法西斯和纳粹之间存在那么多的对立的辩证的能量强化现象，以至电火花四处飞舞。这里有同情怜惜之心，也有荡气回肠的大悲剧和神伤心碎的浪漫传奇，对立面互相吸引，是环境使然而非自择的敌人。

夏天在北戴河，头号法西斯分子简直无所不在，但我自1933年以来就回避他——除了在蓝色的多瑙河上架起的华尔兹之桥。从北戴河回北京的路上，他设法上了同一列火车，一路上我们舌剑唇枪一场。他是我曾经试图交谈过的第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抛开他的政见不谈，他机智诙谐，颇具魅力，他也尽力施展自己的吸引力。除埃德外，看来他是我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个真正有幽默感的人。我也有幽默感和才智——但随着岁月流逝，我逐渐对幽默无动于衷，才智也消磨殆尽了。哦，我多么思念家乡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他们令人开心，尽管天各一方，他们依然爱我。

要摆脱我的法西斯分子也非易事，他不顾我的反对，把我送到

13号院布满大铜钉的两扇门前。但是当佣人在门两侧列队欢迎我时，他被吓住了。他一边退回出租车里一边说：“我不喜欢法西斯妇女。我决不娶这样的人。我喜欢反法西斯的妇女。法西斯主义只是男人们的事。”

从北戴河归来那一路上舌剑唇枪的火车旅行，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感到年轻、才智横溢、令人神往和称心开怀，正如这个受过牛津教育的年轻意大利人说的那样，是“非常，非常的美国风度。”几周之后，我不得不迅速成长。我向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宣战，我丈夫也是如此。我们奋然不顾一切当地的“盖世太保”或中国的蓝衣社。

北京城墙的狐塔拐角掌握着我们在华岁月的特殊奥秘。在这里，两个单枪匹马的外国人成为一个二人和民间级别的二人外交使团，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与日本人和所有法西斯国家及他们在当地的门徒进行斗争。在这里开出了“一二·九”运动之花。1936—1937年，此时正值日本占领华北，《西行漫记》在这里脱稿。从这所房子里，缔造了全新的中美谅解。许多年后，当埃德从毛泽东那里得到让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的许可时，这种谅解将达到其外交上的顶峰。埃德于1972年在瑞士逝世后不几天，尼克松访问北京成功，这是我们两国关系的历史性的新开端。

第十九章 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5年底，中国死气沉沉到了极点，这是一个虽生犹死的时刻。我感到窒息，仿佛空气已腐朽，充满了一氧化碳和腐烂植物散发出的沼气。埃德与我相濡以沫，但对于其他人们，至少是对华北那些正在死亡的人来说，我们感到与他们犹如异类。我们感到彻底的孤独。

北京已经死亡，这不是新闻。除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已经死了1,000年了。我并不想让北京成为战场并被荡平。但我同样不愿意，当日本人占领北京时，这座城市却“令人震惊地缄默无声……心灰意冷，肢体冰凉……没有无边无际的壁垒高筑的城市——城市铁门又沉又厚，塔楼上雉堞相连……至少要有被忘却的雄鬼在夜风中发出呜咽悲鸣”。

这就是我写的一首名为《古老的北京》的长诗的基调。《亚细亚》杂志发表了这首诗，随后被收入选集。（象许多有希望的文学青年一样，我以写诗开始了我的文学生涯。）1935年12月的一期《亚细亚》杂志，主要是刊登我的作品——那首诗和一篇与王纯珠合写的关于绘画的长文，文章题目是《中国四君子》。燕京和北大的校刊都刊载了这首诗的译文，最重要的女诗人冰心也翻译过这首诗。它如此准确地表达了中国青年当时的感受，它在历史的那个瞬间是如此恰逢其时，所以它可以在任何语言里自由交流。埃德认为这是我伟大文学天赋的证明，并曾在我不在场

• 艾伦·F·佩特，《期刊的文选集与美国诗歌年鉴》，1935年（纽约，诗摘协会，1936年）。

时把这首诗念给赴宴的客人听。

就在这窒息和麻痹到达极点时，燕京的学生们向中国正在死亡的组织注射进了肾上腺素。中国所有其它学校都在法西斯的全面镇压之下，可能附近的清华是个例外，那也是一所美国支持的大学。

自1935年1月起，我开始写反法西斯的文章，尽管我几乎不知法西斯主义为何物。我以在华北（我猜想也是在全中国）散发我所能找到的反法西斯材料的主要的一个人自居。这些材料我都要反复打印。我把一皮包又一皮包材料分发给大学生们。

我正在为中国的学生运动史收集资料。当时，中国学生比其他地区的学生更为重要——因为他们代表了国家的精华。对我来说，学生能危害国家是一个新观念。

在1931—1932年学生运动期间，我正在上海。从一开始我就支持中国的妇女与青年。“他们阻断了几个小时的铁路干线交通……他们要求蒋介石将军亲自北上，率领中国军队抗日……如果政府——不是学生团体——要宣称统治中国，采取激烈的行动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这是英国保守党主要党员H·G·W·伍海德写的。他说，大约有50,000学生征用了一整列又一整列的火车前往南京。

《中国报》于1931年8月27日报道，10,000名学生在“与蒋的消极的对抗中获胜。”他们一直等了28小时，要求蒋露面，最终他出来了。从那个时刻起，蒋便对学生进行血腥的镇压，学生们对他恨之入骨。他可能认为这些学生都是共产党分子——他把所有仇恨他和他的政权的人都包括进了这一术语的定义之内。

1932年，学生们相信，只要蒋介石愿意，他就能与日本作战。但是到了1935年，无人知晓局势将会如何。1931—1932年学生运动的一些领导人被捕——他们的尸体被埋进了南京雨花台的坟坑。

我在文章中写道：“1934年，仅在华北一地就有大约300多

名学生、教授和知识分子被捕，数不清的人被处决了。蒋开始按照法西斯路线制定了明确的政治理论……他的盟弟、当今中国第二号法西斯分子张学良，新近与墨索里尼会谈后回国，满载着儒家—法西斯复兴的计划……蒋在南昌机场用意大利飞行员代替了美国人，并且邀请了一批（大约200名）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当顾问。”

埃德憎恨宣传——就我所知，他一生中没有任何这类东西——但他允许我进行宣传，尽管这从好几个方面来说对我们两人都会有危险。他所教育的新闻专业的学生也憎恨宣传。我天然是个活动分子，从小学到犹他大学我一直是学生领袖，就如同埃德天然是一位真正的新闻工作者一样，他始终在他的学科上处于领先地位。除了在关键时刻给予我支持外，他始终专心于自己的事业。

北京的10月通常是可爱的，阳光明媚，金黄的柿子正当时令。我坐在放在凸肚窗前的书桌后面，由于在北戴河游泳，皮肤晒得黑黑的，身体健康，但由于城里的气氛压抑而感到窒息、沉闷。就在这时，戈壁叫起来了。

“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一个学生，”管家通报说，“他叫张兆麟。”

戈壁迎进来一个身材高大的英俊的青年，他是学生团体的新的主席，是从沈阳来的难民。以前他未曾来过，但去年可能听过埃德的新闻课。

“我想请斯诺先生谈谈他对东北的印象，”他解释说。

我写了个便条，交给管家，请斯诺到起居室来。在夏季的一段时间里，埃德曾到满洲和大连呆了一段时间，但对张要了解的事——有消息说，义勇军隐藏在谷子地里与日本人作战——他几乎一无所知。

张兆麟深信，蒋介石决不会为华北或中国任何其它地方而

战，他只会重施背叛东北各省时候的故伎。“我们一点儿也不能相信中国报纸上说的事情。”张兆麟说，“只有外国人了解各地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当他说他觉得，镇压抗日活动已经是很恶劣的了，再压制这些自发的抗日活动的消息就更恶劣了。这时，他看起来不仅失望、消沉，而且简直要不顾一切了。

这是埃德所津津乐道的主题：新闻自由。我们两人都立刻对这个学生产生了好感。他坦率、诚挚、温和、可爱，但又愤世嫉俗，对任何事情思想上都有所准备，甚至有些神经质。我想，这个小伙子有能力，他能够采取行动。很明显，他不仅在智力方面而且在体魄方面也具有领导的素质，这确是难得的。

张对自己、对中国的新闻事业、甚至对中国这个国家都感到前途渺茫。他不知道应该走什么道路或怎么办。但他立刻认定，象我们喜欢他一样，他也喜欢我们。

“如果中国有什么希望的话，你就是希望。”——我当时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出来了。

那天下午，我们象三个盲童在黑暗中探索一座在深渊中并不存在的桥。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张临走前，在窗户前站立了片刻，痛苦而羞怯，竭力掩饰着自己的泪水。

我收拾了一大卷我的“反法西斯”材料给他带回去。张后来告诉我们，他属于一个秘密的抗日团体。但我从未想过，这个团体可能是“法西斯”的。此后不久，张兆麟向我吐露，这个团体就是由少帅张学良模仿墨索里尼建立起来的“青年团”，不过，它正被左派所分裂。

少帅最近刚从欧洲旅行归来，他此行是为自己也为蒋介石考察法西斯主义。少帅是墨索里尼的朋友，而且还是墨索里尼女儿艾达和她的丈夫——意大利驻华公使加勒阿佐·齐亚诺伯爵最喜欢的人。少帅这个中国第二号法西斯分子，同时还是蒋介石夫人最喜欢的人，少帅也敬慕蒋夫人。最终使他转变到反法西斯事业

方面来的主要是他的学生。张兆麟初次来看望我们的那个下午就是法西斯主义在华北完结的开始。从那时起，我觉得我们可能赢得反轴心国的北京之战——尽管纳粹——法西斯分子已使南京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

（如同其他领导人那样，张兆麟大约在1936年2月参加了共产党。1983年，他在吉林大学外语系任教，并正为共产党党史部门撰写一部“西安事变”的历史。他不时地给我写信，但我自从1936年以后就一直未与他见过面。）

燕京的学生自治会现在开始造访13号住宅了。我对他们都爱若亲人。我感到就如同我被淹没在绝望深渊里行将溺毙而现在又被救上来一样。

龚普生是副主席，后来成为张兆麟的未婚妻，但最终与章汉夫结了婚，章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她身材修长，雍容安详，甚至在当时就很自信。（直至1966年，她和她妹妹龚澎——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是外交部两位主要的妇女，与周恩来总理密切合作。1972年，就是龚普生和黄华为我安排了国家要人式的访华旅行。当时，我与当年在北京的几个学生举行了“一二·九”联欢会。龚普生人品高尚，如同她已故的妹妹一样，结合了东西方最优秀的品质。她们两人都受过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教育，但成了共产党人。龚普生当了十年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学生干事，后来担任了外交部国际司司长。1979年她随同赴联合国代表团来纽约。此后不久，她出任驻爱尔兰大使，是第二位出任大使的中国妇女。）

学生会的秘书是李敏。她比其他人来的次数都多。她身量短小，文静从容，为人诚实可亲。和龚家姐妹一样，她是燕京的优等生，是伦道夫·塞勒^①的高足。李敏并不排外——而恰恰相

^① 美国人，汉名夏仁德。美国长老会教士。于1923—1951年任燕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他一直同情、支持并保护进步学生。

反。她是内地的贵州省人，翰林学士与官僚的女儿，是靠奖学金完成了西方学业的学生。她不得不从古老的儒教直接转变为亲共产党的立场，而没有借助于基督教作为过渡。（1972年当我见到她时，尽管她的身体还不错，可以在外交使团里教中文和英文，但她的脸孔呆板如同面具，看上去非常老，她说她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她戴着¹我担任西部高中副校长时的老式别针。我还曾经把我的又轻又厚的山羊皮短大衣赠送给她，这样，她可以在示威时跑得快些，并免受大刀的伤害。四十年代，她在狱中依靠这件中美友谊大衣保暖，并写信给我说：“你的形象永远在我心中放射光芒。”）

张淑义长得很好看，苹果般的脸颊上长着两个酒窝。看上去身体健康，精力旺盛，她脸上总带着迷人的微笑。（直到1972年她还是如此，当时，她是妇联的领导。在1936年以后的许多年里，她担任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全国工业干事。）

这就是“一二·九”革命运动七个燕京主要推动者中的三位姑娘。除张兆麟外，其他三个小伙子是黄华——河北和北京人，经济学专业学生；陈翰伯——新闻系学生（当时两人还是秘密的青年团成员）；和程阶——他的祖父做过溥仪皇帝的老师。一些清华的年轻学生也帮助发动了这场运动，他们之中有姚依林。（他当上了副总理，是八十年代的政府首脑之一。）

（陈翰伯和他的朋友张兆麟后来在西安办了一份报纸，对将要发动事变逮捕蒋介石的军官们影响很大。1936年，张陪同我在西安各处活动。1937年，当陈不得不逃往延安时，他也曾陪同过我。在一段时期里，陈翰伯是中国的重要记者。1972年我们再次聚会时，他是北京政府出版局的“领导成员”。从“五·七干校”“休假”、从事体力劳动后回来，他皮肤晒得黝黑，身体健康。1979年，他是记者协会的主席和国内部部长，住在北京。）

（结果，黄华可能是燕京教育出来的最值得骄傲的学生和“一二·九”运动参加者中最有成就的人。他自中国首任驻联合国大

使卸任后，担任了副总理和外交部长，他还锻炼出与他职位相适应的卓越的有吸引力的性格。1982年他辞去了这两项职务，但仍担任国务委员。1971年黄华抵达纽约那天，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我写的有关他的文章。当我从1937年离开延安后第一次与他重逢时，真是一个快乐的时刻。

“吉姆·贝特兰为了我的延安之行，送给我一件漂亮的红羊毛衫，我离开延安时又转送给你，现在那件羊毛衫怎么样了？”当他用汽车把我送回饭店时我问他，“那是他的社会主义的牛津大学俱乐部羊毛衫，是联系牛津、北京、延安和康涅狄格州的麦迪逊的护身符。”

“我穿了又穿，穿了很久呢。”他用深沉缓慢的喉音说着，脸一下子激动得红了起来，就象他还是青年学生时一样。对于一位中国人来说，他不同寻常地富有激情。1971年，他按西方的方式拥抱了朋友，尽管没有接吻。）

1935年时，黄华是一个自尊自重、心情忧郁、沉着自信的小伙子。人们觉得他负责、可靠。（他在纽约时告诉我，他于“1936年春天”加入了共产党。在此之前，他因为是学生领袖而被抓进监狱关了一些日子，险些受刑。“统一战线”时期在汉口和重庆他是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联络人，1949年同美国和英国的最后谈判中与他大学的老校长司徒雷登博士打交道。在朝鲜战争的板门店谈判中，他是中方的代表。作为高级外交官，他在非洲和埃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66—1969年文化革命期间，他是最后被召回的驻外使节。在此期间，外交部的燕京—清华王朝受到了极“左”分子的攻击，他与其它一些人到“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再教育。）

1935年11月1日前后，黄华和学生组织写出了他们有名的1935年11月1日请愿书：《开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一份油印件带到我们的住宅，由学生组织的一些

人在这儿把它翻译出来。请愿书语气强硬、危险。我告诉他们，这太激进了。文章部分内容如下：

“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接着，请愿书抨击南京政府不抵抗日本，用“赤化”为口实，这样“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捕，更不可胜计。”文章还提及了清华冯友兰博士^①及其它人被捕之事。

在上边首先签署的是“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随后还有其它十个学校，包括清华大学，内有六所中学。向全国各地的学校寄发了2,000多份。

我努力让外国报刊发表这份宣言。我拿了一份去找路透社的弗兰克·奥利弗。

“啊哟，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刊登这样的东西，”弗兰克说，“这只是宣传。”

在亚洲，这一宣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对法西斯轴心国的首次排炮轰击——南京政府官员的子弟公开抨击他们的家长和蒋介石。这些学生是在军事戒严的环境中，在虎口里舍身冒险。然而，对路透社来说，这不是新闻。

我翻身上自行车，牵着戈壁，向北方饭店骑去。合众社的记者F·麦克拉肯·费希尔住在那儿。麦克向驻天津的合众社的厄尔·利夫发了这条消息。从此，他们俩开始提供有关学生的新闻报道。这是美国人从英国人手中拿走火炬的象征性时刻。与法西斯轴心国的战斗也是我们的战争，合众社模模糊糊地认识到了这点。在那一天，暮气沉沉的大英帝国象通常一样象征性地、毫无察觉地土崩瓦解。他们自己得以生存的最起码的条件，就是由

^① 应为杜重远。

英国发表有关中国最保守的大学要求“出版自由”的消息。

路透社的弗兰克·奥利弗满怀敌意，咄咄逼人。可是他的华人助手比他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完全知道那页纸有多么重要。我一点也不怀疑，在一两个小时內，这份文件就有可能落入警察之手，也许首先落入法西斯分子之手。戈壁觉察出了这种气氛，它保护在我身边，用反法西斯的眼光怒目而视。

在淡紫色的朦胧的薄暮中，沿着鬼气森森、紧靠着古老城墙的林荫路，我慢慢地蹬车回家。11月的风沿着雉堞连绵的城墙顶部呜呜地吹着。我焦虑不安。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是，学生的出生入死而一无所获——对此未作宣传，不为人们所知。我们惊动了敌人，而自己徒劳无功。显而易见，要末让运动受摧残而夭折，否则我们就必须制造不容忽视的新闻。

回到13号院后，我对埃德说：“我想，我要开始抽烟了——我还要喝一点你的酒。”（我一直几乎滴酒不沾——我一喝酒就犯困。）我们围坐在壁炉的煤球火前。

埃德吓坏了：“为什么在香烟上浪费钱？我抽骆驼牌，花的钱几乎和房租一样多。”

“为了弗兰克·奥利弗，”我解释说，“还有土肥原。”（土肥原贤二将军被认为是“满洲的劳伦斯”，他在1935年夏天搞了一个《何梅协定》。这是一个卖国协议，根据协议，日本将通过利用傀儡政权接管华北的部分〔或全部〕地区。这主要靠欺骗与保密，这正是路透社和其它外国报纸能起作用的地方。在华北的新旧政权机构之间存在着暂短的平静或间歇。1935年10月，一个反共自治政府在冀东宣告成立。日本坚持的最高要求是要让这个政府占据华北——一亿人口。土肥原将赌注押在宋哲元将军当傀儡上，用一亿美元现金对他进行利诱，并对他施加威胁。但宋将军犹豫不决，土肥原给宋的最后通牒大约在12月10日到期。学生运动将暂时结束这种局面，一直到1937年。）

我开始吸小粉红盒包装的较柔和的哈德门香烟，这是苦力们

吸的牌子。我从未敢碰一碰埃德的骆驼牌。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要使消息传播到全中国的民众或学校，只有通过合众社和我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的文章。该杂志的编辑J·B·鲍威尔现在开始转变为反法西斯分子了，尽管自1927年开始，他一直是蒋介石的首席外国辩护士。

很明显，需要采取行动，以制造能够传播给公众的新闻。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举行一次示威游行。

第二十章 行 动

当局实行最大限度的“白色恐怖”（中国的叫法），标志着在中国大气压降到了最低点。这发生在日本迫使蒋介石的宪兵第三团撤离北京的前夕。宪兵第三团由他的侄子蒋孝先指挥，此人是当时中国最阴险毒辣的法西斯分子。这是日本极大的失策。这意味着日本将不能在华北建立一个卖国通敌的法西斯政权。他们甚至不知道怎样谋划进行这种安排，而希特勒却很快在欧洲非常高明地加以利用。

如果宪兵第三团不调走，在北京进行爱国运动或反法西斯运动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做梦都不敢想。我们会认为，发动这样运动的人必死无疑。宪兵第三团已把左翼势力和抗日活动彻底消灭。我们所知道的共产党人中没有一个不在监狱里，党已经被破坏，如果还有党存在，我们也同它失去了一切联系。

当情况到了这样一个高峰时，新的领导产生了——它必然要产生；在矛盾的最高峰，“法西斯分子”就转变成为反法西斯分子；这可能是政治科学的一条规律。这在北京发生了，在西安也发生了。

在《北京周报》最近刊载的一篇文章里，陈翰伯写道：

“天气越冷，我们的活动越频繁。我们期待了很久的号令终于到来了：12月8日，黄华从城里带回消息——明天游行。

“接着我们花费了三小时进行准备。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紧急学生大会，通过决议——明天游行。

“随后我们把我们的计划通知了斯诺夫妇，把要使用的口号，游行路线和集会地点对他们说了。12月9日，燕京和其它大

学的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领土的战略投降。斯诺和夫人参加了学生的游行队伍。（实际上，我们在街道旁拍摄照片。）

“游行受到了武装镇压。学生高呼口号，赤手空拳与士兵搏斗。”

大约800名学生走上北京街头参加了“一二·九”示威游行。但当全中国的学生听说后，就是这种在政治和军事前线上表现出来的三户亡秦的信心，使他们振奋起来。这种把一切置之度外的勇敢行为发生在最关键的时刻，因而才可能发生12月16日的大游行。这次游行大约有一万名学生参加，大卫·俞帮助计划部署——他是纯业余活动者中间的一名职业活动家。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毛泽东和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向靠近长城的大西北进军。我们无从知道在内战之中他们的政策是什么。尽管在8月份他们开始强调抗日，而不是进行内战。我们很久以后才得悉此事。但是在大卫·俞到达以前——第一个可以找到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北京不得不制定自己的计划。

“一二·九”游行示威结束后不久，黄华把一个年轻人带到我们家，他介绍说这是大卫。大卫个子较高，苍白，疲倦，面带病容，身着褐色毛料中式长袍，一副衣衫不整的样子。（当时，大多数男学生穿长袍，这是上等人的标志。）他面目清秀，开朗，喜怒见于形色，但还可以看出气质高贵，让你感觉他十分自信。他举止落落大方，教养良好，庄重自尊。他看上去并不神经质，可是拿着一张报纸时，手就发抖。尽管他不过24岁，却有一副达官贵人的气派。

• 《在学生运动中》，1982年12月15日《北京周报》，其时举行了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10周年大会。我的回忆与此不尽相同。

他比任何人都更象是一个从事隐蔽活动的人，他还具有某种气质，我见过的其他人都不具备。是什么呢？我想这就是经验。这一定是真正的出众人物，一个真正活生生的共产党地下党员，或起码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一个人怎么能发现什么，可还能说他毫不知晓呢？有党籍，或者甚至同党仅有密切关系，都触犯死刑律条。别人从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当然还是以不知道为妙。但他脸色苍白是不是因坐牢所致？如果他时时刻刻都在被警察和法西斯分子追捕，怎么还能那样满不在乎？那些人如果抓到真正的共产党人，就会获得很高的奖赏。我们的佣人如果告发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甚至一个可疑分子，同样也能得到优厚的报酬。

尽管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一开始都怕我们那条友好的大狗，可大卫不怕。

“戈壁是北京学生会的正式创始成员，”我告诉大卫。“他要参与正在进行的每一件事。”

大卫坐在又厚又软的大椅子上，戈壁也爬进去，卧在他身边。从那时起，甚至在一张便条里，大卫从未忘记询问他的朋友戈壁。

几分钟后，其他三个学生到了。大卫明显地用长者孔夫子般的审慎神态察看他们。他们五个人坐成一个圆圈，当他们低声交谈时，黑色的脑袋都向前碰在一起形成一个圆环，紧张气氛难以描述。戈壁在他的老朋友黄华身边，把它又长又黑的鼻子也挤进这个圈里。

我坐在大凸肚窗边的书桌后面，警告这个圈子的人：“如果你们不希望我们的佣人向警察告发你们，就不要做出这种象好莱坞电影里的阴谋集团的样子。他们来的时候你们要坐回去，讨论老子的无为哲学。”

我们出身满族家庭的管家手托一盘茶水和小甜饼出现了，他穿着毡底便鞋，脚步象猫一样毫无声响。戈壁向学生们发出警告，他们心虚惊慌，五个脑袋飞快地回到各自的位置。佣人刚一

离开，脑袋又组成一个环，茶水被忘在一边。

我自始至终一直禁不住想笑。我当时想，这就是革命，中国人竟然忘记了喝茶。对他们五个我都爱若亲人——就凭他们忘记喝茶这一点就使我爱他们。但一想到他们的安全我却如坐针毡。

我已经认识宋黎了，他是东北的代表，精神饱满，大胆无畏，双目有神，机警得象松鼠。他在街头领导了“一二·九”游行示威，带队直向武装警察冲去。他不久在西安成为少帅张学良的联系人。少帅待他如至友，甚至派兵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

（宋黎成为主要港口大连的主任——相当于市长。1982年与我取得联系。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在北京都举行了全国联欢会。）姚依林是清华的代表，当时是二年级的学生，虽然只有17岁，却才华横溢，是天生的领袖，他加入了共产党。第五个“阴谋家”的名字我忘了，他可能来自北大或师大。

他们五个是学生运动的“智囊”。他们不仅指导华北，而且指导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因为全国其他地区都以在大卫掌握下的北京学生会为榜样。

这个联络代表小组有时就在我们这个外国人的家里见面；在别处太危险了。我看得出，他们从大卫那儿领取指示。大卫看起来象个专家，但我并没有认为他是一个什么重要人物。我想，他成为身处监狱之外、并且活着的唯一（或少数中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纯属幸运。从他谈话的方式来看，他在自谋自断——看起来他是单独活动。

埃德与我，还有那些学生们，一直希望与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而大卫明显地在12月9日之前的晚上找到了燕京的学生领袖们。就我当时所知，在大卫到来之前，北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共产党机构。一个我们称他为彼得的教授来看过我们一两次，但有人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不能相信他。他有可能是失去关系的真共产党员，后来有可能又恢复了失去

的关系。他在教师中很活跃。我认为“彼得”就是徐冰。在那些日子里，每件事都保密，每个人都受怀疑，这是法西斯手段所造成的后果。刘少奇于1936年2月来负责这里的工作，刘一到，徐冰可能就与他一起工作了。在此之前，刘被关押在江苏的监狱里。这是西安市长王林在1982年告诉我的。

其他四人走后，我请大卫留步。

“我不知道你上一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我问他，“能不能和我们一块儿吃点外国饭。”

“我不用为饭钱发愁。”他回答，“但我吃饭时胃不好受。”他说，他的困难是有时连一分钟的觉也睡不成。他心脏有毛病。尽管如此，他可以和我们一块吃饭。“反正我没有安全的地方可呆。”

我很快就听说，他每隔三四天就从这家公寓或旅馆搬到另一家去，防止被警方发现。他的住址随时都可能被认识他的人出卖。他待母至孝，他的钱都是母亲给的。他母亲住在长江流域的某个地方。我依稀记得，当他刚听说北京的学生运动时，正与他母亲住在一起。他听说后，立即动身来京。母亲为他担心，但没有干涉他。

我第一次听到的有关他个人的历史，是在1931—1932年示威时，他是北京大学的主要的学生领袖。这次示威导致蒋介石因丢脸而下野。（大卫从未告诉过我，中国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之一，北大教授曾昭纯是他的舅舅。曾同情1935—1936年的学生运动。大卫母亲的曾祖父就是蒋介石所崇拜的湖南侯爵曾国藩。）

在我年代久远、纸色发黄的笔记上写明，直到1936年2月25日，大卫才告诉我关于他1933年3月在济南被捕的事。他带着手铐脚镣，在狱中被关押了6个月。“1933年我被判处死刑时，我叔叔救了我，”他说，“他是蒋介石的密友，蓝衣社的四大元老之一。”（大卫的真名叫俞启威，但使用黄敬这个名字。我后来发

现，他的蓝衣社叔叔是俞大维，当过蒋介石的国防部长并且在华盛顿呆过——我想是在大使馆里。）

大卫说：济南监狱关押的300名囚犯中有40名学生，他是其中之一。在他被关押期间，有12名重要的共产党人牺牲了。他还说：“在南京每天都处决共产党人。”他告诉我，1936年，宪兵第三团在北京抓了大约1,000名政治犯，其中大多数是学生。在全国，政治犯有50,000名之多。

大卫决定不结婚，而要为革命牺牲一切。他就是这样向我解释的。由于济南入狱和后来的危难、艰险，他的健康受到了永久性的摧残。

“但是，大卫，你得休息一下，摆脱危险，否则你就会死去的。”我试着劝他偶尔休一次假。

“没有用，”他回答，“那样我就会更糟，我的心脏也会更恶化。我跟我母亲住在一起时试过了。我积极活动时倒觉得好些。你们知道，没有人来替我做这些工作。”

在我1936年3月7日的笔记上写着，大卫告诉我，“昨夜”他和黄华险些被捕。他给了我一张由于密探告发而被捕的学生名单。他还说，法西斯分子现在已组织起来要摧垮左翼力量。他说，他的名字上了五份蓝衣社的黑名单，“第三团的宪兵们向着名单发笑。”

大卫总是那么冷静，镇定，温文尔雅，从容安详，审慎明智。他的行动更象一个法官而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活动家；他从不匆忙行事或勃然动怒，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他以带有优越感的神情说那些学生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太左了”。他善意地开“英雄行为”的玩笑。

尽管他的英文很好，但我不知道他以前是否和外国妇女交谈过。一开始他不知道怎样对待我才好。尽管埃德与大卫交谈不多，但他立即理解了埃德，两人成了好朋友。大卫经常来我们家，因为他没有别的安全房子度过时光。和他一起讨论马克思主

义与分析“客观形势”，是我真正的乐趣。我们思想达到了完全的交流。偶尔一次我占了上风，他就会说：“你无疑是一位出色的鼓动家。”

大卫属于完全出类拔萃、令人钦佩的一类人，一个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既然他有条件可以作出任何选择，那么他决定成为共产主义者，就有着根据是非的原则高度自愿地做出选择的性质，而非出于经济的需要或阶级的仇恨。他头脑清晰，才华横溢，诚朴纯真，面对任何事实（只要不与他所掌握的事实相抵触）都虚怀若谷。他思想健全，头脑和心理都很正常——这是他吸引人之所以在。在中国，与我交谈过的共产党人几乎莫不如此。他反对狂热，不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宗教，而是用来作为思考问题的锐利工具。

我并非总是同意大卫的看法，但我第一次对全中国的政治局面、尤其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有了清楚的认识。他认为这些人过于软弱，因而不能保卫中国或担负任何历史使命。

1936年2月，一位重要的共产党员抵达华北，随之而来的是政策的改变。此人是刘少奇，他批评学生运动太左了，并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一项广泛得多的政策，如果“法西斯”分子愿意加入，这个“统一战线”也可以把他们包括进来。

（刘有一段时期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直至1966年文化革命反对他的政策时为止。在六十年代，刘被指控于1936年把一些共产党人搞出了监狱，所用的办法是让他们向当局“悔过自新”，而没有让他们因拒绝悔过而被处决——这是一个困难的伦理论点。我在1973年被告知，“他们应当宁可被处决也不悔过自新。”一个表面虔诚的共产党员，一个从没有冒过生命危险、连监狱里边是什么样子都未见过的人，这样谈当然容易。1935年和1936年在北京，当你能脱出牢门重新工作时，却自陷囚笼而日趋憔悴，似乎是堂吉珂德式的行为。但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不会有人——甚至连我在内，再信任这样的人了。1980年，刘和他的

追随者一起被“恢复了名誉”。)

大卫告诉我，我们在北京有一个“反法西斯战线”，他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本来应该有一个“广泛的抗日战线。”

“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我可能决不为此而花费时间吗？”我说，“尽管现在‘反法西斯战线’发展成为‘抗日战线’，这不错，但我认为学生领袖不会为这样一个‘广泛的战线’而冒生命危险。我们首先是反法西斯战线，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北京粉碎了‘白色恐怖’。我的时间对我来说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任何不反法西斯的人身上。”

大卫非常崇敬地看着我，他说：“当然，历史是分阶段前进的。”

“我是主要发起人，一个创始者。”我说，“你是一位组织者和理论家。全体发起运动的学生都是反法西斯的。这是动力所在。”

回首往事，我看到，埃德与我在把学生和所有其他人，包括前法西斯分子，转化为反法西斯分子的活动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大卫和刘少奇随后到来，吸收他们成为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我注意到，与共产党人比较，埃德与我似乎在心理上更加反法西斯。

(自1937年夏天大卫在延安看望我过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次会面时，他自豪地告诉我，他是华北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1938年，埃文斯·卡尔森在冀中旅行时见到了他，他通过卡尔森转达对我们的问候。冀中离北京不远，大卫在那里担任抗日部队的政委。

他担任过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并且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中国历史上——也许是任何历史上——最危险的地下工作中，他献出了健康与青春，成为半残废的人。大卫死于1958年，享年46岁。他的遗孀范瑾，在文化革命中被清洗之前，一直担任北京市副市长。)

当去中国旅行的人们谈及“社会主义新人”和改变人性时，我就想到大卫这些我所认识的中国人，他们必须探索自己的道路，作出自己的决断。我回想不起他有什么使人遗憾的特性——他不排外，他不假装虔诚，他不主张实行蒙昧主义，他有高深的教养并赞成每个人——包括中国人都发展更高度的文明。他迷人可爱，并不粗暴，也不难相处，他经历了中国最严酷的考验后而幸存下来，甚至保持了他的幽默感和分寸感。

到了12月16日，北京所有的学生都已处于待命状态，当局和日本人也是如此。由于12月9日的示威是一次突然袭击，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这次会发生什么事。

16日一早，埃德和我穿得暖暖和和的乘出租汽车去接合众社的麦克·费希尔。我们开车转来转去，寻找在不同街道上的各个学生队伍。我在给《密勒氏评论报》的报道中说：

“我们乘汽车抵达后，正好赶上看到一班大刀队事先不加任何警告地直接向学生领袖们冲去。……当游行队伍走到前门前面的广场后停下来时，警察们——没有高级长官带队，看上去毫无组织，衣衫不整，头上无帽，惊慌失措——发疯似地跑上阳台……直接向学生群里——不是向他们的上空，发射了三排空包弹。……人群分散开来，但瞬息之间又向前冲去。……一个沉着镇定的车站的苦力开始充当与警察谈判的中间人。”

当夜，我们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一条死胡同里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混战，300名学生被困在里边，大约30名学生被大刀砍成重伤，不能行走。

12月16日，在北京的全体记者都上了。甚至鲍威尔也从上海赶来为《芝加哥论坛报》采访。在前门——北京城墙上的中世纪大门，埃德和弗兰克·斯马瑟斯爬上一个城楼，埃德拍摄了据我所知是这次学生运动的仅有的电影。（这架电影摄影机是我们的一大笔投资，就是为此目的而买的。后来，埃德用它拍摄了

第一部有关红军的电影。)

我在鲍威尔的身边向他进行宣传时，他看到了身穿皮夹克的燕京最漂亮的姑娘。

“那是我理想的革命少女，”他边拍摄边说。

我跑近游行者的队伍，把康斯坦斯·张带过来介绍给他，“她是加利福尼亚葛苣种植场主的女儿。”

鲍威尔为找到一位能引为同类的美国人是如此的高兴，以致在此以后他允许我在他的杂志上要占多大版面就占多大版面。

康斯坦斯的兄弟阿瑟和他未来的妻子梁思怡也参加了示威。梁思怡是清王朝时最负盛名的学者梁启超的女儿。

(1972年，我们在北京饭店为纪念“一二·九”举行午餐会，当时阿瑟是友谊医院的负责人；他们夫妇俩都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康斯坦斯回到美国，在纽约和一位才华横溢的年青记者唐明照结了婚。唐后来成为联合国非殖民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们的女儿南希出生于布鲁克林，以后成为毛泽东的心腹译员。1972年，她仍在那个职位上，为来访的尼克松总统做翻译。1974年，南希被选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但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她就不怎么在公开场合露面了。)

据估计，大约有6,500到10,000人参加了12月16日的示威。路透社在12月16日报道：“在北京，今天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学生示威。……警察意欲过份施暴，但若干手持相机的外国记者在场，对学生的帮助实在不小……相机刚一举起，警察立即停止殴打学生……报道说有10至15名学生在这次混战中被刀砍伤……没有对日本人施加暴力，许多日本人观看了示威。”

路透社在1935年12月18日报道，北京、天津两市市长拜访了土肥原少将，就学生示威一事向他道歉。我从未会见过土肥原，尽管我看见过他。但是埃德与他交谈过。他完全知道我们对学生的影响。在那些决定命运的日子里，土肥原在北京，并看到了12月16日示威，所以我们处于直接对抗的地位，沈阳的《满洲每日

新闻》1935年12月16日援引土肥原的话说：“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国民党支持中国的学生运动。……中国共产党正在利用这次学生运动。……据报道，有些国家就华北问题从事地下活动。我愿相信他们将停止这种活动。……”

《密勒氏评论报》12月21日说：“上海的日本人将中国的学生运动归咎于美国的影响，说……幕后……有人在牵线……大多数学生……是教会学校的……学生运动是在由美国大学毕业的教授们领导下进行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日本报纸刊载了一篇文章说，一位年轻的美国妇女发动了这场运动，无疑地是由罗斯福总统资助的。我为此吃惊不小——周围都是危险的法西斯分子。但我认为，实际上是外国报纸的公开宣传阻止了土肥原的计划。进行这种公开的宣传是我的特殊任务，从11月份直到1936年6月学校放假，我一直在从事这种宣传。与此同时，我教学生如何将消息送给外国报纸；这对他们来说是个新的想法，而且做起来顾虑重重，踌躇畏缩。

为了顾全面子，日本政府公开声明同土肥原的活动无关。面对两个每月生活开支仅50美元——但用事实武装起来的两个美国反法西斯的无名小辈，土肥原及其全部已动员起来的大军竟不得不后退，这真是绝妙的讽刺。1936年，罗斯福站出来，发表“隔离侵略者”的讲话，给予了慷慨的帮助。但此前和此后，在华北没有人确切知道，学生运动通过斯诺这条线到底接受了还是没有接受美国援助，以及接受了多少。回答是零。但这种神秘就是我们的巨大武器；相当于几支完整的大军。

学生运动一直持续到6月份学期结束。那时，随着东北的学生奔赴西安去影响武装部队——最终真正的力量，激昂的情绪也传到了西安，那里的人们的思想正发生一场革命。

1935—1936年学生运动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少帅张学良

从他以前中国第二号法西斯分子的身份转变成积极地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主要是由他自己的学生促成的，这些学生是他的秘密青年团的成员，其中有几个人是“一二·九”运动的发起者。少帅在1936年逮捕蒋介石，试图劝说他结束内战。

要想设计出比这件事更出人意料的歌剧情节是很困难的。日本将军土肥原在1931年策划了和平占领东北。少帅的父亲、老师张作霖被日本人暗杀，随后日本恢复了秩序。少帅张学良服从他的上级蒋介石，带着他的部队“东北”（意为“满洲”）军撤到长城以南。我们的家成了东北难民的聚会场所，我们影响他们，使他们转而反对法西斯主义。

1935年，反法西斯青年的口号声在北京古老的城墙内回响。西安的古城变成了法西斯的中心，打内战反红军的司令部。红军在10月刚刚结束从南方出发的长征。少帅指挥了这场反赤战争；与此同时，在北京城里，我们——正如其他人所知，是独立的，非共产主义者——正从事争取年轻人的心与思想的工作。当少帅青年团的成员之一、已是反法西斯分子的宋黎在示威发生后不久赶赴西安向少帅汇报时，少帅不仅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而且赞成与左翼结成统一战线，并很快与红军实现了事实上的休战。

我们都本能地意识到，某种前所未有的事物，已在世界上兴起：将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反法西斯联盟的一部分，在燕京大学诞生了。

（1981年休伯特·S·梁来美国讲学时曾告诉我，在三十年代，少帅为他在燕京的新闻系提供了部分资助。）

“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始。毛泽东在他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把“一二·九”运动列为自1919年以来中国历史上六个阶段的第四个阶段。“一二·九”运动和1936年西安事变影响了共产党人，是毛泽东用以取得胜利、并于1949年建立联合政府的法宝的一部分。1944—1945年，他愿意在

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与美国人合作。如果这种合作得以实现，世界历史可能大不相同。但“法西斯”势力在美国兴起，院外援华集团—麦卡锡分子的势力把我们与中国隔绝开来，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再次打开中美关系。

1947—1949年美国进行干涉反对共产党以后，在中国的杠杆上，外国人永远不再处于我们在1935—1938年所处的位置。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种一度曾有过的进步、愉快的中美合作似乎不再可能了。

但从1935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左翼势力与西方的联系人就是这些燕京—清华的学生。1972年是埃德加·斯诺从毛泽东那里得到让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许可，那时他们是恢复友好关系的设计师。所以，“新中国”与美国的友谊是在北京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诞生的。

第二十一章 詹姆斯·贝特兰：来自新西兰 的罗兹奖学金学者^①

詹姆斯·贝特兰于1936年1月初抵达北京的那一天，是我的一个幸福日子；他、埃德和我组成了一个令人陶醉的小圈子。在我们旅华期间，吉姆^②将发表四本有关中国的书，埃德九本，我五本（并积累了六本历史笔记）。

尽管我思如泉涌，渴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为伴，但在北京，自1933年以来，除了埃德、泰亚尔和一些中国人外，我实在找不到可与之交谈的人。吉姆已是反法西斯的了，这是他到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旅行的结果。后来他写道：“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的那一年，在牛津大学，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界的时尚，在万灵学院和在莫利的大学预科中一样流行。”他解释说：“在牛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社会主义者），而且不仅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乔治·德·赫·柯尔和迪克·科罗斯曼是我们的导师，约翰·斯特雷奇是我们的先知，奥登和斯彭德是我们所喜爱的诗人。”但是，他最喜欢的似乎还是雷纳·玛丽亚·丽尔克的诗，再加上莎士比亚。他来华旅行期间还带着莎士比亚的著作。

吉姆是来自新西兰的罗兹奖学金学者，他研究英国文学，以后在新西兰大学教授这门课程。他加入了牛津大学俱乐部，宣誓

① 该奖学金由英国殖民者、资本家C·J·罗兹所设，仅给予英联邦和美国的學生。规定奖学金获得者可在牛津大学学习二至三年。

② 吉姆是詹姆斯的爱称。

• 詹姆斯·贝特兰，《战争阴影》（纽约，约翰·戴公司，1947年）。

说，他决不“为国王与国家而战”。可是，我们见到他后不过三年，他不得不投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投笔从戎。（我希望我能有力量防止此事发生；我努力使他留在我们这个中国通的小圈子里，我们非常需要他。但1941年他在香港被卷入了战争。）

吉姆非常令人着迷——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矫捷如运动健儿，仪表堂堂，长着一头卷发和一张敏感的苏格兰—英格兰型的脸，文静温和，教养良好，但缺乏自信；温柔和蔼，羞怯腼腆，尽管极富激情，却完全能自我克制。他蓝色的眼睛里闪动着探索的目光；他四处寻求新的经历。他是我的加利哈德爵士^①。但我必须防止他成为我的朗斯洛特爵士^②。我必须对他“残酷”——正象他所说的那样。他是奥克兰的一个牧师的儿子，在我们的那种关系——我们只能有的那种关系中，他是非常合适的人。

东方的礼法是非常严格的，对于英国人来说更是如此。英国人也罢，美国人也罢，我们具有共同的在任何情况下举止庄重的清教徒传统。正如贝蒂·普赖斯在北戴河所说的，“很幸运，你是一位淑女，吉姆是一位君子。”

我在中国所处的地位对我来说是如此之重要，我不能让一件糟糕的事情把它毁掉。我必须是恺撒的妻子，加倍地忠贞。我可能有几个“特殊关系”，但那是有条件的，条件是我保持外表与实际都是忠诚的，并从一开始就在我的爱慕者的头脑里建立起这些基本准则。我谨慎戒惧，小心回避。埃德认为我当然会如此——但内心中却切肤地嫉妒猜疑。

我还必须借助埃德使吉姆成名立业。他是我们一伙人中的一部分——尽管埃德出于个人的原因，总是处于要把他推出去的边缘上。举例说，我让埃德派他去西安当埃德的通讯员，我还把他

① 加利哈德·亚瑟王传奇中品德纯洁的骑士。

② 朗斯洛特是亚瑟王传奇中最伟大的骑士之一，是亚瑟王王后圭内弗尔的侍夫。

介绍给埃德与我的代理人——亨利埃特·赫茨和我们的出版商。

第一年就出现了危机，但紧张程度是逐渐减缓的，当时吉姆特别渴望同我一道——总是在我们所建立的纯精神的水平上——去朝鲜和西安旅行。我害怕孤身一人，尤其是在西安的危险旅途中更加害怕。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同吉姆一道旅行，即使仅仅因为别人会怎样看待这件事，埃德也会大发雷霆的。我从未告诉埃德有关这次危机的任何情况——也从未告诉吉姆不同他一道去使我多么难过；我让他以为，我所以单独行动是为了抢独家新闻。

我回想起当初那些日子里我们都是那样循规蹈矩——与今天成为鲜明的对比。意义产生于价值。我们赋予我们自己、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关系以极大的价值，所以这些不仅对我们而且对中国人都有了真正的意义。我现在为当时我竟然能处理得那样好而惊异。我不仅涉足于与中国人打交道这样困难的艺术，而且还涉足于与几个男性爱慕者打交道、并让他们规规矩矩这样一种几乎是不可能的艺术。

对于吉姆，还有埃德与我，1936、1937这两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充满了旅行、危险、成就和密切的工合^①集体精神。吉姆的书使他成为他那个年代在中国最负盛名的英国人。与他齐名的还有我们工合的另一位成员，也是来自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吉姆是英国左翼运动的中国派。

吉姆为了他的中国经历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941年在香港，他在战斗中被俘，当了四年日本人的战俘，在码头上干苦力活。在收到他的一张便条以前，我一直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1945年他获得了自由，在登上一艘接运他们的美国船时，他给我写了这张便条。直到1959年我才再次看到他，当时他带着妻子琼在美国

^① 作者于1938年与斯诺、艾黎一起创办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美国人把它的拉丁化拼音Gunggho直接介绍到英语中去，意思是“同心协力”、“热烈”、“雄心勃勃”。

访问，他是在享受大学教师的假期，旅行费用由洛克菲勒基金赠与。

我经常回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里，特别是在英国人当中，那些未曾成熟或未进入壮年就被毁掉了的年轻、健康，大有希望和确有天资的人们。

第二十二章 埃德加·斯诺去看“照耀中国的红星”^①

学生运动遍及全中国。到了1935年12月底，在32个城市里爆发了大约65次示威。

总的说，警察对待示威者相当不错，他们纪律良好。在北京我常常望着那些粗壮的山东警察，希望这样的中国人站在正确的一方。

到了1936年2月，北京动员了10,000名警察日日夜夜对付学生。尽管学生也日夜派人警戒守望，警察还是突击搜查了几所大学，并逮捕了一些人。在清华，第29路军的一个团身背大刀包围了校园。他们特别在搜查一位名叫陆瑾的姑娘。这个姑娘漂亮、活泼。在示威时，她从一座大城门下面爬了进去，从里边把城门打开，她因此成了这次示威的女英雄。但这时她正躲藏在我们家的一间密室里。我们秘密地把她迅速送往上海，她从上海去了美国，为学生的事业进行鼓动，唤起同情。

我们家里全是避难的学生和从满洲来的东北流亡者。其中一人是东北大学校长的儿子王福时。他常常腼腆地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但却象一个社会学家似的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家里的人。（一年以后，王主动当我去延安时候的翻译，他的父亲在日本进攻时躲藏在我们家里。1972年与新中国恢复友好关系后，王福时与我取得联系，并互相通信——他发表了 my 信。他当了一家百科全书的编辑。）

^① 《西行漫记》一书英文原名为《红星照耀中国》。

我们的大灵猩狗是学生会的成员，但我们的另一条狗中国种的金格是法西斯分子，它时常扑过去隔着棉袍咬它能追得上的每一个学生。

在此期间，成立了有149名成员参加的“文化界”救国会。在燕京，休伯特·S·梁是教师中的领导。五四运动的摇篮北大处于两重镇压之下，主要来自内部。中国有影响的科学家曾昭伦是学生的四个公开支持者之一。他是大卫的舅舅，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商仲益（音译——译者）教授被送进监狱关了好几个星期，职位也丢掉了。他常常心慌意乱、犹豫不决地来到我们家，最后他到南方去了。几个月后，同在北大的许德珩（后来成为1949年建国创始人之一）来告诉我们，商教授所乘坐的大客车从渡口掉进河里，商教授淹死了。

对“煽动者”要处以死刑的法令颁布了。南京政府命令查禁北京学生联合会。但是到了3月31日，来自24个学校的1,200多名敢死队的学生不顾一切，抗议一个青年学生死于狱中和其他一些人被捕。与往常一样，我们外国记者组——埃德、我、麦克·费希尔、吉姆·贝特兰都在场。

与此同时，由于少帅张学良的要求，43名东北大学学生在西安获释。少帅的军队已受到爱国运动的影响。少帅为学生作出“个人担保”。在那些日子里，他忙于营救学生。当然，我们知道学生手无缚鸡之力，他们不能打仗，甚至打仗时在军队里都不行。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敢于从军。而至为重要的是能唤起人民和军队的神奇的力量。

1936年，在中国的局外人都想象不出红军里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甚至连俞大卫都不知道。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别无它路可走，即使红军的领袖们不过是“赤匪”——蒋介石一方总是这样称呼他们，还制造了大量谎言说他们犯下了各种暴行，以此来煽动对红军的仇恨。尽管历史上充满了未能改变任何事情的土匪和农民起义，但在当时，几乎令人难以相信会有任何中国人

去做一个共产党员。

红军被封锁了九年。经过一年长途跋涉后，现在他们结束了长征，来到邻近长城的大西北。亲眼看看他们的第一个机会来了。早在1936年3月，埃德就考虑作一次采访红军的旅行，但当时大卫无法为此进行任何安排。他于3月25日从天津写信给我们说：

“埃德的问题将于数日后获得解决。他们二人中的一位将告知有关考虑。我已尽可能就此问题向他们解释。我想，他们没有理由拒绝你们的要求。我希望此事能得以实现。请在动身前写信给我”。

埃德向他的出版商《星期六文学评论》杂志和他自己的出版社的所有人哈里森·史密斯吐露了要作这次旅行的想法。哈里森·史密斯一贯支持我们提出的每一个建议，这次他一如既往地鼓励了埃德。一个春天的下午，在宽敞的起居室里，按惯常的时间喝茶小叙时，埃德与我作出一项重大决定。

“完全正确”。这是我感到自己绝对正确、要求别人绝对服从的时刻之一，此时，我感到非常肯定。“无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你也要去。”如果可能，我也会与他同行。然而，尽管我可以成为很好的掩护，但是我去不了。

埃德说，他要立即动身去上海。“如果能有人帮忙，那只能是孙中山夫人了。”没有某种批准证明手续，他是无法进入红区的。对于这次旅行必须绝对保密。要是处理得不好，就可能破坏他同《邮报》和《先驱论坛报》的关系。他说：“然而，即使古根海姆基金会^①持不同意见，这也是我一生中在亚洲最大的独家新闻。”（古根海姆基金会拒绝了埃德要求为他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助学金的申请，反而把助学金给了一个研究“中国人的面部表情”的学生。埃德对此大吃一惊，目瞪口呆！）

^① 古根海姆是美国一个工业家和慈善家家族。其成员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向学者、作家、艺术家提供名为古根海姆的研究基金。

4月29日，我给我们的代理人亨利埃特·赫茨写信：“埃德因公南下，不日即归。”

5月19日，当埃德自上海返家时，正接到大卫的来信。大卫穿上埃德的一套旧西装伪装逃到天津，因为当时他在北京实在太危险，已无法再住下去了。他在信中说，他在看英文杂志“以成为现时代的人”；在北京，他觉得象生活在“十八世纪”。大卫正在天津组织一次学生运动，显然，他将秘密地与刘少奇交换意见。刘少奇是华北局的首要共产党员，是七人之一，其余的人是大卫、黄华、姚依林——以上是我们的学生朋友——还有薄一波、陈翰伯和徐冰。可是在当时，我们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

5月，西南的两位将军，广东、广西的白崇禧和李宗仁因蒋介石拒绝抗日而要发动另一次内战，起兵反蒋^①。起初，学生要求共产党人“支持西南”，但共产党人的政策是不惜任何代价防止内战，置身事外不予介入——这是苏联当时的政策。

军队很快形成了一个反蒋介石的阵势，但形势非常混乱。我们知道，在西北，少帅与红军秘密休战，所以埃德才有可能尝试着到那里去旅行。

因为内战局势危险、变幻无常，所以一分钟也不能耽搁。6月初，北京一位教授给埃德一封用隐显墨水写的信，要他递交给毛泽东。埃德把他的睡袋、他的骆驼牌香烟、他的蓝吉力牌刮脸刀片和一筒马克斯威尔豪斯咖啡装进背包——这些都是他必不可少的西方文明的产品。他兴奋得激情如火，也因为注射防疫针而发高烧。象往常一样，到最后一刻，还有许多事未办好。但是这也因为他没有料到此行真能实现——因此直到临行前他才注射了预防天花、伤寒、斑疹伤寒和霍乱的疫苗。我们还知道，黑死病是西

^① 根据本书内容，此系指“两广事件”。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发表通电，企图出兵争夺南京国民党政权。

北地方的流行病，但没有可知的预防疫苗，也没有真正预防斑疹伤寒的药。为了防备万一，我能设法到西安，所以我也注射了其中大部分预防针。

在那个时刻，生活很甜蜜，我们的工作也很成功。我们无意为了一次完全难以逆料的冒险，而冒丧失这已有的一切的危险——但是，这必须进行。没有一个人，包括中国人在内，了解红军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人。必须有人去弄明白，可是没有其他人能够或愿意进行这样一次旅行。当时，我们还陶醉于各式各样的力量之中：影响历史的力量，婚姻力量，此外，尽管我们决不会这样措词，还有超越一切世俗事物的高度的精神力量。

埃德对于舍身冒险总是漫不经心。提及危险是犯禁忌的。我绝不提为我们俩之中的任何一个去保人寿险这样一个敏感话题。

埃德脖子上挎着电影摄影机和普通照相机，拍着又蹦又跳的小狗。当我们坐上人力车动身去火车站时，所有的佣人都在门口列队送别。我们可爱和蔼的蒙古苦力老陈坐在第三辆人力车上押着我们的行李，戈壁象往常一样，跳上车坐在我身边。我热乎乎的小手里握着埃德的滴鼻油。由于北京空气多灰尘，再加上抽烟，埃德总是有鼻窦炎。我知道，如果不在临行前把滴鼻油给他放在口袋里，他就会忘记带上。

漆黑的午夜，除了闪烁不定的人力车上的灯外，街上灯火皆无。尽管人力车夫象往常那样尽力避开闹鬼的地方，我们还是坚持象往常那样沿古老城墙边那块清静而鬼气森森的空地走。当头是无边无际的星空和一钩弯月。戈壁总是看见阴影里有东西，要跳下人力车去探看。我们一言不发，只有人力车夫慢慢走动发出缓缓的啪嗒声。

新的世界正在那黑暗的不为人所知的地方诞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冒险活动——但我们两人都不知道，是否会有其他人这样看的。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埃德对此行的记述会成为一本畅销书，但我们意识到，需要一个惊人的高潮，或者一个虎

头蛇尾的反高潮来证明埃德旅华八年不虚此行。

象往常一样，我们几乎错过了开往西安的火车。在埃德上火车时，我把滴鼻油放进他的口袋里。他站在脚踏板上露齿而笑，如同恺撒凯旋归来；并伸手敬礼：“嗨，希特勒！”

“别丢了你的滴鼻油！”我命令他。喧闹的蒸汽机车呼哧呼哧地开动了。

6月16日，我写信告诉我们的代理人，埃德“已前往内地进行一次长途旅行”。

埃德从西安来信说需要一名翻译。黄华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一个短时间后，不久前刚放出来，就径直到我们家来。他回到燕京上课后，接到我的电话。我告诉他，埃德为了秘密去共产党地区旅行，立即需要一名翻译。他自告奋勇前往，尽管这样，他就得放弃毕业考试。我把我能凑集起来的钱都给了他，黄华就这样坐上了下一班火车。作为一名翻译，他成为撰写《西行漫记》一书的合伙人。

我收到一些埃德写来的短笺，里边充满了烦恼、厌倦和沮丧、气馁，诉说耽搁、延误和形形色色的困难。他思家心切，并认为已经“错过了太多的机会”。后来，我什么信也收不到了。一直到9月份，共方的一位秘密信使带来一封信，信上说：“我希望你在此地分享我的经历……你若在此，能进行多么热烈的谈话和讨论呀；空气中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但且慢，还有你厌恶的臭虫与肮脏。”

我未曾料到能接到埃德的来信，我很清楚，通讯联络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在信中要我通过信使给他带几本《读者文摘》，几块牛奶巧克力、咖啡、和绘图仪器。他还让他的秘书郭达给他复印一份《哈泼斯》月刊上有关农业化学的文章。郭达和黄华一样，成了撰写《西行漫记》一书的一位合伙人。书中的每一行字都是他打的，书中每一个字他都喜欢。

第二十三章 插 曲

埃德和黄华已经踏上前往红区的征途了。而燕京其他学生领袖在北海的石舫上^①秘密地举行了一个毕业庆祝会。这既是庆祝胜利，也是告别。我们互相之间亲如家人，我们有这种非凡的感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一起改变了历史。姑娘之中有两位即将成为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两个小伙子要去西安，为少帅办的报纸当记者，目的是影响少帅及其士兵——他们如愿以偿。李敏再次当选为燕京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人。警察如果来，可以把这些人一网打尽。

这些学生都是真正的清教徒。一般说，他们决不会去看电影，更不去舞厅。但我设法使他们看到了三个电影，通常是跟我一道去的。在北京只有一家电影院，当时正上映《双城记》、《悲惨世界》和《叛舰喋血记》。前两部电影是根据我最喜欢的小说改编的。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也是最丑恶的时代。”狄更斯以此开始了他的《双城记》。所有的学生都开始使用这个警句。没有比这更适合中国当前形势的词句了。

冬天里，人们告诉我，学生们在狱中曾经唱《古巴恋歌》、《利塔河》、《老黑奴》、《晚安，女士们》。现在，到了1936年夏天，新歌《义勇军进行曲》和《布琼尼进行曲》（从电影里学来的）象野火一样地传开了。前一首歌在1949年后成为国歌。

自11月份到1936年6月学校放假，我每一分钟都忙于学生运

① 原文如此。

动，不仅打字，打了一遍又一遍，而且在我一生中初次不得不冥思苦想远远超出我的经验的问题。我完全不由自主地成了一个象不拿薪水的空想改良主义者那样的人。我不想成为那种人，我爱昔日的我。埃德也是如此，他对我从一个“至善至美”的人变成了难以名状的这个样子感到恐怖、厌恶，而且从未摆脱这种心情。

在埃德动身去红区的时候，我非常疲乏，我不得不放弃参加体育活动的念头。到了这时，我只希望能恢复元气，并增加20磅体重，恢复到我通常的120磅。我考虑，1936年夏天是我去满洲和朝鲜看看的最后机会。埃德的名字到处受到日本人的诅咒，特别是当土肥原将军和他的朋友们知道了我们与学生运动有关的全部活动后，我的旅行肯定会有一定的危险。吉姆·贝特兰对中国尚不熟悉，他实际上为我担心，并想同我一起去，以便保护我——此外，这一工作还对他具有某些吸引力。但是，虽然他不完全理解我不答应的原因，我不能同意他同我一起去。同样有趣的是，对于埃德突然不露面我是如此守口如瓶，以至有些外国人，其中包括吉姆，可能猜想我们已想离婚了。

在我动身去满洲之前，我需要在北戴河恢复我的健康。那里的哈里和贝蒂·普赖斯夫妇再次邀我前去小住。北戴河是我在中国最后的消夏乐园。我吃惊地发现，吉姆也被邀前往住一段时间。但这无损那里的风光。我们大家都到海滩去，在蚊帐里睡大觉，爬爬沙丘，眺望渔民在破晓时从海上归来，在蓝色的北戴河海湾之畔摊晒湿漉漉的鱼网。我们谈论青春、艺术和革命。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各个方面都十分神秘的中国。

一天下午，我和吉姆两个人单独到村里去买东西，中途我们在一个类似小夜总会式的地方停了下来。在那儿，我们跳了几次舞。当然，吉姆是个很蹩脚的舞伴——他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嘛。虽然如此，这仍然使我回想起美国，回想起在如此久远以前

我与我所所有的昔日爱慕者们度过的美好时光。

我已经部分恢复了健康——甚至体重增加了几磅——我于是在8月份动身，首先去满洲。在大连，我住在美国领事约翰·艾利森与他妻子珍妮特的家里，他们于1932年在京参加过我们的婚礼。珍妮特和我穿上漂亮的长长的蓝白色布和服，围上红毛料的宽腰带，开心地聊闲天。有个能与之交谈的女友，真是令人高兴。

在沈阳，领事约翰尼·戴维斯把我当女王来招待。他父母亲是传教士，他为人机智诙谐，才智出众，妙趣横生。（在麦卡锡时代，他是院外援华集团的受害者。但到了1971年，他应邀出席议会听证会作证。）他长期在东方生活，在这些小小的外国飞地上，人们非常渴望看见新面孔，听见新声音。殷勤好客就如同在美国开发西部时期待客那样热情直爽。

当我离开时，约翰尼·戴维斯给我一封致驻朝鲜领事的信。从朝鲜的长安寺金刚旅店出发，我踏遍了所有的山间小路，并试着在冰凉、晶莹、清澈的小溪里游泳。金刚山是东方最美丽的山区之一。大约在公元513年以后成为佛教的圣山。我们参观了82座寺庙中的一部分，并与和尚谈论佛教。我们在现代化旅馆一天的食宿费仅1.50美元，真是嬉皮士们的乐园啊。

我与默默不语的传教士们坐在阳台上，他们痛恨日本，感到对朝鲜这个亚洲唯一拥有数量可观的耶稣教信徒的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在东方，朝鲜比其它任何国家都更加信仰民主。我和传教士们一样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里的人民。这些传教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而且一贯如此。在东方，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朝鲜的耶稣教青年信徒。后来我着手写了一个朝鲜共产党员的生活经历，书名为《阿里郎之歌》。

你必须能用辩证法思考，才能理解或开始充分领悟亚洲的全部复杂性。由于这儿的国家都是在武力压迫下才对西方影响打开大门的，所以在这里，一个矛盾掩盖着另一个矛盾。只是在马克

思主义成为媒介后，西方文明才有可能真正进入亚洲人的头脑——特别在毛泽东思想和理论里更是如此。

我与日本军事学院的英文教官夫妇交上了朋友。我们在北京的杂货店的老板，矮胖、快活的高林先生也住在那家旅店里。他站在山顶上，反复用真声和假声叫喊和吟唱“瓦尔基丽之歌”^①。（高林先生是远东唯一的登山俱乐部的成员。我回到北京后，他提名我为该会的唯一女会员。）

我们开始了为期两天的攀登，向金刚山最高峰毘卢峰进发。我们事先没有得到警报，30年来以及今后20年内最大的台风就要袭击这个地区。仅在狂风卷来之前半个小时，我们才借助铁链和铁头登山杖到达了峰顶。我躲在一所靠着峭壁的朝鲜式的低矮的茅草棚子里，舒舒服服地度过了令人激动的两天。我最喜欢的运动一直是爬山。对于我来说，毘卢峰是一个小土豆——在九岁以前，我一直住在抬头就看见大梯顿山的地方^②。

由于铁链被台风毁坏，下山很危险。我的前后都有一名强壮的朝鲜向导，用绳子同我系在一起，我们还必须撑杆跳过湍急冰冷的溪水。坐在小船里在怒涛汹涌的河流上颠簸，眼见猪、鸡和人的尸体随波逐流而下，我真吓坏了。后来在汉城，我在桥上看到汪洋无际的洪水。

我感受到了朝鲜的悲剧，它是日本、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一块脚踏石。到了1950年，又成了美国和联合国的战场。美国派军队进入朝鲜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坏的日子之一——我清楚地知道，这是美国人的“帝国主义”的新开端。当美国最终撤出越南和柬埔寨时，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伟大的精神胜利，可是这是迟了25年的胜利。

① 瓦尔基丽：是北欧神话中沃丁神手下的侍女，她们把战死者英灵接引进英烈祠，并服侍他们。

② 大梯顿山在美国怀俄明州西北部。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没有任何进步的东西可以提供给东方——有的只是更加堕落、更加蒙昧。日本在各地利用中国的奴隶劳工建设大工业，与此同时，在国内，军队征召日本青年入伍，使他们的思想倒退到武士的时代。1945年日本战败，这是日本人的大解放，是非常进步的事件。

第二十四章 1936年，首次西北之行

回到北京后，我没有得到我丈夫的任何消息。但我料想他会尽可能呆得久一些，采访到动人的故事。

北京的秋天简直美好极了，我已恢复了健康。吉姆·贝特兰结束了为了解中国而进行的独自旅行后，又露面了。一如既往，我们将我们两人情绪高度紧张的关系保持在令人愉快的状态，非常英国式的，严格不谈个人情感。我需要一个男伴，因为一个外国妇女不可能独身一人与中国人在一起，除非那些中国人是学生或诸如翻译、向导之类的雇员。吉姆和我与一两个激动的急于要同别人谈论“形势”的中国人去野餐。我们去紫禁城里的太庙，那里除了管理人员外，里里外外都空空荡荡。我们还骑自行车出城到乡下去。在乡下，戈壁追咬护城河里的鸭子，在一所农舍前，我们碰上了一只中国大黑狗。一个年轻农民跑出来挡住了狗，他带着爱狗的真情，用胳膊搂住了狗——除了我对自己的狗这样以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

“你的大狗真漂亮。”我微笑着对他说。

“你的大狗真漂亮。”他回答，态度很友好。

我看着晾在矮房顶上和挂在房檐上的红辣椒、大蒜、柿子，还有玉米棒子、高粱穗，对他说：“你们在这儿一定很快乐。”

“我们是很快乐。”他表示同意。或多或少，我们建立了片刻的真正友谊。

在那为数不多的幸福日子里，吉姆和我无所不谈——或者至少我是这样。吉姆并非健谈之人，他相当沉默寡言，但领会每一个暗示和联想。吉姆在牛津大学的一些朋友在西班牙作战，其中

一人于1936年11月在西班牙阵亡。吉姆处于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峰——一种与拜伦一致的思想，正经历一段诗情满怀、兴奋激动的时期。他处于待命状态，准备做任何事情和一切事情。

9月的一天，我听到我们的狗正在外面阻挡一次危险的红军的入侵。我穿过暖房冲了出去，发现佣人们正保护一位身强力壮、肌肉发达的生人，他拒绝象大多数来访者那样退入门房。当他把我丈夫的信交给我时，脸上笑开了花。这是自6月以来的第一次消息。我立刻就喜欢上王林了——不久我发现，埃德也是如此。王林穿着肥大的灯笼短裤，共产党员们当时认为，这是最好的资产阶级伪装。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从封锁线后边的红军那里直接来的红色信使——我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位。

“斯诺把我们那里的香烟都抽光了，他想咖啡想得要命。”他用中文告诉我（他不懂英文）。“这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時候，他非常受欢迎。”

这封长信所署的日期是8月3日，里边还附了一封黄华给张兆麟的信（可是张当时正在西安）。埃德的主要评论是：“他们看起来极为乐观和愉快。他们正在进行发现新的符合科学规律的世界这样困难的工作，就象小学生去参加足球赛一样。”

“我要和你一起回去。”我对王林说，“你如果不带上我就离开北京，我就把你交给警察。”

“好，好得很！”他想到了婚姻的幸福，高兴地搓着双手。“斯诺会多么又惊又喜啊！”

“他会吃惊，不会高兴。”我说。他竟表示同意，使我很惊异，“你要毁掉他摆脱太太羁绊的一段休假了。”

王林善于恶作剧，非常幽默，时常揶揄人。他假装把我带去使斯诺大吃一惊——但他从未告诉我，埃德已要求他返回时带我进红区。直到几个星期后，我才得知实情。（1978年，王林在西安市市长任上为我和王震将军举行了一次宴会。我在《中国共产党

人》。一书中写过王将军的传记。他甚至记得我们的狗的名字叫金格。)

我必须准备在几天内起程。我必须告诉吉姆·贝特兰，这样我不在时他可以照料一下。我还必须告诉麦克·费希尔，请他接替我照料一直由我处理的埃德的报纸工作。麦克听说我要进行这样一次危险的旅行，把他吓坏了，而吉姆则极想同我一道去，即使纯精神上亲近地与我同车到西安也行。在西安，他可以为自己进入红区的旅行进行交涉。我害怕独身一人上路，比吉姆还渴望能带他与我同行。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一起旅行，埃德将会大发雷霆。我甚至未请吉姆参加告别宴会。如果我请他来，对于我们的佣人来说，看起来不合适。在中国，佣人系统是通晓万事的信息网。

无论如何，我不能把这一切都向吉姆解释清楚——我从未告诉他关于我拒绝他陪同的原因——他一直没有原谅我。他认为我对他没有丝毫情意。我也只得让他认为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我忍受了反映强烈的实验性的斑疹伤害预防针（当埃德注射预防针时，我也注射了其它必需的预防针），我把长头发剪短，还烫了发。从宽大的床上取下漂亮的鸭绒被，做成睡袋。华北工业公司还给我做了一件适于旅行用的驼绒大衣。（埃德送给我一件华丽的豹皮大衣作为圣诞节礼物，让我在学生示威时穿得暖暖和和的，但它不适于旅行时穿。这件大衣在今后的40年中是我最好的挚友。）然后我定制了一双为寒冷的西北地区生产的羊毛衬里的靴子，吉姆给我带来了他的红羊毛牛津衫，祝我交好运。

按计划，我将在火车站与王林碰面，但在去西安的两、三天旅途中，绝不表现出我们相互认识。到西安后，一位红军联络员

• 康涅狄格州韦思特波特市、格林伍德出版社1972年重印。本书于1952年由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首次发行，原名《红色尘土》。

将来西京招待所看我。我对官方的解释是进行新闻工作和考古研究，用张兆麟——我们的学生朋友——做我的翻译和陪同。

吉姆提前很早就来接我去车站，他在院子里为我拍了照片。他完全循规蹈矩——我也是如此——但他难以控制满腔的激情，有愤怒和竞争性的嫉妒，还加上了九个月来作为我唯一的特殊爱慕者而积累起来的其志不遂之感。同时，吉姆很护着我，在各方面都表现出真正的绅士风度——在这方面超过了埃德。埃德以他对待其它一切上天赐物之道对待妻子，认为妻子理所当然是属于他的。

我的睡袋和其它装备放在一个柳条箱里，装上一辆人力车。我向狗和照例在大门两侧列队的佣人道了再见。然后吉姆和我沿着古老城墙下行人绝迹的道路出发了，就象四个月以前，我陪埃德走时一样。

“当然，你只不过是去世界的尽头——而且还要往前去。”吉姆闷闷不乐地评论道。

在车站，王林确保我们二人都互相看到了对方，但没有打招呼。我向吉姆挥手告别。老式火车起动了，喷出遮天盖地的白色蒸汽和乌黑的煤烟，沿着城墙轰轰隆隆地前进，汽笛的鸣叫声响得足以惊醒中国全部死去的人。

西安是一座高墙围绕的古城，城门威严高大，看上去象是为把长着反儒教天足的年轻美国妇女们拒之城外而建造的。警察在车站迎候所有的外国人，检查护照。只允许旅客住在现代化的西京招待所。

我到招待所不一会儿，就有人来访。来人脸上生有雀斑，身穿花呢高尔夫球灯笼短裤，戴着便帽，是归国留学生类型的中国人。他随随便便，坦白挚诚，有幽默感，而且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

“叫我查尔斯好了。”他脱下时髦的花呢便帽，用地道的英

语自我介绍。我的第二个红军新交与王林判然不同。王如初生幼虎，迫不及待地要扒平所有的拦路高山；而这一位看起来对我要做的事却无动于衷。

“我们只有一辆小卡车。”他通知我说，还有其它非常重要的行李需要运送。给我腾地方实在不容易。因为军队在调动，要把卡车开过分界线很困难。他真让人气馁。

我说：“叫我货物，不要叫行李。”^①我抗辩说，我只重108磅。

但工程系毕业生刘鼎（查尔斯的真名，这是我后来发现的）说他丝毫也不知道我丈夫现在何处，在干什么事情。此外，我看上去没有健壮到足以进行这样一次旅行的程度。我看上去不象是那样的人。“你为什么要去呢？”他问。

为什么我要去？为什么此事显得如此重要？我最后使他信服，尽管我不是象我丈夫那样有价值的行李，但我还是值得有一小块藏身之地的。

他告诉我，卡车可能在一天的拂晓出发。我必须独自一人乘人力车到达停放汽车的秘密地点。刘将提前打电话通知我。

“接到通知后几小时内你必须准备好动身。”

“你在这里一定很危险，”我说。

他张嘴一笑，“比起少帅，危险多不了多少；我在他家和他住在一起。”

就在那个时刻，西安是中国政治、军事力量和阴谋诡计的中心。一些军官在西京招待所下榻，空气里激荡着阴谋策划与变化不定的气息。法西斯分子变成了共产党人，或者至少成立了中立派；而前共产党员被法西斯分子收买去当特务或双料特务。形势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使对立面转化为统一。但蒋介石是一个死硬脑袋的反共精神病患者。两广地方军队于1936年6月2日发动的

^① 英文行李(luggage)一词又有戏谑妇女之意。

西南抗日反蒋起义，也丝毫没有使他改变。到了1936年9月8日，正是我旅行的时候，宣布事件获得解决。西安城人们对此不满，群情激愤。

当时，刘鼎是红军在西安的唯一联络人。（七十年代他在北京，经常去看望路易·艾黎。但我未见到他。）每隔10天左右，一辆神秘的东北军卡车，由一个身着东北军军装的卫兵押着，进出特务网和警察密布的西安。照这样，卡车带着“白色路条”能穿过白区到延安，当时延安还是少帅部队的司令部。从延安，人们就要有“红色路条”，骑马前往红都保安，保安是埃德度过他大部分时间的地方。

在西安，大约有两周的时间，我每天急得死去活来，期待着第二天早晨就出发，开始危险的旅程，到刘鼎所说的我可能被不定期地放逐在那儿的地方去。我过于紧张和激动，以致食不知味，寝不安席。我根本不是那种勇敢的人，但我有毅力，有命运感。

我们的老学生朋友张兆麟是少帅所办报纸的一个编辑。每天他都身着西装，带我参观城市——去鼓楼、钟楼、庙宇、博物馆、古董店。我们滔滔不绝地谈论“形势”。

张的心中充满压抑着的激动。又是我们两个，处在1927年以来就在中国酝酿着风雨的最大的风暴之中——就象我们在1935年处于张及其朋友发动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夕一样。

张兆麟自己也身处险境之中。蓝衣社已在极端法西斯分子蒋孝先指挥下从北京调到西安，蒋孝先是蒋介石大元帅的侄子。执行恐怖任务的“特别行动队”不断绑架学生和其他人。尽管如此，少帅电告蒋介石说，他将“保护一切爱国志士。”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9月，在我离开西安前夕，西安的法西斯宪兵绑架了宋黎——我们的朋友，警察“最急于追捕”的三位学生领袖之一。少帅大发雷霆，派了两个连的士兵包围了宪兵的拘留所，救出了学生。宋黎一开始就是学生和少帅之间的联系人。他在西安时就

住在少帅家里，对少帅的思想有很大影响。

1936年3月9日，宋黎来北京看望我们，谈到了他与少帅会谈的情况，他引述少帅的话说：“我想，你们会对我最终的政策感到满意。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我的真实感情，尽管我深切同情你们的运动。我要尽一切努力使我们的人知道你们的想法。”他把宋黎带到一个有500名军官参加的会议上，并讲话作了介绍，让宋黎发表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反内战演讲。

当埃德在6月抵达西安时，少帅与红军实际上已经休战。但蒋介石计划了一次新的反对红军的“剿灭战役”。10月初，法西斯分子逮捕了来自华北的三位学生代表。少帅关闭了所有的城门，派部队包围了他们的总部，部队砸开大门，救走了那三位学生。

所以在西安，在蒋介石和反对他的政策的势力之间，已经开始进行一种冷内战。自10月初开始，少帅的军队已准备好为保护红军不遭受进攻而战。这就是我来西安时的形势。

刘鼎已经几次打电话通知我，那辆小卡车尚未到达。两周后他来看我时说，由于军事演习，卡车被阻在渭河对岸了。他无法查明我丈夫将在什么时候返回，但他认为，由于需要，几乎随时都可能回来。他劝我立即离开西安，部分是为了不把注意力引向埃德，如果他被发现，一定会失去胶片和笔记本。

我根本不想离开西安。虽然我是一个蹩脚的女记者，但在我可以不费力地得到一个有价值故事的时候，我能看得出来，而现在这里就酝酿着一个有价值的故事。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记录历史的机会。恰好我在西安那些日子里，两支从南方来的红军部队在朱德将军率领下，正一路打进甘肃，在10月份与毛泽东的纵队会师，结束了他们分开进行的长征。

少帅派人来请我去，他想要我作为唯一可以见到的外国记者，通过埃德所在的报纸《伦敦每日先驱报》，扩大传播西安的形势，如果在少帅的印象中，斯诺夫妇和欧美民主国家的政府要

员们结成了联盟，我将一点也不奇怪。两个年轻人在没有来自任何方面“保证”的情况下，完全自行其事地做埃德和我一直在做的事，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在那些日子里，在亚洲，作为一个美国人真是太棒了。波涛在我们面前让出通路，就象摩西来到红海边上，他面前的波涛给他让路一样——特别是一个红色的海洋。我们到处受欢迎。任何美国人都很可能被看成仅次于罗斯福本人的最美好的事物。

· 有几位中国记者也应邀参加会见，但不允许他们发表任何东西。

在此之前，我未曾见过少帅，尽管他显然知道我的一切。他37岁，当日本于1931年从他手里夺走满洲时，他是那里3,000多万人民的统治者。从1930年起，他就是中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仅次于蒋介石大元帅的第二号人物。他为蒋火中取栗，是蒋的“小兄弟”。1933年，他赴欧旅行。在欧洲，墨索里尼及其女婿齐亚诺伯爵使他转而信仰法西斯主义。由于学生运动，还由于他钦佩战胜了部队的红军，使这位中国的第二号法西斯分子抛弃了所有这些胡说八道。对于他自己的东北学生——有些还参加了他自己的青年团，帮助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他感到很自豪。这减轻了他为丢失东北而感到的耻辱。到1936年2月，正如他得意的学生宋黎向我们报告的，他已经是反法西斯的了。

10月3日，我戴上蓝色的小山羊皮贝雷帽，围上红白蓝三色围巾，和张兆麟坐上人力车出发，去赴定于6点钟与“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会见的约会^①。我们几乎抑制不住欣喜的心情。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的知识分子用漂亮的英语向我们表示欢迎。他是少帅的秘书，名叫应德田。他胜利的神态甚至比我们还

^① 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是——更加外露。（两个月后，应将成为谋划绑架扣押蒋介石的“三个火枪手”之一。他们三人最初受了学生运动的影响，但他们富于想象力的绑架大元帅的行动则是他们自己的主意。）

少帅张学良身着便衣——一件简单的灰色长袍——高明的儒家风格，因为他即将宣布他自己及其军队反抗最高统帅。形势悬而未决，令人惊心动魄。过去一年的历史全部显现在我眼前，我忍不住向他微笑了。他有一点不知所措。他为埃德去红区旅行提供保护，他一直乐于为我的旅行提供保护——尽他最大的力量。他与我有一样共同的东西：我们经常把学生藏在自己家里躲避警察。当我提到他以个人名义作出担保使在北京的46名被捕学生得以释放时，少帅哈哈大笑起来。

我事先提出了五个问题。少帅的回答与蒋介石的政策截然相反。他爆炸性的正式声明如下：

“如果共产党人能够与我们精诚合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共御外侮，那么这个问题也许有可能如近来的西南事件一样得到和平解决。”

会见结束时，他走过来与我握手。这是一种盟约、保证。

在街上，张兆麟和我非常庄严地握了手。事已至此——破釜沉舟了。

国民通讯社发出了编造的报道，竟敢伪造引用副司令的讲话。

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我的电报。我不得不乘坐去北京的首班火车，我极不愿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件正在发展时离开西安，但查尔斯——刘鼎坚持让我走。无人知晓什么时候少帅自己也可能发生危险。形势极为动荡不安，无法预测。张兆麟决定在我乘火车回北京途中当我的警卫。

离郑州不远时，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走进我们的车厢。他自我介绍他是万毅上校，他怒火中烧，义愤填膺。他断言：“我们必须与红军合作。”他在谈话中公开蔑视蒋介石，他说：

“士兵们将自己起来采取行动，不需要命令。”

车窗外，我们看见几列南京政府精锐部队的军车赶赴参加反对红军的战役。我们知道，他们还被派去包围反上抗命的东北军和镇压万毅这样的军官。

万上校在郑州与我们握手告别时，张兆麟眼里噙着泪珠。

我对张评论道：“你看，两颗小小的芥菜籽^①，却收获到了多大一批龙的牙齿啊！”

一年前，我们在活地狱似的气氛中窒息。现在，东北军全体150,000将士与我们在一起，他们站在学生一方，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在我的手袋里是少帅保证率领他们的声明！我们不仅有了北京，而且还有了整个华北。

但蒋介石还不在我们一边。

在我望着张兆麟和那位上校时，我想到这一定是我呆在中国的原因。一两个无名的学生通过不到一年的宣传，能使整个大军开上战场。知识分子与实干家相结合就象火种与干柴碰在一起。（后来，我认识到，在所有尚未工业化的国家里——那里除了在学生中外，社会上并不存在真正有发言权的中产阶级——情况都是如此。）

回到北京后，我把与少帅的会见写成文字，用电报发给《伦敦每日先驱报》。合众社把它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文章还在《密勒氏评论报》和《华北明星报》上发表了，并险些引起一场早产的西安事变。日本人要求南京政府作出解释，南京政府则否认会谈实有其事。

但中国的学生则欣喜若狂。

① 英文中芥菜籽比喻有发展前途的小东西。

第二十五章 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10月， 斯诺归来

我大约在10月7日自西安返回北京。重新坐在我安放在凸肚窗前的办公桌后面，我赶写出了一些文章和信件。我现在是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的华北通讯员，是《亚细亚》杂志的定期撰稿者，是《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的代理通讯员，是《民族》杂志的中国通讯员。我们的代理人亨利埃塔·赫茨提出要我出一本诗、文各式文体都有的书。（她一直是斯诺—贝特兰三人合股公司的合伙人。尽管我们彼此天各一方，但是我们热爱她。她发来的每一封信都充满了美好的、暖人心房的消息——还有钱，无论如何总有一些。）

我还忙于为在朝鲜和满洲新交的朋友买茶叶、丝绸和其它一些东西。生活非常甜蜜，成功接踵而至。

大约在10月25日左右，我象往常一样在桌子后边忙着，戈壁和金格无精打采地蹲在我的脚边打着哈欠。侧门上的敲门声使我们惊跳起来。这是意外的土匪行动。所有来访者都由门房正式向管家禀报，再由他依照皇家礼节向老爷或太太禀报。

站在台阶上的人是我的丈夫，透过灰色的胡须，露出一张胜利者的笑脸。

“我想，您是利文斯通夫人吧？”他一边鞠躬，一边发问。

“你活象一只吞吃了猫的金丝雀，”我回答他。

“你要干什么？”两条狗也想要知道，参加了齐声大合唱，在他身上扑过来扑过去。

他身上背着各种形状的包裹走了进来，在地板中央放下这些

大包小包。他从一个包中拿出一顶缀有一颗褪了色的红星的灰色旧帽子，然后戴在头上，拉低了盖住一只眼睛，便在房间里转着圈象小鸟似地蹦起来了，戈壁与金格也跟着他又蹦又跳。他为满载而归而高兴得不能自持，也庆幸自己的劫后余生。他所有的卷宗、胶卷和笔记本都安然无恙地在地板上放着。

在他提出通常的要求之前，我已按响了电铃，“我要炒鸡蛋、骆驼牌香烟、麦克斯韦尔豪斯牌咖啡……。”

“还有蓝吉力牌刮脸刀片，”我替他提出最后一项。

“还要桃子罐头——美国的桃子罐头。”对放逐在远东的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奢侈品。只有这一次，我对花钱买进口奢侈品毫不介意。

佣人们动员起来，全体出动——烤牛肉、苹果饼、热饼干。

埃德要看给他的信。我把信箱放在他面前靠近大扶手椅的地方，所有的信都已答复。

他欣喜若狂地浏览了来信，然后一把抛在地板上——来信的有他的出版商、《星期六晚邮报》，他的父亲、姐姐和哥哥，而大多数信则来自亨利埃特·赫茨。

我递给埃德我们所见到的亨利埃特的第一张照片；她长相漂亮，有一对热情、富于同情的眼睛。我告诉埃德，她要 and 菲利普·科恩结婚了。

“该回家了。”埃德羡慕地说，“我要知道她长得这样，我的工作会做得更好。”我们都想起了我们第一次见面以后常说的老话。

“那些人都怎么样？”我尽量想从他身上掏出一些东西来，但他乐不可支地逗弄人，避而不作答，使人心怀悬念。忽然间，我想起了至关重要的一点，要在任何人了解情况之前，把埃德带回的胶卷冲洗出来。

不到10分钟，我已经带着胶卷坐在去哈同照相馆的人力车上了。我还带上了一些毛泽东在保安亲自送给埃德的珍贵照片，准

备去复制，这些是仅存的在长征开始前拍摄的照片。哈同照相馆是德国人开的——我推测也许是纳粹分子——在照片里，红军的每顶破旧帽子上都有一颗明显可见的红星。我们每天都提心吊胆，惟恐胶卷在哈同照相馆“丢失”，并希望冲洗这些照片的中国人不了解照片的价值。

这些照片确实曾几乎丢失。10月21日，埃德乘坐东北军的秘密卡车快到西安时，在离西安20英里的咸阳，错把他的装有全部胶片和笔记本的包裹卸了下去。幸运的是，卡车又开了回来，把包裹找到了。

还令人感到幸运的是，当我后来去哈同照相馆取回照片时，看见照片冲洗得很好，也无人过问。

直到埃德的胶卷和文章发往美国之前，为他这次的旅行保密是非常重要的。自从学生运动开始以来，北京当局就检查邮件，但至今尚未敢动外国人的邮件。只要他这次旅行一旦公之于世，一行一动都会被监视。我们也确实弄不清楚会发生多少麻烦。当然，日本人在北京的势力也非同小可。

大约在埃德秘密回家两天以后，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是美联社的吉米·怀特。

“你最近一次接到埃德来信是什么时候？”他问我，声音里充满了警告。

“就在不久以前。”我小心谨慎地回答。

吉米说，从西安来的一项报道说，埃德已被中国的赤匪处决了。合众社在美国已播发了这条新闻。

这是最坏的险事之一；可以暗杀一个旅游者作为诋毁红军的手段。

在13号住宅里，我惊愕地和埃德低声耳语，他已对局势有所警觉。

埃德下了决心。他拿起电话，向吉米讲述了他的经过。

从英国和美国开始发电来询问。关于埃德的讣告在堪萨斯城

已排版待印。在西安就要开始一场寻找我们两人的大规模调查。我们立即电告西安军事司令部，我们两人都安全地住在北京。

就在埃德回来的几天之前，一家报纸刊登一篇报道说，我在新疆被土匪杀害。现在，一位传教士报告说，埃德死于甘肃。斯诺夫妇在西北遭受屠杀，但蒋介石最精锐的军队与警察对此却一无所知。

对于保安部队来说，这可不是等因奉此的例行公事。就在不久以前，发生过列强占据了面积如同山东省大小的一片领土，作为对中国人杀害了他们的一个公民的报复。中国处在被列强瓜分的边缘。在义和团时期产生的恐惧至今还在起作用。各地的中国人都接到一项严厉的命令，要随时随地讲清每个外国游客的下落，否则性命难保。

在整个10月份，当我在西安，特别是埃德在该地的那一天——正赶上蒋介石与张学良10月21日在西安会谈——盖世太保和蓝衣社两家法西斯分子的精锐走卒应当是以最高的效率在行动。如果这些保安部队对这两个流浪的外国人一无所知，这就太丢脸了。他们到处绑架中国人。外国人在中国一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去红区的旅游者可能就不享有这种逮捕豁免权了。

我们的安全系于对我们的猜疑的多重性。日本人曾经认为我们是罗斯福总统的密使，现在又猜测我们是拿南京政府薪水的代理人！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人敢于当苏联的代理人，但有些部门则猜测我们是。（1975年，我发现共产国际驻中共方面的代理人德国人奥托·布朗怀疑埃德和我都是美国的间谍！）这可以演出一台大喜剧了。但在当时这可不象可高兴的事。共产党人仅能稍稍理解一点个人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整个同个人有关的观念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你必须属于某个团体，或者为了钱，才会进行不寻常的活动。新闻记者的工作就是采访纯新闻，而并非别有用心，这对中国人来说几乎难以想象。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和其它东方国家，这么多的外国人被当作间

谍逮捕的原因。个人首创精神对于他们来说陌生到难以理解。

在陕西，邵力子省长被责令负责，而且警察和宪兵被改组，这是因为埃德旅行一事他们被蒙在鼓里。（次年，我将不得不为这次西安的丢脸而付出代价，我将不得不沿途穿越几乎相同的警察与盖世太保的封锁线，而这次他们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当埃德的文章开始发表时，南京政府说这些都是骗局。直到他的照片发表以后，这种攻击才停止下来。

埃德红区之行的重大成果是：中国的右翼与左翼势力都相信他所说的每一件事。他享有完全的可信性。从这方面讲，他的旅行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帮助使舆论倾向抗日的统一战线。

在新闻报道里吹奏出来的雄庄激昂的号音震撼下，积累起来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谣言和猜疑，如同耶利哥的城墙^①一样土崩瓦解了。埃德的新闻报道甚至影响了剧中人物，即共产党人自己，使他们在自己眼中形象更加高大，而最重要的是，使他们第一次认识到，“帝国主义者”并非全体一致，尤其是在同美国人打交道时，尤其是同美国人民打交道时，他们或许有可能利用一派去反对另一派。

如果埃德是一名共产党人，他的报道将不会有什么价值。但事实上他是个记者，把事实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对于宣传深恶痛绝。他喜欢自己的读者，首先想到的是他们——把事实告诉读者是他守望太平洋一职所应尽的责任。埃德爱他的读者。在麦卡锡时代，埃德看起来好象被他自己的读者所拒绝，这确实使他大为震惊，深感伤心。

埃德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他讲自己时代的语言，能为自己的读者所理解。他是在适当的地点、而又恰逢其时的适当的人。他可以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且是在年复一年地观察事实的基础上这样做的。他完全没有个人偏见，在任何问题上都

① 西亚死海以北的古城。典出圣经故事。

没有自私和主观的目的。

埃德回家后的两三天内，他一边抽他的骆驼牌香烟，喝他真正的麦克斯韦尔豪斯咖啡，一边与我滔滔不绝地谈个没完没了。在通常情况下，他是不愿谈论自己正在着手写的任何主题的。这样会破坏自发的新的思路。一般说，埃德既不疑虑重重，也不热情奔放——他轻松自如地处理他所掌握的事实。从不下结论和不易冲动这个意义上讲，他决不简单幼稚。除了对孙中山夫人外，他对任何人都不特别崇敬。

现在他不仅为他自己、而且为中国人发现了毛泽东。这是真正前人未发现的新大陆。他终于面对真正的中国——他认识到了这一点。这里有一位80%中国人的真正领袖，一位已经担当起这个角色的人。

“你喜欢他吗？”我问他。“他对你友好吗？”

埃德有抬起眉毛微微一笑来逗弄人的习惯。他很少回答这样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而且他仍然处在作结论的过程之中。

“我是采访他的第一个外国记者。”埃德回答，“据我所知，我没有树立任何敌人。”

当然，他与毛泽东相处得极好，并喜欢他。但是直到第二年我才发现，埃德在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相处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他是毛泽东所交的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主要的外国朋友。

埃德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形式的英雄崇拜。他深恶痛绝的一件事就是当时用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人身上的“我们伟大的领袖”这句话。他高兴的是，这个术语尚未成为毛泽东的礼仪。（1970年，埃德问毛泽东本人，他对他周围建立起来的个人崇拜怎么想。毛回答，这做过了头。这句话在中国被广泛引用，其结果是，全国各地的大雕像开始放倒下来。）

尽管如此，就我所知，埃德挂起的唯一的一张照片就是他拍的那一张有名的毛泽东半身像。在中国，这张照片仍在使用，而

且多年来是共产党人中的一张官方照片。（在此之后，他这样尊敬过的唯一另一个人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罗氏最后一次竞选运动中，埃德在我们家正门上挂起一张罗氏的大招贴画，我们家所在的城镇传统上一贯投共和党人的票。）

埃德带回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毛泽东本人自述的平生经历，这种自述从任何中国人那里得来都是令人惊叹的珍宝。他还采访到了周恩来、彭德怀等其他几人的简短的生平事迹。当我阅读这些材料时，我意识到，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作一次类似的旅行，以取得其他人的传记材料。

埃德要我缩短毛泽东的故事情节，摘出来供他写书使用。他说，反正他要用自己的话改写部分内容。我听了大惊失色。

“可这是经典之作，无价之宝”，我向他抗议说。这将是埃德的书的核心，主要支柱。它以完美的形式说出了毛泽东的全部背景。我争辩说，埃德不但不应当动它，而且要使用毛泽东向他讲述时所用的每一个字。“嗨，这如同听乔治·华盛顿在福奇谷讲美国革命的故事一样。”

“你不能把这样一大块难以理解的东西放进书里——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这将破坏这本书的销路。”

“别管销路。如果读者愿意，他完全可以略过这一部分不看。但这将使你的书成名。如果你的书有这一重大情节，而未塞进太多的迎合时尚的货色，你的书就能成为传世之作。”

埃德认为，如果我照抄所有的内容，将是白白浪费时间，他命令我删去“所有这些姓名、地方和部队的名称。你不能在一本书里这样记载一大堆中国人名。”

尽管如此，我还是坐下来，按照对埃德所讲的原话，一字不改地从手稿上誊下每一个词、人名和其它一切。尽管这样可能使某些未来的读者厌烦，但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秘史。

在将故事情节全部收进书中的问题上，埃德和我进行了很多争论。我对此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我不敢在那一年4月离开

他自己去旅行，唯恐他趁我不在时删去大部分故事情节。（当我再次见到他时，这是我问他的第一件事。他实际上确实发表了将近全部故事情节，但内心有些忐忑不安。但我认为他也的确删去了许多姓名。）

我同意，这也许几乎破坏了书的销路——但另一方面，我知道，这将使书在许多年内有长远的价值。埃德的观点是进行交流；我的观点是看它是否有益。我认为让读者了解毛泽东和他的事情是有益的。

在把埃德带回的材料写成书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过得多么紧张愉快啊。当我从哈同照相馆取回他拍摄的照片时，是多么兴奋激动啊。在半个小时之内，我认识了所有的人，名字和相貌都对上了号，然后坐下来，利用埃德零乱的笔记，给照片写出长长的传记说明。我把埃德带回的绝大部分材料都写成文章，由他再改写成书的内容。他把他的毛泽东自传的原始手稿送给了我，做为酬谢我为他打字工作的礼品。（离婚后，他要求收回，并得到了手稿。）

对埃德来说，最紧迫的事情是为了其本身的新闻价值，发表他采访毛泽东的访问记。这是报界第一次引用毛泽东的谈话。当《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采访内容后，这10页文字震动了中国的知识界。

埃德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的报道发往全世界，然后又被用电讯传回中国，在中国激起了极大的兴奋。

这一切有一个副产品，就是通过埃德的居中介绍，苏联领导人认识了毛泽东，欧洲和中国人也认识了毛泽东。在此之前，俄国人完全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人，而对蒋介石估计高了。他们虽然后来还是那样做，但毕竟不再愚蠢到以前那种程度。他们的代理人奥托·布朗向他们提供了错误的情报；他在中国没有经验，并且憎恨毛泽东及其政策。埃德的报导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使苏联更有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与美国结成联盟。

第二十六章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如同地震冲击波突然到来。它的余波则强烈如同地震。埃德归来以后的六个星期里，我们两人生活在神魂颠倒、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我们谈论埃德的材料，并把这些材料整理成文章，随后发送出去。我照料他的来往信件，这样，他可以在盔甲厂13号门房附近的私人房间里开始写《红星照耀中国》。我当了一年的学生运动的首席宣传员和公共关系主任。现在，我又有一项新事业，我免费发送的材料不仅有埃德的西北访问记，还有他拍摄的一些照片。我免费送给美国人办的上海《大美晚报》的编辑兰德尔·古尔德^①一些材料，例如，一篇关于周恩来的文章，和埃德在北京协和教堂所作的一次讲话的发言稿。埃德是教堂的程序委员会主席。其它材料送给了J·B·鲍威尔，供他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只有在中国发表的材料才能产生最大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中国人而且影响了外国人。这些文章为共产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结成统一战线铺平了道路。

我与中国的爱情达到了高潮。我爱学生中的每一个人。我爱全东北军的每一个官兵。我准备把老将军宋哲元、当地的十九路军和站在正义一方的任何土匪头子都包括在内。我爱教师和传教士，他们如饥似渴地要求埃德给他们作报告，放映电影，并深切地关心他的调查结果。他们模糊地意识到，在华西方人的全部未来可能取决于埃德发现的这些共产党员们是什么样的人。

仅在一年前，燕京的学生们挺身而出，在绝望中作殊死搏

^① 美国人，汉名高尔德。

斗。目前，全北京——全华北——紧密团结起来，不仅抗日，而且结成了反法西斯战线，即使官方的政策只容许抗日。在军队和知识界，发生了一场心理和观念上的革命。“一二·九”运动使日本人受到了惊吓而退缩回去，但他们仍有可能随时占领华北。一时一刻也不能耽搁。世界在飞快地变化。奥地利、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成为纳粹统治下的傀儡当政的国家。西班牙共和党人正节节失利。法西斯分子正在欧洲接管一切。但在中国，我们使前第二号法西斯分子——少帅张学良——完全站到反法西斯一方。头号法西斯分子蒋介石委员长仍然死硬顽固，仍然不允许抗日，也没有改变对红军的强硬政策的表示。

10月8日，蒋介石友好地接见了日本大使。如果日本同俄国发生冲突，那么得到蒋同意的日本反共计划就要把中国拖入日本一方参战。10月21日，蒋介石飞到西安与少帅张学良及其他人进行磋商。

报纸大标题写道：“11月1日米兰讯：墨索里尼寻求在德意协定基础上的欧洲合作。……自威尔逊思想体系里产生出来的任何幻想都必须抛在一边。”

“11月2日洛阳讯：蒋介石宣布，所有的叛逆都要一体消灭，特别是受知识分子领袖严密组织、精心指导的共产党分子构成了对国家的巨大威胁。”（直到目前，这些共产党人还是被称为“赤匪。”）

在西安（在那里，张兆麟、宋黎和陈翰伯正在影响少帅及其下属军官），张兆麟办的报纸于11月1日报道：“本月26日^①，蒋介石将军对高级军官训话，其结论是：加紧剿共，谈论抵抗是毁灭国家嗜的^②行为。”……上月31日，已下令剿灭共产党。”

蒋介石开始调动他的最精锐的部队三个师，由胡宗南指挥进入阵地。胡进入红区80里，陷入红军惯用的埋伏。自11月18日到

^① 原文如此。

21日，胡在突然袭击中被打败。

11月26日，公布了日德反共条约。

蒋介石已前往西安，组织另一次反对红军的战役。防止这次战事，团结抗日，成为日趋紧迫的任务。

1936年12月12日，是预定要进行另一次学生示威的日期。黎明前，北京青年离开宿舍出发了，他们浑身上下都是参加游行示威的装束——围着厚厚的围巾，穿着厚棉袍。当他们走上北京街头时，他们确信几乎全中国的学生（一小撮法西斯分子除外）和绝大多数人民支持他们，地方当局暗中也欢欣鼓舞，对此他们感到很高兴。

天气严寒多霜。我戴上蓝色的羊皮贝雷帽，围上红白蓝三色围巾，穿着豹皮大衣。埃德与我乘出租汽车去接吉姆·贝特兰与合众社的麦克·费希尔。寻找示威游行的队伍是我们常遇到的困难。我们通过跟随骑自行车的学生通讯员找到了示威队伍——你可以把他们与普通骑自行车的人区别开，因为他们低着头，脖子贴到车把上，他们兴高采烈，目光专注，就象他们要把信送到加西亚去一样。

“你冷吗？”麦克·费希尔问我。“你哆嗦得缩成一团了。”

再也没有比这更超乎我们想象的了，黎明时刻，在西安附近的临潼，蒋介石委员长象学生似地身穿睡衣，攀过高墙，在寒天冻地里夺路而逃，跑到附近的山上躲藏起来。

我们跟随着学生来到紫禁城附近的景山，市长在那里很同情地对他们讲了话。我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的定期文章中写道：“这次示威是在北京举行过的最成功的一次。”在景山有4,000名学生；在街上有6,000名学生游行，警察很少干涉。12月

9日，学生在西安举行了示威——强调“一二·九”示威一周年的意义——张兆麟给我们寄来了学生宣言的复印件，12日北京示威时散发了这些复印件。景山群众大会后，他们高举红旗，唱着歌，列队回校，人们告诉我，自1927年以来，这里第一次有人在街上唱歌。他们唱《义勇军进行曲》，从“一二·九”运动开始，这首歌对人们就是一个鼓舞。蒋介石如果在这些学生中间，也不会比在西安安全。统一战线正在高潮之中，每一分钟都在高涨。

这一天累得人筋疲力尽，头晕眼花。但我们已约定好请吉姆·贝特兰和伦道夫·塞勒与路易丝·塞勒夫妇吃饭。我们抓紧时间换上礼服，没有使客人们等得太久。塞勒夫妇的两双坦率的蓝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神情。我们等候吉姆。不一会儿，他来了并同客人们打招呼，一反过去沉默寡言的常态。

“你们听说了吗？今天早晨，蒋介石在西安被东北军杀死了。”

无人作声——一片沉寂和难以置信。

直接走进虎口不是蒋介石的性格。这是古老传统的中国大歌剧的风格。这个消息好得令人难以相信——实际上并不确实，不完全确实。

这是千载难逢的时刻。局面转过来了。很明显，中国的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举行兵变，逮捕了总司令。第二号“法西斯分子”已经转变立场，俘虏了死硬顽固的头号法西斯分子——是死是活，无人确实知道。

在此后的一两天内，电话里传来了谣言与臆测。没有确实的消息，也没有人会相信消息说的是那么回事。宿舍里，学生们欣喜若狂——但一想到现在一场内战可能难以避免，便又冷静下来了。南京的形势和西安一样危险和若明若暗。中央社报道说，张学良于12月13日举行兵变，并通电“要求推翻政府。”

来了一名学生（我想这是俞大卫）询问消息，并说学生会要求立即对日本宣战和成立代议制政府；他们谴责“在任何借口下

进行任何形式的内战。”

街头平静。没有群众反应的明显迹象。燕京的学生又来访问。休伯特·梁来了。东北的人来了。

其中一个东北人带来一个从满洲来的义勇军。他告诉我们，在满洲有18万义勇军，包括游击队——其中大约有80,000人是红军。自1931年以来有50,000义勇军被杀，大约8,500个日本人被消灭……他说：“日本人训练狗吃活人作为对抗日活动的惩罚。”

东北人终于带来了某些确实消息：蒋介石于12月12日在西安附近的临潼被少帅的卫队指挥官孙铭九上校逮捕。西安的全部法西斯分子都被逮捕。第一个被打死的人是蒋介石的凶狠残忍的侄子蒋孝先。他从北京被调往西安当宪兵第三团团长。他利用在宪兵第三团的前共产党人，在1935年底破坏了共产党在华北的机构，并不经审判就处决了许多无辜学生，他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少帅和杨虎成将军共同发起捉蒋，并试图通过“兵谏”来强迫蒋介石接受少帅的八项主张。但蒋介石拒不与他们会谈，反而要求他们杀了他。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孔子门徒，要“面子”的观念在他身上是根深蒂固的。

少帅的八项主张在北京得到全面支持。“东北人协会”中有人通过私人电台得到了八项主张的内容，他们给了我们一份。其内容如下：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

停止内战，立即抗日。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释放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权利。

确实遵行孙中山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东北人一致认为：要末你打死老虎，要末老虎吃掉你。他

们知道，如果张学良不成功，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报复的目标。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关头，危机自1931年9月就开始酝酿了。每个东北人都认为，如果蒋介石逃脱，他决不会宽恕，而会报复。（他们是多么正确啊！40年以后，少帅在台湾仍被囚禁着，直至1980年才被释放。）

最后，唯一可以说得到满足的要求是：在抗日期间暂时停止了内战，尽管蒋仍然一贯让其精锐部队对红军进行监视、封锁。过了一段时间后，释放政治犯才得以实现。

12月16日，一份苏联的《塔斯社新闻》油印电讯稿送到了我丈夫的办公室。这份电讯稿油墨未干，就由报童送给在北京的五、六个外国记者。往别处寄还要等一些时候。埃德出门了，但当我正在阅读电讯稿时，大卫·俞来了。

我看了这份《塔斯社新闻》感到很吃惊。我的反应是，俄国人根本没有得到关于形势的情报。我送给大卫一页，接着我就重读另外一页。大卫的双手发抖。当他阅读这份令人难以置信、违背事实的声明时，他的脸色惨白。他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我担心他的心脏病会发作。

“他们一无所知。”由于震惊，他的声音低而嘶哑。“他们攻击的是在西安的共产党人的立场。这将损害统一战线。”

官方报纸《真理报》的社论引述如下：

“努力把中国团结起来……进行一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这就是主要任务，这个任务……正落在南京政府的身上。中国人民的敌人的代理人鼓动反动势力顽强地抵抗这种努力。举世周知的日本的代理人汪精卫的名字和张学良军队的兵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张学良本人一贯执行不抵抗外来侵略的政策。现在他……举起了据说是抗日斗争的旗帜，实际上他在帮助分裂中国，并播下使中国陷于更大混乱的种子。……日本人煽动过，现在又在煽动个别将军跳出来反对南京政府……日本的

奸细们决藏不住他们的狐狸尾巴。苏联忠于严格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政策。组成‘独立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傀儡国家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夺取中国领土，这和苏联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中国人民大众不会允许他们自己被日本奸细及其雇佣的特务所欺骗……”

上文注明的日期是12月14日于莫斯科。同一天，另一份共产党官方报纸《消息报》，以荒谬绝伦的谎言作了类似的攻击：

“去年，中国社会的一切力量都越来越团结在南京政府的周围，……这很清楚，不管它用什么口号和主张作掩护，它不仅是对南京政府、而且也是对全中国的威胁……人民统一战线……应被看作……与南京政府在一起的战线而不是反对南京政府的战线。”

然后《消息报》引用了未指明来源的日本电讯：

“‘张学良的政策是苏联支持的。’……

“这显而易见的假消息是日本方面的人士传播的。”

对于蒋介石被捉，大卫的惊讶程度不亚于我们，但他知道，在西安的全部政策是与红军人士共同协商执行的，除了捉委员长这段插曲外，张学良与他们的想法完全一致。我们当时不知道捉蒋是谁策划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出人意料的时刻，大卫和我四目对视，惊恐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又一次想到，我真高兴我不是一个中国人。随着，眼睛里充满了对大卫、对他被围困的国家同情的泪水。围攻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内部和外部，进攻的武器中也包括谎言。这种事情能使中国的公众舆论——左、中、右都转为反苏。这能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转变成反对中国红军。在西安，这将超出任何人的理解力。法西斯分子将会高兴，但他们还是不会信任苏联（他们从未相信过）。这甚至能使中国共产党人变为反苏——秘密地而不是公开地。

大卫和我似乎代表了三十年代由于历史而联合起来的中美青

年。我们遭受着法西斯力量的进攻，现在又受到苏联的攻击。大卫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一年来，我的全部时间几乎都用来努力帮助拯救中国，使她不受日本和法西斯的叛国卖国行径损害。我们从未想到要把苏联牵扯进“世界革命”或抗日战争。我们全部的想法是动员中国保卫自己，但没有某种的民主自由，这根本就办不到。我们所要苏联做的只是不要介入中国的事务，顺其自然，让事态自行发展。现在，苏联自杀性地攻击它的朋友，而不是攻击它的敌人。

我给塔斯社记者打电话：“你能不能推迟一天公开发送这些电讯稿，等我给你送些消息去？请你发电报给莫斯科，告诉他们错到了何种地步，并给他们送去一些有关事实真相的材料？”

他说他对此不能予以考虑，他没有选择余地。我顿时泪水横流，再也讲不出话来。我知道他也许会丢掉差事，但要与此举所涉及的利害关系相比，看来就微不足道了。（30年以后，当中国和苏联几乎要兵戎相见时，这就变得更明显了。）

大卫在绝望中听着。

我挂断了电话，然后告诉大卫，他必须去塔斯社办公室，将事情的全部过程告诉他们，把共产党的观点讲给他们听。

“这种事我不能做。”他说，“我们从来不许到那里去，或者与任何苏联人打交道。这不行。”

“尽管如此，此事无论如何也得办。我想，你不得不牺牲你自己了。我将和你一块去，并负全部责任，我去和他们谈。我不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是一个美国人——他们要为拒绝听我讲话而羞愧。”

“你是对的。”大卫说。他要一张纸给他们写了一份备忘录。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也许在那个塔斯社报童把电讯稿送到中国报界之前，能把他叫回来。我把下边衬着复写纸的白纸递给大卫，以留作记录。我保存了一份副本。在这个时刻，大卫可能因违反纪律而被开除出党，看上去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

我让管家去叫了两辆人力车，穿上豹皮大衣，戴上贝雷帽。我把我的红白蓝三色围巾紧紧地围在脖子上，一头飘在身后，从此以后，我一直这么紧紧地围围巾。

我们进了苏联大使馆宽敞的大院。塔斯社人员接待了我们，尽量做出彬彬有礼的样子。他是个年轻人，明显地和我们一样感到身处困境，迷惑不解。我简单地说明大卫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来此地。大卫把备忘录递给他，那个塔斯社人员把备忘录抓在手里，就象这是一根点燃的炸药棒。

大卫在备忘录里解释道，500名学生离开北京去西安，在那里建立民主统一战线。他说：“蒋介石施展了他最后的诡计——离间东北军，切断其与红军的联系，再切断统一战线——然后他就要解散他们……如果蒋介石没有被抓起来，他就会全力以赴去进攻红军，消灭东北军，并镇压人民战线……捉住蒋介石是英明的行动——它使全部亲日和抗日力量发生了两极分化。”他的主要观点是，西安事变的原因是“蒋介石试图消灭统一战线。”

大卫没有被开除出党。正相反，随后他作为代表被派去参加1937年在延安举行的共产党会议。在延安时，5月8日那天他郑重其事地来看我，并向我解释说，他同意在《解放》上阐明的毛泽东的政策：“中心路线是为民主而奋斗……当前，共产党必须团结一切阶级对日作战。”

当时我并不知道，是谁或什么原因救了蒋介石一命。直到1937年末，我从延安回来后，才得知内幕。这是埃德在上海发现的，并写在《红色中国杂记》这本书里。

在我一生中所发生过的事情，没有一件象西安事变那样富于戏剧性，那样不可思议——而且每当有一种新的说法出现，就更显得如此。这使我想起了日本的古典电影《罗生门》，在这部电

•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年。

影里，一次谋杀案的每一个目击者所看到的角度都不同。埃德和我计划就西安事变这个主题合写一本书，我自己实际上已开始写出几页了，打算写成一出歌剧，也许是一部电影。

如果中国有一个“灵魂”，那么它在西安综合症中得到永生。对于任何一个从未试图要确定一个中国历史事件有关真相的人来说，他是无法想象出进行这种工作有多么困难的——更不用说发表有关事件真相所涉及的困难了。西安是中国之谜中的永久难题之一。

在西安事变时期，不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极为崇敬苏联，而且他们不愿向外人承认有任何秘密问题，更不用说与苏联决裂了。在西安事变结束以后，共产党实施的纪律是绝对的。这显示了毛的领导特性，他将个人的愤怒置于次要的地位，而贯彻实施新的路线。但这心灵上的创伤将永远留在中国人的心理上。

捉住蒋介石的不是红军，而是少帅自己的3个顾问，年轻的非共产党左派——孙铭九上校、应德田、苗凤山（最后一人名系音译，——译者）。1938年9月，我们在香港从苗处听到了内幕。他们率领了要东北军和红军结成联盟的年轻军官团体。

我们第一次见到苗凤山大约是在12月12日事变之后的第四天。一位东北朋友秘密地带他来见我们。我现在还能在想象中看到苗头戴外国式样的有沿帽，水獭皮领的黑大衣，淡紫色鞋罩，这是他认为的外国资产阶级的化装。他体形单薄，神经质，敏感，内心充满了紧张和激动的情绪，勇于献身——甚至狂热——但可爱，吸引人。他告诉我们，他和他的两个年轻的朋友是西安事变的主要推动者，他对少帅颇有影响，他是一个思想单纯的新近转变为信仰革命的人。

苗说，他必须立即就到西安去，希望有一个外国人能在路上保护他，因为如果他被发现，就有生命危险。他还希望有一位记者能从西安把事实真相报道出去。当时埃德在中国是个大英雄，

但他忙于写自己的书。苗绝望了。

“吉姆·贝特兰可以去。”我脱口而出，希望弥补拒绝让贝特兰陪我去西安一事。我想吉姆也许可能如愿以偿地进入共产党地区。

埃德并不急于让《伦敦每日先驱报》同苗发生关系，但他同意吉姆去，尽管他几乎没有钱来雇一个通讯员。苗有些疑心，他坚持要我“担保”吉姆，因为是我推荐他的。

我飞快地跑去打电话找吉姆。他必须赶上下一班火车，苗打扮成他的秘书。

吉姆在他的第一本书^{*}中讲到了此事。他们必须秘密地走，躲开军队哨卡。在圣诞节前夕，释放蒋的前一天，他们仍试图渡黄河未成而被阻在大禹庙。在这荒郊野外，拜伦式的困境，外面寒风呼啸，吉姆躺在床上阅读他的珍贵的“莎士比亚”。一位年轻的尉官拒绝发给他们通行证，直至圣诞节那天才予放行。苗直到12月27日才到达西安，晚了两天。

从此以后，东北军和青年人都消失了，在历史的饕餮巨颚中被碾为齑粉。但自一开始缔造统一战线的就是他们。我一直反对进行暗杀，但在1936年我看到了引起这种行动的原因。

* 詹姆斯·贝特兰，《中国的危机》（伦敦，麦克米兰公司，1937年）。

第二十七章 圣诞节，虎头蛇尾的结局

从蒋介石于12月12日被捉，到他在圣诞节被释放期间，形形色色的东北人来看望我们，带来了或真或假的消息。我每天急得死去活来，为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有关全体东北学生和人民的事情牵肠挂肚。埃德不象我这样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他把中国的事务区别开来，孤立看待。他实际上从来没有焦虑过，甚至不为自己担忧。这一点由我来弥补，我一个人着两个人的急。

埃德并不愤世嫉俗，而是因为他在中国居住的时间够长的了，对办事虎头蛇尾已司空见惯。中国人总是会妥协的，这在当时被看成天经地义的事。

西安事变给我们上了一堂现实的政治课。我们必须站得高一些，才能有正确的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英国和美国之间结成潜在的联盟，要比中国本身的问题重大得多。决定西安结局的是这一历史的需要，如此而已——需要利用蒋介石当联系人。苏联不想为了区区小事，如被围困在长城脚下、弹尽粮绝的几千红军部队和在西安、北京街头若干呐喊的学生，而危害这一大局。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蒋被捉后的一两天内抵达西安，并通过广播公布了事实真相。美国共产党人自纽约发来电报指责她，他们不想受西安事变的沾染。既然史沫特莱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以后也永远没有成为共产党员，这种指责简直毫无道理；这永远无法向任何中国人解释。

对中国人来说，美国共产党人过去一直是、现在依然是个谜。1949年，亲华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当做

“美国间谍”逮捕。逮捕她的目的是堵住她这个“害群之马”的嘴。这已是怪事一桩，但对中国人来说，更为奇怪的是，美国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也不肯进行干预，甚至拒绝替她争取一次申诉的机会以求得到起码的公正。

中国人和苏联人及其共产主义追随者之间不和的种子是长期播下的，这至少在西安事变期间就开始了。自西安事变以后，我认为我理解中国和中国人了。但在1936年，我至为欣慰的是中国既不是我个人，也不是我的国家必须关心的问题。我汲取了一条很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如果你不会游泳，就远离水边。我从未想过要卷入任何共产党或同他们有关的事件中去。我不是坚韧不拔，铁石心肠的人，也不希望成为这种人。这并不意味着我未能看到这类人的丰功伟绩和特殊品质；而只是因为这不是我做事的方式。

埃德旅行归来后，在社交场上变成了一个花花公子。尽管这是一种历险后的自然反映，如同战士从战场上下来后放松一下似的，但我发现他的变化后还是很吃惊。他被捧为名流。他甚至有了两个女性爱慕者。

在假日期间，我们与哈里及贝蒂·普赖斯夫妇一同前去参加了一个聚会。在夜间10点，我们4人乘出租汽车沿着城墙边的林荫道回家。第二天早晨传来消息说：与我们隔两家的邻居帕梅拉·沃纳被杀害了。她被害的时间可能正是夜间10点钟。发现她尸体的地方靠近我们所经过的那段城墙。她的心被挖出来——可能在死后或死时挖出的——被当做“药”卖了。或者这是不是一个警告，一种恐怖主义的形式？

帕梅拉才17岁，刚从天津的学校回家度短暂的假期。要找出谋杀她的动机是很困难的。人们最后看见她的时候，她正在林荫道上骑自行车。那个地点正是人们熟知的我骑自行车的地方。这不是一件错杀了人的案子？日本人和中国法西斯分子把我和埃德都吓出北京，对他们大有好处。

在释放蒋介石之后，法西斯分子必然会向我的几十位朋友报复。由于替他们担心，我已经坐卧不安了，帕梅拉的被谋杀使人心惊肉跳。埃德却毫不在意，依旧出去赴约会。但一天晚上，我留在了家里。

那天黄昏刚至，我接待了一位从天津来此调查这件谋杀案的伦敦警察厅刑事部的人。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不仅是因为天冷的缘故。

他要了一杯白兰地，当他发现我丈夫把我独自一人留在家时却大惊失色。他问：“难道你没有想到，凶手一定藏在什么地方，而且可能就在附近吗？”他发现我们的左邻右舍鬼气森森，他不明白我们怎么能够住在这里。

我告诉他，正是因为我们的左邻右舍鬼气森森，我们在这儿才感到安全。人们认为靠近狐塔是整个拐角地带都闹鬼。除此之外，我“单独”和15个佣人在一起；其中四个男人都持有大刀。

“无论哪儿都没有灯光。”他抱怨说，“在黑暗中，外边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恳求我收拾行李立即离开——去任何地方也不要呆在这儿。他认为帕梅拉的案子是他所听到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凶杀案，并且推测凶手可能是个疯子。“不然这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说，“这是在警告外国人，象你这样的外国人——更确切些，你的丈夫，或者这可能是认错了人。”

我们暖暖和和地坐在壁炉前面，但我也开始发起抖来。

埃德回来得很晚，并喝酒太过量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他总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宠儿——他确实也是。我对他的担心总是超过他对自己担心的十倍。对埃德来说，帕梅拉谋杀案只不过是一桩地方性事件。他确实相信，外国人在中国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个谜从未解开，甚至也没有找到比较合理的推断。我从未真正相信过帕梅拉·沃纳谋杀案是针对埃德和我的，但始终存在疑问。

象通常一样，我非常努力地工作。甚至替埃德答复来信，使他能腾出手来写他的书也成了一项繁重的工作。《生活》杂志买下了73张他拍摄的照片，《亚细亚》杂志买了两张，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为此他们每张付了50美元的金币。“北美报业联盟”在多家报纸上同时连载了他的文章。《亚细亚》杂志正在连载毛泽东的自传。1月份，埃德被邀请为纽约的一家名为《亚美》的新杂志当编辑，但他拒绝了。我们写的书，《活的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大受欢迎。我自己也接到纷至沓来的约稿信件。但我认为把埃德的报道及书搞出来是刻不容缓的事。

尽管路透社攻击吉姆·贝特兰搞“宣传”——这位唯一愿意致力于直接采访任何事实的英国人——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发生了，埃德从西北带回来的报道成了催化剂。在中国的传教士对报道极感兴趣，并邀请埃德到处作报告。其中有一个传教士竟然说：“据我看来，红军任何一天都可以向北京进军。”

随后，在这些活动中，一个真正的里程碑在舞台上出现了——传教士开始觉醒，并决定在创办一份新杂志的工作中，“加入俱乐部”。

第二十八章 创办《民主》杂志

1937年1月的一天。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管家拿来一张J·斯潘塞·肯纳德的名片，这个名字我们从未听说过。

他告诉我，教友服务委员会提供1,000元金币，要求他创办一份实用基督教伦理道德杂志，用以影响中国青年。他眼中闪现出期望和热诚的曙光。他认为比起其他在中国的外国人来，埃德和我对中国青年有更大的影响。他说：“其他人都没有资格编辑这本杂志。”在两个条件下，他可以把钱交给我们，放手让我们便宜从事：埃德加·斯诺的名字作为编辑出现，和杂志的副标题是“基督教实用道德伦理杂志。”

“我丈夫现在太忙，没有时间干其它工作。”我说，“但是，我来干。”我告诉他，他的光临似乎是上帝的派遣。如果有任何需要杂志的时候，此刻的中国正适其时，而且在此以前，连提出给我们一块银元这样小钱的人都没有。

我在肯纳德的名片上写了“放下一切事情。他要向你提供1,000元金币”，让管家送到埃德在花园里的书房去。在书房里，埃德中断了写书，高兴得低声叫喊起来——他为自己突然成名而欣喜。

埃德来到我们这里和我们一起坐在熊熊燃烧着的壁炉前。当肯纳德说，埃德加·斯诺是向中国青年传播基督教伦理道德的唯一途径时，他的笑容一直传到堪萨斯城。

“我丝毫也不反对基督教伦理。我小时候当过圣坛童子。”埃德高兴得大笑起来。但是他说，他一分钟空闲也没有。“我正在写一本书——无论如何，我自己认为要写成一本书。”

我说，如果他只挂个编辑的名，我将做全部工作，并发表他那本书的某些章节。每一期我们都有独家新闻。而且我们还可以发表吉姆·贝特兰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章。前途多么辉煌的大好时机啊！

“好极了。好极了！”肯纳德火热的目光表示同意。“特别是对贵格会教徒来说，没有比宣讲事实更重要的基督教伦理道德了。耶稣基督为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发明社会主义的正是耶稣自己。你要是不相信，就看一下圣经中的《使徒行传》第二章。”

埃德让茶水和杏仁饼噎得透不过气来，伸手去拿骆驼牌香烟。

埃德决定，我们可以用他做挂名编辑，可以利用他拍摄的照片和一切在别处没有申请版权的东西。

我们三个人互相握手。

“这件事超出了我们三个人的能力，”我说，“我们应当把各式各样的人吸收进来。我来当总编辑，无论如何也要把杂志组织起来，办下去。”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并不知道如何创办一份杂志。我当过小学校刊的编辑和高中年鉴的副编辑；那是我的全部编辑经验。我痛苦地认识到，我自己的“伟大的书”又要推迟问世了。但我知道创办这个杂志绝对正确；一决生死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此外，我需要为我的文章找到一个在当地发表的途径；我曾经为我的人数不多但非常热心的追随者抄写过东西，那种单纯的体力劳动让人筋疲力尽。

本来设想埃德丝毫不为此事耗费他的时间，但他并不回避那种充满辩论的长会，从这种会议中确实产生出一种新的一致意见。他是一位真正的记者——他甚至喜爱印刷油墨和浆糊的气息。他的父亲不就是印刷《堪萨斯城明星报》的斯诺印刷公司的老板吗？

首先我们给燕京大学的休伯特·S·梁打电话。他将成为我们社论委员会会议主席。在开始阶段，只有梁、肯纳德、斯诺夫妇和O·J·托德，托德是一个美国工程师，他因和休伯特水火不相容，很快就辞去了司库的职务。肯纳德吸收的一个姓肖的信徒发现我们缺乏语言方面的知识，不打算在我们头衔上用大写字母时，也辞职不干了。

我们从燕京大学动员了其他“一二·九”运动的同情者：哈里·普赖斯，伦·塞勒和张东荪。接着，吉姆·贝特兰从西安回来后也参加了，并带进来艾达·普鲁伊特^①，她是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并且是在中国的第一位社会工作者。吉姆住在她的有三进院落的宽敞宅邸里，同住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北京哈叭狗和她的两个养女。我们每人都为这项事业捐了150元中国钱，基督教青年会的负责人艾德华兹^②同意为我们找一个“保证人”。

董事会辩论了有关人类生存的每一个问题。我们仅就一件事达成一致意见：言论自由。该杂志应成为“对左派和右派的禁忌均不承认”的论坛。埃德写道：“在两年之内，也许是三年，当全体反动力量……企图毁灭人类自由的历史大厦时，一场巨大的爆炸注定要再一次震撼地球。”我们使用华丽铺张的语言。我们在论述宏伟的理想。

埃德和我决定了刊名——民主——但在那个时代这个词名声不佳。甚至连传教士们都害怕，这将把我们与学生隔开。同样不幸的事实是，在中文里没有与这个词相近似的词。

关于刊名的问题刚一付诸表决，伦·塞勒就要求实行一次专政：“我们能否达成一个协议，即这份报纸完全由你们负责……由你们告诉我们从何处开始，你们希望我们往何处去，又不希望我们走向何处，等等一切事情……？如果这样办下去，你们可以

① 美国女教士，汉名萧爱德。

② 美国人，汉名艾德敷，字泽长。

把我的150元增加到300元。”

作为编辑，我在创刊号上写了论《中国与民主》的政论性文章，文章说：“全部专制、暴虐势力的一时复苏，给文明带来巨大的威胁，在以前反对这种势力的斗争中，民主取得了胜利。认识到了这种威胁，我们集合在这面旗帜下……使我们感兴趣的民主的特殊方面是……发现和传播对于反动派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对于自由则是战无不胜的盟友——这一真理。”

我们不得不为自己着想。在人类历史上，民主曾以多种面目和多种形体出现。一个要素是向上运动的机会，发展与改进的权利。在当时的中国，这意味着或者动员人民，或者允许他们动员起来抗日。但蒋介石过于软弱无力和胆小畏惧，他不允许这样做。当然，他知道这必然会脱离控制和威胁他的政权。

中国在1937年所需要的，正是传教士、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写的关于民主在中国的文章，和同时刊登的另一篇埃德加·斯诺写的有关毛泽东的文章。这就是第一期上我们刊载的内容。

我编好了头两期的双月刊，准备在4月1日开始发行，但杂志直到5月才问世。除了休伯特·梁以外，我是唯一热爱这个初生婴儿的人。当我在5月开始安排去共产党统治区的旅行时，我不得不把这个娇嫩的婴儿交给一位对中国完全陌生的人。没有其他人乐于接受这一项没有报酬的危险的工作。我费了不少周折才把他吸收进来。

在我雷卡米埃夫人式的沙龙里举行星期三晚会。一天傍晚，吉姆·贝特兰和一位讨人喜欢的年轻英国人一块儿来了。这个人显眼地叼着一支长烟嘴。他无精打彩地一动也不动，透过朦胧的弗吉尼亚烟草的烟云观察我，就好象我是从十九世纪传教士的木桶里拽出来的一个什么物件。约翰·利宁不敬畏神明，诙谐机敏，老于世故，一副故意装出的漫不经心的神气，淡蓝色的双眼闪耀着恶作剧的目光——决不是在我们的传教士朋友中激发起信心的那种人。（他同肯纳德立刻成为事事对立的不共戴天的仇

。) 约翰仅在北京逗留几天，身边也没有多少钱。他在牛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读古典文学和政治学，在欧洲为《幸福》杂志工作了一年，当过休·多尔顿爵士的秘书。休·多尔顿是工党政府的外交部次大臣，是工党的党魁。

“我是收支不平衡的预算专家。”约翰解释说。

我说：“妙极了！这正是我们在北京所需要的。”我在考虑如何让他参加我们这个团体。

积我几年来与中国人多次谈话的经验，我劝说的办法是要条理分明，明白易懂，简单明了，多次重复，重点突出，用基础英语。我经常坐在椅子边上，心中充满了工合女童子军式的热情，把这股力量灌输给我的听众。但约翰不是童子军类型的人。我从未能找出为他所同意的任何事情。我没有被他爱慕的危险——这是和吉姆·贝特兰在一起的麻烦。但我原谅了他，因为他是这样坚定不移地反对法西斯，并刚刚结束了与法西斯分子、纳粹和佛朗哥追随者的直接接触。我的想法是让他负责与中国无关的反法西斯事务，让他严格地置身于中国事务之外。

当我机灵地把话题引到我们的杂志上来时，约翰耸了耸肩。

“民主！你一直在开玩笑！你们太落后于形势了。”

我凭我同中国人交往的经历认识到，要提起1776年并不明智^①。但这座大桥仍然必须跨过去。

“副标题必须是‘实用基督教伦理道德杂志’，这是拿到肯纳德的1,000元金币的条件。”

“啊，我的上帝！这简直是艾丽斯在漫游仙境！”约翰站了起来，在地板上慢慢踱来踱去，双手抱着头，开心地奚落人。

约翰最初拒绝同这两个名称中的任何一个沾上任何关系，最后他还是妥协地接受了杂志的名称，但不接受副标题。董事会的表决否定副标题，约翰也就同意留了下来，条件是我们必须付给

^① 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此处指美国的民主理想。

他最低生活费和为他租一所中国式的小房子。但是他不要肯纳德走进这个院子。

当时，希特勒就要席卷欧洲，日本人已准备好在几周内直接打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把自己对一个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吹毛求疵的伟大工党反法西斯分子的评价，保留给自己而不公开披露。

约翰和我确实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喜爱欧格登·纳什^①的诗。当我们挽救中国的努力未获成功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失去美国人的幽默感。约翰不仅听我说双关语和不根据前提推理的戏谑语，而且还从嘴里拔下长长的烟嘴，然后大笑起来。（他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我模仿纳什的作品，这同样吓坏了肯纳德。）

3月25日我给上海的J·B·鲍威尔写信：“埃德患肾结石住院——我忙得要死。”我要求他和《民主》交换广告。

就在我丈夫住院动手术那天，印刷所送来了首次的校样，这个印刷所无人懂英文——他们只是一个个字母地照样模仿。样书必须立即校好送回去。约翰和我从未排过样书。我本来希望埃德来监督第一次的操作。

约翰来到我们家。在威尔士亲王的朋友们曾经跳过舞的舞厅地板上，我们铺开了校样，这时，约翰提出最后通牒：

“我并不要求住豪华的饭店，我也不想要任何薪水，但我确实需要不受干扰。再看见肯纳德，我就无法忍受了。如果你不能阻止他进我的院子，只要创刊号一发行，我就不得不离开北京。”

我一言不发。当我们剪贴校样时，我大滴大滴的苦咸的泪珠一颗一颗地与约翰的烟灰一道掉进图书馆的浆糊里。我流泪是因

^① 美国幽默诗人（1902—1971），诗风粗犷，奔放，在美、英两国赢得众多追随者。

为约翰傲慢地大笔删去了我小心翼翼写下的外交辞令，凭借这些外交辞令，我艰难地在对立分子中建立了我们小小的反法西斯战线。我为中国而流泪。当希特勒褐衫党的铁靴声在欧洲回响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吹毛求疵的工党分子，我为欧洲的前途而流泪。当我把吉姆·贝特兰的稿子《西安真相》递给约翰让他贴上去时，我为这篇文章而流泪。

我们爬上人力车赶着把样书给住在一条胡同里的印刷商送去，连我们的人力车夫都认为这条胡同太黑暗、太凶险了。我避开了几周前发现我们的邻居帕梅拉·沃纳尸体的那条荒芜凄凉的林荫路。那天夜色漆黑，阴沉，寒冷，大风呼啸。在曲曲折折的胡同里，只有人力车摇晃不定的车灯照着亮，我们只听到人力车夫发出的啪哒啪哒的脚步声。约翰看上去害怕了。

从印刷所回来，我们又穿过更黑更窄的胡同去医院看埃德。约翰羡慕地看着这明亮雪白的单人病房——当代洛克菲勒风格的，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传教士风格的。

埃德的手术并不完全成功——病情一直折磨了他好几年。

自北京分手之后，我再次见到约翰是1938年在香港的事了。他在那里帮助孙中山夫人工作。我们两人都因闹痢疾而瘦得形销骨立，看上去老了十年。“你最近看欧格顿·纳什的诗了吗？”我们同时相互问了同一句话。

（后来约翰与一位美国在华传教士之女结了婚。1941年，他们帮助我在康涅狄格州麦迪逊找到了我们的那所小房子。1945年，当我作为记者采访联合国大会时，在旧金山再次见到了他。他还叼着他的长烟嘴，为当上英国情报机构首脑而得意。有人告诉我，他为成了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而感到愤慨。他后来在康涅狄格州的威尔布里厄姆学院教希腊文和拉丁文。）

当日本人1937年7月7日进攻北京时，最后一期《民主》杂志在印刷时被他们没收了。《民主》是在黑暗的地平线上的一道短

促的闪电，杂志刚刚停刊6个月，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就极力让我们复刊。1939年，肯纳德从四川给我写信说：“弗兰克·普赖斯^①要和休伯特与我”一起恢复这个杂志。弗兰克和哈里是兄弟，是和蒋介石夫人最接近的传教士。自“一二·九”以来我们已前进了很大一段路了。

休伯特·梁在1974年写信给我说：

“《民主》是在盔甲厂13号孕育出来的……从当时的时代和历史条件看，这可能是在中国出版的最重要的英文期刊之一。这是一个直接的、巨大的胜利，象疾风暴雨一样席卷了中国的知识界……杂志中的许多文章被翻译过来，并登在中文刊物上……它引起国民党注意，抗议它亲共产党的倾向……甚至中国的头号敌人，当时任南满铁路总裁的松岗洋右出于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买去400册《民主》创刊号送回日本。”

这些生气勃勃、喜好争论的人满怀希望创办了《民主》杂志，他们后来情况如何呢？

休伯特·梁是第二代新教徒，从1954年到现在一直在南京大学教授英文。1972年尼克松重新建立友好关系后，他是我在中国的老朋友中第一个给我写信的人。他在美国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很成功的访问讲学，直至1982年才返回中国。

1974年肯纳德从他退休的地方给我写了信，他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我想他还是浸礼会传教士。他曾于1939年左右从四川给我写信，要我进川帮助恢复《民主》杂志。

哈里·普赖斯和贝蒂·普赖斯在田纳西州塞维尔维尔安家，现在仍然在教书。1975年，哈里在那儿庆祝了他的75岁生日，我也接到了他的请帖。

伦·赛勒夫妇1973年曾访问过中国，和50多位中国的老朋友

① 中文姓名为毕范宇。美国南长老会教士，出生于杭州。在美国大学毕业后返华，任教于金陵大学。抗战时期为国民党作宣传工作。

聚谈。几年后伦·赛勒逝世时，这些人还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

在三十年代，张东荪是中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教我黑格尔哲学的老师。1931年，他自己创立了一个党——国家主义派。1944年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民盟与共产党联合起来于1949年成立了政府，张在这个政府里担任高级职务。在日本占领时期，他和燕京大学的其他教授一起成了日本人的阶下囚，据报道他三次企图自杀。张东荪和他的弟弟嘉森是中国主要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曾经要求埃德和我编辑他们的全国性刊物——如果埃德不能应邀，我一个人也行——但我们拒绝了。张在1918年编译了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他还是我在北京愿意与之谈论哲学问题的仅有的几个人之一。

在三十年代，所有的人都希望美国人在中国采取进步的行动——但仅仅作为个人行动。当时的重大问题（和现在一样）是中国应当向一种不是反西方的、而是与世界其他部分共处的社会主义前进。

第三部分 延 安

第二十九章 在红色中国——我的延安 之行，1937年

当我于1937年4月21日离开北京赴延安时，未曾想到直至10月17日才返回——也未想到日本会在7月7日占领中国北部。

自我1937年访问这座城市后的十年里，在延安的窑洞和山区产生了全新的民间传说和民族神话，产生了一种围绕毛泽东的新的信仰。而“延安精神”成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主题，这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恢复传统的革命神圣精神。就在延安，毛泽东研究和撰写了现在被视为经典的名著。象阿波罗神的神谕一样，他规划了中国革命的未来——而且总是正确的。犹如西方人2,500年来到伯那萨斯山的特尔斐神祠朝拜阿波罗神那样，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者都到延安朝圣。

除去附近的窑洞外，延安城已经消失，1938—1939年日本人的狂轰滥炸和其它野蛮行径使它成了一片瓦砾。中国人重建了延安，尽管与原样不同。但是我所保存的1937年拍摄的300多张老城的照片记录了旧城的容貌；它的市区，宋朝时期的城门和城墙，对于这样一座小城来说，显得多么壮观啊！

延安城的位置宛如镶嵌在城墙上的珠宝和戴在群山上的王冠。这座城市以它美丽的容貌而骄傲，雕镂华丽的大理石牌楼横跨狭窄的街道，一座座砖砌的瓦房有围墙相间。延安是文明的守卫者，这种文明在别处只是由于保藏在古老的洞穴和躲在显得贫

穷和屈辱的泥墙后面才得以在精神上幸存。几百年来，从中亚来的大批游牧部落骑兵的战车辘辘地通过具有战略意义的狭窄的山谷，前去掠夺中国的大西北。每个山头城垛林立，要塞上站满了手拿红缨枪的哨兵——而现在那些哨兵的后代扛着来福枪在保卫关隘。

延安成为民间艺术的主题，就象道教的九天玄女娘娘一样受人们欢迎。缓缓而流的浑浊的延河水依旧环抱着这座新城，风水宝塔依然矗立在山顶。但河水已不再是阻隔交通的壕沟，在河上已架起了一座可以泄洪的新式拱桥，如今在中国就象长江大桥一样闻名。我猜想，纪念很久以前母权尊严的古冢还依然存在，但是曾保卫过千家万户大门的无所不在的道教真神已经躲进了古代人类祖先的洞穴。

一个年青的美国妇女成了延安故事中的一部分，现在看来这是令人奇怪的事。我的《续西行漫记》*是第一本关于延安的书，是多年来唯一的一本，而且也是唯一的一部描述了这座古老的城市及其特别神秘之处的书。《西行漫记》的背景是写保安，因为延安是在埃德离开西北几个月后才被共产党占领的。

延安在历史上揭开了光辉的一页。毛泽东和他的南方纵队在1934年离开江西，历时一年，长征25,000里，来到了万里长城所护卫的中国文化的摇篮，占据了辽阔的黄河上游的一半地域。延安、长城和黄河构成一个三角形，长城与黄河在北部的交叉点就是这个三角形的顶端。（保安是长征途中停留的地方，比延安还要偏远，位于延安以西30多英里，那里的生活简直无法维持。）

在延安附近，正是传说中的第一个皇帝、中国奠基者的诞生地——或安息所。黄帝陵墓是中国最古老的遗迹，具有5,000多

* 道布尔戴—多兰公司，纽约，1939年。达·卡波出版公司，纽约，1977年，简装本1979年。

年的历史；而长城大约建于2,500多年前。黄帝的后继人是尧、舜、禹。禹是第一个治理黄河洪水的皇帝。肥沃的黄土、有机的土壤使人类能在这片不毛之地上生存。

在陕北人们学习再三思索，那里生存条件恶劣，从长着锐利牙齿的老虎的时代直到日本和蒋介石的轰炸机时代，人们不得不藏在洞里。人们生活在洞中，面对这个现实想上几千次。这片肥沃土地中的电流发自地球深处，如果你附耳在这片大地上，你能听到几千年来声波的回响。

毛泽东说过，他没有挑选长征的起点和目的地。把伟大的业绩赋予延安，是出于需要，而不是选择。就在这儿，在孔子宣扬的古代文明的窑洞里，毛泽东终于斩杀了儒家学说这条老龙——如果真的已被杀死的话。在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人们不那么尊重孔子，至少在过去2,000多年来儒学停滞不前并处于僵死状态，唯有窑洞是儒学留给人们的纪念。

第三十章 西 安

大卫·俞为我确定了前往红军地区的日期，他告诉我，5月初在延安将召开共产党代表大会，他将作为一名代表前往延安，我可以与他同行——假装我们互不相识。在西安他将与红军联络处安排我去延安的旅程。

这是第一次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聚会。我将采访他们，并且为埃德在保安时已开始的口述人物传记集增添新的内容。几天以后，他们将奔波几百里之遙回到他们与敌人战斗的军事岗位。机不可失，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王福时实际上定居在我们的起居室，默默地观察一个美国人的内务，他自愿去当我的翻译。他想为他在北京的《东北报》写文章。而大卫打算请陈翰伯做我与西安红军办事处的联络员，尽管我亲爱的朋友张兆麟已在法西斯占领后被迫逃跑了，但陈翰伯还在西安办报。

我失去了第一次去西安旅行时用的睡袋，那是用戈壁心爱的丝棉被和我的鸭绒垫做成的。我现在用两个最好的驼绒毯子当做旅行睡袋，我把它们叠好和行军床一起装在一个大柳条箱里。

在这最后时刻，埃德变得沉默而不合作了，他不肯去卷我的睡袋，抱怨他因动肾结石手术而处于恢复期，他对于摆脱掉我和我那些五花八门的讨厌事情并不感到遗憾。这样，他更能集中精力写他的书。然而，他抱怨说：“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埃德和吉姆沿着荒凉的林荫道送我去火车站，我们都不愿让任何其他人知道我的行踪，当我踏上火车车厢的阶梯与他们挥手

告别时，感到很得意。

在两天的火车旅行中，我吃辣子鸡，学习单词和词组：虱子，跳蚤，臭虫，驴子，清扫房间及一些对旅行者似乎有用的词。

我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丈夫写信：“9日下午，我平安到达郑州，W病在车上，D在这儿还好^①……这当然是极好的头等旅行，今后我要坚持下去。”

从郑州转陇海路沿黄河至潼关，这是三省的战略通道。下一站是西安，它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西北古都城和早期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所有叛乱的东北军被迫于4月1日前撤离西安，一路上东北军乘坐的列车正被调到不为人们注意的岔道上，以等待看管和调换他们的中央军火车的到来。少帅还在首都南京当蒋介石的俘虏。

在西安，我有很多时间来考虑那些风云突变的事。圣诞节释放了蒋介石后，东北难民被迫分散；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不存在了。刚好在我到达后的这几天，法西斯完全占领了西安。

4月23日清晨8时，我到达现代化的西安车站，被迫住进西京招待所，所有外国人都被要求住在这里，处于警察监视之下。然而——完全愚蠢的行动——“……在警察到达前我离开了，陈在一个中国人家里找到了一个地方。”4月24日我给埃德写信，补充道：“我现在住在一所空荡荡的石头房里，冷得快要冻死了……但愿我不会得肺炎。今天……还在下雨，道路泥泞，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叶剑英8点来看我。”

叶剑英和周恩来是红军的西安秘密办事处的负责人，张文平是他们下面的工作人员（1974年叶成为北京政府的国防部长，而他的老至交周是总理）。

我坐在一堆粮袋之间用冻得发青的手给埃德继续写信，

^① W是王福时，D是俞大卫。

“陈翰伯说，这里的情况是这样的：西安完全在顾祝同制控下，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组织，一个群众组织也没留下，一个东北军的军官也没留下，只有几个学生……杨虎城不仅没有权力而且几天以后要被迫去欧洲，在28日（这一直是秘密）谁将领导他的军队还不知道。如同东北军一样，他们将在中央政府控制下……顾在西安有四个师……杨只允许拥有两个团的兵力，以装饰门面……胡宗南还留有二个师（他原有四个师，两个师在两周前的战斗中全部被歼）。

“红军司令员徐向前在宁夏只有3,000人，而且已损失掉2,000，惨败给回民军……。少帅的500名学生先锋队员全在蚌埠，除去那些加入红军的以外，其余都无事可干。西安非常凄凉……它变成了一个死城……只有两、三个客人在招待所。

“毛泽东访问记在这里广泛翻印……我极力要求你不惜一切代价在今年春天把书送出去，而且立即翻译出来……趁外界还没有反应，人们还不能阅读之前……整个景象令人沮丧……今年将是一个饥荒年。”

顾祝同是蒋介石最宠信的官员之一，而胡宗南是他最得力的军官，刚好在我到达前两星期，胡把他的一半军队丢给了红军。从1937年起，胡指挥着蒋介石50万精锐部队在西北堵截红军，而他对抗战却没有出一点儿力。至于杨虎城，他同少帅一起逮捕了蒋介石，现在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他最后在囚禁中遭到杀害。

4月24日晚8时，我的第一位真正红军方面的人出现了。（埃德的信使，名叫王林，他原先是个铁路工人，不是战士。）他的真实姓名叫张文平，26岁，没有结婚，高个，英俊，性格开朗，有魅力。他有些不大象中国人，但是我因为太忙，无暇弄清他的身份，直到后来，他向我说明他是政治安全局在西安的情报站站长，这一点解释弄清了我对他发生兴趣的原因，而不是他的特殊相貌。

我不记得是否与叶剑英交谈过，只记得后来他来看望过我几分钟，他长得象中国人的地方不多，倒有一半象外国人。他是广东人，曾是广州公社的高级指挥官，叶显然把我看作是第一个外国记者。后来他在34岁时当了参谋长，是红军中极少的几个“老人”之一。叶知道其他外国人。但是对张文平来说，我可能是他的第一个外国“朋友”甚至是熟人。

在一间冰冷的库房里，坐在潮湿的小米袋上，张文平和我进行了有趣的谈话。我几乎不相信，红军会是象他这样的人；他们不会真的是象他这样的人。他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曾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在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一直想当中国的马丁·路德。

那天早上，张通知我，要是天不下雨，道路能够通行，可以乘红军的卡车秘密地离开，他告诉我，只要天气许可或头一天道路可以行走，就要在第二天早上5时准备好。

第二天早上，非但天气不许可，更有甚者，我没见到张文平。直到大约5个月以后，当我坐在延安外面的黄土崖上观看一些新到者时，其中一人跑到我面前向我致意，他就是张文平。（1944年，张受到国民党的严刑拷打并在狱中被杀害。）

早上5点前，我收拾好行李，并在下个不停的4月的淫雨中等候。7时，有人把一张名片送到库房来给我，开来一辆汽车停在砖房里——这是公安局欧阳上尉的名片。他检查了我的护照，指出签证是去年的，并通知我，1937年不允许给外国人发来西安的签证。没有合格的签证我只能在西安停留24小时。

我指出，我签证的有效期到9月18日，但是欧阳上尉带着一种反对帝国主义占有的架式把我的签证握在他戴着洁白手套的手里。

“完了吗？”我问，我既有礼貌而又坚定，并且还以一种帝国主义的姿态从他手里夺回了我那宝贵的证件。中国海关为了阻止访问者离开城池，可以随意长时间“扣压”来访者的护照。西

安古老的城墙很高，也能起这个作用。我听说，我的朋友《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最近和一个要拿走他护照的警官动了拳头。

欧阳上尉承认我的护照是一种特殊情况，这不仅是签证的问题。南京政府已下过命令，不许记者进入西安附近的军事区。因此，不准我离开这座城市，例如，我不能到三原去，由于欧阳说那里有匪情，我明白三原是去红色区域的进口；这是杨虎城将军驻守的边境城镇，他和红军关系很好。

欧阳上尉还告诉我，南京送来了一份禁止来西安的外国记者名单。名单的第一位就是埃德加·斯诺。他劝我马上回到北京去。

我抓住了一个技术性细节。“我的名字没在名单上，是不是？”

“那不重要，”上尉说。“你和你丈夫是一样的，无论怎么说，你是做记者工作的。”

去年此时我正为会见少帅而费尽周折。

我们的谈话被库房外的争吵声打断，陈翰伯来找我，欧阳上尉的四个便衣警察挡在门口不让他进来。我听到陈告诉了他们一个假的姓名和住址以掩盖他的身份。这有点可怕，因为他会因向警察谎报姓名而被捕，尽管他来找我的是无罪的。但是在中国，白色恐怖之严重使陈不可能说出他的真实姓名。

欧阳上尉决定把护照留给我——还有其它物品。他说：“在你逗留西安期间，我派四个卫兵保护你的安全。”他又说，“这里的局势很不安定，外国人在这儿不安全。”

显然，必须要拟订一个新计划。由于这些“保镖”，我不能继续呆在这儿顺从地忍受官方的长期监视。倒不如住进西京招待所，并可望雨停后从张文平那里得到进一步的消息。在这四个便衣的监视下，我假装说，我的行李袋和行军床是属于这间屋子的普通用具，仅带了一个提箱同陈离开了库房。

我和陈乘人力车，四个保镖跟在两旁，在这不遂心的雨中，愁苦地慢慢行进。在招待所，陈离开了我，在西安我再没见到过他。他是我唯一的联系人，是安排这次旅行的最后的希望。他寄给我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雨还在下”，以表明他无能为力。后来我得知警察已发现他说谎，所以他躲了起来。（我们在去延安的路上又相遇。当我在延安时他也在那里——这是直到1972年以前我在中国最后一次见到他。1949年以后，陈翰伯成为新闻界的领导人之一，尽管后来红卫兵攻击他为“反党分子”。1980年我们又在康涅狄格州我的家里重逢，当时陈作为中国出版协会主席到美国参加书籍出版会议。）

招待所老板周先生是个非常圆滑的人，他明确表示：假如他试图帮助我，他就会失业和被迫离开这座城市。他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负责人，同所有来西安的外国人都很熟。他特别为我准备了一顿外国风味的早餐，而且直言不讳地劝我放弃任何去延安的打算：“利夫和基恩到红区的旅行破坏了你的机会。我告诉你吧！几天前新任命了一个警察局长，他不准任何人通行。”

刚好在我离开北京的前几天，合众社的厄尔·利夫曾来看望我们。他曾在凌晨4时偷偷溜出西安，到延安呆了几天，并在警察还未弄清事情真相之前就返回了。后来，就在我到达西安的前几天，一个名叫哈里·邓纳姆的年轻美国摄影者秘密地到红军前线去了几个小时，然后返回西安，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刚好在利夫之前在红区呆了几天。

周先生继续警告我，假如我逃跑，警察就会把他抓起来抵罪；这个招待所的每个人都会受到威胁。每个汽车站都接到了不准租给我汽车的命令。

在到西安之前，我对这里的局势毫无所知，任何一位姓斯诺的人来到这儿都是最不受欢迎的，其处境是最窘迫不过的，特别是斯诺之妻。斯诺几乎制造了一件可能危及尚不存在的红军和他

们的国民党敌人之间脆弱的统一战线的事件。前几年埃德的旅行是由东北军秘密安排的，而且也是西安事变所掀起的自由主义浪潮中的一部分。当这支军队被迫撤离西安时，时局的钟摆又摆回到法西斯右翼一边。我的旅行恰恰在局势极端不稳，全城笼罩着一片法西斯恐怖的时刻；任何人也想象不出他们对于丢失面子的事会持何种报复态度。

我还得知，如果埃德在西北再一次露面，他将会有遭到暗杀的危险。

西安当局对我担忧极了，原因有二：一是怕我可能逃到延安，二是怕我可能呆着不走。

当局的忧虑现在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我不得不为所有那些在我进行这次不受欢迎的历险之前秘密溜走的人付出代价。如果我能找到离开西安的办法，我将成为自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以来，实际上是自1927年红军建立以来的能冲破封锁线的第八个外国人（非东方人），第五位记者和第二位妇女。

第三十一章 阴 谋

在西京招待所，我以一种渴望的心情——而且一点也不虚假地——告诉周先生，在我顺从地返回北京之前，我想游览一些旅游胜地。

周先生在二楼给我开了一个房间，从这儿可以看到我的卫兵正在阳台上站岗，真有点象罗蜜欧式的样子。卫兵的队伍很快就增加到7名，一个是我的保镖，另外多了两个穿便衣的“蓝衣社”法西斯分子，一个个杀气腾腾的样子，这些当地的盖世太保使我感到恐惧，他们在休息室门口两边轮流站岗，两个游动哨不离我左右，偷听我的电话，随时准备审问每个来访者——谁也不准来访。夜班卫兵彻夜不眠，4月26日，我给埃德写信。

“看来，他们以为我会飞走……外国人很难到这儿来。传教士说，没有签证他们不能来，而且也得不到签证，对此，很多人都很气愤。在三原，包括大教堂在内，约有7名传教士。有些人说，杨一离开，他的军队再撤走，就可能发生麻烦，但也可能不会，社会事务局的负责人说，我来到之前的两天，他接到一个要求监视我的电报。是谁告诉北京的？我很奇怪。我猜想，这是我们某个忠诚的工作人员干的。（我想不出打电话的具体人。）显然，他们决心不再让任何外国人到军事区去——联合战线说得漂亮，尚在形成过程之中。使用的办法是让外国人的生活痛苦不堪，这样，他们就愿意逃条生路了。我有个不祥的预感，这些穿蓝衣的家伙们想拿我作为对象，制造一个“事件”，以此阻止不断而来的外国旅行者和新闻记者。他们控制了整个城市，这里的一切象“双十二”前一样（中国人称1936年“西安事变为双十二

事变”)。

尽管一般说来，外国人在治外法权的祝福下既安全又受到过分保护，但在中国总是存在发生“事件”的危险。万一埃德决定要来的话，我为他担心胜于为我自己。我于4月25日写信给他：

“咳！我有四个侦探（也是蓝衣社的）成双地跟着我……他们很恼火。他们知道我是埃德加·斯诺的‘太太’而不高兴，他们为其他三个人溜走而大发雷霆——正如我想的，我是个替罪羊……一定要告诉所有人，我在上海，这很重要。除非坐车返回，并加以巧妙伪装，否则我无法离开。他们现在想阻止所有外国人到这儿来，假如你来的话，你也得伪装起来，并做好一到就立即离开的准备。他们会枪杀你的。警察头目今天对我说你‘很坏’，所以我作为你的妻子，需要‘特别保护’。基恩与之动手的就是这个人，（你最好不要来，事实上他们会采取一切措施来伤害你，这不值得成为一个“事件”……）别人不能来看望我，我也不能去访问别人，我已陷于困境，但无论如何我也不想返回。我以后会写信……或C会写，假如我不得不匆忙逃脱。必须迅速寄出此信。”

周先生告诉我，在他们发现我躲藏的地方之前，欧阳上尉，一个警察班，甚至警察头目本人搜寻过我，花了整整一个通宵。他们搜查了西安所有传教士的家，天知道还有多少户无辜的中国人的家庭遭到了搜查，所有离开这座城市的汽车和卡车也无法幸免。

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对着隐现在我和禁城延安之间阻隔的群山。我那无法逃避的罗蜜欧就在下面。这不是第一次斯诺家的成员由于西安施行的种种“威力”而使生活变得困难。前几年，埃德被偷偷地带进和带出西安。他那时打破封锁线进入红区正是在蒋介石到达西安而他的盖世太保都处于戒备状态之时。当报导埃德加·斯诺在甘肃被杀害、海伦·斯诺在新疆被杀害时，人们要求警方承担责任，省长邵力子承担了责任，大大丢了面

子。而如今斯诺又给西安禁地制造了很多麻烦。

另一个姓斯诺的曾让东北军做他的卫队。现在“我们”的军队正在用火车被运往安徽，他们要为12月12日逮捕蒋介石而赎罪。杨将军同意于4月28日赴欧洲；总有一天，他的军队会失去控制，或至少象他们12月12日干过的那样，去抢招待所。法西斯分子以一种报复心情匆匆赶回——并已完全控制了这座城市。

我不知道该向谁去求助，我感到孤独。谁能冒违反军令的危险把我偷偷带到三原呢？陈翰伯正在躲避警察，大卫·俞不愿失去参加在5月份召开的延安会议的机会。张文平和红军办事处也不能给我一点帮助，即使他们愿意的话。

但是，我去延安的意图丝毫未减，谁能预知新的内战何时开始呢？我感到或许是现在，或许是永远不会发生。这可能是我唯一的一次考察红色共和国的机会。

主要的一点是：我必须使这“第一次”成功。我不能把任何意图泄露出去，我有些紧张和惊恐不安，但是我却很坚定。

我在招待所最沮丧的时候，周先生想了个办法，他把我介绍给西安唯一的隐迹的美国青年游侠；他是我的朋友珍妮特·菲奇·修厄尔的大堂兄，名叫肯普顿·菲奇，同修厄尔一样长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白皙的皮肤，淡黄色的头发，他们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老朋友。他的名字未被收进《续西行漫记》一书中，甚至现在我还犹豫要不要提他的名字，尽管麦卡锡时代已经过去。他是在中国曾有40个成员的传教士家族的后裔。肯普顿的父亲乔治·菲奇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头目，是蒋介石夫人的好朋友之一。肯普顿如果帮助我，他就可能丢掉在西安的工作（我逃跑后不久，他就转移了），而且一定会在今后的岁月里给他招致麻烦，但没有他，我就到不了延安。

肯普顿早已知晓我的全部情况并劝我返回北京。对此，我坚决拒绝。然后，他提议陪我到我想去的任何地方游览，但我所选定的目的地除外。外国人必须互相帮助，他不愿意看到任何妇女

处于痛苦无援的境地。

我们乘出租汽车去访问传教士，我的保镖象以往一样跟在旁边。还没等我说出我的意图——他们能否帮助我去三原，找一个在那儿的传教士——他们就让我明白，我已经制造了很多麻烦，欧阳上尉在晚上把他们叫起来，并因为我而搜查了他们的住所，此外，大批新闻记者试图到红区去已给传教士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困难。一些志愿到危险地区工作的年轻人已经被警察赶回来，他们被怀疑是乔装的新闻记者。传教士也不再允许随意行动。他还说，人们在西北做“合法生意”也要为“短暂的愚蠢好奇”付出代价。

我几乎不能为记者工作的合法性辩解，但是我利用这个机会要求他们把详情报告给我们的《民主》杂志，而且进一步了解在北京时对“实用基督教伦理学”下的定义。

传教士说，他们乐意帮助我返回北京，但是绝对不能去三原。

我们的出租汽车被警察的汽车尾随。他们每站都用电话向总部报告。我们听到他们说：“我们很安全”，这话成了我们的笑料。看来，他们认为在这个城市里一场骚乱迫在眉睫，而他们在任何一个拐角处都可能受到武装匪徒的袭击。

肯普顿和警察上尉发生了一次争吵，可能是因为他发觉这些监视是荒谬的，而且是对“合法”的外国生意人的一种侮辱——我不记得这些特别规定。无论如何，在我们访问过传教士以后，肯普顿的心已转向了我的事业。他没有表明这一点，但我若坚持实现我的意图，他愿尽一切努力帮助我。

访问红军办事处使他下了决心。办事处的人变得可敬而守法，他们告诉他；他们自己不能帮助我去三原，现在正和蒋介石进行谈判，虽然他们不同意反对外国人访问红色区域的命令，但也不准备违抗。恰恰在现在，他们不能得罪警察，他们的代表正要来参加5月的大会，而警察正在进行监视、拍照和保存有共产党

嫌疑的每个抵达者的档案材料。我是警察的特殊案例，如果他们帮我逃跑，他们承担不了由此引起的一切麻烦。但若我能自己到那里去，我将受到欢迎。他们说，他们将秘密通知在三原的办事处迎接我，同时把姓名和地址给了肯普顿。

看到我确实孤立无援，并且不是一个共产党人，肯普顿决定为我去智胜西安当局。

他告诉我，在西安只有一个人能帮助我，但是他正在患病住在医院里，此人是埃菲·希尔，瑞典人，他是一个技工，另一个传教士的儿子。他曾负责过斯文·希登的旅行，而斯文·希登是众所周知的前纳粹分子。埃菲不会被怀疑去帮助一个反对法西斯的人。肯普顿说：“为检修汽车，他经常到西北各大名胜古迹游览，任何地方都允许他去。”

他带我去见埃菲：他的病相当重，他毫不犹豫地会说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我，而且说但愿他身体好起来，可以亲自开车送我到三原。他会雇一个人把将军的汽车搞到手，任何次一等的汽车都不可能允许开出城门。我几乎把我所有的钱都献给了他，数量不多。我想他说过大约需要150美元就能安排好。

4月27日，我给埃德写信：“除去一个外国人菲奇外，没有一个人来看我……多么不可思议的令人可怕的国家啊！如果我在这儿不能继续实现我的计划，那还有什么理由呆下去呢。……当我起程时将给你发电报，但不要在车站等候很长时间，我想在一两天内会定下来……这是在几方面人士的帮助下，作了各种权宜的尝试之后才能有的结果。他们现在一定会检查英文邮件。”

28日我又写信：“还没有激动人心的消息……中央政府在两周前接管了一切，反动统治笼罩西安……我听说杨虎城大约只剩下15,000人，他和他的部下都彻底被毁了。我今晚觉得很痛苦，但对于我无能为力的事担心是无用的。金格和戈壁怎样？但愿金格能在这儿，用它的牙去咬我那些讨厌的朋友。一定要马上把你的书带出去，不要浪费任何时间，因为在此次经历后我将要

离开中国。”

这几乎每字每句都是埃德在他的旅行前夕从西安写给我的信中的话，他明白，他可能要为他的怪想法而抛弃一切。

我不愿在这不必要的历险中拿我的生命和健康去冒险，我只是要赴延安记载下历史事实而又安全返回。我天性安静、文雅——除去我的说话方式外——而我仅有的特殊胆量是合乎道义的仁慈。对我的加拉哈德，肯普顿·菲奇来说，我显示了一种神秘感——一个小个子，女人气，娃娃脸，一点也不象到共产党地区去旅行的那种女孩子。虽然我并不具有健壮的体魄来承担男子汉干的事，但我有足够的愿望和决心。

访问埃菲回来后，我知道现在除了这两人外再没有什么朋友了。埃菲的调皮的海盗式微笑在我心中点燃了希望的火花。我们制订了一项计划：埃菲去找一个司机和将军的一辆汽车，这辆汽车在黎明开城门时不会受到阻拦。我必须避开我在招待所的卫兵去会见肯普顿，他将陪我到约定地点与这辆汽车的司机见面，然后再悄悄溜走。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按时离开，在三小时内冲过封锁线到三原去。我们知道，警察一发现我已出走，他们不仅会去追赶，而且还会先打电话通知所有的中央政府军队的驻地，让他们沿途阻截我。我们订好日期，29日晚和30日晨，我记得是这个日子，但是不能肯定，也许是28日晚和29日晨。

我事先表演了一些转移注意力的手法；我把在招待所二楼的房子换到一楼，这间房子有一个后窗可以看到这个院子的后院。我也经常“睡过头”，为的是一旦清晨我未露面，不会有人去找我。

我给人一种印象：我已放弃了到红区旅行的计划，而且很快就要离开这座不公平的城市西安而返回北京。我给埃德发了一份电报，我希望他能明白这是假的：“预计明天启程，车站相接。”而且我告诉欧阳上尉，要先参观临潼，这是12月12日蒋介石被捕的地方。我的陪同几乎把我当成一个享有特权的俘虏，而

第三十二章 勉强逃脱

今晚在招待所，除我以外只有另外的一个旅游者，平常繁忙的旅舍变得冷冷清清，几乎无人居住。只有无所不在的卫兵格外引人注目。我比以往更惊恐不安，但是更坚定。一周来我睡不好吃不下，但是我没有吃安眠药，也不想喝酒以克制这些日子的紧张情绪。

最令我忐忑不安的是，我们的计划要求我必须藏在汽车的行李箱内，虽然我未患过幽闭恐怖症，但也简直做不出这种事，这种情景使我彻夜难眠。我不仅害怕会在汽油的气味中窒息而死，而且我心中不无怀疑，如果司机发现未锁行李箱会发生危险时，他就会锁上而再也不去管它。可以肯定，当发现我已死去时，无人知道原因——司机会说他确实不知道我在行李箱内。

现在夜深了，确切地说是深夜12点45分，我必须在院墙的高处看燃着的香烟亮光，这是约我跳出后窗到堆着垃圾的地点去的信号，这地方的高度足以使我越过院墙，这个地点是在12月12日邵元中企图逃脱杨虎城部队时被击毙的地方。

肯普顿·菲奇将在墙外等候我并把我带到一个处所去，在早上4点钟开城门时，一辆轿车将把我带走，这辆汽车是杨虎城将军的私人座车，司机是杨将军的人，不会反过来拦阻总司令的拥护者。我们将绕过蒋介石军队重兵防守的干线，全速驶往三原，三原是杨虎城的驻防地。我们有那儿的红军办事处的地址，并能指望他们接受这一邮件，并进一步负起传送斯诺这个包裹的责任。

我估计，我的夜班卫兵在休息室两旁和在我房间对门的屋

里，门打开着。我也估计到，招待所夜班工作人员也象往常一样正在监视着。但我没有预料到在晚上8时收到的一条消息：西安宣布了军事管制法。杨虎城将军即将离开这座城市，而他的留守西安基地的两个团预计要暴乱，或至少会重演他们在12月12日洗劫招待所的行径。在我将要攀越的围墙那儿恰好有士兵在巡逻，如果任何一个不速之客在夜里出现，他们可以开枪射击，而且在黑暗中也不可能辨别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外国人。

我发现，周先生为了保护他的那些还未被抢掠去的毛毯，派了一批服务人员在院内巡逻，夜间每隔15分钟巡查一次。这是一个更加沉重的打击。

看来毫无希望。但我明白，今晚必须实现我的意图。我猜想，肯普顿和埃菲怀疑我是否胜任这出戏中扮演的角色。可以肯定，他们再也不会给我第二次机会了。

我当时并未意识到，就是这个最令我担心的“军事管制法”才使我有机会逃走，在游击战中最大的好处毕竟是行动突然。谁能想到我会这样一个晚上企图逃跑呢？但无论如何，我们的逃跑计划没有考虑到在我们这一小撮阴谋分子之间最后时刻需要进行一次联络。我没有其它选择，只得试着干。

在夜里12点半时，我尽量多穿几件衣服，把我的棕色驼绒裤和与之相配的驼绒上衣穿在外面，这衣服是前年我特地为那次不出名的探险缝制的。我戴上我那古老的、光荣的蓝色羊皮贝雷帽，并把我的卷发全塞了进去。我曾在1931年离开美国前为报社留影时戴过这顶贝雷帽，还曾在学生游行队伍里戴过它。它是一个护身符。

我象一个逃学的女孩企图逃避查铺一样，把我的枕头和毯子弄成人形铺在床上，以便次日早上看起来我象睡得很晚似的，而推迟追赶我的时间。我把为这次历险而准备的几件物品装进手提包：一个优质笔尖的沃特曼笔（我很喜欢这支笔，还一直保存着）、唇膏、香粉、冷霜、两块手帕、和我仅有的薄薄的一卷纸

币——所剩无几，这使我很着急——把这个手提包稳稳地背在肩上。我戴上克鲁克斯式太阳镜（至今仍戴着它），紧张地坐在窗前凝视窗外的月光。

约定的时间12点45分到了，我应该看到院墙上的香烟亮光。然而什么也没有。我由于失望而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我不能总是停留在这儿从窗子里监视着。我计算了服务人员巡逻的时间，他们很快又要转回来了。我极小心地侦察了窗外的地形（我最怕扭伤脚踝），跳了下去。在旅舍和围墙之间有20码空地，而且被无情无义的月光照得通明；我确信，当我全速穿过几乎是无边无际的空旷地，跑到墙边的阴影处时，我的影子会使我暴露。我沿墙根悄悄地移动，一直没有见到受欢迎的香烟亮光。

在拐角处是一堆垃圾和水泥垃圾箱，这是邵元中企图越墙逃跑时被击毙的地方。我攀上高处窥视墙外，在大街的路灯下，可以看到一支由十名宪兵组成的特别巡逻队。向另一边看去，在围墙尽头，我能辨认出土兵的头盔。我又滑了下来，躲在这一堆垃圾的阴影处，观察服务人员在院子里巡逻。

大约40分钟后，我断定，军事管制造成的紧急状态使肯普顿不能赴约了，我无法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攀过围墙，也无法爬上高高的窗户再回到我的房间，我暴露在外面，孤立无援，只有铤而走险。当下一次院内巡逻兵消失在建筑物的拐角处时，我立刻跑过去，绕过院子的开阔地，摆脱掉纷乱的铁丝网。可恨的是，我在月光下的影子看起来那么大，它一定会使我暴露。

在招待所内，我奇迹般地未被人发现，我走到前门的入口处。现在必须适时地改变策略，在“以攻为守”的理论指导下，我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试着扭大铁门的把手。另一个奇迹出现了——门未锁，随着我的手的转动，门打开了，我勇敢地跨出门去，面对着卫兵。

“你到哪儿去？”他们盘问我说。

我用典型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傲慢姿态回答说（当然

是用中文)：

“我要回家，附近有人力车吗？”

又是一个奇迹：孤单的一辆人力车沿着街道过来了。我用命令的口气：“洋车，来！来！”我坐了上去，高声地向警察道了谢，让车夫送我到^在一个假地址去，就是将军的邻居处，这是我们一致商定的集合地点。我不知道怎样解释这个事实：为什么在门口的警卫不阻拦？也许他们未接到阻挡任何一个外国妇女的命令，也许是在大门的黑影处未认出我是外国人，也许他们是刚换岗的新兵。最大的可能是，在招待所内的特别警卫考虑到他们已负有看管我的特殊任务，而未把我的情况通知门口的警卫——通知门口的卫兵我可能从那儿逃跑，这对他们来说是丢脸的事。其次，无人想到我会在越来越严的军事管制法的安全措施下逃跑。

我的人力车沿着街道前行，由于警察在进行安全巡逻，街上行人绝迹。

每看到一个警察，我的心就悸动一下，但只有一次他们让我停下来。

“我是外国人，我要回家，”我说。这是理由充足的解释。因为在那时的中国，一个外国人，无视军事管制法及军令，甚至在最不适宜的时刻，跑到街上来游逛，也是无人怀疑的。

由于疏忽而造成的可怕错误，我没有要去的地点的确切地址（即使有一个门牌号也行啊！）。我既不知道房主的名字，也不知道司机的名字，现在甚至比坐在我窗前凝视——希望看到肯普顿香烟亮光信号时更痛苦。没有他的指引，我所知道的只是我们的“安全邸宅”坐落在钟楼过去的某一个街区。走过一个红漆大门，这不是我要找的地址，但它引导我走上一条相接的支路，那也不是要找的地方，但是那里有几个未上过漆的大门……

我以前从未如此清楚，所有中国的街道象规定的一样都有红漆大门。我的唯一希望是，在中国通常是人人都知道任何外国人的住宅的，我本来打算一路打听，直至能找到有人说他曾在附近

一座房屋前见过肯普顿·菲奇为止。我所抱的一线希望是那所
的警铃还没有响，并且还未派我的保镖紧紧追赶我。

后来，最后的奇迹出现了，我突然看见了一辆自行车。我辨
认不出骑车的人，由于人力车的车篷遮着，对方也未能看见我，
但在自行车刚刚过去、快要走出听力所及的范围时，我本能地喊
了一声“嗨！”

听到了我的声音，肯普顿惊奇地停住了他的自行车，当他来
到我的面前时，他震惊地咧着大嘴，真象那难以捉摸的红漆大
门。“你真的跑出来了？祝贺你！”因为有士兵巡逻，他无法接
近院墙，而且他认为我不敢在昨天晚上试着逃跑。他在街上等了
大约20分钟，后来听到了一声枪响，因而猜想我不敢越过围墙。
事实上，他怕枪声可能是朝着我开的。他已放弃今晚的机会，当
我喊出声时，他正要回家去睡觉。

“我很高兴，这枪声不是向着我开的。”我嘻嘻地笑着，嘴
咧的比他的嘴还大。我们俩对视了一分多钟，傻笑着。然后他骑
上自行车，优雅地挥动他的胳膊招呼我说：“这边走。”

我们距离目的地不远了，我故意在另一个大门前下车，付
了车钱，为的是以后车夫就不能向当局报告准确的门牌号，然后
步行到约定的住宅。一辆汽车停在院中，肯普顿把我介绍给司
机，我们严肃地握了握手，他是一个有点神经质的老人——性情
乖僻。我当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人把我锁在任何行李箱内。

在我们等候天亮开城门的几个小时内，街道上最轻微的嘈杂
声也会使我躲到沙发后面，唯恐被追赶我的警察发现。后来，在
太阳快要升起前，司机就离开了房间。我们期望他立即回来，但
是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影子。我们在屋内找，在院里寻，他
已无影无踪了。肯普顿突然拍了拍额头说：“我早该料到这事
了。”“你知道，他昨天晚上跟我说什么？他沉静地说，‘你知
道，我总感到晚上很勇敢，不害怕，但我好象在早上总是没有勇
气。’他在晚上吸鸦片，原因就在这里！”

是呀，这儿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做黎明前的黑暗吗？当我们正要组织一帮人去附近的烟馆寻找时，这个浪子回来了，眼睛异常明亮，一付十足的脓包样。

一分钟也未耽搁，在鸦片烟激起的勇气逐渐减弱前，肯普顿给我戴上一顶男人帽子，被子一直裹到我的鼻子那儿，我穿上便裤，戴上墨镜。我们指望因为这样的穿戴，人们可能把我当成因患肺结核要回到三原的传教士父母那里去的孩子。

按我们的计划，肯普顿此时应鞠躬告退了，但司机做出一种不愿意的样子：除非肯普顿和我们同行，否则他不去。我没有要求他这样做，但肯普顿决定同我们一道走——一种纯粹的骑士行为。

从常识来说，这是合情合理的安全措施，因为任何一个哨兵都无权阻挡一位将军，于是，我们乘坐将军的车出发了。我们手握军事许可证，快速地通过城门，以一种娴熟的傲慢姿态把城门外一队修路的士兵驱散到道路两旁。

司机说：“我不会停下来，即使哨兵开枪也不停。”但这可能是鸦片烟的作用。

我们故意沿着蒙古骆驼商队的道路——而不是走私犯的小车道——颠簸行驶。但是这条交通稀少的线路却绕过了咸阳市和中央军的主要岗哨。我不止一次地担心车子可能陷下泥坑，尽管乘木筏渡过泛滥的渭河是很好玩的事，但由于我们有几次遇上中央军的官兵，因此一点乐趣也没有。肯普顿·菲奇的陪同使这一天安然无事，只要他愿意，就不会有人对他到乡村旅行的权利提出疑问，尽管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是谁。他在中国居住了这么久，足以准确无误地知道怎样对付不受欢迎的审问的。

啊！小小的三原镇啊！在1937年春天的早晨，在我的眼中你是多么迷人啊！我们仅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两个小时，来到了这个介于国民党和红军之间的中立地界、地方军陕西第十七路军的驻防地。肯普顿决定一直把我安全地送到红军办事处才离开。我们

有地址，在一座城门附近的一个小货栈。我们打算在那儿打听一位姓王的先生。但当我们满不在乎地闯了进去，几乎撞到一个戴红军帽的年轻哨兵的刺刀尖上时，我们就开始放弃找人的念头了。肯普顿没有时间进行谈判了，就直截了当地抢了哨兵的帽子，手里拿着抢来的纪念品，冲进了汽车，以便在未被发现他已出走之前返回西安。哨兵对他的这种帝国主义式的抢劫，不知是应该笑、还是应该开枪。

我第二次见到肯普顿是1945年在纽约。他告诉我，他们发疯似地赶回西安，他躲进了公司的院里——他是美孚石油公司在西安的负责人——马上装作在睡懒觉。肯普顿告诉我，欧阳上尉打来电话，“他说他要来看我，所以我躺在床上，象平时一样摇铃召唤侍者。他进来时，脸色象纸一样白，怒不可遏。他在司令部受到了训斥，已来找过我四次了。他说你们逃跑是终于使人无法忍受的最后一击，他们已尽了一切努力阻止你前去。三天以后他又来了，还是……”

他补充说：“有人说你从北京出发一路都有人跟踪，”“欧阳上尉说，所有宪兵和警察都接到了命令。他还通知我，必须离开这个城市。他们从汽车里发现了一些证据，而且据报告说有人看到了外国人。三天后，公司向我宣布，我被调往长沙。一个多月后，大约在农历7月，我离开了西安，经过被轰炸的徐州府。不久，那个吸鸦片的司机也碰到了一点麻烦，但摆脱了。只有我们三个人被涉及。招待所的经理周先生怕得要死，他不知你是死是活，也不知会给他带来什么灾祸。两个警卫被关押了六个月。所有传教士的住宅和其它每个涉嫌的地方都遭到搜查。”

天意使我成为西京招待所传奇故事的人物之一，以及成为周先生喜爱的女英雄——不是那时而是很久以后。

在麦卡锡时代，两个联邦调查局的人拿着一册《续西行漫记》来访问我，虽然在这本书中我没有写出两个加拉哈德的名字，联邦调查局的人问我是否知道肯普顿·菲奇有什么对美国不

忠诚的地方，我拒绝透露曾经帮助我逃跑的人的姓名，他们也未再坚持。我告诉他们，我相信肯普顿没有搞颠覆的思想，我知道肯普顿——和他的父亲——都不会对这事保密。但尽管如此，我从未说出他的名字。这是原则问题。他不仅不同情任何共产党，而且对我的旅行也不同情。这不过是在危险时刻的一个绅士的自尊心。当我是宪兵的俘虏时，他更是他自己意识的俘虏。埃菲·希尔也一样，他对共产主义没有丝毫兴趣，但面对整个广阔的世界，他不能拒绝帮助一个孤独无援的美国姑娘。

我有足够的理由从三原给欧阳上尉写信，告诉他，我将进行几个星期的旅行，不要为此担心，我很安全。肯普顿在5月1日给我的丈夫写信，告诉他“通过一番多少有些紧张的经历后，我已安全抵达”。他又说：“如果我给你透露哪怕是一点点关于当地所谓特务机关如何暴跳如雷的情况，那么毫无疑问，你会感到很有意思的……。据我在这里所听到的，蓝衣社派人暗杀你是轻而易举的事……。撇开政治观点，一个孤独美国人总是会帮助另一个孤独的美国人的，而且看来在困难中一个年轻小伙子也总会帮助一个姑娘的，我也绝不会偏离习惯作法。”

后来在1937年，我进一步了解到，我的行李被留在招待所，当局认为我可能乘火车离开了西安，并怀疑我绕道穿过乡村回去了——这是我原来的计划——他们给沿陇海路远至潼关的每个站打电话，试图追踪我。警察头子又一次感到需要重整他的部门，这又是为了姓斯诺的人，但是象我的两个警卫直接被整治进了监狱的事，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每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都把宝押在我的回来上面。日后的回程会造成比我原来出逃时更严重的问题而且更加难办——怎样通过西安返回而又不使我的胶卷和笔记本被没收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我可以把所有的笔记委托给他的，虽然我也托离开延安去北京的某人带了一部分胶卷，而且埃德也及时收到了

并把其中11幅照片放进了《西行漫记》一书中。

引起人们的担忧的一个方面是，众所周知，法西斯蓝衣社惯于绑架、暗杀他们不喜欢的中国人，去年在西安常常发生这种事。西安官员首先预料到这种事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可能会被秘密杀害。周先生确实为此担心，而这也是肯普顿·菲奇总不离我左右的一个原因。每个人都警告我说，埃德绝不能再到西安来，否则他将遭到这样的命运。没有保存关于中国人由于法西斯报复而失踪的记录，而且对中国的法西斯分子来说，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外国人也是不能容忍的。

5月2日我从云阳给埃德写信：

“现在我在三原附近的彭德怀的司令部里。昨天是‘五一’节，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红军真是不可思议。他们都年轻得令人不能相信。我一路历尽艰险，现已成功到达。今天我要去看贺龙，然后去延安，我只有一点点时间来写这封信。王福时很好，陈翰伯也已从西安逃脱，和我同在此地。我自从到此后，又忙又累，无暇思考。我感到头脑发胀，但没有病。当我爬出窗口时把东西全留在招待所了。我在这里当然很快乐，这确实是一个成就……”

5月3日那天，埃德还不知道我已经到了三原。他用暗语给我写信说，“在你结束假期以前，也许你能见到吉姆。”吉姆和埃德正在努力完成他们的书。他们无法知道我正在进行的事——我们不能轻易相信很可能被检查过的信件——但他们都在考虑必要时赶来营救我。埃德的信最后说：“如果我去看你，你认为能对你有所帮助吗？或者你认为会把细菌从你那里引到我身上吗？如果可能的话，那很好，啊！我如此地爱你。”

第三十三章 抵达红军前线

经过几乎十天的艰苦跋涉，我终于在1937年4月30日抵达红星之国。陈翰伯已在这里，我在三原的联系人王先生，已经通过电话向附近的彭德怀的红军司令部报告说我已到达。这位将军给我派了一辆道奇旅游车——这是少帅送给将军的礼物，此外还有两辆别的车和12辆卡车，这位司机说，“我是跟这辆车来的”，他曾经是少帅的一名司机。他告诉我，东北军很多人已参加了红军。

在前线的政治部，一个和蔼、漂亮、文雅的姑娘笑着走过来欢迎我，同我热烈拥抱，她名叫李伯钊，我将同她住在一起。一个穿军服的小男孩腼腆地笑着给我端来一盆受欢迎的热水。我听埃德讲过，红军里的“小鬼”大都是孤儿，年龄在8至15岁，他们在部队当勤务兵。

李伯钊，26岁，是红军中有希望的剧作家，她是前线话剧团的指导员，嫁给了前线的政治部主任。她给我讲了长征的故事：她三次走过可怕的草地。“宣传队努力用舞蹈、歌声和口号来鼓舞士气，”她简单地说，“晚上，我们沿河点燃篝火，开展娱乐活动。景色非常美。每天夜里我们都要检查有多少人牺牲……和毛泽东部队在一起的30多个妇女，在长征中一个也没有牺牲，相反，倒使她们的身体得到了锻炼，过去身体纤弱的人，现在变得强壮了。”

但是李伯钊象红军中的很多人一样，得了肺病，每天早晨她都咳血。（尽管如此，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浮，直到八十年代她还活着。）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大祠堂去和陆定一谈话，他是前线宣传部的负责人，文质彬彬，戴一副深度眼镜，知识分子味道很浓。陆有30岁，成为积极的共产党人已达12年之久。他负责新闻界方面的工作，前一年，当过埃德的向导，他用极好的英语欢迎我。

埃德把他的照相机留给了陆，好让他拍下一些红军传奇式领袖的照片，并把照片送给埃德。陆解释说，他一直在学习使用这架照相机，迄今只有一张照片使他满意。“我放大了很多张，送给朋友挂在屋里，”他说着，自豪地展示了一幅梅花怒放的照片！这样，我将会在红军办公室的墙上看到很多幅陆的梅花怒放的杰作。

随陆定一走遍各地的另一张照片是一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已遭磨损的照片，“这不是我的孩子，”他解释说，“但看上去很象我，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怎么样了——我的妻子九年前在福建被杀害了。”

我的两个相识非常有吸引力，而且受过良好教育。他们是我们同一类型的人，我想，并且觉得奇怪，他们是如何坚持日常的艰苦生活、而又不失温文尔雅的风度的？此时此刻，对于陌生的环境，我不再感到害怕和不安了。

李伯钊劝我在去延安的路上要穿红军制服，戴军帽和墨镜，旅行时就不会太惹人注意了，在红军妇女中穿制服是很平常的。李伯钊让一个裁缝用了两个小时为我缝制了一件瓦蓝色外衣和一顶红军帽，但是我没穿军裤，仍旧穿我的宽大舒适的蓝裤子，这比规定要打的绑腿要好得多。

在前线，彭德怀将军接受过我几次采访，除了与那些崇拜他的“小鬼们”之外，彭对人生硬，一本正经，极端不受个人感情影响，他是个清教徒和斯巴达克式的人物，这在红军中是出名的。他是约翰·利尔伯恩^①式的人物。他比奥利弗·克伦威

^① 约翰·利尔伯恩(1614—1657)，17世纪英国著名政治活动家。

尔^①更清教徒味儿十足，最微小的不合道义的事他都会严厉批评，他对妇女很反感。这种态度自然而然使妇女们觉得他最有吸引力。

彭从我在1937年认识他之前到1958年为止，一直是红军的副总司令。1958年，他被解除了国防部长职务，他的岗位被林彪元帅所取代。据说，彭作为反对公社的亲苏“右倾分子”被排除在政权之外。1949年，陆定一成为有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长，但是1966年他被撤职，后来又“恢复了名誉”（他是在北京的著名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朋友，斯特朗在北京度过晚年，1970年于北京逝世。丁玲是1930年以来中国最杰出的女小说家，大约和彭德怀同时作为“右派分子”被流放。彭德怀逝世了，但丁玲活了下来，在1980年又一次成为文坛的佼佼者。）^②

1937年首次欢迎我的红色分子中，绝大部分人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清洗，因为他们是亲苏分子。据说，革命把他们的孩子都毁了，就象在法国和苏联那样。然而中国没有处决过“老布尔什维克”，而在1937年当我正在延安时，苏联处决了不少老布尔什维克。看来，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比法国人和苏联人在他们的革命中要更文明些，而且更有能力来约束领导层。他们仍保留着古人的对文字和思想的敬畏，然而，并没有超越以正统性为统治和权力的主要武器的阶段，就象所有的原始社会那样。

①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领导人。

② 本段的一些叙述与事实有出入，显然是作者记错了。

第三十四章 古城茅舍

我们的卡车费劲地开到延安城门外的一个站停了下来。准备去红军大学的13个大学生背着背包在汽车的颠簸中唱着“布琼尼进行曲”，车停下来后，他们跳到地上。我们每个人都披上了一件金黄色天鹅绒披风——来自戈壁滩的飞扬的黄土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在灰蒙蒙的阳光下掸掉了尘土。

我的“一二九”运动时的老朋友黄华过来向陈翰伯和王福时致意，我与他们在途中相遇（他们带来了我放在西安的帆布床）。黄华负责接待到达的大学生们。大卫·俞也在这里，他要在秘密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一个关于华北工作的报告。（当大卫后来见我时，我发现他令人震惊地受到毛泽东和他的讲话的影响。）

黄华带我去见博古，他是中央外事组组长，是毛泽东的对立面之一。博古陪我到外事组的院子里，来到我自己的一间小房间，窗是纸糊的，门上挂一块深蓝色棉门帘，靠窗放着一张雕花的方桌，桌上放着蜡烛和我的特别的茶具，另外有两把椅子和两条长凳，这就是屋子里所有的家具了。屋子的一角凹进去一块，这是一间卧室，用蓝布帘隔开，这是一铺“炕”，一个砖砌的高台，我把帆布床和睡袋放在上面。床腿搁在四只装满煤油的香烟筒里，尽管对蹦得很高的跳蚤来说，一点阻挡作用也没有，但这可以防止蠕动的小虫爬上来。

无论是相互竞争的、还是过群居生活的昆虫都喜欢栖居在砖地上，但我用石灰撒在砖缝里，小虫子就无法呆下去了。我每晚都把皮鞋放在高处，早上拿下来，倒着晃一晃，看看有无蝎子、

蜈蚣、虱子和跳蚤。头顶上的天花板是一块下坠的白布，老鼠彻夜沿椽子跑来跑去，它们争斗时黄土纷纷落下。我的床下放着一个捕鼠夹子，当捕到一只老鼠时，我吓得尖叫起来，把全院人都吵醒了。没有杀虫剂、没有化学药物、没有机械工具的话，这完全是有机生命啊！

不是老鼠而是跳蚤带来了黑死病——陕北是世界上少有的这种瘟疫的流行区。我的地板上聚满跳蚤，跳蚤爱好群居，喜爱外国人。中国人并非具有免疫力，而是由于世代受跳蚤侵扰，血液里产生了大量抗体，足以避免染上传染病。我永远不会忘记，黑死病曾毁灭了欧洲基督教徒的一半人口，而且使保持清洁在欧洲成为时髦，而这一点看来在几个世纪以后才传到中国。虽然那个夏天在我们院子里没有瘟疫，但却有一个得伤寒的，一个得痢疾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普通疾病，我的私人警卫员得了肺病。患肺病非常普遍，无人注意它。可能在延安的每个人都得过痢疾，但看来中国人通常都不大为这些病所烦扰。

在延安的四个外国人中，我未出一个月就得了痢疾。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李德——德国的奥托·布朗害了两三年恶性痢疾，乔治·哈特姆大夫是红军的第一个外国医生，人们叫他海德，他瘦弱，脸色发青，想来得了肺病，他只有27岁。美国作家和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大约45岁时在疗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治疗她严重的心脏病和胃病。仲夏时，她从马上摔下来，摔伤了背，在山上的窑洞里躺了好久，这使她郁郁不欢而且不能工作。

除了患病的时间外，史沫特莱有一种特别的魅力，更有一种才智和幽默，我经常上山到她的窑洞里专为消遣而听她讲有关蒋介石的故事。延安方面对这个题目如此感兴趣，是希望证明去年12月释放蒋介石是不合理的，因为放蒋几乎是不能容忍的。我认为史沫特莱女士根本不想控制自己的感情，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想法。她很欣赏自己的这种发泄，这能帮助她打发日子。

我在延安度过了四个月，收集了足够写四本书的资料，还给

别的书收集了部分资料。我太忙，沉湎于工作中，甚至未注意我自己因患痢疾而变得多么虚弱。严重的阶段终于过去，我用饥饿疗法控制住了病情，在晚上饿得不能入睡时就啃点蒸饼。

我们都可望吃到我们习惯吃的食物。世界革命怎么能和一个美国桃子罐头相比呢？我主要靠米饭、馒头（也就是蒸的软饼）、铋（胃病药）和一种叫亚醇的痢疾药片为生。马海德医生习惯于在我们的纸窗下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报告他的到来。

我对住在延安的其它三位外国人的态度感到奇怪。在中国，被隔绝的西方人通常渴望结识新朋友，甚至渴望谈上几个小时。虽然马海德医生对我和李德都很好，但是他们两人谁都不同史沫特莱女士讲话。他们说她“讲了他们的谎话”，这可能是她在患精神病的特殊困难时期做的事，但他们一点儿也不能原谅她。

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也本来就不期望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一直感到不安。有一次我使劲嚷嚷着，为了让我闭嘴，马海德医生最后被迫同我一起上山去艾格尼丝的窑洞看望她——但除了谈药物外，他们两人别的什么也不谈。

除了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个人不睦外，马海德医生平易近人，才华横溢，机智幽默，讨人喜欢，具有魅力；他总是很“脱离群众”，这是在华的外国人的普遍现象。（1972年我们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他已经同中国人结婚，有了孩子，而且变得“完全中国化”了。）

正象我与这类西方人第一次认识一样，毛泽东和中国人也是逐步了解他们的。毛和李德正在进行政治斗争，而且互相嫌恶。李德的真名是奥托·布朗，在延安不出名，白皮肤，蓝眼睛，40多岁。这位共产国际代理人的思想在各方面都与毛泽东相对立。（甚至到1965年他还从东柏林攻击毛泽东，他于1972年死在那里。）当我大胆地向李德提出一些复杂而又矛盾的问题时，他凶恶地向我叫喊。于是，我认识到他不了解中国，只是从欧洲的经

验来考虑中国。当我向毛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他觉得有趣而乐意解答。

我很清楚，李德由于痢疾而变得相当虚弱！而且由于招致过多的敌视而变得急躁不安和难以相处。我也明白，他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能与我这样的外来记者谈话，但我对他对待我的方式迷惑不解，好象我得了传染病似的。当我在1975年得悉其中的主要原因后觉得很有趣。一位美国学生读了1974年德国出版的一本李德的书后写信给我：“我想你可能愿意知道他对你和埃德加·斯诺的评论，他不信任你，认为你是美国密探。你们的报道简直太精采了，因为这个原因，当你在延安时他避免同你接触。他永远不能肯定，你的目的是纯新闻报道或是别的……他是个多疑的人。”

李德不了解有事业心的美国新闻记者，他更不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而且他自己也清楚。然而毛泽东对整个形势有一个精确的估计。有趣的是，当得知李德不喜欢我并和我争论后，毛的表情缓和了，对我十分友好。

我理解李德怎么会成为一个如此神经质的人，但是，他给中国和西方之间未来的关系带来了多大的损害呀！我想，我讨厌接受来自共产国际中象李德这样的人的命令。

第三十五章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在我到达延安的第一天早晨，由于汽车颠簸、旅途劳累，我的头还有些昏昏沉沉，这时，我的新警卫员报告说，毛泽东和朱德将军在院子里，准备拜访我，以示欢迎。我不能决定是否重新涂上唇膏——这是我的一条西方文明的生命线——还是把它全部擦掉。结果，我什么也没做成。

我们互相握手，朱德用“延安式的握手法”表示欢迎。这种方式在全中国已成习惯，而传统方式是鞠躬，至于握手，特别是男女间的握手，过去几乎从未听说过。握手就是两只手握着摇两次（就象朱德于1972年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欢迎我回到中国时那样）。我丈夫没有见过朱德和他的军队，所以我预先没有思想准备。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富有同情心，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给人一种对全人类都那么仁慈和友好的感觉。

他是一个真正的民间英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见到他就把他看成是她在大地上的最好朋友。她离开延安后，先到了西安，随后就到朱德在山西山区里的司令部。她和朱德在很多问题上看法非常一致，后来她在写朱德传记时甚至把她自己的形象都写进去了。他可能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个真正信任的人，虽然她也曾钦佩埃文斯·卡尔森——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也从第一次见到朱德那一刻起就与朱德看法一致，而且把他当成“热情而真诚的朋友”。有见识的朱德已在他们在中国度过的长期岁月里，证明了他们二人的行动是正确的，他们在中国所探求的是与“真正的”中国人在观点上的一致，或者至少在思想上具有某种关系。

两个来自基层的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山区，寻找一个值

得他们敬慕、尊重和认同的民间领袖，这是特别重要之处，犹如卡尔森敬慕他的朋友罗斯福总统那样，尽管方式完全不同。如果卡尔森不喜欢朱德，艾格尼丝就会极端憎恨他。

卡尔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成员，他从遇到朱德的一瞬间就接受了工合主义——与此同时，埃德加、我和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同时在上海创造了这个合作社，“工合”一词即源于此。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感情来自与人民的一致性，特别是那些用双手劳动的人们——生产者。对我们来说，朱德代表了中国的宽广大地，他很宽厚，人们本能地了解这一点。他老家在遥远的四川农村，他必须自己寻找学习机会，而他确实这样做了，甚至远赴欧洲求学。

最主要的是，朱德不盲目地反对西方，而且思想开放，胸襟开阔，忠诚老实，公平厚道。

我们这些美国人认识到朱德的优秀品德，而德国人李德却藐视朱德、藐视毛泽东和其他人。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反过来，中国人也认识到我们美国人是好人，因此信任我们，喜欢我们，而厌恶李德。这是悠久的持续的中美友好关系的一部分，这么深的友谊从未在其他任何一些民族中存在过。

晚年，他在北京担任国家元首，一些外国人如艾黎称他为“老先生”，这就是他在我们当中的印象；按我们西方人的传统，先生的所有品德都被认为是高贵的。在我的心中，甚至早于艾黎使用这个称呼之前，我就总是把朱德认为是完美的先生，或如中国人称谓的“朱总”。

朱德及其夫人康克清高度称赞我的勇敢精神，尽管这种勇敢在延安并不新鲜，但是毛泽东在私下从不作这种表示。朱德用他的特殊方式欢迎所有的外国人。1972年，詹姆斯·恩迪科特告诉我，一个传教士曾在四川救过朱德的性命，这也许能有助于解释他与众不同的态度。

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个整体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人物，以致某

些中国人把“朱一毛”看成一个人。毛是头脑，理论家，“主席”；朱是心脏，军队，而且具有人民领袖的天性，体现了人类的本性。他们两人都是用高级材料制成的，这使他们在八、九十岁时还能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首。

朱德双手插在袖筒里，谦逊地坐在破旧的桌子后面，他的平头上依然戴着帽子；而毛泽东把他的椅子拉离桌旁，摘下他柔软的红星帽，让他浓密得令人吃惊的黑发滑落到耳旁。他交叉着那美丽的、出奇的、强有力的、高贵的双手，好奇地看着我，甚至带着善意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力量。它一点也不象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通的手，也不象工人阶级的手。毛很魁梧，而且就一个中国人而言，体格很健壮，他的手与他的体格很相称。

任何事也损害不了毛泽东，他教养良好，但本质刚强，坚韧不拔。我喜欢他，而且和他处得很融洽，就象埃德加从一开始起就有的那样。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埃文斯·卡尔森由于某些原因都对毛泽东了解较少。埃文斯把他写成一个“谦虚的、善良的、稀世的天才，在茫茫黑暗中努力为人民找出一条和平的生活道路。”

我对毛泽东的生平已经比除我丈夫外的任何人都知道得多些——因为毛在以前从未对任何人讲过他的生平。我对毛说：“我丈夫一回到北京，我就尽快把你的传记打出来了”。“这是一部杰作，会给每一个读者以深刻的影响。于是我决定不惜任何代价访问你们的地区。我丈夫希望我从你这儿得到最后一章的材料。”

毛泽东以他习惯的方式笑了笑，亲切地点了点头。

因为毛泽东在前年对埃德坦率地讲述了一切，所以对我也毫

• 埃文斯·卡尔森：《中国的双星》（多德—米德公司，纽约，1940年），第170页。

无保留。朱德带着他的将军们在他们来出席5月份的党代会的几天中访问过我。（只有一个重要领导人未来——林彪，他显然比其他他人更排外。）我已经为我的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搜集了34份简要的传记，还进行了其他一些采访——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毛树立了榜样。毛泽东是从礼仪到外交政策的每一件事的主宰。

在那个夏天，我与毛泽东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尽管还不如一年前埃德与毛那么亲密。我给了他一份长长的问题单子，并谈过几次。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其中有许多是要求解释看来似乎是矛盾的问题。他呵呵地笑了，说：“你知道，中国有些事是很奇怪的。”他有时在椅子上转过身来问我：“你的意见呢？”这使我有点紧张，后来我才明白，他诚恳地想知道一个外国人的想法。

就在那个夏季，毛泽东完成并修改了一些重要的新论文，并用这些论文在延安的抗大发表演讲。他知道我学过黑格尔，但若不作确切解释，我就无法理解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真理。他愿尽力为我澄清一些事情——他欣赏智力方面的挑战——并同意与我合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那将是一条多么重要的独家新闻啊！在7月4日美国独立节那一天，他第一次和我就“中国革命的实质”进行交谈，真是好极了。但是日本在7月7日进攻中国，毛就把我交给了他的助手吴亮平，至于其他的事就交给了官方史学家洛甫了。

1937年，毛泽东在抗大第一次发表了演讲《矛盾论》；这是在他读了我的长长的问题单子并同意对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解释后发表的。他给我的主要回答是：不能用形式逻辑来理解中国革命，而只能用关于矛盾的观点。我准备接受这些论点，尽管我不喜欢这个术语。我断定，德国的李德和苏联永远不会接受这种思想，也不会理解这一逻辑。但我从未逆料，1937年曾弄得我糊里糊涂的矛盾，会真正导致七十年代的中国与苏联及其卫星国的

武装冲突，尽管李德和毛在那年夏天就已处于对立地位了。

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如果他说的话，那中国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他是灵活的，愿意改革和研究的，最重要的是——忍耐——直到转折点。他等待最低点，然后在既不早也不晚的时刻，采取行动，扭转车轮，引导历史随之前进。

党代会从1937年5月1日开到15日，中央委员会在8月份开会，毛泽东的充满生机的权威持久地建立起来了。1937年8月13日，我采访毛，在交谈中他给我一份共产党的十大“救国”纲领，这是针对现实的日本威胁的救国纲领。主要宗旨是：给人民以爱国行动的自由和武装自己的自由。

为了避免引起软弱的、被吓破胆的国民党的敌意，十大纲领不包括经济项目；统一战线很脆弱以致没能提出一项持久的建议，甚至连简单的民众经济动员也未提出来。

最后毛拍案而起，脸色通红，目光炯炯，激昂慷慨地说，如果与南京政府合作，这十项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不合作，中国就会灭亡！”他愤慨地把最后一句又重复了一遍。

“我确有同感。”我站起来点头表示同意：“中国必须以任何可能的办法动员起来，否则中国就会灭亡。有一种组织总比没有强。”

这就是我在延安之夏的主要结论：“全民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组织起来采取行动——其中的一条办法就是讲‘民主’”。（后来毛以“新民主主义”这一重要提法提了出来，埃德和我都希望把这个小小的、但重要的词汇添入我们杂志的标题中去。）我懂得了共产党能够组织人民——不是向他们提供物质的东西，而只是依靠亲密无间的精神力量，或如他们自己指出的，“生死与共”。青少年都自愿参军——所有红军士兵都是不付佣金的志愿兵，他们勇于牺牲，而新的军队随后又建立起来。在延安的黄土地带，人们靠野菜和动物充饥，生活几乎不能维持，一个苏醒

的精神力量产生了，它可以充当饥饿与危险的精神食粮。中国青年起来反对昔日的各种可怕的弊端。毛泽东的革命自始至终是青年运动，而生气勃勃的革命总是把妇女包括在内的。

毛泽东在晚年由于种种原因搞起了个人崇拜，他带着他的抱负和局限性成为“新中国”的化身。他是一个有辩证头脑的复杂人物，他和他的事业是不能用西方的范畴来加以描述的，否则就不但不能说清，反而会搞得更加含糊不清。他是他同时代人中最乐观的人，但是他愤世嫉俗，不信任无能之辈。对于外界的影响，他比他的同龄中国人都更加开放——他以惊人的敏捷从谷物中挑出秕子，而又本能地识别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毛泽东是巨形化了的普通人，是中国的缩影。他是他的国家占人口80%的农民的化身，其余的20%害怕他，但最后还是承认了他的权威，而且在毛泽东在世时也带着或多或少的崇拜心情跟随着。毛更象亚伯拉罕·林肯而不象其他西方人，甚至连他的高大、魁梧、自然的纯朴而高贵都相似。他也同样孜孜不倦，渴望学习，甚至在1970年他还学习英语，为人民树立了榜样。

毛泽东的特点是大——在各方面都如此。他总是确定某项政策和某种理论的大轮廓，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作为个人，他决不是微不足道的，也决不是自私平庸的，更不是有报复心理的，他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他是一个胜利者，并把胜利的进程作为享受，他的大部分胜利是思想上战胜别人而取得的。据悉，他从不杀害对手，与法国和苏联的革命相比，这是大大前进进一步的文明行为。1937年，当“老布尔什维克”在互相残杀时，毛泽东却给予他的两个死敌以自由——他们直到最后都力图摧毁他。一个是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另一个是张国焘。我在延安时，张是抗大教员，他获准离开了延安，尔后他到了蒋介石的司令部，他们欢呼他为唯一“正确的领导人”。

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是这样称呼的）的精髓，是“革命能改变一切”。这不是理想主义，毛的意思是行动，而不仅是思想。

总是驾驶着国家航船向主流前进。

毛主义是一种变革的方法，革命的方法，是理论，而不是一套重新建设的蓝图。它是一座桥梁，借助它，工业化前的国家，如亚洲和非洲的国家，可以轻松地通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并掌握社会主义的武器去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甚至青少年时期在长沙时，毛就知道社会主义是进步的强有力武器和工具。他的办法是，不是去等待新的工具和机器来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进行武装革命。武装的农民保卫了另一部分农民，这些人自觉行动起来改变社会经济状况，而不是等待外来的经济决定论。

在中国长期革命的三巨头中，如果毛泽东是头，朱德是心，周恩来就是执政的手。

5月我到延安听到的第一个新闻就是有关周恩来的。有人告诉我：“在你到达的前一周，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参谋长遭到枪击，有十个红军战士当场牺牲，几个受伤者后来也牺牲了，出事地点距离延安只有15里，周、参谋长和一个新闻记者还有另一个人奇迹般地脱险了，他们跑着躲开了。只有四个人安然无恙。”这辆汽车就是一周前我从西安到延安想要乘坐的那一辆，但是没有赶上。

1936年6月，周骑马去欢迎埃德，从那以后他们成了好朋友。我在1937年6月才见到周，因为他到西安去了，但在以后我们进行了多次谈话。

周恩来于1899年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他经历了两次革命和旧的宗法制度的变迁。他和他的妻子邓颖超的结合是全国现代婚姻的楷模。1920年在法国留学时，他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他还访问了英国、德国和莫斯科。1924年，他是黄埔军官学校副校长^①，1925—1927年革命时期军校的年轻学员们的

^① 当时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榜样。起义失败后，他逃往苏联，后来又回到江西。然后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在遵义，他和毛泽东结成了联盟，从此长期持续下去。

1949年，周恩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一直干到他因工作紧张、操劳过度患心脏病和癌症而进医院治疗。他的作风很象毛泽东，是典型的中国人。周是天生的外交家，他毕生的职责也正是如此，无论在国内还在国外。他的基点在于联络，在于寻求共同基础和连接的纽带。从一开始他就稳稳地驾驶了政权。（就好象他在使用着一具陀螺仪，犹如驾驶战车的武士，总是在道路中间行走，但不断左右调整着。）

毛泽东喜欢在人们的世俗观念中引发火山，周恩来象是一个一同来的组装零件的工程师，对每个细节都极为精细，有处理“中国”局势的高超技艺。历史上的高级官员在计谋上无人能与周相比。毛是政治家，周也是政治家，还是一个天生的政治活动家。周是组织工作的能手，他是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的首席联络人员。

人们常说，周过着一种具有魔力的生活，没有人象他那样在一生中经历过如此之多的失败的尝试。甚至在六十年代，成千名极左的红卫兵包围了他的办公室，索要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但是周恩来把他们劝走了。在1967年，周发现一伙红卫兵暴徒正在袭击“英国代办处”，他亲赴现场，愤怒地命令他们“回家去呆着”。

周恩来不象毛似的是一个来自民间的普通人，他代表了中国人所谓的士，是知识分子的保护人。他的革命生涯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当时在天津教会办的南开中学读书。他有通商口岸类型人的风度，更灵活，更练达。他实际上是中国人所谓的“儒将”。

在周恩来任总理的活跃时期，东西方关系解冻得以实现，这是毫不奇怪的。周恩来宽宏大度，潇洒自如，教养良好，明智、

开胡、坦率。

（1972年我去中国旅行时，没有要求会见毛泽东或周恩来，尽管我本来是应当提出这一要求的。后来，我听说毛也许会愿意会见我，但人们不能冒昧地提出与他会见，我怕他说不见。我离开北京后，两位特使给我送来了两位领袖的信，邀请我回去。周恩来说，他未见到我感到遗憾，而同时，他请他的妻子照料我的访问，他说，我可以在中国愿住多久就住多久，愿到哪儿就到哪儿。他的妻子邓颖超，还有朱德和康克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随后两位夫人设宴招待了我。）

第三十六章 在延安的四个月

我原先计划在延安只停留一个月左右，但6月1日我丈夫从北京来信说，他安排了几位美国旅游者访问延安，一心期待他们能够一路护送我返回北京，他知道我对于携带胶卷和笔记是多么担心。6月22日，欧文·拉蒂莫尔、T·A·比森和菲利普及艾格尼丝·贾非乘埃菲·希尔驾驶的一辆汽车到达延安，希尔早恢复了健康，他曾帮助我逃离西安。他们停留了一天，在23日离开。

但是我未能和他们一同返回；他们是借口游览一座名山通过了西安封锁线的，如果返回时突然多出了一个人，估计在西安会遇到麻烦；更糟的是，埃菲的小车已太拥挤了。所以我只好把一些胶卷和珍贵的笔记本委托他们转交埃德——我担心，如果我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会被西安的警察没收。

我计划乘红一军的卡车去西安，但是车子没来。下了几周的暴雨冲垮了两地之间的道路和桥梁，而且断断续续地一直下到秋天，我在延安一直被困到9月。

然而，还有很多地方要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人要谈话。在那个夏天，我约见了很多人，提了成千个问题。我至少采访过65人，同各种类型的人进行了长短不一的谈话。除去我来自西安的福音派新教朋友张文平外，没有人想对我施加一点影响。相反，没有人打扰我，他们也不特殊地来帮助我。在整整四个月中，我自由自在。中国人认为其他外国人会照顾我的——但是这些外国人太忙于关心他们自己的事了，并未注意我和我的问题。

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要求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我一走出院

子就要穿上军服。我一直喜欢穿裤子，这是真正的解放，那时在中国的外国妇女几乎从不穿裤子，除非去户外散步时通常穿上马裤。在延安，所有的人都穿裤子，这对新来的学生们更是一件大事，过去，无论男女都穿长袍。在中国，穿长袍是学生和上等人的标志，而工人阶级、农民和普通人，无论男女总是穿肥大的裤子。革命者采用了二十年代孙中山设计的“中山”服。男女共产党人至今还穿它——他们的裤子根本不象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裤子那样肥大。

在共产党人中，除去妇女，一般头发稍长些外，很难分辨出男女，延安本地人看着这些陌生人十分惊异。本地妇女都缠足，甚至一些女孩也被缠上足。当地的父老还有不少人留着辫子，便鞋上系着绒球。

尽管我始终都愿意适应环境，但我也不是访问延安的人中的佼佼者。我不能不抹口红，虽然我尽量做得让人们看来不太明显。我有病，要是不抹口红，感到病容更甚。化妆是忌讳的。唯一的另一个涂着口红走出百里之外的妇女，是刚从北京来的漂亮的天才女演员吴光伟，她是艾格尼丝的翻译。（艾格尼丝从不化妆打扮，她有早期女权运动者的风度。）

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对女性的不礼貌都是禁忌的，现在仍然如此。如果一个女性力图把自己打扮得具有吸引力，就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在这个清教徒和斯巴达克式的军队里，罗曼蒂克式的感情纠缠必须规避，他们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一切。

主要共产党人的性格在各方面都是清教徒式的，而且在新中国仍是这样。外来访问者得到的印象是，人们都加入了童子军或基督教青年会。（新中国仍在教育人恪守同样的规矩，特别是教育中小學生这样做。尽管除了毛主义外没有其他信仰。）男女可以在同一小组旅行，但他们从未有任何一点身体上的接触，甚至互相之间从不赠送礼品，他们通常分成不同的小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革命能够发展，为什么妇女可以参加革命并和红军一起行

军而不会出一点问题的原因。不仅在军队中而且在政治工作人员中都一样纪律严明，必须百分之百地遵守。

首先，强奸罪要处死刑。朱德告诉我，这样的事根本不存在。极端清教徒式的谦虚和严格的道德是赢得民心的纲领的一部分。提高妇女地位是共产党强烈维护的主张，而且也是取得成功的关键。这意味着一种特殊的保护，不仅反对强奸——或任何形式的不尊重——而且在家庭或在工作中也要保护。妇女曾是家庭中的奴隶。一种新的核心婚姻正在实行，清教徒主义是唯一有效的结构。

在延安，清教徒主义、禁欲主义、斯巴达克主义的哲学是绝对的，只有几个人抽烟，以毛主席和他最好的女友蔡畅女士为首。（蔡畅从1927年到1966年是地位最高的女共产党人，1966年，毛的妻子江青取代了她的地位。）现在中国吸烟者比比皆是——这是极大的浪费，因为种植烟草会损坏土壤。现在吸烟者众多的原因之一是仿效毛主席，他活到了80多岁。此外，毛是个体格健壮的体育爱好者，朱德和几乎所有的男领导人都如此。毛的口号总是“艰苦朴素”，没有浪费——除了吸烟外。

在延安，红军当然没有酒，甚至也没有茶；他们喝白开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有薪水。他们以最大的牺牲获取功名。他们展开小组竞赛和作鉴定，每分钟都以此为享乐。

他们对自己的制服感到无限骄傲，特别是裹上绑腿后更自豪。男人们缝补、编织、洗涤，但是没有熨斗烫平皱褶。每个人都梦想在自己口袋上别一支钢笔，即使是不能用的也想得到一支。

战士们喜爱各式各样的摩登的，即“新流行的”东西，如在运动和操练时，很多人穿着白色带有红条和其他图案的短裤，其中一个图案是一个小小的胖动物，瞪眼看着世界，样子象一种中年的米老鼠，我问一个战士它代表什么。

“是只米老鼠，”他说。

在我的笔记中记着这么一项：“苍蝇很活跃。我的翻译得了感冒和沙眼病，他脸色不好，身体虚弱，无处可呆，所以在这儿吃，他在戏剧学校仅有一个睡觉的草垫。”

我的翻译没有轻松的时候，当我用我最好的北京话友好地与警卫员谈话时，这位受窘的卫兵让我的翻译告诉我，他不懂英语；尽管我告诉他，我在北京同我的仆人交谈毫无困难，而他们也不会讲一句英语。我认为，他不相信在那个夏天我们能分享讲中文而不是讲英文的快乐。

语言是对红军的真正挑战，因为战士们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讲不同的方言，有些人根本听不懂从不同省份来的战友的话。（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是个普遍问题；在上海的中国妇女俱乐部不得不规定大家都讲英语，以此作为其成员的共同语言。）不断地努力在脑子里进行翻译，红军的语言技巧就有了显著提高，尽管他们仍继续讲着自己的方言，但都设法相互听懂。经过这个夏天，我的中文当然有了长进，我至少能听懂很多话，但我还需要一个翻译把我想说的话表达出来。

除了一个翻译外，艾格尼丝和我都有一个日夜不离的武装警卫员，象所有重要的共产党人一样。我的警卫员叫邓明远，他经过了一段艰苦努力才听懂了我的中国话，他18岁，但看上去还要年轻一些，红润的双颊，白皙的皮肤，他的脸几乎还没有他佩带的那支毛瑟枪大。他已经在红军中度过了四个春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在我们院里的六个警卫员中似乎是个宠儿。

这个班的班长叫曹醒材；我私下送他一个绰号叫波尔朵斯，因为他的长相与那个强壮的火枪手很相似。有一次，我过河去采访，下起了倾盆大雨，洪水将要来临，而渡船工人拒绝把我们再渡回对岸。河水猛涨，看来我们要在这里被困上一个星期了。波尔朵斯从一个军官那儿借来了一匹白马——这个军官刚刚在水中抓住马尾巴泅过河。我的火枪手迫使这匹懂事的马渡回对岸，象年轻的洛肯瓦把我背在他的背上，渡过了这湍急的河水，我身上

尽管巴湿透，但却很安全地渡过了宽阔的河面。从此以后，波尔朵斯是我崇拜的英雄。

在红军中新流行的一种活动是唱歌，每个人一有机会就唱，而且用最宏亮的嗓音唱。填上了新的中国词的“Dixie”^①在延安最受欢迎。特别是在美丽的落日余辉中，整个山谷歌声回荡。步出我的院落，一群基督徒正在做礼拜，唱圣歌。可能就是传教士首先把欧洲风格的大合唱传给了中国。

中国人最喜爱戏曲，现在仍然如此。演戏从一开始就对共产党革命起了重要作用，这不仅是为了宣传，也是通过娱乐赢得民众。共产党每到一个村庄，首先演节目，然后发表长长的演说，甚至中国的少年儿童也都是天才的演员，他们在台上一点不害羞，也不怯场。看来，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公开演说，而不会有窘迫之感。演讲、集会、唱歌和演戏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娱乐。

这些方面正是我不擅长的，我断然拒绝在公开场合唱歌、跳舞甚至演讲。人们希望来访者演一两个小节目，尤其希望外国人演节目。艾格尼丝喜欢表演，但是我被一种怕出洋相的单纯想法所吓住了。我的嗓子不好，自从高中以后我拒绝公开发表演讲，因为我在高中时讲得太多了。

朱德将军第一次带我到延安剧院，他把我介绍给大家，我站起来向大家鞠躬，但是拒绝上台，我不敢登台，全场观众鼓掌要求我讲话、唱歌或跳舞。朱德最后明白我被吓住了，于是说：“斯诺夫人嗓子疼，她说她从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唱过歌或发表过演说。”这确实使我在延安不能和更多的人感情交融。（毛泽东也未能使我作一次演说或唱一支歌。）

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未想过要当演员——尽管我总想写剧本——我最怕抛头露面，我几乎从不这样做。我也不喜欢政治家

^① Dixie是1859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首歌颂南方的流行歌曲。

们之间的争吵和内战，但我喜欢各式各样的私下讨论。

十分奇怪，我发现，延安的妇女对我在公众面前的谦卑和胆怯表示赞许。她们很快对我热情起来，我很快就和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交上了朋友。夏天，博古的夫人刘群先和朱德的女战士夫人康克清都对我特别友好。刘群先在长征中是有30名妇女的独立小分队的负责人。一开始她想知道我对于妇女地位问题的见解，后来她很快就称赞我了。这里的妇女有严密的组织以维护她们的思想。只有丁玲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敢于持不同意见，特别是关于自由恋爱和婚姻的问题，而她们俩被排斥在团体之外。

妇女们对史沫特莱一点也不了解，虽然她特别需要帮助，但只有丁玲和朱德对她表示某些同情。看来中国人一点也不神经过敏。除去史沫特莱、李德和朝鲜人金山外，看来，在延安的每个人都很快快乐。

所有现象中最主要的是在前线部队及其政治领导中存在的“集体精神”，这种精神达到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埃文斯·卡尔森在前线受到了朱德及其官兵们的热烈欢迎，使他感动得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致力于在美国及其海军陆战队中理解和鼓舞这种精神。“工合”精神是革命的支柱，这是出自一个人，为了一个目的而甘愿作出自我牺牲的意志。然而，特别奇怪的是，我自己也变成了这种“集体精神”的一部分；在我和红军战士们一起从延安到西安的十天旅途中，虽然我每天晚上都已筋疲力尽，几乎爬不上行军床，然而每天我都忘记自己是多么虚弱。

这是一种由高尚的风格和高度紧张所产生的精神力量——要是在古代，就不那么容易理解永不变化的中国了。要说这是因为中国人全都一样，像一群蜜蜂，这就不能解释我是怎样，如我丈夫、埃文斯·卡尔森、路易·艾黎和其他外国访问者一样，掌握了一些奥秘了。

丁玲也感到了这种奥秘并努力给我作解释：“红军是一支新型军队，你在中国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军队。他们一心一意扑

在革命上。他们没有烦恼——他们只为工作上的困难操心。他们都很年轻，我来到这里以后，感到自己也和他们一样年轻了。在我来之前，我睡不好觉，现在睡得很香，而且开始发胖了；这种简朴的生活很好。”

第三十七章 旅途十日

8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本占领了北京和天津，1937年8月13日又开始进攻上海。8月16日美国公使馆命令所有的美国妇女和儿童撤离中国。铁路遭到轰炸并被切断。港口封闭。延安得到了这些消息，但详情怎样，如人们能否旅行，却无人知晓。我感到束手无策，病倒了。我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到西安去了解确实的消息。但雨依然滴答滴答地下个不停。

作为一种替代的办法，我和毛泽东商议我能否作为一个在陕西前线的业余战地记者。我告诉他，我目睹过1932年的上海之战，而他也听到过我从西安逃跑的故事，但他仍用极为疑虑的目光看着我。我初到延安时体重108磅。现在我看上去老了十岁，体重至少减轻了十多磅。

“我为你写一封证明信给前线的邓小平。”毛决定。他挥舞着黑色毛笔，亲自为我写了信。

（当我到达前线时，邓和他的军队已经出发了。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作为贵宾出席了华盛顿市为庆祝“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举行的正式招待会，而我在42年之后到底把毛的信亲自交给了他。当然，邓已变成了中国的主要掌权者。）

毛继续说：“肖劲光会照料这儿的一切，我们欢迎斯诺先生在任何时候再次来访。”

肖是一位高大、强壮的军官，两颊象苹果似的，他负责指挥后方军事区。（七十年代他仍是北京的高级领导人。）他摇着头，对我的使命不大相信，他疑惑地看了一眼我那可怜的瘦小的警卫员，把他辞退了。

肖说，他要派一个最好的警卫员来照料我，同时找一匹小马给我骑，并找两匹骡子驮行李。“你可以和第一批小分队一起走，当然，这个小分队必须要有武装护卫。”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来访问我，她的背伤还未康复，谁也未想到她的伤势这么重，迫切需要做X光透视。她已经把她的几件贵重物品交给了我，并嘱咐我如何处理，还私下里把她的丝袜赠送给我（我至今还保存着）。

尽管延安与外部世界的通讯联络不多，但我还是收到了埃德9月6日在天津打给我的一份电报：“你可以经青岛返回，但急切要求你马上离开。否则今年就不能回来了。”真是交了好运，雨停了，等待天晴起程的小分队在7日早上按预订计划向西安进发。

李德来为我正式送别，整个夏天他几乎没对我讲过一句客气话。他送给我一副德国墨镜，1933年他曾携带它进入红区，长征路上也一直随身带着。他还送给我一把匕首，这是在南方被俘的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他把匕首送给李德以示尊敬。

李德心情激动、声音战栗地说：“这是我仅有的财富，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在这儿的处境多么困难，我要求你把这些东西留作纪念。”

我被这种未曾料到的感情表达弄得不知所措。我说：“当然我理解，”我又告诉他，你把我当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圣徒，而不是象你应做的那样对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说教。我知道，从某方面讲，李德知道他本人以及他为之工作的共产国际已在中国失败。他要把这火种传到美国。（在1972年我把匕首送给周恩来作为在北京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品。“我们不提李德的名字。”他说，“但是会妥善保存它的。”）

马海德医生也来为我送行，他给我一卷羊皮纸的旧书，这是一本古西藏书，因为缺少纸，在长征路上把它用来当纸写字，作为共产党宣传品。“你想不到我是多么喜欢你，”分别时他秘密

地说。

“我希望这样。”我回答。

正象肖劲光所许诺的，保卫局（负责安全和情报工作）派了一位第一流的警卫员接替邓明远的职务，邓因为肺病加重而被送进卫生院。我没有想到他粉红色的面颊是肺病的症状，也没有顾虑到整个夏天他咳嗽时的唾沫常常飞进我的茶中。

我的新警卫员名叫柯荪华；他不仅是来自江西的长征英雄，并且是一个有权威“排长”，也就是士官。柯荪华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院子时，他毫不掩饰地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他可能是想看看我的胳膊是否有一点肌肉。柯荪华23岁，个头与参谋长肖劲光相仿。他要了一支新毛瑟枪，而且认真地检查了马和骡子，确信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历时极度紧张的12天，行程250英里，从延安到西安，成为一段伟大的经历，这很大一部分得力于柯荪华。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让他去安排。

9月7日黎明，我病得几乎不能起床了，但我必须上路。这是很久以来的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

大部分的桥还未修好，我们必需涉水过河，我的马看来很清楚我的虚弱情况，当我们第一次过河时，它就在河当中把我从背上抛下，掉转头往它在延安的马厩跑去，还带着一匹骡子与它一起跑。等柯荪华抓住了牲口，叫住它们的两个马夫时，其他旅伴已在我们前边很远了。五、六个红军战士只得回来护卫这行进缓慢的小队，柯荪华虽然大丢面子——但我注意到这并未影响到他顽强的男子汉的自负。

不算武装护卫队和马夫，我们的车队大约包括30人，至少有三名妇女是红军高级领导人的夫人——朱德、肖克和博古的夫人。肖克的夫人还抱着孩子，朱德的夫人执意要到战斗前线去，尽管不许妇女去那里。在我们小分队还有几个正要上前线的红军

在耀县，我们住在一个马厩里，这里昆虫滋生，我想我可染得了黑疫病或伤寒病，病菌可能侵入了我体内，我的体温上升很快，房子好象在我周围旋转。我认为我快死了。但是，幸运的是马海德医生和部队也在这儿，他使我安下心来。

在三原，我们得知刘伯承的军队正要从他们在云阳的司令部夜行军到陕西前线去。我不愿错过会见这位有名的司令员的机会，同时也要把毛泽东为我写的介绍信交给邓小平，所以在天亮前，博古夫人刘群先和我只带了两个警卫员做护卫，租了人力车奔往云阳。四小时后我们来到司令部，却令我们极为惊愕。我们冒险地穿过危险的土匪出没的无人地带——博古夫人将是值钱的赎物，更不用说斯诺夫人了。我们却只差几个小时未能见到刘和邓；八路军（这是这支红军当时在统一战线中的称呼）这最后一支部队于夜间开拔了。

我们在云阳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在一支部队护送下回到三原。一辆卡车和另一支武装卫队准备从三原送我们到西安，并用一张特别通行证让我通过我五个月前如此不光彩地通过的那个城门。

第三十八章 重逢在西安

我回到西安最担心的事是，我的笔记本和胶卷可能会在西安或途中的任何地方被没收。为安全起见，我做了一条带口袋的救生带，把它围在腰间，用外衣遮住。途中每当看来有危险时，我就把它围上。

我们搭乘八路军的卡车，于9月18日到达西安——我的西安签证到期的那一天。我们直接来到红军办事处，在那儿，我在很多人中间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当她邀请我到她的小屋去住时告诉我，就在几天前，埃德帮助她逃出了北京。（后来在1972年和1978年我访问中国时，她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在北京正式设宴欢迎我，在一起共同回顾我住过的狭窄的小屋和斯巴达克式的生活。）

翌晨，9月19日，我前往招待所。我来西安的签证已在前一天到期，我居住在这座城市已属非法。幸运的是西安已经发生了变化，统一战线在起作用——很小。在西京招待所，周先生见到我十分高兴。他给欧阳警官打电话，请求他帮助我离开西安。虽然这曾是欧阳上尉至高无上的特权，但这次他却甚至不来看我。当日本飞机距机场不到二十英里时，及时地出现了三名特务来“保护”我，和我还有艾格尼丝与柯荪华一起在防空洞里躲避了三个小时。显然，我以前逃跑的故事在西安已广为人知，因而他们对我的态度暗中含有某种钦佩之意。

我的警卫员有些局促不安。我告诉周先生，柯荪华是长征中的英雄，甚至三个特务也带着职业的兴趣看着他。他穿着一身过于窄小的学生制服，但他看起来真象一个学生。他怀有共产主义

的信念，相信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他消灭过100个敌兵——这是红军官方计算的战绩。

这次空袭过后，我登记住到招待所我原来的房间里，把4月份我曾跳过的窗子指给柯荪华看。

我指着漂亮的现代化的带白瓷卫生设备的水管装置自豪地宣称：“这就是美帝国主义。”他仔细琢磨这奇异的水龙头，我说：“我们发明了所有这些科学奇迹，我们每天都洗澡。”

对于这一点，柯似乎不大相信。因为十天来尽管我们刷牙，有时也用热毛巾擦脸，但我们当中没有人在晚上洗澡。

我继续给柯荪华介绍令人惊奇的现代化文明，我带他（和我的三个特务一起）去看电影。这是他第一次进电影院，简直被迷住了，连话也顾不上讲。影片名叫《绥远》，是一位姓王的新闻制片人拍摄的，他是埃德在上海时的老朋友，并在1932年为我拍过一个新闻短片。

我的问题是怎样离开西安，当我得知去沿海城市青岛的铁路一直畅通，我便放弃了当一个战地记者的计划，而抓住了这个逃脱的希望。因为铁路不时遭受轰炸，我需要陕西省长开一张乘军用车的特别通行证。

八路军为我做了安排，1937年9月21日，我30岁生日时，周先生和柯荪华带我到火车站，曾在4月份跟随过我的两个老“保镖”也加入了那三个新特务的行列——他必须报告我确实登上了这列火车。

周先生预言道：“总有一天西京招待所会被看成是传奇式历险的中心。你的故事是我最喜爱的。”（1983年，彼得周从澳大利亚给我写信，要求我把他在北京居住的侄女安置进一所美国大学。现在，详细地讲述周先生怎样把我介绍给肯普顿·菲奇的事，已经成了周家的传统。这是我当时能去延安的唯一途径——周先生知道得很清楚。）

柯荪华站在火车阶梯的最下一级上，低头沉默不语。他强忍着离别的悲痛，一直尽量低着头，不让特务们看见他的眼泪沿着他那诚实的晒黑了的面颊滚滚流下。

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长城看来太遥远了。这儿是一位容易被理解的中国人在流泪，好象送别他最亲近的亲戚。这是中美友谊的根基。我从未做过任何损害这种特殊友谊的事，但是，这种友谊是由很少的几条脆弱的线编织而成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许多无情的剑正斩芟着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人的天性。

11时，汽笛长鸣，火车开动，当我站在火车阶梯上挥手告别时，一直背对着我的一小群特务们转过身来，看着我。他们面带着羞愧之色，尴尬地露着笑脸向我鞠躬。

但是他们并没有摆脱我……

大约七个小时后，傍晚时分，军车停在潼关，旅游者都知道这是全国一座最不吉祥的城市。这儿是蒋介石在整个大西北的军事战略司令部。河面宽达半英里的黄河在潼关南面拐一个弯向东流去，有两条河流在拐弯处汇入黄河：洛阳和从西安附近流来的渭河。这座城市坐落在高于黄河80英尺的峭壁上。从远古时代起它就是要塞。

中国人在这儿要受到搜查而且常常失踪，不只是那些有共产党嫌疑的，还有其他的人。我知道，4月份曾有命令，如果我到潼关并试图绕道去红区的话，就逮捕我。而现在，好象这最可怕的恶梦真的来临，四个武装宪兵和几个警察闯进我的车厢，夺过我的行李，把我强拉下车。我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

“为什么？为什么？”我哀怜地问。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不告诉我，他们只是说接到了来自西安的电话。

敢于动我和我的行李，这绝不是中国人的行为，因此格外令人可恼。他们甚至拒绝看省长发给我的特别通行证。潼关是法西

斯盖世太保的保安司令部。我还在外衣下面系着带有笔记本和胶卷的救生带。他们是不是要强迫我提供关于红区的情报？我会不会在潼关就此失踪而无人过问呢？

我坐在一辆人力车上，由武装卫队押着，通过黑暗荒凉、迷离曲折的街道，走了一个半小时。潼关还处于军事管制之下，我们有四次被迫停下来，他们检查了我的护照。

他们没有带我到某个秘密盖世太保的前哨站去，最后来到了中国旅行社的宾馆。经理挂好了通往西安的电话，并把话筒递给我。耳机中传来的声音虽有些失真，但却那么令人高兴：“吉姆和我到西安找你，我们刚好错过了四个小时，请乘下次车回到这里来，我已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听到你的一点消息了，你还好吗？”

我的心激动得简直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好容易才镇静下来，我说：“我简直惊呆了，好的，我乘下次车回去。”我恐惧的心情缓和了，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我穿过黑暗曲折的道路又回到车站，赶上了第一趟去西安的班车，我的武装卫队看来也不那么凶了。

在月台上，我被几个中国人围住了。外国人很少在潼关被阻挡的，而在全中国，美国人通常都受到欢迎，这次却不同了。一个人挥舞着一张报纸威胁地说，“报上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拒绝帮助中国。”我以前在中国从未感到有任何反美情绪。

我乘坐的火车于凌晨两点到达西安，埃德和吉姆带着一个警察卫士正在等候，他们直接把我带到他们下榻的招待所。

埃德对我的情况发表评论说：“你看来不象吞吃掉猫的金丝鸟。”

“你穿着的这件蓝色中国学生长袍，看上去活象一名传教士——相当别致。”吉姆补充说。

“你们俩的书写得怎么样了？”我想知道。

“都已经完稿了，也和出版商讲妥了，”埃德报告说：“我刚

寄走最后一章就来找你了。”

“当然你要去延安，”我对吉姆说：“你将是第一个到共产党区域去的英国籍人。”

在招待所，周先生以他最优美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微笑接待我。“我把你安置到你的老房间——我现在最喜爱的房间”。他充满戏剧色彩地说。他用青岛啤酒招待我们。

“这需要一些李德的白兰地。”埃德说。吉姆从他的行李中取出一瓶。“当你到延安时告诉他，我买了一瓶。”埃德说。

周先生急忙去取了几只玻璃杯。

埃德提议：“为金丝鸟和传教士干杯。”

但吉姆不赞成，“我们为什么不说不说一些重大的、对这件事有纪念意义的话呢？”

“为西安干杯！”我说。“为周先生干杯！他把我介绍给肯普顿·菲奇，菲奇把我介绍给埃菲·希尔，没有他们，我永远也去不了延安。为西京招待所干杯！在这儿我们三个人制订了那么多阴谋计划。”

当我们喝李德的白兰地时，我向周先生许诺，有一天我要写一幕关于他和西京招待所的喜剧。“你可以把它译成中文，”我对他说。

吉姆在他的第二本书中写道，“第二天我们去火车站送别斯诺夫妇，对于依然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们的警察来说真是大大松了一口气。佩格的卫兵……由于这第二次分离而深深地动了感情。”

当我们第二天出现在招待所休息室时，柯荪华正喜气洋洋地等我们。他紧握埃德的手，请他到红军前线去报道“真正的战

• 《未被征服者》，1939年由约翰·戴出版公司出版。写的是吉姆去采访红军和延安之行。佩格是我的绰号。他提到的蓝长袍及我在延安穿的系带子的便鞋现在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争”，而且愿意即刻就当埃德的警卫。

埃德解释说，伦敦《每日先驱报》要求他立即回上海，那里正在进行抗日的大战。

柯荪华说：“毛主席会感到失望。”他据理力争。为什么埃德认为在西北不会有一场大战呢？“我们会最先取胜，我们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没有，一次也没有——今后也永远不会有，不会败给任何人。”

他提出了另一个论点：“斯诺夫人有一张毛主席开的特别通行证——是他亲笔写的。”

两天后，9月24日，柯荪华曾当过班长的那个师，有名的常胜军第一师，在陈赓领导下在山西的平型关赢得了抗击日本的第一次大胜利。除了柯荪华，全中国都大吃一惊。中国人民早就期待着这样的胜利。

柯荪华毫不犹豫地命令埃德加·斯诺到红军前线去，这是他所知道的动员埃德的最好办法。柯班长从未怀疑过“革命能改变一切”，和他的“战无不胜的第一师”。最可贵的是，他所表现出的对外国人坦率自然的友好情谊及其对他们先进科学技术的羡慕。埃德和吉姆立即认识到一种特殊的东西方友好关系体现在这个严肃的青年身上，就象艾格尼丝在他身上看到了年轻的朱德一样。

艾格尼丝做了背部透视，结果表明伤势不严重，她计划到红军前线去。我们与她、吉姆和其他在西安的所有朋友道别。9月23日，我们乘11点钟的火车去滨海城市青岛。在火车站，我的警卫员使劲地握着埃德的手，以便建立一种全新的中美友谊——柯也努力与其他姓斯诺的人建立这种友谊，他希望我们两人回来。

埃德在他的第四部书《亚洲之战》里（在他的书中常用我的笔名提我，这是他据希腊文“尼姆”〔意思是“姓名”〕，和“威尔士”两词想出来的，因为我是半个威尔士人。）描述了我们在西安的重聚和我那次火车旅行：“看来，详细讲述妻子在一个

国家里的命运似乎没有必要，在那里，他们双双在一起行动或许更好些，但尼姆是唯一的……我意外地到达西安的时间好象是计划好的。我们在徐州换车……这座城市被炸得相当严重；85架日本飞机轰炸了陇海路和津浦路上的许多城市。我在距离这座城市不远处看到了一列罹难的火车；很多的旅客被炸死。我打听了这列火车的情况。如果我不把尼姆从潼关叫回来，她可能已是这死者中的一员。”

在青岛，我们在海滨旅馆住了几天。我们在这里休息、美餐，还洗海水浴。就我的记忆，我们是这座旅馆仅有的客人，但是德国人没有撤离他们统治已久的这一租界。

我的嗓子由于惊恐不安和紧张依然沙哑失声，埃德在经历了北京的战争和努力撰写《西行漫记》后也需要休息。我们乘坐马车，在吉米店里吃冰淇淋，观赏这座美丽的城市——但谁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来进攻这里呢？

埃德去上海报道战事。10月12日我登上《幽州号》轮去天津，这里也象别的船上一样挤满了难民——一些富有的中国人乘船来来往往，把轮船当成了旅馆。

我旧时的日记曾记载：“10月13日，曲阜，在威海卫有七架美国歼击机和一架日本飞机。在海湾外有六艘巡洋舰，中国船不准出海。”

在天津我抽时间参观了一下市容，日本在7月29日轰炸和摧毁了南开大学。

我不得不在天津又在北京两次通过日本检查站，北京已于8月11日被日本占领。所有中国人都要受到严密的、粗野的搜查。但是日本人不敢触动任何一个美国人，因为害怕美国卷入战争。但我一直还在担心罩在外衣里面的带有笔记本和胶卷的救生带，我最担心的是有关朝鲜人的笔记。我在《阿里郎之歌》中曾写过

• 埃德加·斯诺：《亚洲之战》（纽约，兰登出版社，1941年）。

这个人。日本人无疑会夺走这些笔记的，如果他们怀疑这些宝贵的资料有用的话。

我想念北京，这座没有勇气也没有畏惧的古城。10月17日，火车带着悲哀的长鸣驶过了永定门的外墙，随后天坛呈现在眼前，我又见到了城墙上的我的老朋友狐塔，又看到了前门，我和埃德曾在这座高大的城门那里摄下中国学生与警察搏斗的镜头。

日本现在占领了这个死气沉沉的城市，昔日这里曾是鬼雄出没之地。但仅仅12年之后，毛泽东就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并不感到震惊。

第四部分 工业合作社

第三十九章 别了，北京

在那所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他们发现我不仅得了阿米巴痢疾，而且还患有其它四种疾病。他们治疗痢疾的特殊办法包括在我病房的墙上挂着一幅希特勒画像。但愿那些医生和护士将不会因我反对轴心国而对我进行报复。

起初，我一点也不能入睡，神经过敏，忐忑不安。这原来是服用那位医生给我的含有神经兴奋剂的滋补药的结果。一旦我停服了这种药，身体就开始康复了。尽管我的病已痊愈，但还有一些很难受的脓疮需要继续治疗。

我离开北京几乎有七个月光景，一大叠要我撰文著书的信件等着我去处理。选载我们的文集《活的中国》的那些评论文章是很有抒情色彩的。

在那个时候，人们会几乎毫无目的地去购买一些奇特物品。我很难抵制这种倾向，就买了一块很大的金色骆驼毛地毯。（后来，在另一次挨饿之时，我不得不把它卖掉了。）离开北京去上海和埃德相聚的时候到了。我们的仆人难过地把一大堆文稿和一些书籍包装起来——足足装了40箱。

我用瘦小的颤抖的手，整理从13号住宅的壁橱中取出我那些可信赖的老朋友的相片。这时我记起了那位健康而幸福的23岁的

美国姑娘^①。六年前，她带了几件漂亮的夜礼服来到这儿，体重比现在的100磅重20多磅。我依然不想做一个殉道者。我忙得不可开交，不能更多地考虑自己的身体，1935年以来，我的情况一直如此。我好似被一阵旋风卷走，来到我不熟悉的另一个世界，就象我特别爱读的第一本书《奥兹的术士》中的多萝西一样。

我痛切地意识到，我甚至还没有写过第一本著作。这一次，我将不惜任何代价把它写出来。

^① 指本书作者自己。

第四十章 工合：我们创办工业合作社

1937年11月21日，我离开北京和天津。有几天，就象六年前我曾站在《总统号》轮船的甲板上眺望那热闹而繁华的黄浦港一样，我站在巴特菲尔德和斯怀尔轮船公司的一艘近海轮船的窗户旁向外瞭望，映入眼帘的情景与六年前的多么不同啊！

黄浦江两岸，数英里之内一片废墟。日本的货船已在装载掠夺来的机械和废铁，运往本国。上海仍在燃烧；中国人从8月13日抵抗到11月9日。12月3日，我正好目睹了日本军队在南京路上的庄严而紧张的胜利阅兵式。我从前曾乘人力车经南京路去美国总领事馆上班。现在，在海军上将亚内尔阁下的《奥古斯塔号》旗舰上不再举行饮茶舞会了。外国的亚洲舰队仍然停泊在黄浦港，但日本已占领了整个上海，除了租界以外。（不到四年以后，在偷袭珍珠港的时候，日本把上海的外国租界也占据了。）日本军队没有遇到抵抗，向前推进了200英里，到达中国的首都南京，用难以置信的暴行，于12月12日占领了该市。

在海关码头等候我的，有我的丈夫和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他们翻起了外套的领子，抵挡凛冽的寒风。我不想把行李单递给埃德，但又不得不递给他。他惊讶地吹了一声口哨。“你托运来了近40箱无用之物。谁去付全部运费和存放这艘船上的保管费？”他多么讨厌行李！他实际上只带着他需要的一半行李旅行，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他总是缺这少那，措手不及。

“只不过是你我的一些文稿，一些书籍，又不是什么家具。”

当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和我等候时，我问他，中国人怎能

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打仗呢？！

“中国的工厂70%在上海和无锡，”他说，“而其余的大部分在长江畔的汉口。”

我们三人乘出租汽车，穿过了一群群疾病缠身、衣衫褴褛的难民。“在这些街道上，肯定有60万失业的、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工人，”约翰·本杰明说。他在红十字会做一些领导工作，但半途而废了。“可笑的是，为了解决救济问题甚至想到开设施粥所的办法。上海租界上至少共有150万难民。”

埃德议论说，中国人几乎所有的机器都没有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区去，并问约翰·本杰明：要是没有什么办法在日本人把全部机器弄到手之前使国民党政府疏散运走一些的话，那么，谁是国民党首领的亲密朋友呢？

“在中国还从来没有那样干过，”本杰明委婉地回答。

我同约翰·本杰明在他暂时居住的“美国俱乐部”里一起进餐时，他给我简短地讲述了上海沦陷的某些细节。当附近的数百名居民因中国飞行员误投炸弹而被炸死时，他一直在这座俱乐部的屋顶上注视着。死者的鲜血流入路旁的阴沟。

埃德在巴布林·韦尔区的梅德赫斯特大楼租了一套公寓房间。就在那里，在同许多人的多次长时间讨论中，一项计划诞生了。这是一项我将能把它作为我对历史的微薄而长期的贡献而加以回顾的计划，即工业合作社计划。

12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埃德带我到路易·艾黎的住处同他共进午餐——吃烤牛肉，甜食是胡桃。大约在1929年，埃德在西北地区报道那次可怕的饥荒时，在火车上曾短暂地同他见过面。但我以前却从未见过这位肌肉发达、精力充沛的人。我立即就喜欢上路易了。他长着一头黄中带红的头发，一对深蓝色的眼睛，宛如大陆架以外深海的海水。尤其是看见一位在东方多年而依然保持精力旺盛、体格健壮的外国人，我感到格外高兴。不管怎么说，他是

1927年到达中国，而且当年发生的一场大屠杀，就象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西兰军队时的恐怖经历一样，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创伤。

路易有魅力，很腼腆，沉默寡言，很有教养，而且依然相当孤独，虽然他在那场饥荒中收养了两个中国孤儿。他的幽默感受到了抑制，他是一个爱发怒的人，充满着各种义愤填膺的激烈感情。

“我愿当一名机枪手，”他一边用手指掐着胡桃，一边说。

路易是英国文明的最好的化身——充满爱尔兰—英国人的富有诗意的情感，喜欢体育和娱乐，热爱大自然，喜欢作长途的徒步旅行，尤其是有清教徒似的道德——不仅有工作道德，而且有良心，还有诚实的劳动人民的品质。他是一个天生的社会主义者，换句话说，他具有健康的本能和感情。他有童子军的传统、遵守英国士兵的绝对勇敢和尽责的准则等一切优良品质。而且，他尊重每一个人。噢，不仅如此——他对拒不用手干活的“知识分子”不屑一顾。他同他们永远也合不来，尤其同那些意志薄弱又“爱面子”的中国型知识分子搞不好关系。

路易尤其憎恶爱慕虚荣。他决不装模作样，甚至在同蒋介石夫人谈话时也是如此，这对他所从事的工会工作来说成了某种不利因素。

路易具有领导才能，但他也很谦让，而且乐于听从别人的命令——这是他年轻时在军队里就已学会了的。这是他的“社会主义”特性的一部分。（1960年，他最终加入了新西兰共产党，与此同时，他有点儿中国化了，适应于他在中国的环境。他仍然居住在中国，住在北京的原意大利大使馆里，他成了全部时间都在中国旅行的人之一，他徒步或乘任何交通工具去那些最偏僻的地方旅行。）

路易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秘书中已有了一个追随者，所有这些秘书都有西方社会的良知。当艾达·普鲁伊特在1938年遇

见路易时，她就决定把她的余生奉献给他，做他忠诚的女仆。路易是她或任何这样的西方社会工作者所遇到的唯一男子汉，他符合她们关于在中国的西方男子应该是怎样的人的理想。

在我们例行的星期日午餐时，路易和埃德开始总要表示他们的愤慨之情，批评和谴责蒋介石的一切所作所为。他们对中国的机器在被日本缴获之前未被撤走一事火冒三丈，不管日本人将利用这些机器还是将从战略上毁坏中国工业基础，他们都很气愤，埃德和路易都希望这些工业发挥作用。

我的观点与他们不同。我不相信批评会有用，除非我提出某种更好的办法。为什么白费时间去把造成当时中国局势的责任推到蒋介石或其他任何人头上呢？事情很清楚，路易正在消耗可以更好地用于从事生产的宝贵精力。但是，他能做什么呢？在那种糟糕透顶的、毫无希望的困境中，谁能有所作为呢？我们三人的头脑应该去考虑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路易是一个天生的移山者——我则是一个天生的推动象路易这样的人的主要谋划者。有些事情必须一拍即合。

路易是这块国际殖民地的工厂监察员。一得到日本人许可后，他就立即用他的办公用小轿车把我带去察看那些工业地区的荒芜景象。在1938年进行这样的一次旅行之后，路易写道：我“监督”着他，并且说：“‘瞧！路易，中国今天所希望的是在各处建立工业……一个搞工业的运动。……我告诉你，路易，你说喜欢中国，你就得放弃这个工作……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去做某些将会有用的事情。中国人生来是倾向于搞合作的。’她是这么说的，而且比这些说得还要多得多……‘让我们把一切都放下，用文字来描绘一幅能够干些什么的图画。’”

我们进行了多次这样的视察。有一次视察回来，我为鲍威尔办的《中国周报》写了第一篇关于工业合作社——我们最后这样

◆ 《工业合作社的两年》，路易·艾黎著（香港1940年出版）。

称呼我们的组织——的文章，题目是《日本的吸血政策》。这篇文章引起了约翰·本杰明的关注。

在一次宴会后，我脑海里产生的那种新思想受到了英国领事约翰·亚历山大的激励。我吃惊地发现，同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态度形成对照，他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合作社却很热心。在那次宴会上，我们并没有讨论工业或者中国的问题，但是他的话给了我一个新的概念，他说：“在任何类型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或者你所处的社会中，合作社是民主的基础。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能够建立一切。”

这不恰恰是中国所需要的吗？当我后来在回顾那次讨论的情况时，我感到疑惑：为什么不把工业和合作社结合在一起呢？我一产生这个概念，就确信这样做完全正确，绝对必要的；什么也动摇不了我的信念。然而，我找不到实例来说明它，也找不到任何语言来描述它；起初，埃德和路易都不愿意接受这种模糊的、在我们看来是新的思想，尽管我们想象在某个地方必须存在这样的合作社。

未过多久，我们在上海发现了一本描述我们所想之事的书。这本书是由C·F·斯特里克兰写的，我已忘记了书名，但1938年5月，在我们出版的第一本小册子《中国的工业合作社》中，我们重印了该书的某些内容：

“合作者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劳动者自己拥有工厂，自己管理工厂……通过合作团体雇用职工的方式从事生产，这是北欧的更为有用的方法，而那种秘密合伙的工场……不是合作社。公开性是合作社的实质。……”

• 《读者文摘》（1938年9月号）转载了这篇文章。

•• 详见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开端》一书（博学出版社，1961年）。在我1941年所著的《中国为民主奠基》一书中，也许能找到那些经过国际联盟核查的章程和细则。

埃德的思想总是很开放的，他不怕新的思想。但是，路易却不仅很谨慎，而且已经信奉他所认为的那种正统的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谁也不希望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是那时一个最不吃香的字眼。那时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是如此之大，以致希特勒因这种自取灭亡的分裂而取得了政权。

我们三人都知道，中国现有的合作社是多么腐败而无用；那些传教士搞起了这些合作社，有一些是用来对付江西的共产党人的。但是，我已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生产者合作社同其它合作社是不一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才是改变社会结构的关键，而不是分配和信贷的变革。乡村需要工业革命——为什么不靠合作社来实现呢？

（那时候，我们并不清楚更大的目标——然而，现在它是苏联同中国敌对的主要原因之一。小生产会滋生资本主义，而不是导致社会主义——这是苏联的理论。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即使如此，在中国却别无替代办法。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在条件不成熟时搞任何类型的合作生产，他们只有国家工业和私人工业，除了仿效苏联，没有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计划。我的丈夫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允许在他领导的地区搞工业合作社，答复是肯定的。直到1949年以后，这是红区工业生产的主要方式。

毛泽东的思想被恰当地表达为“两条腿走路”，即大、小工业并举。但是，苏联决不赞成中国的合作社，而且现在也不喜欢印度的50,000个合作社，在印度，也奉行搞大工业的思想。）

路易·艾黎在1982年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10周年的讲话中回忆说：“对我们来说，在1937年，为了抗战，重大的问题似乎是如何在中国内地发展足够的经济力量。……埃德加那时的夫人佩格说，‘必须有一个人民的生产运动，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办法是把人民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把他们的生产单位联系在一起。答案就是搞工业合作社！’埃德加同意并且使搞工业合作

社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我回到家中，按照他们的主意，改变了我已制订的计划。”

路易和他在上海搞工程的朋友们制订了技术性计划。他们修改这一计划，直到这一蓝图适合于亚洲的任何乡村或任何不发达国家为止。（到1947年，印度、缅甸、日本和其他地方照搬了这个工业合作社计划。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请路易去印度从事这项工作，但路易并不想离开中国。）

路易是那种不可缺少的人。他走出城市，进入乡村。尽管受到反对派的不断干扰和破坏，他仍然凭着他的努力和品格，使这一工作开展起来。这些合作工业的产生是任何工业不发达国家的最惊人的成就之一。

我在1938年最初求教的中国人是两位基督教女青年会秘书——张淑义和龚普生。她们发现，上海有关合作社的唯一专家是鲁光明，他开办了第一个合作社——铁匠合作社。我的脑海深处有一个活跃的想法：所有中国的新教徒应当破天荒第一次到基层去工作，作为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和得到外国人帮助的酬报。同样，所有的传教士也应破天荒第一次支持一项可行的自助计划，这也是他们对中国、对他们国内的财务赞助者所承担的义务。这些教会团体是提供过帮助的。我未听说过即使是最反动的传教士有过反对工合的事，尽管他们给予合作社的帮助不大。他们宁愿让学生留在学校里，而不去从事生产，不去帮助“救中国”（那时的用语）。

1938年4月3日，在上海锦江饭店的一次晚宴上，我们成立了第一个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休伯特·梁（士纯）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约翰·亚历山大是书记。休伯特带来三个上海的重要银行家，其中包括徐新六（不久以后，当他携带计划去汉口时，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罹难，有些人认为这次事件不是偶然的）。休伯特还带来了黄婷初小姐（俱乐部的一名女职员）。我带来我们的出版人胡愈之（1949年，他成了北京出版工作的领导

人)。加上路易和埃德，在场的共有11人。第11位是龚普生介绍给我的合作社专家鲁光明。

在我们的会议上，约翰·亚历山大不得不隐瞒姓名，不露身份。在我们第一次共进晚餐后，他就离开我们去旅行了，直到3月18日的一次秘密会议前，我们没有再见到他。那次会议记录写道：“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提议，并和路易·艾黎合作，制订出了一项在中国建立合作社的简要计划。……请教过亚历山大并要求他给予帮助……亚历山大自愿去争取美国和英国合作社运动的支持。”

和我们所办的杂志的情况一样，讨论工业合作社的会议把各种不同观点的人组成了一条统一战线，达成一种妥协办法，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筹集资金。

然而，除了对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科拉克—柯尔爵士的工作外，其他事情都寸步难行。我们请求这位大使给予帮助，使蒋介石政府允许开始进行这项工业合作社工作。他得到了蒋介石夫人和她的姐姐孔祥熙夫人对这一计划的支持。早些时在香港已要求宋家的另一个姐妹——孙中山夫人赞成我们的计划。那时她是左翼人士和自由事业之间的联络者。

至于政府，条条道路通向宋家王朝。总理孔祥熙博士被他的夫人霭龄和蒋介石夫人所迫，成了有名无实的头头。当孔祥熙起初拒绝工合计划时，霭龄的妹妹蒋介石夫人突然哭了起来。政府就从救济金中拨出了500万元，但发放得如此迟慢，致使中国的工业合作社运动几乎被扼杀了。

工业合作社是整个宋家王朝支持进行的唯一的计划。例如，孙中山夫人是埃德加·斯诺的一位好朋友，然而，蒋介石夫人却讨厌斯诺。孙夫人对她宠爱的弟弟宋子文施加了影响，使他支持这项计划，但他同他的姻兄孔祥熙博士意见不一。宋子文在幕后帮助工业合作社，而且还支持左翼事业。他是那时中国最重要的银行家。

1938年6月15日，我们在银行家俱乐部聚会，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参加了这次聚会，陪同他前来的是路易主办的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朋友之一，名叫塔莉莎·格洛克。（和路易一样，塔莉莎仍在中国幸福地生活着。在那里，她帮助过孙中山夫人，而且已有一点中国化了。）

与此同时，W·H·奥登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是英国大使科拉克一柯尔的客人，他们正在进行一次写作旅行，写他们的著作《通向战争之路》。我们把路易介绍给他们。他们尽力使英国大使更积极的帮助工业合作社。但是约翰·亚历山大在数年后对我说，对科拉克一柯尔产生主要影响的是埃德和他的新著。

1938年7月，路易作为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主要顾问到达汉口，陪同他的是他的一些中国工程师，他们被认为是“贝利弟子”，因为路易和他们所有的人都受到过已故的约瑟夫·贝利（一位传教士）的影响。

在那第一年年底，建立了拥有15,625个会员的1,284个工业合作社。

到1938年9月，我写好了我的第一本书《续西行漫记》^{*}，胡愈之的地下救国团体从我的打字员处取走了这本书的稿子，并秘密地把它译成了中文，他们并取走了埃德刚出版的《西行漫记》一书。我还为胡愈之写了一本题为《革命生涯》的书，书的内容包括我在延安写下的大约34个人的自传。我又写了一本题为《中国之妇女》的书。

我一直在促使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第四营”在那些基督教

* 道布尔戴和多兰图书公司出版（纽约，1939年），这是对本书出于礼貌上的赞扬之举。《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头版评论称：“她有写旅行记叙文的才能，这是写镇静而幽默的、具有丰富多采的奇闻事而又有可靠情报的记叙文的才能。法国人几乎独具这种才能，而这种才能在盎格鲁—萨克逊人中是极其罕见的。”埃斯奎尔写道：“《续西行漫记》有戏剧性，情节引人，激动人心，而且有新的素材，这些特点应使此书成为畅销书。”

女青年会办的难民营中做好卫生工作，以解决霍乱病问题。并且我一直在影响那些工厂的女工，让她们去内地。

但是，我最大的精力和创造力是用来设计出推动工业合作社的方法和手段，而且不断地促使人们为这项计划去做工作。这项工合计划有其自身的生命力，有独立的本质。不管曾有过多少次由于不可能和毫无希望而放弃这项计划，但它还是象巨人安泰^①一样一次又一次站立起来。

埃德为我的著作《中国为民主奠基》（香港，1940年第一版）写了一篇前言，他写道：

“不到三年之前，尼姆·韦尔斯……陪我同上海的一位好友吃饭。……我们的主人——一位合作社的热心人提出，应该在合作社的基础上把世界组织起来，作为从事民主工作和防止战争的手段。尼姆·韦尔斯不同意他的提议……但在几天后，我听说，尼姆谈到某些合作社思想时讲得很好……她正提倡在中国搞难民生产合作社；不搞施粥所和非生产性的难民营。……她还在这灿烂的闪光中看到：在将来建设战后更好的中国时，这样的一个运动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最终可能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因而，‘工业合作’，正如当今在全中国数以百计的自立的工场中所实现的那样，首先是尼姆·韦尔斯的思想的产物。正是她首先使路易·艾黎对搞工业合作社的可能性产生了兴趣。……艾黎先生（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新的主要技术顾问）慷慨地承认了这一事实。……主要应归功于尼姆·韦尔斯的推动，艾黎和他的‘贝利工程师们’制订出了这个计划的技术上的细节，这个计划成了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一个如此重要的榜样。但是，要不是由于她的新思想的合理性，和她那始终不渝的热情的天性，这一运动就永远不会变成现实。……她在发动这个伟大运动的创造性思想方面的作用……激励了（其他人）……她自己的不屈不挠而又毫不自私的劳动和贡献，为别人作出了榜样。”

^①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地神之子，战斗时，只要身体不离开土地，他就百战百胜。

第四十一章 香 港

大约在1938年6月，埃德从上海去香港。后来他又到了内地，从事报纸工作，并为他的下一本书《为亚洲而战》收集材料。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之后，中国政府迁移到内地，先是到汉口，后来又到长江上游的重庆。1938年秋，汉口落入日本人手中时，埃德又回到香港休息。我重新收拾好40箱行李去那儿同他团聚，在里帕尔斯湾旅馆游泳，晒日光浴。

从1936年以来，我们两人一直紧张而努力地工作着，其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至少我是这样的；埃德尚未达到那种地步。他的体重从通常的165磅降到125磅左右，而我的体重还不到100磅。不过，我们依然陶醉于我们的能力和成就，靠超越体力的某种东西生活着。我们的基础是坚实的——我们是正确的，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从西安事变以来，我们对此一直确信无疑。而且，这肯定对其他人是有影响的。

我乘坐的“巴特菲尔德和斯怀尔轮船公司”的近海轮船在香港港口靠近了码头。埃德和约翰·利宁来接我，两人都很消瘦，脸色苍白，但在浅黑色的眼圈中，放射出喜悦的、炯炯有神的目光。这时是另一番滑稽可笑的情景。

“我的天哪，她在这一堆行李中都装了些什么呀？”埃德感叹地说。

我的男仆正抓着上面的把手搬运我的得意杰作——两个竹制的书架（或书柜），每一层都放着一棵极其珍贵的盆景树。

“这种枫树到秋季就变颜色，”我解释说。“这种小竹林是罕见的。这棵多节的粉红色小松树长了90年了。这是一种真正的收

藏品。这些东西要放在出租汽车里，随我一道去旅馆。”

我是多么喜爱盆景啊！我的屋子总是摆满这些玩艺儿。

埃德作了个怪相。“行李单在哪里？我对你说过，离开北京时把这40箱东西扔下一半。”

“你可以对艺术品残酷无情，存心不良，不懂装懂。你可以撒手不管。”我说。“从现在起，我来照料这些东西——而且钱也由我来付。别再争论啦！”

我把行李单交给在我身旁的仓库管理员，从他那里拿过了收据，使劲地把它放进了我的手提包。

（在1940年12月我们最后乘船离开中国时，我带了这40箱行李。我夸大了这些文稿和资料的价值，因为这些东西如此地来之不易。实际上，有些资料是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来的。）

在里帕尔斯湾旅馆度过的潮湿而闷热的几天，是我们婚后生活中的重要时刻之一。对中国人来说，我们两人的著作正在成为第一流的书籍，影响着整整一代向往自由的、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胡愈之把那些著作带到了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对那儿的年轻的中国人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对埃德来说自1929年、对我来说自1931年以来所度过的长期而艰难的岁月，看来是很值得的。我们以赞许的、甚至是逗趣的目光互相对视着，就象两个在渺无人迹的荒山野岭中不期而遇的饥饿的难民一样。

国民党的两位显要的遗孀——孙中山夫人和廖仲恺夫人带着后者的两个孩子——廖梦醒和廖承志，正住在香港。我是在延安时第一次见到廖承志的，那时他得了痢疾，卧床不起。（当我后来在1972年同廖承志交谈时，他主管同日本恢复邦交的工作。在1949年成立的政府里，对妇女来说，这两位遗孀被授予了最受尊敬的职位。在任何国家的政府机构中，孙夫人是当选为副主席的第一位妇女，而且她在1982年临终前，成了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并加入了共产党，我是她的治丧委员会中12位外国人之一。）

我和孙中山夫人的关系多少有点心心相印。我感到，在中国，她是了解并欣赏我的工作 and 情况的人。我们两人都保护和坚持作为我们的具有内在力量的女性气质。这一点的证据是，她给了我一枚青绿色的饰针和一套深红色的中国式服装，还给了我另一套衣服料子。我20多岁时充满朝气，豪爽而大方。从我欢快而贞洁的宝贵的青年时期以来，我一直没有见过孙夫人。她惊奇地看着我那已变得虚弱而疲惫不堪的模样，劝我注意健康。那年9月我刚刚31岁。

我一直没有忘记同孙夫人的这种特殊的亲密情意。我们两人都多种选择的权利，我们却选择了这条孤独的、艰险的流浪者的道路。但是，孙夫人具有我绝没有的某种本领：中国人的生存能力，有了这种能力，你经常可以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保存足够的精力，决不走极端。孙夫人没有失去她那鲜明的幽默或揶揄之感。她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她喜欢艺术。（1978年，在北京紫禁城她的邸宅里吃午饭时，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孙夫人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会”，是左翼人士在香港活动的中心。这个同盟会为共产党统治区募集资金。帮她忙的是那位港口医生的迷人的妻子——希尔达·塞尔温一克拉克，一位工党的社会主义者。希尔达没有学会“同中国人打交道”的艺术，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她办什么事都不顺利。

“你是怎样同中国人打交道的呢？”她热切地问。

“千万不要撕破情面，这样的话，什么事都好办了，”我说。
“在中国，关系破裂了，你就无法弥补。”

使我们感到十分惊讶的是，《西行漫记》成了一本畅销书。只有一票之差，即海伍德·布龙的那一票，使这本书没有被“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中。倘若选中，得到75,000美元，那该多好啊！同样使每个人（特别是中国人）吃惊的是，美国共产党人也攻击这本书，禁止他们的书店销售此书。在共产国际看来，此书

中有两、三句话含有错误。埃德没有从这种正统观念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当他在历史的前线流汗苦干时，这些学究式的诡辩家却从不对历史助一臂之力，这在埃德看来，未免太孩子气和太渺小了。那时候，我们还未能意识到，这是对毛泽东的一种间接的攻击。埃德曾从毛泽东那儿得到过信息。

我最后得出结论，那些追随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时候（当然并不是从1927年起）都不理解中国和中国人。

我们两人都忙于了解和报道中国的实情，没有更多地去了解那时席卷欧洲的思想冲击。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使我们的思想过度紧张了，同时，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隐伏着预感，即后来有2,000万俄国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是一些重大的事件，黑暗的事件，就象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恐龙从史前的山洞里出现一样。当我于1972第二次旅华时，苏联已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而且，这两个国家自1960年以来就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甚至简直没有注意到核战争同样地威胁着每一个人。

在里帕尔斯湾海滩上，埃德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哎哟，你的脸变了样啦！”他惊奇地说。“差点认不出你了。难道你不舒服吗？你的脸色真难看，仿佛你活不长了。你想想，我正要给你照张相呢。”

“为什么浪费钱呢？”我说出了他曾常对我说的那句老话。过去，当我可怜巴巴地站在某个历史里程碑旁徒劳地希望他给我照张纪念相时，他常常这么说。

“你还记得那一天我们在杭州第一次见面时我给你拍的那张相片吗？当时，那位苦力抬头看着，向我翘着大拇指说，‘顶好’！就在那时，我认定在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你，你和中国人在一起，将取得重大的成就。嗯，你取得了成就，但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啊！”

“你怎么认为你的脸色就比我的好呢？”我问道。我提议，我们俩下一步应该到某个地方去长期休息。在中国要干的事太多了。

“咱们到菲律宾的山区去，”埃德果断地说。“我累极了。我刚好松了口气。我感到我象个行尸走肉。我们可以在碧瑶打高尔夫球。”

“我太累了，连行李也收拾不动，”我接着说。

不过，每天早晨，不知道哪儿来的力量，我又获得了度过另一天的新的充沛的活力。我们两人都从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的冲突中不断取得力量和成功。

第四十二章 播种“芥菜籽”的时候

菲律宾——这个美国的骄子，在热带的炎热气候里懒散终日，耽于欢乐，满脑子想的是斗鸡，对未来满不在乎，根本不去考虑日本人的危害正如乌云将布满蔚蓝的天空。在菲律宾，除了十万华人之外，人们处于未明言的亲日的昏睡之中。而贫苦的农民却在所有的天主教堂里为佛朗哥^①捐款。

在码头上接我们的是菲律宾人、《马尼拉公报》的编辑和他的夫人。他们是约翰·本杰明·鲍威尔的朋友。我想，他的名字叫埃斯科达。他的夫人对我们说，我们刚好有时间换一下服装，去参加马拉坎南宫的舞会。这次舞会是为正在同那些奎松市人一起中途停留在这儿的德国贵人而举行的。“我为你们两人带来了菲律宾服装”，她说。

“但是，我的夫人带来了40箱行李和20棵小树，”埃德厌烦地说。“我愿意把这一切留在船上，让她带一块大地毯走。”

那位编辑要去了行李单，并介绍了一位将照料我们一切的一家酒店仓库的代理人。但是他说：“你们所有的盆景、蔬菜和花都要留在海关检疫站。”

“对丈夫们怎么处置？”我问道，“我的丈夫脾气很坏——是最坏的。”

在一家小旅馆里，我们几分钟内就穿好了菲律宾服装，上路去赴宴了。我们的脖子上都戴了缀有茉莉花和晚香玉的花环。我

^① 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长枪党首领，法西斯独裁者。菲律宾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的精致的衣服下边有个拖裾。在度过了几年朴素的岁月之后，我再次穿上了舞会穿的长袍，这是多么有趣啊！

埃德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知名人士来接待，他对此很喜欢，他甚至还允许他的夫人和他一起照相。哦，又一次跳起维也纳的华尔兹舞，真是欣喜若狂，有趣得很！

那里的中国人为我们举行了一次似乎令人惊讶的大型招待会。我们现在发现了一种新型的中国人——白手起家的富裕的海外移民，他们起初一无所有，后来却控制了象菲律宾这样的不发达地方的贸易和一部分经济。

大约850万华侨被列入中国人口的一部分，差不多全部（820万）侨居亚洲——大多数在泰国、马来亚、荷（兰）属东印度群岛和香港。作为生产自助的工业合作社的思想，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数代人以来，华侨一直帮助他们故乡的无比穷困的亲属。1940年前的四年中，他们给了在中国的亲属20多亿元（中国货币）。华侨救济中国的钱每月达7,000万元左右。

孙中山主要靠华侨资助。国民党却采取严厉措施，除了通过政府渠道，所有援助不得流入中国。不过，每个人都明白，工业合作社的救济金将消失在采取这样敌对而不合作态度的人的手中。（后来，在1939年，那些高等菲律宾华人和银行家决定送给工业合作社数十万元，并要求埃德去香港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处理救济基金，这时的情况正好是一场较小的革命。他们坚持要宋子文参加这一委员会，尽管宋子文是工业合作社名义上的头头孔祥熙的对手。埃德讨厌搞委员会，但他又毫无办法。菲律宾华人不信任其他人，也不相信宋子文，甚至连路易·艾黎也不信。宋子文把他的夫人和孩子派到碧瑶，由我把他们介绍给周围的华人，他们参加工业合作社会议，以募集基金。）

正如在我们把工业合作社思想引入之前，中国曾处于真空状态一样，菲律宾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立即被这种状态吸引住了，要求没完没了，我们几乎得不到一星期的喘息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想念起了在香港的路易。他从那儿来信说：“你应该安排佩格去成都，使那些地区正在犹豫不前的学生团体增强一些勇气。可以这样设想：她是经云南去成都旅游，而你去迎接她……”

我正以远远超过我的精力工作着。这种情况使我不能考虑路易的要求，他从来都不理解我体力上的虚弱或其他任何情况。

10月3日，路易给我们寄来了第一个工合的社徽，并在信中写道：“如果要使这项工作开展起来，还会遇到许多障碍。”

他的钱不够用来买下两辆卡车，而且为了应急正在动用他自己的现款。路易仅有的可以动用的钱是我们在菲律宾筹集的。这些基金是通过孙中山夫人和宋子文寄给他的。在我们到达马尼拉后的一个月左右，1938年10月27日“中国妇女救援会”寄出了第一笔钱20,000元，这是他们议决的总金额14万元的预付款。（除注明者外，均指中国货币。我们估计，我们能够让在合作社工作的每个成员挣得7美元左右。那时的兑换率已超过了5:1，这一兑换率在日本人进攻之前就流行。）

1938年11月5日，华侨又寄出60,000元，这笔钱是指定用在安徽的共产党新四军开办一个工业合作社中心的；他们正在积极地抗击日寇，所以，这是急需的。埃德在汉口曾同新四军的著名指挥员项英谈过工业合作社的事。

我们并不想命令可怜的路易去越过那种处于暂停状态的内战局面，立即横跨中国大陆去组织此事。我们有以统一战线来赢得这场战争的方式，这是唯一的方式。而且它正在发挥作用！

到11月7日，郑夫人主持的“中国妇女救援会”已经给了工业合作社12万元。正是这笔捐款挽救了路易和那一项计划，并使重庆政府大为惊恐，同意让工业合作社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这件事象一道闪电击中了重庆政府，而重庆当局对此大发雷霆。对于菲律宾发生的这种造反行动，他们忧心忡忡，火冒三丈。他们撤换了驻马尼拉的总领事倒并不是没有得到当地中国人的同意，

并向菲律宾群岛派去了两位使者，以弥补我们所造成的损失（绝大部分并非有意造成的）。

重庆政府坚持认为，除非通过政府和蒋介石夫人，不得寄送金钱。这一规定暂时得到了遵守，从1939年1月到3月，向重庆寄去了209,106.90元。

我们只是力图使工业合作社免于夭折，而向爱国华侨募捐的办法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比这更为卓越的政治手段了。就在工合计划到了要被扼杀的地步时，菲律宾的支持拯救了整个计划，以及路易。并因而能够以工合的方式来帮助毛泽东领导的地区，这具有最重要的深远影响。

与华侨支持工业合作社有关的一个主要矛盾是：菲律宾的合作社可能会损害同美国产品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商业利益。菲律宾人开始想搞的主要是消费性合作社，最重要的是把它作为从中国人手中夺取零售业的一种手段。我不得不很快作出说明：生产者合作社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而消费和信贷型的合作社则不然，特别在必须有一个抵制而不是销售日本货的阵线的地方，情况更是如此。

菲律宾群岛被日本占领了三年。然而，马尼拉却风平浪静。（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前一年，埃德和我曾提醒我们的朋友离开，但他们对此却只是付之一笑。有一次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弗朗西斯·塞尔高级专员共进午餐时，他们两人面带笑容，对日本将进攻菲律宾和新加坡的看法嘲弄了一番。他们没有想到，日本并不是由它的外交官和文官，而是由一支敢死队员组成的中世纪武士般的狂热的军队控制的。埃德和我为预见将来曾研究过以往的历史。我们意识到，日本拥有一台没有制动器的战争机器。）

直到工业合作社委员会成立之后，菲律宾的华侨才在社交方面与当地权势阶层融合起来。那些地位很高的美国人支持我们，工业合作社委员会是一个混合体：有菲律宾人、华侨和西方人；有右派、左派和中间派。华侨非常感激，十分惊奇。

大部分工作和外交事务是由波莉·巴布科克处理的，她是前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秘书，同一位美国进出口商人W·R·巴布科克结了婚。在碧瑶，E·E·克劳特尔夫妇成立了工业合作社委员会，并象巴布科克夫妇一样，百分之百地支持我们的计划和路局。

那时，东南亚所有华侨的侨领是以“木材国王”著称的郑老先生（Dee C. Chuan），他曾经是一位商人收养的身无分文的孤儿。虽然，他大部分时间都病魔缠身，我们还是同他和他的夫人结成了朋友。他决定倡议华侨帮助中国的工业合作社。我们想把，这些工业合作社建立在福建，因为大部分菲律宾华人来自那儿，而且象往常一样，他们在那儿的亲属正在忍饥挨饿。由于所有新的冲突，郑老先生的健康状况未能好转。在我们第一次同他谈话后，又过了几个月他就去世了。他最后的行动是向华侨提供资金，使得共产党地区得以在最有战略意义的时刻开办了工业合作社。实际上，没有他的支持，整个工业合作社运动就可能被扼杀；成为重庆政府所允许的另一种腐朽的、病态的、毫无意义的运动，其目的只是为了乞求国外的金钱。

郑老先生的遗孀继承了丈夫的事业，而且做得很好。虽然她是一位老式的中国妇女，但她继续尽可能地给予支持。

对埃德和我两人来说，同象郑老先生这样的中国人结交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切身的直接经验中对历史上的各种因素有了广泛的知识；否则我们是得不到这些知识的。

我们热爱郑老先生，也热爱在实现他的主张方面取得进展的其他中国人。另一位老人是碧瑶华侨侨领罗新兴，他对我们的计划确实抱着象郑老先生那样的支持态度。罗新兴是一位站在自由一边的追随孙中山的老人，他受到各派的攻击——正如我们全体参加工合运动的人，包括孙中山夫人本人，后来受到的攻击一样。

我依然记得碧瑶的罗新兴的面部表情，那时他要求我对他的

华人协会发表坦率正直的演讲，解释我们的计划。我拒绝了，理由是我从未作过公开演讲，仅仅作过非公开的讲话。他不相信，因为中国人喜欢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发表公开谈话。所以，我不得不通过译员作了演讲。随后，会员们投票决定把158.66元寄给我们的垦拓团，再转给安徽的共产党游击队。对谨慎处世的华侨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

在这件事之后不久，罗新兴自杀了，自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华侨在政治上的摩擦。这样的中国人是没有国家的人，是身在异国的华侨，不过，他们同其祖先仍有血缘关系。在菲律宾，在美国对日本的商业战中，华侨是美国人的同盟军。对于两位年轻的美国人来说，这是点燃他们两人心灵的火花，以推进一项救中国的真正计划——给华侨在中国的广大亲属有工作——不断地得到华侨的资助。

当我回忆往日，想到我为什么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用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十多年岁月来维持工业合作社的工作时，我就回想起了象郑老先生和罗新兴那样的人。这些人表明了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品质，他们是真正的人。当他们成为上层人物，掌握了数百万资财时，他们并没有变成法西斯分子和邪恶的反动分子。他们站在人民一边。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帮助别人。要是没有这样的人，孙中山是寸步难行的。孙中山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毛泽东和中国的其他一些受爱戴的领袖也是这样的人，即使在恐怖的斗争和努力的一生中，他们的品质也没有受到邪恶的玷污。

当个人有选择的可能时，当各种选择摆在他面前，他总是选择好的，而摒弃邪恶的东西。这就是对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品质的重要评价。这是伦理道德的精华——当面临选择时，总能识别正确和错误。这往往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表示。孙中山夫人是我所了解的这一类型中的最重要的人物。大卫·俞也是属于这一类。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人物……当然，这种人也不是那么多。

从一开始，埃德和我的脑海深处就有一个得意的计划：尽力筹款，以便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办工业合作社。毛泽东曾写信给埃德，欢迎搞工业合作社。但是，我们不能从任何左翼人士那里得到捐款。那是孙中山夫人的“保卫中国同盟会”的职权范围的事，这个同盟会从事帮助抗战和医疗事务等。

路易首先“在1939年2月12日同印度医疗队一道到达延安”，他在一封来信中说，“我见到了毛主席和边区政府的其他官员。……他们同意……搞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分部。……所以，总共拨出了1,500元……正在挖五个窑洞，并抹上白。……”

路易·艾黎得到毛泽东的亲自同意，在延安建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毛泽东很快地理解到这些合作社的价值。路易让他的养子迈克掌管1,500元，还掌管20,000元的贷款资金。五个月内，我们办起了15个合作社。

开办的第一个团体是“延安制灯合作社”。它由七位成员组成，他们用菜油制造灯油，他们还制造一种改进了的金属油灯。下一个开办的是“棉毛编织合作社”，随后又建立了制鞋、制被褥（在保安的一个窑洞里）和“化学制品”（肥皂、墨水、粉笔）等单位。在保安，一家“化工”合作社收集医治痢疾的草药、制造“补脑汁”等药品，一共有16种之多。不久，在延安还建立了一家面粉厂，一家榨油作坊（原料是蓖麻籽），一家陶器制造合作社和一家运输合作社。

1936年6月，安德鲁·罗伊（一位传教士）写了他在延安“窑洞里”所看到的关于合作社的情况。他写道：“我是一个持消极态度的人，但是，西北地区存在着应使基督教徒肃然起敬的许多事物。”

在成都，罗伊和他的朋友约翰·斯潘塞·肯纳德后来着手为延安儿童筹集一笔用来购买羊皮连指手套的基督教基金。1940年1月15日，我一收到肯纳德的来信，就立即把它寄给了在马尼拉的波莉·巴布科克。她和一位叫安妮·格思里的基督教女青年会

秘书立即想出了一个主意，为在西北共产党地区的儿童成立“处处皆好友合作学校和工场”，并在当月寄出了17,000多元，予以资助。

不管土地如何坚硬如石，这是一个播种“芥菜籽”的时候。我明白了这一点。1939年4月，筹集基金委员会的E·E·克劳特尔夫人和我开始向在共产党地区开办的“国际中心”的计划寄去了大约200元，这笔钱将安排约30名中国人在一家新办的合作社工作。娜塔莉·克劳特尔得到了碧瑶金矿工程师们的关心，他们看得出生产的重要性。娜塔莉在那个市镇进行了小量的动员工作，得到92人的捐款时，她写道：“一个教会团体的100位伊哥洛妇女送了28比索，以照料两个难民。”

郑老先生和他的菲律宾华人寄出了20,000元，在安徽开办一家机器厂。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尼拉的菲律宾工业合作社协会——我们筹集基金的委员会投票决定，将其固定基金的四分之一专门拨给这家共产党的工厂使用。寄给路易的总金额超过了10万元，使安徽的工业合作社中心工作开展起来了。

路易不得不到长江下游的战争前线进行危险的旅行；1939年7月，在安徽开办了第一批合作社。第一个合作社每天制作20套军服。第二个合作社生产皮革制品——腰带、背包、左轮手枪皮套和皮靴。到1939年10月，开办了15个合作社，其中包括一个印刷厂和一个医疗用品厂。

一件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收集来的每一比索好象是开采来的一块红宝石。就这些美国人和其他人而言，它意味着思想上的一次完全的革命，这不仅表现在救济工作方面，也表现在对正在艰苦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友好态度方面。正是那些捐助忠于共和政府的西班牙的人们帮助了工业合作社，不过，其他许多人也提供了帮助。娜塔莉·克劳特尔所以对工业合作社产生关切心情，是由于她读了《西行漫记》，这和许多人的情况是一样的。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了，蒋介石的军队袭击了约有

8,000人的共产党新四军，打死了副指挥员项英，俘虏了叶挺将军。受到损害的还有我们的许多工业合作社，然而，碧瑶华人寄来的每一比索已经产生了作用——我们以示范性项目指明了这条途径，而那些游击队现在能够依靠他们自己的合作社生存下去。

我已在皖南事变前一个月，1940年12月，乘船离开中国。但是，这次事变的消息使我十分不安，如果说不上大吃一惊的话。蒋介石对消灭“赤色分子”的兴趣仍然大于对日本人的侵略的抵抗。在重庆，我们学生时期的老朋友龚澎小姐冒着生命危险，把这次事变的真相告诉了外国记者；她的丈夫乔冠华（后来当了外交部长）也是这么做的。在新加坡和爪哇岛，我们著作的出版人胡愈之带去许多本我们所写的那两本书，他象另一位传奇般的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唐家基一样，成了爱国华侨的良师益友。1940年，唐家基到中国旅行，促进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此时，这些华侨（大部分来自福建和广东）的故土和亲属正在遭受日本占领军的蹂躏，他们要求抗战，而不要打内战。

在埃德和我离开（埃德是在1941年2月启程的）之后，重庆政府派人窜到菲律宾、新加坡、爪哇岛和其他地方的华侨当中，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战，“以反对共产党人在那儿已取得进展的宣传活动，”他们这么说。居首位的百万富翁、银行家以及“远东华人商会”正在进行这种“共产主义”的宣传！但是，重庆政府为了得到大量现款，却又依赖他们。一般说来，募捐来的钱只是被那些首先装入自己腰包的人用掉了。

到1941年，路易已使1,800个工场营运起来了，而且在红区和非红区，数以百计的工场正在建立。这是关于“芥菜籽”的一种伟大的寓言。“芥菜籽”落在哪儿，它就生长在哪儿的土地上——大部分是在受到日本威胁而极其危急的共产党地区。在这些地区，工业合作社不仅是个理想，而且是唯一可能的生产手段。

1944年，反动派迫使路易离开了他的岗位，但非正式地允许

他作为纽约的“美国援华工业合作社委员会”的实地执行秘书留在中国。在纽约，到1951年我们关闭这个委员会时，我们为此项工作筹集了350多万美元。（我那时是该委员会的副主席。）

1947年，中国再次爆发了内战。我们的委员会分裂成为三派，两个反对派力图消灭路易，而其他人甚至没有意识到反对派们的所作所为——这时，我们从事工业合作社活动的人在山丹正遭到右翼分子的逮捕，有一位组织者甚至被活埋了。

《西行漫记》一书具有很大的魔力，它赢得了如此宝贵的声誉，而且使那么多人改变了信仰。与此同时，在有关处理困难的政治形势和筹集基金方面，我进行了新闻采访工作，干着体力活儿，而路易则把那些基金用于搞工业合作社。矛盾是如此之多，致使工业合作社实际上只是成了矛盾的汇合点。在这个汇合点，消极因素变成了积极因素。在重庆，斯诺这个名字令人厌恶，我们在工作中总是秘密地发挥作用；然而，其他人谁也不能挽救这种局面。我们（特别是路易）被指责为“哗众取宠”的人。但是，对于开办以及挽救工业合作社来说，这一点是必要的。

在那时候，办工业合作社的思想几乎受到了在中国的每个美国人的支持；而且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也对此寄予同情。但是，美国官方并未给予援助，只是在1940年突出地把埃莉诺·罗斯福安排进发起人委员会。后来，事情太晚了。1947年，中国再次爆发了内战。

1944年，毛泽东在支持办生产者合作社方面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办合作社不仅作为战时的紧急权宜之计——他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些合作社——而从原则上讲，最终是为了建立繁荣的乡村和把劳动力组织起来。

到1959年，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建立了工业合作社。那时，这种体制已变为大型的公社，它拥有工业，凭工分而不是工人的股份来发工资。不过这些公社在城市里行不通。在那儿，“合作社”是由街道基层、大部分是由家庭妇女和其他妇女组织起来的。这

些合作社是我们过去办的老工业合作社的“近亲”，尽管它们没有用工合这个名称和我们的旧章程和细则。

当我在1972年和1973年再度到中国时，看到这些小工业（包括土高炉），我感到非常激动。我们曾一度在菲律宾为这种小工业筹集过基金。工业合作社已成了工业不发达的古代乡村般的社会和经济与毛泽东提出的新的“公社”概念的桥梁。为了消除中国人的裙带关系和地方自治亲属制度的强大内聚力，为了能在这块骚动的国土上改变最难改变的社会，土地改革和办合作社也许是必要的。

第四十三章 别了，亚洲

从事工合工作的朋友们虽然一直来来往往，然而，直到1940年，我们大家才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聚会。这次聚会是在美丽的沃斯特小别墅举行的。这所小别墅是我们在碧瑶租下的，有两幢种有兰花的房子，周围一派山区风光。

为了给孙中山夫人筹集资金，吉姆·贝特兰正在讲演。

埃文斯·卡尔森辞去了他的公务，正在出版他的著作《中国的双星》。他充满着他那“灌输伦理观”的概念，这种新概念是新教徒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搞工合的路易·艾黎主义的结合，加上代表军队的士气和精神的朱德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文斯把工合这个术语译成了英语，把这种深奥的哲学灌输给“卡尔森的海军陆战队袭击队员们”。埃文斯是《西行漫记》的信徒和罗斯福总统的特殊朋友，对许多人来说，他成了美国文明的最好的象征。他是个领导者，而且有追随者。

路易·艾黎曾多次因忙于工作而患了疟疾和伤寒，康复后又竭尽全力地工作着；无论他健壮的、长了红色汗毛的双腿走到哪儿，一场一个人的革命在中国引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他第一次把工业革命引向中国的内陆——把生产方式改变为合作体制，并为将来的发展建立一些小规模的试验项目。

埃德加·斯诺正要写完他的第四部著作《为亚洲而战》。他那沉默寡言的、不愿抛头露面的秘书郭达已从中国来到这里，帮助他完成这项工作，正如他曾对《西行漫记》一书给予帮助一样。（在八十年代，郭达时常写信给我。他在北京从事《中国日报》的工作，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第一张英文报纸，这张

报纸主要是为学英语学生出版的。)埃德现在充满着功成名就之感，享受着他和生活的乐趣。但是，由于多年的过度劳累和紧张，加上战争期间造成的营养不良，他已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

我曾打算在菲律宾休息，但我并未这么做，我写出了两本书，并压缩了另一本。我还坚持不懈地对工合计划发挥作用。我的体重仍然只有101磅。在我们离开美国以后的数年间，我们两人为了不得痢疾，除了吃可以剥皮的水果外，任何生的食物都不吃。我们极需要维生素，渴望完全的休息。

我们优先考虑的是，在日本把我们当作战俘之前逃离东方。1940年后期，妇女和儿童得到命令实行疏散。不可能象我们从1932年以来就一直计划的那样取道欧洲回国，这是令人心碎肠断的事。1939年以来，欧洲就已处于战争状态。埃德作为认可的战地记者是可以去欧洲的，而且《纽约先驱论坛报》给了他一项工作。我很自然地催促他接受这项工作。我注意到，对于我的热情，他似乎有点儿心神不安！

12月份在上海时，我站在船舷上向埃德和约翰·本杰明·鲍威尔道别。他们穿着防弹背心，但拒绝离开那座已毁坏了的城市。埃德虽然优柔寡断，但是精神状态很好。

“当然喽，对你来说，去欧洲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说。“如果你不去的话，你将总是为此感到遗憾，我也会这样。”

“我猜想，你宁愿带着那40箱行李而不同你的合法结婚的丈夫一道去旅行，”埃德抱怨说。“当然，如果我不取道欧洲回国，我总可以乘泛美航空公司的巨型远程班机回去的。”那就是他内心所希望的事情——即使付出高价，也要飞回国去。

埃德一生所珍视的是做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的人。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为自由，他总是有家庭，有妻子，而且几乎毫不退让。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当他注视载着他妻子的

《总统号》轮船在黄浦江上离开他的视野时，当他未同他的妻子一道回国时，埃德一生中第一次产生了孤独之感。

我曾对埃德说：我将在横渡太平洋的一路上休息，当我到达加利福尼亚州时，我将绝对注意营养和彻底休息。他也需要营养和休息，然而，我的身体情况更为糟糕。

在旧金山，我船上的18岁的服务员帕特·托宾在码头上看管那40箱行李，并替我把它们存入货栈。（后来，帕特成了“国际码头装卸工人联合会”中的一位有权势的人物。）时值圣诞节期间，我到卡梅尔同一位朋友一起逗留了片刻。那儿的一位医生对我说，我需要住进一家营养疗养院，但我感到这样做太费钱了。

在卡梅尔，我开始接到了一些紧急的（而且很费钱的）电话，起先是从马尼拉、随后是从檀香山打来的——“我有点儿不舒服。我生病了，”埃德抱怨说，“我真的病了。我感到很沮丧，神经紧张，而且我不能作出决定啦！我想，我并不希望去欧洲。我也为你而担忧。我不知道你是否感到怠慢了——对吗？”

“不，我没有这种感觉。我希望你不要喝酒，不要把钱浪费在打电话上。你为什么不寄航空信呢？”

在他说下面这番话时，我才意识到他确实感到不舒服了——“我感到心神不定，我的健康被毁掉啦！我只不过是个大大的失败者，我们已花掉了我的全部积蓄。我还没有离开中国，可是我已经为她害上思乡病了。”

“你并不是个失败者——你是个重要的知名人士，”我一再使他放心。“你所需要的就是乘飞机回国，然后重新踏上自己的国土。你丝毫没有想到这是个多么伟大而美丽的国家。我热爱它的每一寸土地。我见到的每个人都渴望会见你。你马上就会过上欢乐的生活。”

那就是他所希望的事情——由我来决定，他应乘巨型远程班机回国，而放弃取道欧洲的旅行。

正在发生的大事不止一件。1941年1月7日发生了皖南事变。当时，我们民间工业合作社的全体人员中有一些人遭到了杀戮。蒋介石又回到了原来的打内战的立场上——不分青红皂白地实行毫无意义的大屠杀。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几个月中，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简直又成了人间地狱。只有一种光明的希望，我们的工业合作社和路易·艾黎，在全然不可能办事的局势下进行着如此英勇的斗争，而且获得了成功。

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老的格言——除了依靠武力，依靠枪炮和屠杀，无论什么事也干不成。除了用这种简单的办法，什么变化也不可能发生。我们一直力图建立一个统一战线，这不是为了统一战线本身，而是由于许多重要因素，其中包括涉及美国对未来的世界和中国的影响。我们为了得到美国在政策上的支持，已经提出了一项可行的计划，而且我们肯定这项计划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甚至印出了给罗斯福总统的一份请愿书，要求在对中国的援助中专门拨出5,000万美元，用于搞工业合作社——这样做本来是可能改变历史的。

在我的行李中的这份请愿书再也留不住了，非发出去不可。而且埃德和埃文斯两人都是鼓吹这种思想的“最积极的工合分子”。我们需要某些著名的好莱坞人士，而我就在这儿，在加利福尼亚州。然而，尽管我感到疲惫不堪而无力去组织一个委员会，但工合的神秘精神是不管个人情绪的。即使不是一个叫罗斯福的人当总统，埃德和我也不想使这项工合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对于我承担的所有超出情理、常识和我们财力的过多的工作和责任，埃德特别感到不满。我们两人所做的事都已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我们全靠一股激情和再次上紧弦后的力量生活着。只是那不时来临的意外成功所带来的令人陶醉的喜悦，才使这种工合小组迅速发展着。现在，在异国他乡因隔离而产生的强大的结合力被打断了。我俩分别住在太平洋的两岸。说真的，我俩第一次分离了。当我们在亚洲时，我们是不可能分开的；无论在哪儿，我

俩之间的生活纽带都完好无损。远隔两地只是使这种纽带更坚韧而不是更脆弱，因为危险感和对团聚的渴望使之得到了加强。

埃德那罕见的心理失常状态没有延续很久。1941年2月，我们在“夕阳大街”好莱坞的一家旧旅馆（“真主花园”？）会面了。十分钟之后，埃德忘掉了他的一切梦魇和忧惧。我们离开旅馆，到出售旧轿车的地方去看了一看。我们付了现款，买了一辆帕卡德牌轿车。似乎每隔几分钟，我们就从超级市场买大包大包的東西，回到我们的小屋——每样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生的。莴苣！我们已经十年没有尝到莴苣啦！

埃德发现自己是好莱坞的一位重要的知名人士。他对此很高兴。使我吃惊的是，我成了第二号知名人士。一位叫J·A·皮维尔的摄影师要给我照相，并把拍好的照片陈列在橱窗里，因为这张照片“看起来象琼·贝内特”。

好莱坞是那时整个国家的镜子，正处于它的全盛时期。它也是左翼反法西斯的民主阵地，充满着自助的哲学。我们正好是在他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到达的——他们把我们当作我们所支持的事业的、既是真实的也是象征性的代表。例如，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最近拍了影片《将军在黎明时死去》而站在“劳苦人民”一边。这样，他就冒险地介入了中国的内战。在这部影片里，加里·库珀扮演那位反对军阀的美国“行善者”；马德琳·卡罗尔（埃德最喜欢的明星之一）扮演女主角。迈尔斯通是《西行漫记》一书的钦佩者，钦佩这本书的，还有那时处于职业顶峰的约翰·福特和其他一些人士。

在好莱坞，为了那份争取用于工业合作社的5,000万专款的请愿书而组织了委员会，约翰·加菲尔德和林语堂是这个委员会的两主席，而一些最优秀的电影界人士是发起人。埃文斯曾向罗斯福总统和总统夫人谈过我们的工合计划，从1940年以来，埃莉诺·罗斯福一直是“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的发起人。

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和他的夫人埃拉·温特（林肯·史蒂芬斯的遗孀）高兴地向我们欢呼；他发现我在好莱坞的组织工作、特别是我同萨姆·戈德温的谈话令人欢欣鼓舞。我们同欧文·肖和后来成为麦卡锡主义的牺牲者的其他电影剧本作者进行了短暂的会见。迈克尔·布兰克福喜欢我的著作《阿里朗之歌》。后来，他写了埃文斯·卡尔森的传记，书名叫《了不起的美国佬，工合！》，1943年所拍的关于埃文斯的影片，是由杰出的演员伦道夫·斯科特主演的，这部影片是第一流的，而且现在依然流行。

事实上，埃德的体重一个月内增加了30磅——这个月的部分时间是在亚利桑那州的旅游者大牧场度过的。在那儿，我们过着隐居生活，以便忘掉中国和世界上事情，而有充分的时间来恢复健康。旅游者大牧场的场主说，她从来也没有见过象这样站在丈夫一边、具有献身精神的女人。

“从现在起，我将把我们俩的名字写到我的一切著作上，”埃德公正地说。“我本来应该从一开始就这样做的。”他说，即使我同那些著作没有关系，他也将把我的名字作为合著者写到他的著作上。这将是一种新型的著作活动：“我是个作者，而你则为著作的内容出力，象你以往所经常做的那样。”

我当然不允许这么做——这一点，他是明白的。我把他上述的过分的补偿的打算，归咎于他喝了太多的桔子汁！

我们在康涅狄格州找了一所门牌1752号的小房子——地下室的大小刚好放那40箱行李。我为埃德把一个旧的贮存玉米用的活动小木房移到了我们的地盘上，作为他个人的工作室。他简直爱上了它。当我去纽约旅行回来，我发现他买了另外一个同样的小木房，放在那个旧小木房的旁边。在他旅行的间歇，他在这座小木房里写了三本书。

冬天，我们是在纽约和华盛顿度过的。那些新政派人士热情地接见了我们，要求我们发表谈话、报道和写更多的著作。我们

担负了一项极为合适的职责，就象我们在中国时那样。当然，我们是独立的，从来也不是共产党人——在麦卡锡主义之前的岁月里，这确实是必要的。但是，任何信赖左派的人士的影响，正是麦卡锡主义者所要消除的。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一直感到提心吊胆。在这场大战的中期，埃德作为《星期六晚邮报》的记者时常到国外去。在太平洋群岛战役期间，埃文斯·卡尔森身在前线（由于战争的创伤和压力，他在1947年去世了）。我的三个兄弟都是军人，两个死於同战争有关的疾病，而第三个是太平洋先遣飞行中队的战斗机驾驶员。在中国，路易经常处于险境中。最后，他所办的工业合作社的全体成员中，有些人被捕，有些人被杀害。最惨的是吉姆·伯特伦当了战俘；在1945年美国人把他带离日本海滩之前，我们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他在日本一直被当作象码头上的苦力那样使唤。

由于埃德看待事物态度客观并能区分不同情况，所以他除了在他工作的“中国部”外，不再过问中国事务。但是，直到工业合作社委员会内部分裂后的1951年，我一直未能使自己解脱出来。我那时是该委员会的最后一任副主席。（1981年，我重新担任了这一副主席职务。）

埃德摆脱了往事的束缚——尽管没有全部摆脱，但比我要摆脱得多。在他于1972年逝世和我于1972年至73年期间再次访华之前，我不能重新提笔写些什么，甚至也不能重新阅读这本在那么多年前开始写的陈旧的手稿，因为这意味着重温每一页所叙述的往事，这使我想起，在那充满斗争和牺牲的漫长的岁月里，我所得到的报酬是多么微薄啊！

我想起了那么多年前两位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是多么勇敢；他们对任何人，甚至是相互之间的要求是多么微小；他们给予别人的是那么多，但又不在别人面前提起它，甚至在两人之间

也不谈及这些事。这段经历本应使我们俩得到比离婚更好一点的结局。但是，我们俩离婚的结局却暗含在这段经历中。这出没有怜悯、没有悲剧、没有冲突、没有善恶之争的戏还算是出好戏吗？

然而，这还不是最后的结局。1961年，《援外法案》第601款规定办合作社是美国的官方政策，这距1941年我们努力争取此事已有20年了。现在，不仅印度、而且非洲和一切工业不发达的国家都在开始建立一座通向未来的桥梁。当然，出于必要，它和以前建立的桥梁并不完全一样。但是，这种正在被采用的蓝图——工业合作社和大工业并存——这就是在中国创造的工业合作社。

结 束 语

1978年，我72岁时带领一个电影小组到中国，蒂姆·康西丁是制片人兼摄影师，埃里克·萨里宁是摄影师，纳尔逊·斯托尔负责音响效果。六个星期中，蒂姆几乎每天都要就斯诺在30年代的经历向我进行采访。在1978年旅行的整个期间，我跨越了同电影小组成员的“代沟”，对此我感到又惊又喜，他们不仅年龄只有我的一半，而且都是在那个电影世界沐浴惯了阳光的加利福尼亚人。

我惊讶地发现，在我们最后访问保安时，这些年轻而有经验的、但已筋疲力尽的电影小组成员，和我一样精神饱满，十分活跃。外国人来到这个偏僻的、离中国长城终点不远的穴居者的村庄，还只是第六次。埃德加·斯诺曾是到过保安的第二个外国人。在西北地区，由于他的一些著作，埃德已作为他们的“拉斐特”^①而出了名，而现在，甚至在41年之后，我受到了象“基督再临”般的接待。

我们就在中国革命的基地保安，处于真正的人民之中。在这里，人们几乎过着新石器时代的洞穴生活，然而，他们的思想却象任何地方的人的思想一样先进，至少他们在生存方面是聪明的。在毛泽东来到之前，保安就已经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政府。

当我走出毛泽东住过的窑洞，呼吸着清新而令人陶醉的空气

^① 拉斐特（1757—1834），法国的将军和政治家。1777至1782年期间，他曾在美国帮助过美国的革命斗争。

时，我的翻译说：“一位红军老战士的遗孀问，她能否同你握手。一位老战士和他的夫人也想同你握手，并请你到附近他们的窑洞里喝碗茶。”

我向一个小山谷那边望去，看到那三个人正在小丘上微笑着迎候我。那位漂亮的、长了白发的遗孀仍然裹着脚，穿着农民穿的老式的棉布裤子，在踝部用带子绑着裤管。那位脸上长了寿斑和布满皱纹的老战士穿着军服。

刹那间，我联想到了47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一位裹脚妇女的情景。当我现在同这位裹脚的寡妇握手时，一种情投意合的感情在我们的心坎里油然而生。这种情感越过了太平洋，而且，为未来——为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打下了足够的传统基础，这种特殊关系是数代人用那么大的勇敢、牺牲和冒险精神建立起来的。

1981年，在60个人中，我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获得者。而且在1982年被再次提名。这一提名并不是因为我取得了任何特殊的成就，而是因为我的思想和世界观具有对世界和平与进步的潜在的意义。我惊异地发现，我们的工合思想正在一年年地变得更为切实可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情况更是显而易见。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在它们同那些工业强国和地区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

1972年，我访问了印度50,000个繁荣的工业合作社中的一些地方。1942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把我的著作《中国为民主奠基》当作教科书，在印度创办了工业合作社。英迪拉·甘地总理对我说，她是多么赞成这些合作社。我认为，甚至只要有五、六个人读了《中国为民主奠基》这本书，那么，写作此书就是值得的了——确实有这么一些人读了，他们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夫人、尼赫鲁和甘地（这两个人斯诺都认识）以及美国和英国的与援华工作有关的主要人物。这些人中，只有甘地拒绝支持工业合作社思想。

到80年代，新兴国家出现的不稳定和动乱，使我们的工业合作社思想成了经济和外交上迫切需要的东西，中美洲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1981年，我恢复了过去的“美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我们力争使国会令1961年通过的《援外法案》第601款重新生效。这一条款曾使开办合作社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1981年举行的内罗毕会议提倡恢复能源计划，但没有提及创办能源工业的合作社办法。而且，那一年举行的坎昆会议也以陷入完全的僵局和失败而告终。这证明，对我们的生产者工业合作社来说，展现出了一个极好的时机。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没有理由来反对这种实现工业化的办法，这是一种对两种制度都几乎没有什么危害的妥协办法，也是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氏族部落主义或无论什么主义都可以共存的。

1982年，根据象路易·艾黎、鲁光明和S·T·孟等一些合作社创办人的要求，北京政府开始讨论准许恢复我们在1938年开办的那种类型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这个问题。1979年以来，北京政府已经建立了同类型的合作社，作为政府解决无业青年的就业计划的一部分。1983年春天，这一许可得到了批准。

我赞成人类取得的成就，赞成探索宇宙空间，赞成发明和创造。我赞成努力扩大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了解，哪怕是一丁点儿也好，我本人已尽力这么做了。我赞成健康而有组织的生活和思索，赞成自然界的和谐，包括人类的推理能力。我赞成最大限度的个性发展，我知道，这在美国是有可能做到的。在美国，我们拥有一切资源，来建设可能是最高类型的未来的文明。

象中国老年人一样，我崇拜我的祖先，穿宽松的裤子，喜欢喝茶。

我爱虎纹猫，我爱我那门牌号为1752的小房子，我爱罗伯特·雷德福、布鲁斯·詹纳，我爱我的那台用旧了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造的打字机，我爱那套《大英百科全书》，我爱公

众电视台放映的英国影片，我爱质地轻软而宽松的衣衫，我爱单一的家庭，我爱过去惯用的英语和乘火车，我爱巴台农神庙和美国历史（截至1960年），我爱意大利式馅饼、可口可乐、黑麦做的金枪鱼三明治，我爱威斯敏斯特大教堂^①和特尔斐^②……我爱保安。

① 英国著名人物举行国葬的地方。

② 古希腊城市，因有阿波罗神殿而出名。